

二十世纪文库

# 舆论学

〔美〕李普曼 著

林 珊 译



华夏出版社

责任编辑：况 且  
封面总体设计：郭 力 钮 初 呼 波  
李 明 王大有  
本书封面设计：呼 波

PUBLIC OPINION  
by  
*Walter Lippmann*  
The Free Press, A •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New York, USA, 1965.

舆 论 学  
〔美〕沃尔特·李普曼 著  
林 珊 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南里)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3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24 千字 插页 2  
198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8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500 册  
ISBN 7-80053-209-7/Z·023

定价：5.15 元

6/12/10/11  
16  
译者前言

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1889—1974) 是美国著名的政论家、专栏作家，他一生著述很多，《舆论学》是他的早期著作，也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这部著作问世以后，得到了美国乃至资本主义世界的新闻学界和政治学界的极大推崇。半个多世纪以来，不仅连续再版，而且许多美国大学的新闻传播院校一直将它的有关章节作为教材编入新闻传播学的教科书。英国企鹅图书公司出版了这本书的普及本，并在书上赞扬它是新闻学的“标准理论著作”。前些年，美国传播学教授韦尔伯·施拉姆来华讲授新闻传播学时，曾把李普曼奉为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并把《舆论学》列为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作品。

美国历史上一些著名政治领袖，早已意识到舆论的重要性。例如，十九世纪初美国总统托玛斯·杰弗逊曾说过：“我们政府的基础是民意，因而政府首先就要保障这一（舆论的）权利；如果要我在有政府而无报纸或有报纸而无政府之间加以选择，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十九世纪中叶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也说过：“你有舆论的支持，无往而不胜；没有的话，无事不败。”然而，传统的美国政治学却一直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探讨政党、选举和政府部门怎样决策等问题上，对于舆论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更没有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和研究。因此，《舆论学》的出版，曾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反响。

《舆论学》是时代的产物。本世纪最初的二十年，从美国国内的情况看，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从世界情况看，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帝国主义列强为各自的利益互相角逐，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是在列宁领导下，俄国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并建立起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这两件大事曾引起李普曼的极大关注。美国赫伯特·阿普特克在《沃尔特·李普曼和民主》一文中，曾描述李普曼在这时就认为“打倒社会主义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见美国《政治月刊》1956年第2期）再加上他亲身参与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工作，不仅从战时宣传工作的经历中充分体会到舆论的力量，而且对舆论的原理，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设想。

李普曼纵观国际、国内的形势，关注到时代的需要，及时地指出了舆论的重要作用，这是《舆论学》为什么具有这么大的时代价值和社会影响的原因之一。当然，其价值决不仅限于此，美国传记作家罗纳德·斯蒂尔曾评论说，这本书的名字平淡无奇，但是，它的思想却令人惊叹。那么，究竟《舆论学》提出了哪些“令人惊叹”的思想？下面不妨略举一二。

首先，怎样形成舆论的问题，在《舆论学》一书中占了较大的篇幅。李普曼把舆论看成是人们头脑里的想象，从而肯定了有一种类似铅版浇铸的“固定的成见”（stereotype）在形成舆论的过程中起着决定的作用。

一般说来，“成见”一词在英语中通常采用prejudice、pre-conception等等，带有先入之见或偏见的意思。李普曼采用的“固定的成见”是不同一般的，它象浇铸的铅版一样牢固而一成不变。用李普曼的话说，“一旦我们牢固地产生了这种成见，就很难解脱它。”它也能解释成为人们认识上的一种模式，可以把对于类似事物的认识都纳入这种一成不变的模式之中。

李普曼列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他认为：“在我们观察世界以前，已有人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样的了。对于大多数事物，我们是先想象它们，然后经历它们。……看到一点儿熟悉的东西，就象是很熟悉，有点儿生疏的东西，就象是非常陌生。”而且，“先入之见形成以后，旧的形象就会淹没新的视野，并影射到记忆中重新出现的世界中去。”因而就认为对事实的歪曲是深深地根植于人们头脑的机能之中的，“大部分人对世界的认识是

通过他们的感情、习惯和偏见这个三棱镜的反射而得到的。”也就是通过“固定的成见”得到的。

把上述理论应用到新闻报道上，李普曼就认为由于“固定的成见”起着重要的作用，使得歪曲的报道和虚构的报道比真实地反映客观实际要容易得多。而且，李普曼断定，即使记者是现场的目击者，也带不回真实的报道。“因为他本人带着一些成见到出事地点去，事后他带回来的多半是他想象的，已经改观了的一个事件的报道，”还说：“当成见的体系已牢固地形成时，我们就会注意那些支撑成见的事实，而不去注意那些与成见相矛盾的事实。”从而李普曼得出结论：“新闻和真实并不是一回事，必须清楚地加以区分。”

这里，显然涉及到了一个认识论的问题，究竟是物质到精神、客观到主观呢，还是倒置过来？我们坚持存在决定意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推动人们的认识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又是认识发展的动力。舆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反映了社会存在，它来源于社会实践，决不是来源于“固定的成见”之类的意识本身。

究竟有没有象李普曼所说的“固定的成见”这种意识现象？我们认为，“成见”这种社会意识是有的，但是，成见并不象铅版浇铸那样牢固不变。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社会意识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结构，其范畴包括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感情、成见、习惯、情趣等等都属于社会心理，它虽含有逻辑思维和理性的成分，但一般说，是不系统、不定型、处于自发状态的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比较直接的反映。认识本来就不是一次完成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成见作为社会心理，通过反复的社会实践是可以修正或改变的。

其次，作者指出由于世界太大，人们不可能直接地去认识每一个发生的事件，加上检查制度的存在和官方设置的保密制度等等原西，人们往往生活在报界提供的和自己所设想的一种“假环境”

中，作者以柏拉图的洞穴理论相类比，认为处在“假环境”中的现代公民对于纷繁的世界事务是很难进行考虑和作出明智的判断的，他们只能充当“局外人。”

第三，在舆论与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作者既然把普通公民看成“局外人”；认为他们既不了解情况，又无理智，那么，只有属于“社会贤能”的少数“局内人”；他们受过特殊训练，能够通过专门的“情报机构”得到准确的情报，作出明智的判断，因而能在社会上发号施令，决定一切；并可以通过宣传来左右“局外人”。它明确地写道：“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利益与舆论根本无法一致，并且，公共利益只能由一个特殊的阶级来管理。”因此，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杜威曾把《舆论学》称为“可能是目前用文字表达的对民主制最有力的起诉。”（见《李普曼传》中译本，第281页）

面对着重重矛盾的李普曼，不从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中去寻找答案，相反，却把形成舆论的症结归之于“心理因素”，提出了“固定的成见”、“假环境”、“新闻与真实必须加以区分”以及“‘局内人’统治‘局外人’等种种“理论”，这些“理论”无疑都是为巩固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统治地位和维护剥削制度辩护和服务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舆论学》在美国政治学界、新闻学界一直保持着极高的身价。八十年代的今天，美国新闻署仍把它作为“美国的重要著作”在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展出，并不是偶然的。施此来说，确实值得我们对它进行剖析和研究。另外，剖析和研究这样一本西方舆论问题的代表作，对于更好地推进我们的舆论研究工作和树立我们科学的舆论观必将是有好处的。

李普曼早年在哈佛大学求学时就曾表示过他厌恶《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著作和反对阶级斗争的思想，因而在本书中的一些地方，也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了多方面的攻击，希望读者注意分析批判。

这个译本是根据1965年的版本翻译的。1984年曾在内部印出

过，这次出版又经过较详细的校订。在定稿过程中有些拉丁文词句和疑难之处，曾请教了著名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同志，得到了他的热情指导。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领导对于本书的翻译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另外，范东生同志对译文进行了修正。特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译者的水平，译文中的缺点和错误，欢迎批评指正。

一九八七年五月于北京

“看吧！许多人住在一个地穴中，光线从洞口射进来，照亮整个洞穴。他们从小就囚禁在这里，腿和颈都被链条锁着，不能动弹，只能朝前看，不能环顾四周。在他们背后的远处，上方有一股火光在闪烁，在火焰与囚徒之间有一条隆起的通道，你将看到，顺着这条通道筑着一道矮墙，它就象一些提线木偶的演员面前的屏幕，他们在屏幕上表演木偶戏。

他说，我看到了。

我说，你看见了吗？有一些人在墙上出现，拿着各种器皿顺着墙走过；还有用木材、石头和其他材料制成的人兽形象；正象你料想的，有些囚徒在说话，有一些则沉默不语。

他说，这是一种奇特的影象，他们也是奇怪的囚徒。

我答，就象我们自己一样；他们只能看到火光射到对面洞壁上显现出来的自己的身影或彼此的身影。

他说，确实，如果从不准许他们转动头颈，除了身影以外，他们怎么能够看到其它东西呢？

对于他们所拿的物品，他们同样只能看到影子，还能看到什么别的东面？

他说，就是。

如果他们能够互相交谈的话，他们会不会设想，他们正在称呼他们面前的实物呢？”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中苏格拉底与格劳孔的对话。〔根据乔伊特(Jowett)译文〕



# 目 录

译者前言	( 1 )
------	-------

## 第一部分 引言

第一章 现实世界与我们的想象	( 1 )
----------------	-------

## 第二部分 探讨现实世界

第二章 检查制度与保密	( 21 )
第三章 接触和机会	( 28 )
第四章 时间与注意力	( 36 )
第五章 速度、言词与清晰度	( 41 )

## 第三部分 固定的成见

第六章 固定的成见	( 50 )
第七章 作为防护手段的固定成见	( 61 )
第八章 盲点及其价值	( 67 )
第九章 信条及其敌对者	( 75 )
第十章 固定成见的察觉	( 86 )

## 第四部分 兴趣

第十一章 谋求兴趣	(106)
第十二章 重新考虑个人兴趣	(114)

## 第五部分 创造一种共同的意愿

第十三章 兴趣的转移	(128)
第十四章 是或非	(146)
第十五章 领袖与普通群众	(156)

## 第六部分 民主政体的偶像

第十六章	自我中心的人·····	(167)
第十七章	自给自足的社会·····	(174)
第十八章	武力、官职委任权与特权的作用·····	(183)
第十九章	新形式中的旧偶像：基尔特社会主义·····	(194)
第二十章	一种新的偶像·····	(206)

## 第七部分 报纸

第二十一章	买主们·····	(210)
第二十二章	坚定的读者·····	(217)
第二十三章	新闻的性质·····	(224)
第二十四章	新闻、真实和一个结论·····	(237)

## 第八部分 有组织的情报

第二十五章	打入的楔子·····	(242)
第二十六章	情报工作·····	(249)
第二十七章	诉诸公众·····	(262)
第二十八章	诉诸理智·····	(271)

# 第一部分 引言

## 第一章 现实世界与我们的想象

### 一

1914年，有一些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住在一个海岛上。那个海岛不通电报，英国的邮船六十天才来一次。9月里，邮船尚未来到，岛上的居民仍在谈论不久前报纸上报道的关于即将审判凯劳克斯夫人枪击加斯頓·卡尔默特的事。因此，9月中旬的一天，全岛的居民都聚集在码头上，比往常更急于想从船长那里知道判决的情况。可是，他们了解到的却是英国和法国订立了神圣同盟，向德国开战已六个多星期了。在这不可思议的六个星期中，岛上的英、法居民和德国居民实际上已是敌人了，但他们相处得还是象朋友一样。

但是，他们的境况与欧洲的多数居民并没有多大不同。他们迟误了六个星期，在欧洲大陆上，这种间隔可能只有六天或六个小时。但都存在过一段间隔。当他们还没有从任何方面得到会打乱他们生活的消息以前，在这一段时间，人们仍然根据他们对欧洲的旧有认识来处理事物。每一个人都有一段时间照旧在适应环境，而实际上这种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直到7月25日，全世界的人们还在生产运不出去的商品、购买进口不了的货物、生计已计划好了、企业已筹划完了、存在着种种希望和期待，所有的信念都认为世界依然如旧。人们仍在写书描述那个世界。他们都相信他们脑子里的想象。然而过了四年，在一个星期四的早晨，停战的消息传来，由于停止残杀，人们吐露出难以形容的宽慰。在真正达成停战以前五天，人们已经庆祝战争的告终，尽管数千年轻

人已战死在战场上。

回过头来看，对于我们仍然生活在其中的环境，我们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我们可以看到，报道现实环境的新闻传给我们有时快，有时慢；但是，我们总是把我们自己认为是真实的情况当作现实环境本身。在涉及现在我们行动所遵循的信念时是较难回想起这一点的，但是，对于别的民族和别的时代，当他们狂热地相信那些荒诞可笑的世界图象时，我们却较易看清并自鸣得意。我们坚信，根据我们事后清楚的认识，他们需要知道的世界和他们确实知道的世界，往往是十分矛盾的两回事。我们还可以看到，当他们按照他们所想象的世界进行统治和斗争、贸易和革新的时候，他们得到了成果或者没有得到成果，却是在实际存在的世界里。他们出发探寻印度群岛却发现了美洲，他们诊治邪恶现象却绞死了一些老妇人。他们以为只要不断出售货物而永远不买进货物就会越来越富。一个哈里发服从于他认为是真主的意志，焚毁了亚力山大的图书馆。

圣·安布罗斯 (St. Ambrose) 写389年时，叙述了柏拉图窑洞里的囚犯不屈不挠地拒绝回头的情况。“讨论地球的性质和位置并无助于我们未来的生活。斯克里普彻 (Scripture) 叙述的，已足够供人们去认识它了。‘上帝并没有把地球挂在什么东西上’。那么为什么还要争论上帝是把地球挂在空中还是水上，因而又提出这样一些争议，稀薄的空气怎么能支撑得住地球？如果是挂在水上的话，地球又为什么不会坠落到水底？并不是因为地球在中间，就象是依靠平衡的力量悬挂着，而是上帝的意志强制着它，使它固定在不稳定而又空无所有的基础上。”<sup>①</sup>

这无助于我们对于未来生活的希望。这足够使我们了解斯克里普彻所叙述的内容。那么为什么还要争论？然而在圣·安布罗斯

---

<sup>①</sup> 亨利·奥斯本·泰勒：《中世纪的心理》一书中的引文，见该书第1卷，第73页。

以后一个半世纪，对于地球上相反地区的问题；意见仍然是混乱的。有一个名叫科斯马斯的修道士，因科学上的造诣而著名，因此受委托写了一本《基督教徒的剖析》或称《基督教徒对世界的看法》。<sup>①</sup>很显然，他所知道的正是期望他知道的，因为他的所有结论都是以他读过的斯克里普彻的著述为基础的。于是得出这样的意见：世界的形状是一个扁的平行四边形，南北的长度两倍于东西的宽度。陆地为中心，四周是海洋，这海洋又同样被别的陆地所围绕，洪水泛滥以前，那里住着一些人。这另一块陆地就曾是诺亚离岸的港口。其北部是一座圆锥形的高山，太阳和月亮围绕着它转，太阳转到山背后时就是夜间。天空与地球外侧边缘相胶着。四面有高墙连接凹面的顶，所以地球就是宇宙的地面。天空的另一端是海洋，造成了“水在太空之上。”天空的海洋与宇宙终极的顶端之间的空隙属于神。地球与天空之间居住着一些天使。最后，既然圣·保罗说所有的人都生来就住在“地球的表面，”他们又怎么能住在被假定为地球背面的地方呢？“我们得知，一个基督教徒眼前有这么一段叙述，‘就连地球背面的地方这个名称都不应该谈及’。”<sup>②</sup>

他更不应该到地球的背面去，任何基督徒的王子也不应给他一只船去尝试，任何虔诚的水手也不会企图去试试。对于科斯马斯来说，他的天体图丝毫不荒谬。只有想到他绝对相信这就是宇宙的天体图，我们才可能开始理解他曾怎样担心马吉兰或皮尔里或飞行员冒了与天使及天穹碰撞的危险在天空飞行七哩。同样，记住各个党派几乎都绝对相信他所想象的其反对党的形象，我们才能对战争和政治的怒火有最好的理解；他们不是把真正的事实作为事实，而是把假定的事实作为事实的。因此，象哈姆雷特那样，认为普洛尼斯就是皇帝而会在沙沙作响的帘子后面

---

① 莱基：《欧洲的理性主义》第1卷，第276—278页。

② 莱基：《欧洲的理性主义》，第1卷，第276—278页。

刺伤他，正象哈姆雷特说的：

“你这个鲁莽、多事的倒霉蛋，再见了！  
我还当你的主子哩；你自认晦气吧。”

## 二

伟人们，即使在他们活着的时候，通常都只是通过一种假设的人格而闻名。因此，古话说的对，在亲近的侍从眼里，没有人堪称英雄。对于侍从和私人秘书来说，也只看到少量的真实，他们自己常常沉浸在虚构之中。当然，一些皇室名流的人格都是塑造出来的。不论他们相信他们公开的品格，或者他们只允许皇室的内侍来安排，至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一种是公开的和庄严的，另一种则是私下的和有人性的。伟大人物的传记常常流于这两种性格的记载。官方的传记作者描绘社交生活，暴露性传记则记载另一面。例如，查恩伍德·林肯是一个杰出的肖像，并不由于他是一个实际的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英雄的形象，充满了重要性，几乎可与安尼斯或圣·乔治相比拟。奥利弗的《汉密尔顿》是崇高的抽象作品，是一种思想的塑造，正象奥利弗自己说的，它是“一篇关于美国联合的文章”。它是关于联邦制度国家形式的不朽作品，不可能是个人的传记。人们有时候创作他们认为是揭示内心世界的自己形象。雷品顿（Repington）日记和马哥脱·阿斯奎斯（Margot Asquith）的日记都是一种自我描述，最详尽地揭示了内心的细节，就象作者如何想象自己一样。

但是，最有兴味的，是那种人物肖像是在人们心目中自然地产生的。当维多利亚即王位的时候，斯特雷奇（Strachey）先生<sup>①</sup>说：“外界有一股很大的热潮，情感和浪漫开始流行起来，天真、端庄、头发美丽和面颊红润的小女王驾车通过她的首府的

---

<sup>①</sup> 利顿·斯特雷奇：《维多利亚女王》第72页。

场面，观众充满了忠诚的喜悦。首先，每个人对维多利亚女皇与她的伯父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对照。那讨厌的老人，淫逸和自私，愚蠢和荒谬，还不清的债务，倒霉和声名狼藉——它们象冬天的雪一样已经消失了，现在女皇已经加冕，并且光辉灿烂，春天已经来到。”

M·让·德皮埃尔富 (M·Jean de Pierrefeu)<sup>①</sup>直接看到过崇拜英雄，因为当军人享有最大声誉的时刻，他正是霞飞 (Joffre，法国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法军总司令——译注) 手下的一名军官：

“两年来，整个世界敬神般地庆祝梅因 (Marne，法国东北部) 的胜利。不相识的人们欣喜若狂地为表示他们的敬意，给他寄来包裹和贺信，其数量之多，几乎把包裹负责人的腰都压弯了。我认为，除霞飞将军以外，没有其他的战争指挥官能够理解什么概念比得上“荣誉”的含意。他们送给他一盒盒世界各地大糖果商制造的糖果，一箱箱香槟酒、各种葡萄美酒、水果、野味、装饰品以及器皿、衣服、烟具、墨水台、压纸器。各个地区送来他们的特产，画家送来他们的绘画，雕塑家送来小塑像，可贵的老妇人送来羊毛围巾或短袜，牧羊人在他住的小屋里雕刻了表达他的心意的烟斗。全世界所有敌视德国的制造商运送来他们的制品，哈瓦那送来他们出产的雪茄烟，葡萄牙送来了葡萄酒。据我知道，一位理发师用亲近将军的人们的头发精心地制作了一个将军的肖像；一位职业作家怀着同样的思想，用成千上万歌颂将军品格的片断写成特写。至于他收到的信件，有各种手稿，用各种方言从各国寄来，充满深情，令人愉快，洋溢着爱戴和敬慕的情意。他们称他是世界的救星，他的国家的父亲，上帝的代理人，人类的恩人等等。爱戴他的不仅仅是法国人，而且有美国人、阿根廷人，澳大利亚人等等；成千上万的小孩，未受父母的指点，

---

<sup>①</sup> 让·德皮埃尔富：《三个G. O. G. 和将军的大本营》第94—95页。

主动拿起笔来向他倾吐了对他的敬爱，他们中的多数人 称他为‘我们的父亲’。在战胜了野蛮主义的时刻，成千上万的人从心底抒发的感情和崇敬的心情是深刻的。对于所有这些天真幼小的孩子来说，霞飞就象圣·乔治击毁龙一样。当然，他具体体现了人类意识中的善良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思想。

狂人、傻子、半疯狂和疯狂的人都把他们阴沉的脑袋朝向他，就象朝向理智一般。我读过一个住在悉尼的人的来信，他乞求将军从敌人手下拯救他；另外，一个新西兰人请求他派一些士兵到欠了他十镑钱而不还给他的那位先生的住所去。

最后，数百个年轻的姑娘，不顾羞怯，不让他们的家属知道，要求与他订婚；还有一些姑娘希望去侍候他。”

人们把霞飞以及他的部下、他的部队所赢得的胜利和战争带来的失望、个人的悲伤，以及对未来胜利的希望，混合起来产生了理想人物霞飞。但是，除了崇拜英雄以外，还存在驱除妖魔的问题。通过同样的途径，体现了英雄，也出现了魔鬼。如果所有的好事都来源于霞飞、福煦、威尔逊或罗斯福的话，那么所有坏事都产生于凯泽·威廉、列宁和托洛茨基。正象罪恶都归咎于他们一样，好事都归功于英雄。对于许多头脑单纯和受惊吓的人来说，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政治倒退、罢工、障碍、不可思议的死亡或是不可思议的灾难，无一不归咎于这些个人。

### 三

对这种象征性人物举世瞩目之状异乎寻常，十分显眼，每一个作家对于描绘这种引人注目的、无可辩驳的典范人物都有癖好。对战争现实的剖析发现了这样的典范人物，但这样的人物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在较正常的社会生活中，象征性的偶像同样可以支配人们的行为。但是由于竞争的对象很多，每一个典型人物的影响都远不是那样无所不包的。不仅由于每一个典型人物最多



只代表一部分人从而只带有较少的感情色彩，即使在那部分人当中，对于个人不同观点的压制也是微乎其微的。在相当安全的境况中，那些舆论的象征会受到检验、比较和争论。它们产生和消失，互相结合又被人遗忘，永远不能把整个团体的情感完全交织在一起。毕竟唯在一种人类的活动中，所有的人完成一个共同的神圣目标。这种情况发生在战争中间的各个阶段，那时恐惧、好战和憎恨情绪占领整个精神领域，在厌倦感出现之前，战争的情绪便压倒或者吸附了其他每一种直觉。

几乎在所有其它境况中，甚至在战争陷入僵局时，可以产生足够大的范围的各种情感，从而造成冲突、选择、踌躇和妥协。正象我们将看到的那样<sup>①</sup>，舆论的象征通常具有这种利益均衡的痕迹。例如，停战以后，看看那种不稳定的、绝非成功地建立起来的“协约国统一体”的象征多么迅速就消失了，而每一个国家对于其他国家的象征性形象——英国是公法的捍卫者，法国守卫在“自由的前沿”，美国是十字军——也几乎随之立即破灭了。再看看每个国家内部，由于政党的倾轧、阶级的斗争和个人野心的发作，开始搅起了延续不断的争端，因而使自己国家的形象也遭到了损坏。随之，领袖的形象也一个不如一个，威尔逊、克莱门梭、劳埃德·乔治，他们再也不是人类希望的化身了，而仅仅成了一个幻想破灭了的世界的协商者和行政官。

不管我们把这看作是和平所造成的罪恶之一呢，还是称赞它回复了明智，在这里显然是无关重要的。我们首先关心一些虚构和象征，是为了忘记他们对于现存社会的价值，而要把他们看作只是人类交流机制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在，任何社会对其利益都不是完全有自制力的，每个人对于发生的每一件事知道得那么少，一些意见涉及的都是看不到和难以掌握的事件。戈弗尔草地的舍

---

① 本书第五部分

温女士<sup>①</sup>知道法国正燃着战火就去设想这场战争。她从未到过法国，当然她也没有到过现在这场战争的前线。她看过法国士兵和德国士兵的照片，但是她不可能想象三百万人。实际上，没有谁能够想象他们，专业人员也不作这种尝试。比如说，他们把这些部队想象为200个师。但是，舍温女士得不到战斗的地图，所以，她想象战争的话，她就盯住霞飞和凯泽，就象他们从事个人决斗一般。或许你能理解她是根据她的想象来观察的，她的作品中的形象可能就象十八世纪的一个伟大士兵的版画。他勇敢而沉着地站在那里，比真人大些，后面衬托着一支模糊而个子小的军队蜿蜒在风景画面中。看来大人物们对这些想象也並不在意。德皮尔富讲述了一位摄影师对霞飞将军的访问。这位将军在他的“中产阶级的办公室里，坐在没有放着文件的办公桌前，他就在那里签名。忽然发现墙上没有挂着地图，根据普遍的想法，一位将军的办公室是不可能不挂地图的，于是就在挂画的位置挂上几张地图，事后立刻就取下来了。”<sup>②</sup>

任何人对于没有经历过的事件，只能有一种凭他对那事件的想象所引发的感情。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在我们了解了其他人自认为他们所了解的事物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他们的行为。我曾见过一个在宾夕法尼亚州矿区长大的年轻姑娘，当一阵风吹破了厨房的窗玻璃时，她突然从完全欢乐的状态陷入一阵悲伤，她极度沮丧了几个小时，我对此感到莫名其妙。当她缓过来能说话的时候，我才知道她认为要是窗玻璃破了，就意味着有近亲死亡了。因此，她对于曾恐吓过她以至使她逃出家门的父亲感到哀痛。当然，经过电报查询，很快就证实她父亲非常健康地活着。但是，在收到回电以前，破裂的玻璃对那个姑娘一直是有根据的讯息。为什么它能成为根据，只有高明的精神病学医生的长时间

---

① 见辛克莱·刘易斯 (Sinclair Lewis) 《大街》 (Main Street)。

② 见前书第99页。

的调查才能够说明。然而，即使是最漫不经心的观察家也能看到，那个为家庭纠纷搅得心乱如麻的姑娘从一个外界的事件、一种记忆中的迷信、一种悔恨的烦乱以及对他父亲的恨与爱中产生出一种完全虚构的幻觉。

这些实例中的反常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当一位司法部长被门前石阶上的炸弹爆炸所惊吓时，就使他确信革命传单上所说的，1920年5月1日将爆发革命是真实的。我们认识到相同的机制多少在起作用。当然，战争提供了许多这种类型的实例：偶然的事实、创造性的想象、信仰的意志，这三种因素构成了一种虚假的现实，对它就有一种歪曲的本能反应。因为这是十分清楚的事，由于某些原因，人们对于虚构的情节也会象对真实情况一样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反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据以作出反应的，正是他们帮助创造的那种虚假的情节。他并未相信俄国军队曾于1914年8月经过英国，没有直接的证据就不接受任何关于暴行的传说；没有见过一个阴谋、一个卖国贼或一个间谍，因为那儿没有；那么就让他首先谴责吧。他从来没有把知情较少的人所说的话当作真正的内情来传播，就让他来谴责吧。

在所有这些实例中，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一个共同的要素，那就是在人与他的假环境之间的插入物。他的行为是对于虚假环境的一种反应。但是，因为是行为，如果付诸行动，其后果就不是在刺激起行为的假环境中而是在发生行动的真实环境中起作用。如果这种行为不是实际的行动，而是我们一般地称之为思想和感情的东西，它就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不在虚假的世界中表露出来。但是当这种假事实的刺激对有些事或者对其它人产生作用时，立即就发生矛盾了。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些强烈的感觉：把一个人的脑袋往石头墙上撞；通过经验来学习，证实赫伯特·斯宾塞<sup>①</sup>的悲剧：“一伙残酷的事实”谋杀一种“美妙的理论”；即缺少

---

① 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实证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主张不可知论。

一种失调状态的不安感。因为在社会生活的层次上，所谓人对于环境的调整当然是通过各种虚构作为媒介来进行的。

这里所说的虚构，我并不是指撒谎，我指的是不同程度地由人们自己描绘的环境。虚构的范围包括从纯粹的幻觉到公式化的科学的自我意识，或者是对某个特定问题的决定，正确性超出小数点的一定数目则是无关紧要的。一篇虚构的作品，可能有那么一点程度的可靠性，只要能考虑其可靠程度的，这种虚构就不是骗人的。实际上，人类的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说的“我们思想的偶然闪耀和再镇定”<sup>①</sup>的选择、重新整理、追踪和风格化。有选择地运用虚构是感情起落的直接暴露。尽管有时用完全清白的眼光看，它是令人耳目一新的，那也不是真正的选择，清白只是智慧的源泉和校正，而不是智慧本身。

由于真正的环境总起来说太大、太复杂，变化得太快，难于直接去了解它。我们没有条件去对付那么多难以捉摸、那么多的种类、那么多的变换的综合体。然而我们必须在那种环境中行动，我们必须先把它设想为一个较简单的模式，我们才能掌握它。人们必须先掌握世界的概貌，才能详细考察世界。然而他们长期的困难是获得他们自己需要或者其他人需要的地图，而这种地图不曾在波希米亚海岸绘制。

## 四

舆论分析者必须开始认识清楚下列三者之间的关系：行动的情景，人对那种情景的想像，以及人对从行动的情景中产生出的想像的反应。这正象要求按照演员自己的经验排演的一个话剧，它的情节是按照演员真正的生活来处理的，不仅仅是舞台的角

---

<sup>①</sup> 詹姆斯：《心理学原理》第2卷，第638页

色。电影常常用很大的技巧强调内在动机和外在行为这双重戏剧。比如，两个人正在争吵，表面上看是为了一些钱，但他们的感情却是不可言传的。这时影片的画面渐淡，而两个人中的这个或那个用他们头脑的“眼睛所看到的東西演示出来了。隔着桌子，他们为钱在争吵。而在他们的记忆中，他们回到了青年时代，当时那位姑娘抛弃了他，爱上了另一个人。这个表演在外的戏剧可以这样解释：这位男主人公並不贪婪，而是在恋爱。

美国参议院演出了类似的场面。1919年9月29日早晨早餐时，有些参议员阅读了《华盛顿邮报》关于美国海军在达尔马提亚<sup>①</sup>海滨登陆的新闻电讯。这报纸报道：

#### “一些事实现已证实

下面的重要事实看来已经证实。致后方海军安德鲁斯将军统率的驻亚的里亚美国海军的命令是英国海军军部通过伦敦的军事委员会和后方海军将军纳普斯发出的。並沒有询问美国海军部同意或是不同意。……”

#### “在但尼尔斯不知道的情况下

但尼尔斯先生收到电报后说，他统率的部队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正在进行海战，这使他处境特殊。人们认为英国海军部能够给后方海军安德鲁斯将军发布命令让他代表大英帝国和她的盟军，因为如果丹纳齐沃的追随者受到牵制，某个国家就需要作出牺牲。

人们还进一步认识到，在紧急的情况下，新的国际联盟无论得到或是没有得到美国海军的同意，都可以指挥美国海军部队。……”

第一个发表意见的参议员是宾夕法尼亚州的诺克斯先生。他愤慨地要求调查。康涅狄格州的布兰德奇先生接着发表言论，又愤已促使他轻信。诺克斯先生气愤地要求，要弄清这个报道是否

---

<sup>①</sup> 南斯拉夫一地区。

真实；半分钟以后，布兰德奇先生也要求知道，如果海军被消灭掉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诺克斯先生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忘了他要求调查和答复的事。如果美国的海军被消灭的话，则会爆发战争。争论的基调仍然是有条件的。争论继续进行下去，伊利诺斯州的麦考密克先生提醒议会说，威尔逊政府倾向于发动一场小的未经认可的战争。他重复了西奥多·罗斯福关于“进行和平”的妙语。还有更多的争论。布兰德奇先生注意到海军根据最高委员会的指令驻在某处，但他回忆不起来谁在这个机构里代表美国。美国的宪法也没有提到这个最高委员会。因此，印地安那州的纽先生提出一个决议案要求知道实情。

迄今为止，参议员们仍旧模糊地认为他们在讨论的是一个谣传。作为律师，他们还是记得获取证据的一些形式的。但是，作为一腔热血的男子，对于外国政府不得到美国国会的同意就命令美国海军参战这种事实已感到愤慨。就情绪来说，他们相信它，因为他们是反对国际联盟的共和党员。这种情况唤醒了民主党的领袖、内布拉斯加州的希契科克先生。他为最高委员会辩护，说它是受参战列强指挥的。由于共和党员的延误，和平还没有最后达成。因此，这种行动是必要的和合法的。双方现在都设想这个报道是真实的，他们得出的却是带有各自党派偏见的结论。然而他们还在讨论要不要调查这离奇的设想的真实性，即使受过训练的律师们，也难于在调查得出结果以前不作出反应。这种反应是即刻产生的。由于迫切需要这种虚构，它就被当作真实的了。

几天以后，一项官方的报告说明这支海军不是受命于英国政府或最高委员会而登陆的。他们並沒有与意大利人作战。他们是接受了意大利政府的请求，为了保护意大利人而登陆的。美国的指挥官正式受到了意大利官方的感谢。这支海军並不曾与意大利交战，他们是根据一种确认的国际惯例行动的，与国际联盟並無关系。

这一行动的情景发生在亚德里亚海，华盛顿的参议员们头脑

里对于那种情景的想像是由一个毫不关心亚得里亚海而很关心击败国际联盟的人提供的，也可能他是有意欺骗。参议员们对于这种想像的反应受到了对国际联盟的党派偏见的影响。

## 五

在这个特定的例子中，并不需要去判定参议院是在正常的道德标准之上或者之下，也不管参议院是否比众议院或其他议会更占优势。此刻，我只想考虑全世界的人是怎样按照他们的环境去行动的。在充分考虑了蓄意的欺骗以后，政治科学仍旧叙述这样一类的事实：比如两个国家互相攻击，每一方都确信他的行动是自卫，或者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每一方面都肯定自己是代表公众利益的。我们可以说，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更确切地说，他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但是，他们思考的和感觉的却是不同的世界。

正是对于这些特殊的世界，对于这些个人的或集团的、阶级的、地方的、职业的、全民族的、宗派的人为制造物来说，产生了“伟大社会”中人类的政治调节。它们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难以描述的。然而这些虚构很大部分取决于人们的政治行为。我们必须想到，有可能50个最高的议会是由至少100个立法机构组成的，它们又属于至少50个省市议会的统治集面，加上它们的执行机构、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组成了世界上正常的权威。但是它并没有开始表现出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因为在这无数的权威中心里，都各有一些政党，这些政党本身都是统治集团，它们在阶级、阶层、派系和宗派小集团中都有根基；其中有许多个别的政治家，各自又成为联系、记忆、恐惧和希望的中心。

不知怎么的，常常因为种种不可避免的模糊的原因，由于统治、妥协或者相互吹捧的结果，这些政治机构发出各种指挥：调动军队或讲和、应征入伍的生活、赋税、放逐、监禁、保卫财产或没收财产、鼓励一种企业或留难另一种企业、促进移民或阻碍移民、改进通讯或实行检查、建立学校、建立海军、宣布“政策”

和“命运”、设置经济障碍、购置财产或毁掉财产、使一个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或者喜欢一个阶级而反对另一个阶级。对于这些决定中的每一种，对于有些事实是作为结论来看的，有些情况的看法是作为推论的根据和作为感情的刺激来接受的。对这些事实采取什么看法？为什么采取那种看法？

即使这样追问仍不能详尽地研究其中真正的复杂性。在一个社会环境中存在着正式的政治机构，还有无数大大小小的企业和公共机构，志愿的和半志愿的委员会，全国的、省的、都市的和街坊的集团，它们常常作出与政治机构的指示不相同的决定。这些决定的根据是什么？

彻斯特顿（Chesterton）先生说：“现代社会有内在的不稳定，因为它以这样的概念为基础，这种概念认为所有的人出于不同的动机，却会做同样的事。……就象在任何罪犯的头脑中，可能想的是相当独特的一种犯罪行为的苦境，同样，在任何郊区职员的家或内心可能幽闭着迥然各异的人生哲学。第一个人可能是完全的唯物主义者，觉得他自己的身躯是一具可怕的机器在制造他自己的思想，他也许对他的思想就象听单调乏味的钟表滴嗒声一样熟悉。隔壁的人可能是一人信基督教的科学家，他把他的身体看得比他的影子还空洞，他几乎会把他的手臂和腿幻想为狂梦中活动的蛇。街上的第三个人可能不是信仰基督教的科学家，而正相反是一个基督徒，就象他的邻居说的那样，他象是住在神话故事里，一个神秘而有根据的神话故事，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朋友的面孔和表情。第四个人也许是一个神权诡辩家，也许还是一个素食主义者。而且我还可以幻想第五个人是一个崇拜魔鬼的人。……不管怎样，这种多样性是有价值的，这种统一性是不可靠的。设想所有的人总是在想着不同的事，然而干的却是同样的事情，这是一种使人产生疑问的推测。社会不是建立在共同的或者公约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偶然的因素之上的。有四个人可能在一根灯柱下相遇，一个人在把灯柱漆成豆绿色，作为一项



重大市政改革措施的一部分；一个人在灯下谈他的每日祈祷书；一个人以酒醉后偶然的热情拥抱着灯柱；最后一个人仅仅因为绿色灯柱惹人注目而用来作为与他年轻女友约会的地点。但是，希望每天都发生这样的事是不明智的。……”<sup>①</sup>

可以用世界上的政府、政党、企业、社团、社会阶层、行业与职业、大学、派别和民族代替灯柱那里的四个人。设想立法机构的成员正表决一项将影响边远地区民族的法令，一位政治家正作出决定。设想“和平会议”重新划定欧洲的边疆，一个驻在外国的大使企图识别他自己政府的意图和外国政府的意图，一个推销商在落后国家谈判一种特许权，一个编辑查问一场战争，一个牧师请求警察管理娱乐，一个俱乐部的休息室正在决定关于罢工的事，一个缝纫集团正准备调整学校，九名法官正决定俄勒冈州的立法机构要不要规定妇女的工作时间，一次内阁会议决定承认一个政府，一个政党的会议选择一名候选人和起草一个政纲，二千七百万选民投票，一名在科克的爱尔兰人想起一名在贝尔法斯特的爱尔兰人，第三国际计划重建整个人类社会，一个董事会面对着其雇员的一些要求，一个男孩正选择一个职业，一个商人正估计下一季节的供求情况，一个投机商正断言市场的发展，一个银行家正在决定要不要给一个新的企业以贷款，广告商和广告的读者……。设想不同类型的美国对于“英帝国”或“法国”或“俄国”或“墨西哥”等概念的想法。这些想法与彻斯特顿先生说的在豆绿色灯柱那里的四个人的想法没有多大区别。

## 六

因此，在我们探讨人们有许多复杂的固有区别以前，我们将很好地了解人们所知道的世界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不同。<sup>②</sup>我並不

---

① G. K. 彻斯特顿：《疯狂的人与清醒的户主》，载《浮华虚荣的社会》，1921年1月号，第54页。

② 参看华莱士：《我们社会的传统》第77页以及下列等等。

怀疑有一些重要的生物学上的区别。由于人是动物，如果没有这种差别，那才是奇怪的事。但是，作为理性的动物，在找出产生行为的种种环境之间有何相似之处以前，只是笼统地概括比拟行为是非常肤浅的。

这种思想的实际价值在于它对古代关于本质、教养、先天素质和环境的争论进行了很必要的改良。因为虚假的环境是“人性”和“形势”的一种混杂物。我认为我们观察人们的所作所为来武断人是什么以及人常常会是什么样，或者武断社会必需的环境是什么，都是无益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人们对于“伟大的社会”的种种事实会怎么样作出反应。我们真正知道的只能说是他们对于“伟大的社会”的最不充分的形象是怎么作出反应的。不能够根据那样的迹象就对人或者对“伟大的社会”作出结论来。

因而，这将是我们的探究的线索。我们将设想每一个人作什么并不是以直接的和确凿的知识为基础，而是以他自己想象或别人告诉他的情况为基础的。如果他的地图册告诉他说地球是扁的，因为怕掉下去，他就不会航行到他认为是我们星球的边缘上去。如果他的地图上有一个永葆青春的喷泉，庞斯·德利昂<sup>①</sup>就会去寻求它。如果某一个人掘出象金子一般的黄土，那么在一段时间里，他就会表现出真的找到了黄金一样。任何时候，人们怎么设想这个世界，就决定了他们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要作什么，而不是取决于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对于世界的设想决定了他们的努力、他们的感觉、他们的希望，而不是他们的成就和结果。正是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们，他们最响亮地宣布他们的“唯物主义”以及他们对于“空想家们”的轻视，他们把全部希望放在什么地方？放在用宣传来形成一个有阶级意识的集团上。然而，什么是宣传？如果不是努力改变人们据以作出反应的形象，用一种社会形态代替另一种社会形态又是什么？什么是阶级

---

<sup>①</sup> 西班牙的探险家。

意识？不就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吗？民族意识也不就是另一种方法吗？吉丁教授的那种意识，不就是在大量信念中间我们所认识到的我们的那种意识吗？

试把社会生活解释为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你立刻会说，享乐主义者就是以这种未定论来狡辩的，因为即使假设人们确实追求这些目的，还是没有触及关键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他认为一种生活方式比另一种生活方式更能产生快乐？人的良心的指导可以说明上述原因吗？那么，怎么碰巧他就有他所具有的那种良心的？人在经济上自私自利这种理论能否说明问题？然而人们怎么这样设想他们的利益而不是那样设想？是追求安全、或者名望、或者统治、或者含糊地被称作“本人才能的发挥”等等愿望吗？人们怎么设想他们的安全？他们考虑什么名望？他们怎么策划出统治的方法？或者他们想要了解的私利的概念是什么？快乐、痛苦、良心、获取、保护、美化、控制等等无疑这些都是人们某些行动方式的名称。也许存在着一种要达到这些目的的的天性。但是，对于这种目的没有进行说明，关于追求这种目的倾向也没有任何描述，因而也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行为。人们推理出来的唯一事实证明，决定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行动的因素是他们的假环境和他们内心里对于世界的认识。因为，假若现实世界与人类的反应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和迅速的，不是间接的和推断的，也就不会有优柔寡断和失败，（如果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象胎儿在于宫里那样贴切地处在世界上），肖伯纳先生也就不可能这样说，人类除了最初生存的九个月以外，没有人能够象一棵植物一样驾驭他的事务。

在这种联系中，主要的困难在于将精神分析的方案运用到政治思想中去。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奉者们关心特殊的个人与别的个人之间，以及特殊的个人与具体环境之间的失调。他们曾经设想如果能够澄清内心的混乱，就不会搞不清楚什么是显然正常的关系。但是，舆论涉及的是间接的、看不见的和费解的事实，它们

是一点也不明显的。舆论涉及的那些情况被认为只是一些意见而已。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家几乎总是这样假设：对于任何聪明才智来说，环境是可知的，如果不是可知的，至少也是可以感受到的。他的这种假设是舆论的问题，不是想当然地认为一种环境是容易地被认识的。社会分析家最关心于研究怎样设想较大的政治环境，以及怎么能够更加成功地设想这种政治环境。精神分析家检验对一项x的调节，他把这x称作“环境”；社会分析家检验这项x，则把它称作“假环境”。

当然，任何人都永久地和经常地得益于新的心理学，不仅是因为当运用得正确时，就能大大地帮助人们自立，而且不管怎么样，因为研究梦、幻想和合理化的东西能够显示出假环境是怎么构成整体的。但是，他不能把这设想为他的标准或设想为社会秩序之内的一种所谓“正常生物学上的生涯”，<sup>①</sup>或者还是外部的一种“从宗教的压抑和教条主义的惯例下摆脱出来的”生涯。<sup>②</sup>对于心理学者来说，什么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生涯？或者什么是从宗教的压抑下摆脱出来的生涯？固然，保守的批评家们首先设想第一种，富于浪漫思想的批评家则设想第二种。但是，在设想它们时，他们是就全世界而论的。实际上，他们说的社会，或者是那种符合于他们理想的正规的社会，或者是那种符合于他们理想的自由的社会。两种理想都仅仅是舆论，精神分析家作为医生也许会接受它们，而社会学家则可能不以现存舆论的产物作为研究舆论的标准。

## 七

在政治上我们必须对付的世界是接触不到、看不到和想不到的。需要我们探索、报道和想象。人并不象亚里士多德的神化的

---

① 爱德华·J·肯普夫：《精神病学》，第116页。

② 同上书，第151页。

人那样一眼就能注视到所有存在物的。他是在进化中产生的动物，只能估量一部分现实，以维持他的生存。抓取极短时间的直觉和愉快。然而就是这样的动物，创造了种种方法看到肉眼所看不到的、听到耳朵所听不到的东西，衡量庞然大物和无限小的个体，计算和区分比他作为单个人所能记忆的更多的东西。他学习着用他的脑子去观察大部分他不可能看到、接触到、嗅到或者记忆起来的世界。对于这种接触不到的世界他自己就渐渐地头脑里造成了一幅可以信赖的形象。

有些现实世界的情况涉及其它人的行为，又与我们的行为有一定关联的，它仰藉于我们，是对我们感兴趣的，我们大致把它称为公众事务。这些其它人头脑里的想象，他们自己的情况、他们的需要、意图和关系等等都是他们的舆论。一些集团的人或者以一些集团为名义的个人按照上述的情况来行动就成了大写字母的“舆论”。因此，在下西的章节中我们将首先探讨一些原西，即为什么这种头脑中的想象常常错误地引导人们去对待现实世界。根据这种前提，我们将首先来考虑限制人们获得种种事实的一些主要因素。这些因素是一些人为的检查制度，社会接触的限制，每天只能用比较少的时间注意公众事务，由于必须用很简练的消息来报道事件因而引起了曲解，难于用少量的词汇来报道一个复杂的世界，还有最后一点，即不敢面对可能威胁到人们既定的生活惯例的那些事实。

然后，这种分析从上述多多少少属于外在的限制转到下列问题上，诸如储存的印象、先入之见和用偏见来阐明、补充等等都怎样影响到这些来自外界的点点滴滴的消息，以及又怎样转过来有力地指导我们的注意力和我们的视线本身。从这里再继续考察来自外界的有局限的消息怎么样在某一个别人身上形成与他自己的兴趣相一致的一个固定的成见。随后的一些部分，考察许多意见怎么具体化成为所谓的“舆论”，怎么形成为“民族的意志”、“集团的意见”、“社会的意图”或者任你所说的其它什么东西。

前面五个部分是这本书的叙述部分，接着是分析舆论的传统的民主理论。争论的实质是民主政治在其原始形式中从来没有正视过由于人的想象与现实世界並不自动保持一致而产生的问题。然后，因为民主的理论受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的批评，接着考察其中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最高深和最合乎逻辑的批评。这里，我的目的是想弄清楚这些革新者是不是考虑到舆论的主要困难。我的结论是他们与最早的民主主义者一样，完全忽视了这种困难，因为他们设想在复杂得多的文明世界中，人们心目中对于接触不到的世界也有一种神秘的认识。

我认为代议制政府不管采用什么选举制度，它在普通的政治中或者工业中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除非有一个独立的、内行的组织把未被发现的事实清楚地提供给必须作出决策的人。因此，我认为认真地接受这样的原则，那就是个人的代表制必须提供未被发现的事实作为补充，这样就会容许一种令人满意的分权，让我们避免极端的和不切实际的虚构，使我们每个人都必定会得到关于公众事务的足够的意见。报刊的问题被认为是混乱不堪的，因为批评家们和辩护士们希望报刊实现这种虚构，希望它编造出民主理论中所有没有预见到的东西，而读者则希望不付代价或者毫不困难就出现这种奇迹。民主主义者把报纸看成是一种医治他们缺点的万应灵药，然而对新闻的性质和对新闻事业的经济基础的分析似乎都表明报纸必定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並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舆论的组成的不完善性。我的结论是，舆论如果是健全的，就必须组织起来为报刊所用，不是像今天这样的情况，由报刊来组织。我想这种组织任务首先属于政治科学，只有政治科学能在作出真正的决定以前成为舆论的形成者，而不是在决定作出以后去充当辩护士、批评家或者报道者。我要指出的是政府和工业的错综复杂，促使政治科学有这种巨大的机会来丰富自己並为公众服务。当然，我希望这些内容将有助于少数人更清晰地去认识那种机会，因而就更自觉地来研究它。

## 第二部分 探讨现实世界

### 第二章 审查制度与保密

一位将军在历史上某一重大战役的紧要关头主持一次编辑会议的形象，看来更象《巧克力士兵》中描写的情景而不象现实生活中的一页。然而，我们从编辑《法国公报》的官员那里的第一手材料得知在凡尔登战役的危急时刻，霞飞将军和他的阁员聚会讨论了翌晨将刊印在报纸上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

德皮尔富说<sup>①</sup>：“23日（1916年2月）晚的公报是在戏剧性的气氛中编写的。总理办公室的贝特洛刚刚接到总理命令的电话，要波雷将军加强报道并强调敌人进攻的部分。有必要让公众作最坏的准备，以防万一遭到大败。这种忧虑清楚地表明了政府既没有从司令部，也没有从国防部得到足以自信的根据。贝特洛说着，波雷将军就记下来了，他递给我已写上政府希望的报纸，还有冯戴姆林将军当天发布的命令和一些俘虏的供词，其中都说明这是为了取得和平而进行的最重要的进攻。所有这些都技巧地用来说明德国正付出一种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努力，并希望以此赢得战争的结束。这种逻辑就是造成没有人会对我们的撤退表示惊奇。半个小时以后，当我带着我的手稿下楼时，我发现在克洛德尔上校的办公室里，他自己不在；少将雅南、上校杜邦和中校雷努瓦都聚集在那里。我担心形不成我期望造成的印象，波雷将军自己准备了一份提出的公报。我读了刚写好的稿子，发现太温和了。

---

<sup>①</sup> 《G. Q. G.》第126—129页。

波雷将军的公报正相反，似乎太使人惊恐了。我曾有意删掉了封·戴姆林将军当天的命令，把它放进公报里去的话，就会打破公众所熟悉的公式，就会变成一种辩护。就似乎在说：“你怎么猜想我们能够抵抗？有理由担心因为改变调子而导致使公众感到心烦意乱，而且公众会认为什么都丧失了。”我说明了我的道理，並建议把戴姆林的命令作为单独的笔记的形式交给报社。

“意见有分歧，波雷将军去请德皮尔富来作最后的决定。将军微笑着走来，镇静而富于幽默，对于这种新的文字上的军事会议说了几句逗乐的话，並看了稿子。他挑选了一个较简单的稿子，称赞了第一段，加上了“像预期的那样”几个字，以便消除疑虑。断然反对把封·戴姆林的命令加进去，而把命令作为特讯登在报上。……”霞飞将军当天晚上仔细地读了这公报並批准了它。

在很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全世界都会读到那二、三百字的报道。它就会在人们的头脑里形成一幅关于凡尔登发生的事的情景，面对这幅情景，人们会振奋起来或者丧失信心。布雷斯特的店主、洛林的农民、帕勒斯·波旁的代理人、阿姆斯特丹（荷）或明尼阿波利斯（美）的编辑都必须保持希望，然而也准备了万一失败面不致惊慌。因此，告诉他们丧失地盘对法国统帅来说是不惊奇的。向他们说明情况是严重的，但不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现在法国参谋部对于德国的进攻并没有充分的准备。支撑的战壕还没有挖好，后备的通路还没有建筑，有刺的铁丝也缺乏。但是，承认这些话，反面会造成祸患。最高司令可能失望，然而还要强作镇定；国内和国外的人民完全不清楚，职业军人缺乏专一的打算，可能根据整个报道已忽略了关于军官权限的派系和反派系的混战。所以，官方只提供某些最有可能稳定人心的事实，而不是让公众根据将军们知道的全部事实去行动。

既然这样，安排假环境的人们是知道真实情况的。但是，几天以后，发生了一桩法军参谋部並不了解其真相的偶然事件。德



国人宣布<sup>①</sup>他们在前一天下午攻占了杜奥蒙要塞。尚蒂义的法军总部却无人知道这项新闻。因为在25日早晨，第20军团交战以后，战斗的形势好转了。自前线发来的报告并没有提到杜奥蒙，尽管到当时为止没有人知道这要塞是怎么被夺走的，但调查表明，德国人的报道是真实的。在此期间，德国的公报已迅速传遍世界，法国必须发言，因此，总部进行了解释：“根本不知道尚蒂义是怎么遭到进攻的，我们想象，26日傍晚公报中的进攻计划当然只有千分之一的真实性。”这期想象的战斗公报这样写道：

“杜奥蒙要塞附近发生了一场激战，它是凡尔登要塞的防卫体制的一个前哨。今天早晨这地方被敌军占领，经过几次不成功的攻击却使敌军遭受惨重损失，以后我们的部队又收复并越过了这地方，敌军再没有能够攻回来”。<sup>②</sup>

实际发生的情况既不同于法国的报道，也不同于德国的报道。当军队换防时，这块地方在命令混乱之中不知怎么被遗漏了。只有一个炮兵司令和几个人留在堡垒里。一些德国士兵见门开着，就爬进了这个堡垒，把里面的每一个人都监禁起来。过了一会儿，山坡上的法国人因受到从堡垒发出的射击而震惊。在杜奥蒙没有进行过战斗，也没有损失。也不象公报所说的，法国军队曾越过这地方。固然，每一方都曾越过这地方，但是这堡垒是在敌军手中。

然而，每个人读了公报都相信这个堡垒处在半包围中。话虽没有明晰地这么说，但是“新闻界像往常一样加强了调子。”军

---

① 1916年2月20日皮埃尔富：《G. D. G.》第133页以及下列等等。

② 这是我自己的译文，2月27日伦敦出版的《星期日纽约时报》的英语译文如下：

“2月26日（1916）伦敦讯：在杜奥蒙要塞附近曾展开了一场猛烈的战斗，这地方是凡尔登要塞旧的防卫体制的一个前哨阵地。经过几次无效而使敌人损失惨重\*的强攻，这地方今晨被敌人占领，后来我们的部队重新占领并越过了它，敌人尽了一切努力也未能再攻回来。”

\*法文电讯称“很大的损失”，因而英文译稿夸大了原来的电讯。

事作家们断定德国军队很快会投降。几天以后，他们开始自问，驻军缺乏食物，为什么还没投降。“这就必须通过新闻机构来要求他们放弃包围的问题。”①

## 二

法国公报的主编告诉我们，随着战争的拖延，他和他的同事们开始通过持续宣传德国的严重伤亡来抵消德军的顽固。有必要来回忆这段时间，实际上直到1917年底，协约国各国人民的正统看法是这场战争决定于“消耗”。没有谁相信运动战。人们坚决认为战略或者外交都无关重要。只是一个屠杀德国人的问题。一般公众或多或少相信教条，但是，还必须提醒他们正视德国的惊人的胜利。

“几乎没有一天公报不提到德国人严重丧失正义的各种表现，说到他们制造流血牺牲是极其惨重的，一堆堆尸体，进行大屠杀。无线电也不断地运用凡尔登情报机构的统计数字，这个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关戴少校曾发明一种效果极好的推算德国伤亡人数的方法。每隔两星期数字增加十万左右。这些300000、400000、500000的伤亡数字，分成每天、每周、每月的伤亡人数，用各种方式反复宣传，产生显著的效果。我们的公式略有不同：‘根据战俘供词，德国在这次进攻中的伤亡大约为’……；‘有证据表明这次伤亡’……；‘敌军因伤亡而搞得精疲力竭，没有再度进攻’……；这些公式因为用得太多，后来就不再用了，每天又采用另一些公式：‘在我们的炮火和机关枪的攻击下’……不断地反复地给中立者们和德国本身造成印象，并且制造一种血淋淋的背景，尽管德国电台（Nauen）企图否定用以破坏这种反复的宣传所造成的恶果，然而徒劳的。”②

① 皮埃尔富：《G. Q. G.》第134—135页。

② 皮埃尔富：《G. Q. G.》第138—139页。

法国司令部希望通过这些报道公开树立一些论点，用以指导新闻检查员，这些论点可系统地阐述如下：

“我们的敌人用于这次进攻的有生部队的人力在下降中。据我们知道，1916年的士兵已经在前线。剩下的1917年的士兵已征召，其来源是第三类人（45岁以上的人或者是休养痊愈的人）。在几周后，德国军队将消耗殆尽，他们自己就会发现，他们所遭遇到的全部是联合的军队（1000万对700万）。 ” ①

根据德皮尔富所说，法国司令部自己曾转变成这样的想法：

“由于一种非常失常的心理，只看到敌军的损耗，似乎我们的力量没有遭受损失。尼韦莱将军也有这些想法。1917年我们看到了这种效果。”

我们已经学会了把这称之为宣传。有一些人，他们能够阻止人们独立地去了解某事件，并编出关于这事件的新闻来适应他们的意图。意图既是这样，爱国热忱根本不成其理由，他们运用他们的权力使协约国的公众象他们所要求的那样去看问题。关戴少校的伤亡数字就是根据同样的要求向全世界散布的。他们想要诱发一种特定的推论，即战争将对法国有利。但是，这种推论不是通过论证的方式得出来的。它几乎是自动地从创造出来的德军无休止地在凡尔登高地上残杀的精神形象中得来的。由于把德军的死亡作为这种形象的焦点，而不提法军的死亡，这就对战争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看法。这种看法的设计，是用来抵消德军进占的影响，抵消德军坚持进攻的力量的印象。这种看法也有意使公众默认强加给协约国军队的败坏士气的防卫策略。公众习惯于这样的想法，即战争包含了大的战略转移、侧翼进攻、包围和戏剧性的撤退，已逐渐忘记那种较量生命就能赢得战争胜利的可怕思想。总参谋部通过控制所有发自前线的新闻，用许多事实来代替一种看法，使之与这种战略相一致。

---

① 皮埃尔富：《G. Q. G. 》第147页。

战地部队的总参谋部总是设在使它能够最大限度控制公众了解情况的地方。它控制去前线的记者可以到什么地方采访、不可以到什么地方采访，控制记者在前线的活动，阅读和审查他们从前线发出的消息，并且管理电讯系统。政府在军队的后面控制电缆和护照，加强管理邮政、海关和封锁。政府通过法定权力并通过其特务机关对出版商和公共会议着重进行这种控制。但是，就军队而言，这种控制还是很不完美的。敌军总是有公报的，现在运用无线电播发这种公报，不可能限制中立者收听；尤其是有些士兵的谈话从前线传回来，有些士兵回来休假也散布一些情况。<sup>①</sup>军队是难以控制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海军和外交方面的检查制度几乎总是更为严密的。较少的人知道正在进行什么，他们的行动是更容易受监督的。

### 三

严格地说，没有某种形式的审查制度，世界上也就不可能有宣传。为了进行宣传，必须在公众与事件之间设置某种屏障。任何人在能够制造出一个他认为是明智的和合意的假环境之前，必定会限制人们去了解真实的环境的。因为当人们直接了解到真实的环境时，就能对他们看到的事产生误解，除了能够决定可以让他们看什么地方和什么东西以外，没有什么人能够决定他们怎么样误解它。军队的审查制度是造成障碍的最简单的方式，但决不是最重要的方式，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存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允许它存在并且不把它当一回事。

在不同的时代和对不同的问题，有些人把某种保密的标准强加于人，让别人接受它。隐瞒事实的界限，譬如说先是以出版的内容不“与公众利益相一致”为理由，逐渐变成认为与公众毫无

---

<sup>①</sup> 当美国进攻圣·米耶尔和在阿尔哥纳——莫兹的进攻以前几周，法国每个人都向别人谈了这个极大的秘密。

关系作为理由。所谓一个人的秘密这个概念是有伸缩性的。因此，一个人有多少财富，被认为是秘密，在所得税法令中订有细致的条款，要尽可能保守秘密。出售一块土地，不是秘密，但其价格可能是保密的。一般对待薪金要比工资更秘密，对待收入比对待遗产更秘密。一个人的信贷级别只提供给限定的范围。大公司的利润比小商行的利润更为公开。某些情况的谈话，夫妻之间的、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医生与病人之间的、牧师与受圣餐的人之间的，都是享受保密特权的。一些董事会议一般都是保密的。许多政治会议也是一样的。内阁会议上的发言、大使与国务卿的谈话、私人访问或者餐桌上的谈话，大部分是保密的。许多人把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契约看作是秘密的。曾经有个时候，所有公司的事务都象今天任何人的神学一样当作秘密的。在那以前，有一个时期他的神学就象他眼睛的颜色一样是公开的事。然而另一方面，传染病曾一度象人的消化过程一样是秘密的事。秘密这个概念的历史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有时一些概念是极为抵触的，就象当布尔什维克公布密约时，或者当休斯先生调查人寿保险公司时，或者从《城镇话题》报的版面到赫斯特报纸的头版披露某人的丑闻时都曾这样。

不管保密的理由是好的还是坏的，总存在一些屏障的。在称之为公共事务领域的各种场合都坚决要求保密。因此，问问你自己，你是怎样了解那些形成你的意见的事实的，就常常很说明问题。你根据谁真正看到、听到、感觉到、数过、命名过的事而产生一种意见的？是不是那个人告诉你的？或者是那个人告诉他的？或者某人以此类推？他被准许看到多少？当他告诉你法国想要这和想要那，他到底观察了法国的哪个部分？他怎么能观察到那情况的？当他观察那情况时，他在哪里？他被准许与哪些法国人谈话的？他阅读了哪些报纸？他们在什么地方听到他们所说的事的？你能向自己询问这些问题，但是很难回答。无论怎样，它们会提醒你，你的意见与涉及的那个事件常常是有距离的。而这种提示本身就是一种保障。

### 第三章 接触与机会

#### 一

当检查制度和保密从新闻来源上截取了很多消息的时候，大量的事实根本不能传给全体公众，或者很慢才传给全体公众。因为思想的传播有很明显的限制。

考察一下战争时期政府的宣传，就能够粗略地估计出消息传给“每个人”所要作的努力。回忆美国参战时，战争已进行了二年半了，曾经散发了千千万万印刷品以及发表了无数的演讲，就让我们看看克里尔（Crce1）先生“为争取人们的思想，赢得他们信服”，使“效忠美国的福音能传遍全球每个角落”<sup>①</sup>所作的努力吧。

克里尔先生告诉我们，他必须调集包括“新闻处”之类的机构，发布了6,000多份消息，征募了7.5万名义务宣传人员，他们至少对总计三亿人发表了75.519万次以上的演说。童子军向美国住户递送了加注释的威尔逊总统的演说稿。向60万名教师分送了双周刊。为带图表说明的演说提供了20万张幻灯片。为招贴、橱窗画、报纸、广告、卡通动画片、图章和徽章制作了1438种不同的设计图样。许多商会、教堂、互助会、学校都被用作传播的渠道。然而，我还没有对克里尔先生所作的努力说得充分，其中还没有包括麦卡度先生为“自由贷款”搞的巨大组织，没有包括胡佛先生对食物进行的广泛宣传，也没有包括“红十字会”、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救世军、天主教国际性互助和慈善团体和犹太人福利委员会等的运动，没有提到象实施和平同盟、自由民族联

---

① 乔治·克里尔：《我们怎样为美国作广告》。

盟、全国安全同盟等爱国社团的独立工作，也没有提到协约国宣传局的活动和社会底层的各少数民族的活动。

或许这是迅速向全国人民传播一整套相当一致的思想所作的最大和最集中的努力。早先改变宗教信仰的运动是较慢的，也许更踏实，但范围从来没有那么广。如果在危急的时刻，需要最广泛地影响每一个人，那么通向人们思想的更为正常的渠道敞开得怎么样？我认为，政府当局曾努力创造一种战时很成功的几乎可以称为全美国单一的舆论。但是，请想想这是多么艰难的工作，这需要多么高深的智谋，需要多少经费和人员。这一切在和平时期都是不存在的，作为和平时期的必然现象，存在所有不同的地区，存在着各种团体、各个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区、外国领地和社会等级，他们只能含糊地得知许多正在发生的事情。

他们按常规生活，他们禁闭在他们自己的事务中，不了解较大的事件，很少与不同于他们自己类型的人接触，阅读得也很少。当然，旅行和贸易、邮件、电报、以及广播、铁路、公路、海船、汽车和新式飞机等等都对传播思想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们各以极复杂的方式供应消息和意见并影响其质量，它们本身又都受到技术、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影响。每当政府放松护照礼仪或放松海关检查，每当一条新的铁路或者一个新的港口开放了，一条新的船线建立了，每当价格上涨或下降了，邮递变快或变慢了，电报不受检查或降价了，公路建成或扩建或改进了，都会影响到思想的传播。关税的细目表和补贴影响到商业企业的方向，因此，也影响到人们订立合同的性质。所以，可能会发生马萨诸塞州塞勒姆案中的例子，即造船技艺的改变会使整个城市从一个有国际影响的报道中心降为一个上流社会的省城。所有改变得较快的直接效果不一定是好的，例如，法国铁路系统那么高度集中在巴黎，对于法国人民就很难说是一种纯粹的幸事。

当然，传播工具所发生的问题是最最重要的，国际联盟计划的建设性的特征之一曾是研究铁路运输和使铁路运输通向海洋，

电缆电报<sup>①</sup>、港口、燃料站、隘口、运河、海峡、河道、交通终点总站、市场等等的垄断，比一群商人的发财致富或者政府的特权更具有意义。它对于交换新闻和意见是一种障碍，但垄断并不是唯一的障碍。费用和可得到的供应是更大的障碍，因为如果旅行或贸易的费用受到限制，如果设备上的需求超过供应，那么，即使没有垄断也同样存在障碍。

## 二

一个人收入的多少，对于他接触除他邻居以外的世界，有相当大的影响。有了钱，他就能克服几乎所有的传播的有形的障碍，他能够旅行、买书刊和获得他注意到的几乎任何世界上已知的情况。个人的收入和城镇的收入决定了能获得的通讯数量。但是，人们的思想决定怎么使用他们的收入，怎么使用又转过来影响他们将来会有多少收入。因此，也还有一些限制，因为他们常常是自我克制和自我放纵的。

有一些独立自主的人，他们把大部分空闲时间和多余的钱花费在驾驶和比赛汽车上，花费在惠斯特桥牌游戏和事后的分析上，花费在看电影和阅读粗制滥造的文艺作品上，总是向同样的人说着同样的老套话。他们确实不能说因为新闻检查或保密而受到妨碍，也不能说因为新闻工具费用高或者传播困难而受到妨碍。他们的毛病是对于人类的情况知道得太少，缺乏欲望和好奇心。他们的问题是不去接触现实世界。有兴趣的世界等待着他们去探索，而他们并没有进入这个世界。

他们象是身系皮带把自己捆在法律和他们社会圈子的信条所固定的范围内活动。男人们在营业中、在俱乐部和在吸烟车厢中的谈话圈子都比他们各自所属的圈子更为广泛。女人们的社会群

---

<sup>①</sup> 因为要认真地智取耶拔群岛。



和她们的谈话圈子常常几乎是相同的。在社会群中，从阅读和演讲以及从谈话圈所产生的一些思想是经过挑选、接受、剔除、判断和同意的。最后才对讨论的每个方面作出决定，哪些根据和哪些消息来源是可接受的，哪些则是不可接受的。

有句成语叫作“人就是言论”，我们的社会群体就是由这样的人所组成；他们就是赞同我们最熟悉的事物的人们。在大城市有广泛兴趣和交通条件的男男女女中，社会群体的划分没有那么严格地局限。但即使在大城市，仍在一些地区和村落，围居着一些自给自足的社会群体。在较小的社区内，人们之间从早餐后至晚餐前可能保持一种较自由地交往，有一种更真诚的友谊。但是，极少有人不知道他们真正属于哪个社会群体，不属于哪个社会群体。

通常，一个社会群体的显著标志是他们的孩子将在群内通婚，若与群外的人结婚，至少要经过一阵考虑才能批准这种婚约。每一个社会群体相当清楚它在一些社会群体的等级中所处的地位。在相同等级的社会群体之间，交往容易，接受个别的成员很快，受到的款待是正常的和不使人尴尬的。但是，在“较高的”社会群体与“较低的”社会群体之间进行接触时，总是各自都存在犹豫，感到一种微弱的不舒适，并且有一种不相同的意识。固然，在美国那样的社会中，特别是在没有种族障碍的地方，以及经济地位改变得很快的地方，个人可以相当自由地从一社会群体转入另一个社会群体。

不管怎样，经济地位不能以收入多少来衡量。因为至少在第一代中，社会地位不是根据其收入多少决定的，而是根据一个人的工作性质决定的，要经历一代或两代，这种情况才会在家庭传统中渐渐减弱。因此，银行业、法律、药物、公用事业、报纸、教堂、大的零售业、经纪业、制造业都是列为与售货、管理者、专门技术工作、护理、学校教育、店务管理等等的社会价值不相同的，而这些行业又与铅管业、司机、女裁缝、承包工或者速记等

等各属不同的等级，这些又不同于男管家、侍女、电影放映员或火车司机。然而经济报酬与这些等级则并不一定是相互一致的。

### 三

不管公认的检验标准是什么，当社会群体已形成时，它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阶级，而更类似生物学上的一种集团。社会群体的成员是与爱好、婚姻和儿童密切相关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成员都有相同的态度和愿望。因此，在社会群体中，舆论面对着“家庭传统”、“体面”、“礼貌”、“尊严”、“情趣”、“礼节”等准则，这些准则构成了社会群体自身的形象，这种形象被努力灌输给儿童。在这种形象中，很大程度上心照不宣地被受一种公认的看法，即要求每个社会群体在思想上承认别的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越是粗俗地强迫对外表达要遵从，则别的社会群体就会体面地和敏感地对他们自己的认识保持缄默，而这种依从无形地存在着。但是，当出现婚礼、战争或者社会大变动时，这种认识就变得明显起来，那就是特罗特（Trotter）<sup>①</sup>根据普通的名词“百姓的本能”所作的一大堆童向的分类。

在每一个社会群体内部，有一些预言者象《无辜的时代》<sup>②</sup>中的卢伊顿斯先生和曼森·明戈特夫人，他们被认为是其社会型式的管理者和解释者。他们说，如果卢伊顿斯先生抬举你，你就被抬举起来了。他们的作用所具有的吸引力就是达到高级的称号和地位。学院社团的选举，谨慎地分成等级，这种等级是普遍地被承认的，通过这种选举决定谁是学院的什么人。用极限的优生学的责任心来衡量，一些社会领袖是特别灵敏的。他们不仅必须懂得怎么促使他们的社会群体达到完善，而且他们必须培养一种了解

---

① 特罗特（W·Trotter）：《战争与和平时期的百姓的本能》。

② 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无辜的时代》。

别的社会群体正在作什么的特殊才能，他们担当着一种外交部长的职责。在这样的社会群体里，大多数成员都满意地生活着，实际上他们把这种社会圈子看成世界。社会领袖们必须既熟悉他们自己的社会群体的内情，又不断地了解他们在一些社会群体的统治集团中所处的地位。

实际上，这种统治集团是由社会领袖们组成的。在任何层次上，都可能有被称为社会领袖的社会群体。但是，垂直地看，实际上把社会连结在一起的，至少指通过社会接触连结在一起的，是由那些特殊人物来完成的。时常猜想，就象《无辜的时代》中朱利叶斯·博福特和埃伦·奥伦斯加进口出口活动那样。这样，就出现了从一个社会群体到另一个社会群体建立起来的个人渠道，通过这种渠道就使塔德的摹拟法则发生作用，但是，大部分人並沒有这种渠道，必须专门为他们提供社会报道和高尚生活的电影。他们可以产生他们自己的统治集团，几乎不被注意地包括黑人和“外国人物”，但是，被同化的群众常常把其本身称为“民族”，由于群体与群体之间有很大的隔阂，通过种种个人的接触，产生了许多类型的交流。

有些社会群体处于那样的地位使他们成了象罗斯（Ross）教授所说的“习俗的发光点”<sup>①</sup>因此，社会的上级容易受到社会的下级所仿效，掌权者被他的部属所仿效，有更多成就的人被成就较少的人仿效，富人被穷人仿效，城市被乡村仿效。然而，仿效並不受国境的限制。有权力的、社会的上层、有成就的、富裕的、城市社会群体在西方基本上都是国际性的。在许多情况下，伦敦是其中心。它的成员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人，就象现在一样，包括外交界，高级金融界、陆海军的上层、一些教堂的巨头、少数大报纸的老板以及掌握通请大权的他们的母亲、妻子和儿女。他们立刻能成为一个大的谈话圈子和一个真正的社会群

---

① 罗斯：《社会心理学》第4、5、6章。

体。但是，其重要性在于实际上这里已最终消失了公事与私事的区别。这个社会群体的私事成了公事，公事却成了它的私事，並常常是它的家庭事务。正象哲学家们所说，马戈特·阿斯奎斯的限制就象王室的限制一样，一张税单和一次会议的辩论也是差不多的谈话内容，

这种社会群体对政府的许多领域並不感兴趣，至少在美国，它对于中央政府只发挥一种动摇不定的控制。但是，它在外交事务上的权力总是很大的，战时，它的威信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那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些世界主义者与现实世界有接触，而大多数人是没有这种接触的。他们彼此在首都一起进餐，他们的民族荣誉感不是抽象的，而是经历过他们朋友的怠慢或者赞许的一种具体的感受。对于明尼苏达州草原的肯尼科特博士来说，温斯顿想些什么，关系极少，而埃兹拉·施托博迪想些什么则关系很大，但是，对于有一个女儿嫁给了斯威辛伯爵的明戈特夫人来说，当她访问她的女儿或者招待温斯顿本人时，温斯顿想些什么那就有很大的关系了。肯尼科特博士和明戈特夫人都对社会敏感，但是，明戈特夫人对统治世界的社会群敏感，而肯尼科特博士的社会群体只统治明尼苏达州的草原。然而，在影响到“伟大的社会”关系较大的一些问题中，肯尼科特博士所想的，尽管实际上是从“高等社会”通过地方社会群体的渠道点点滴滴地传导到明尼苏达州草原的，然而他却常常以为他所想的纯粹是他自己的意见。

## 四

我们不想探究社会结构问题，我们需要关心的只是在我们与世界在精神上的联系方面，社会群体究竟起多大作用，它怎样确定什么是可采纳的，怎样决定如何去判断它。属于直接权限内的事务，各个社会群体多多少少都是自己决定的。首先，它决定判

断如何具体进行。但是，这种判断本身是由一些模式<sup>①</sup>建立的，这些模式可能是从过去继承来的，也可能是从别的社会群体传过来或者仿效过来的。最高的社会群体是由“伟大的社会”的领导人物组成的。对照几乎所有其它的社会群体，它们大多数的意见都只是直接关于地方问题的，而在这种“最高级的社会”中，关于战争与和平、社会策略和政治权力的最终分配等问题的重大决定，都是在一个小范围内根据个人的经验作出的，这些经验至少也都是个人的认识。

在决定能够看到、听到、读到、感受到和了解到什么，以及许可看到、听到、读到、感受到和了解到什么的问题中，由于地位和接触起着那么大的作用，无怪乎道义上的判断比建设性的思想更为普遍得多。然而在真正有效的思想中，最最重要的事是取消一些判断，恢复纯真的观察力，去除私心杂念，成为好奇和坦率的。人类的历史就象它的本来面目一样，“伟大的社会”的政治意见，需要一定程度的无私和镇静，这是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很少能作到的。我们是关心公众事物的，但我们却陷在私人的事务中。我们不带成见地去了解情况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而且我们还经常受到干扰。

---

① 参看本书第三部分。

## 第四章 时间和注意力

### 一

要粗略地调查一下人们每天有多少注意力放在了解公众事务上面，这自然是可能做到的事。我曾检查了三项调查，这三项调查虽然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和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的<sup>①</sup>，然而有趣的是结果大体上很一致。

霍奇基斯和弗兰肯向纽约市1761名男女大学生寄发了调查表，除了极少数以外，几乎全得到了答复。斯科特向芝加哥的4000个著名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员发调查表调查，收到了2300人的答复。在所有这些答复中，70%至75%的人表明他们每天用一刻钟的时间读报。芝加哥的被调查者中，只有4%的人阅读报纸少于一刻钟，25%则越过一刻钟。在纽约人中间，有8%多一点的人计算他们读报的时间不到15分钟，17.5%的人则多于15分钟。

极少人对15分钟有一个精确的概念，因此，不能把这些数字看得精确无误。而且，多数企业家、专业人员和大学生倾向于一种难以理解的偏见，反对用太多的时间读报，也可能倾向于不想让人知道他们是急切的读者。因此，这些数字能正确地理解为，在选择调查对象中有75%以上的人对于报道现实世界的印刷新闻的注意力是很低的。

这些时间的估计被一项主观性较少的调查很好地证实了。斯

---

① 1900年7月，D. F. 威尔科克斯：《美国报纸：对社会心理学的一项研究》，见《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的年刊》第10卷，第56页。（詹姆斯·爱德华·罗杰斯的《美国报纸》中的统计表是经过重制的）。

1916 (?) W. D. 斯科特：《广告心理学》第226—248页。又见亨利·福斯特·亚当斯：《广告与它的精神法则》第4章。

1920年乔治·伯顿·霍奇基斯教授和理查德·B·弗兰肯：《大学生的报纸阅读习惯》，全国广告协会公司出版，纽约市东第26条街，15号。

科特问他的芝加哥的调查对象每天读几种报纸，答复是：

- 14% 只读一份报纸；
- 45% 读二份报纸；
- 21% 读三份报纸；
- 10% 读四份报纸；
- 3% 读五份报纸；
- 2% 读六份报纸；
- 3% 读全部报纸；（当进行这项调查时为8份）

读二至三份报纸的读者占67%，这与斯科特调查的每天读报15分钟的比率数相当接近。博览四至八份报纸的读者数与读报占15分钟以上的25%的比数大致相符。

## 二

较难推测的是这些读报时间是怎么分配的。曾询问了一些大学生，要求他们指出“五篇特写报道中最感兴趣的是哪篇”。不到20%的人答复最喜欢“一般新闻”，不到15%的人最感兴趣的是社论，不到12%的人最喜欢“政治性的”，超过8%的人喜欢金融类。停战以后还不到二年，超过6%的人喜欢读国外新闻，3.5%的人喜欢读地方新闻，将近3%的人喜欢商业新闻，还有0.25%的人喜欢关于“劳工”的新闻。零散的一些人说，他们最喜欢体育新闻、专题文章、影剧、广告、卡通、书评、“更正”、音乐、“伦理类”、社交、短讯、美术、故事、航行、学校新闻、“流行新闻”、图片。除此以外，大约67.5%的人选择有关公众事务的新闻和评论作为最有兴趣的读物。

这是男女混合的一群大学生，女学生们对于“一般新闻”、国外新闻、地方新闻、政治、社论、影剧、音乐、美术、故事、卡通、广告和“伦理类”等比男学生有更大的兴趣。男学生则对金融、体育、商业版、“更正”和短讯更有兴趣。这些区别与思想

观念上有教养和有道德、男子气概和果断等多少相符，不致使人怀疑这些答案的充分客观性。

他们很同意斯科特对芝加哥企业家和专业人员调查的答案。不是问他们对什么特辑最感兴趣，而是问他们为什么喜欢一种报纸而不喜欢另一种。将近71%的回答是有意识的，偏爱地方新闻的占17.8%，偏爱政治新闻的占15.8%，偏爱金融新闻的占11.3%，偏爱国外新闻的占9.5%，偏爱一般新闻的占7.2%，偏爱社论的占9%。其它的30%喜欢与公众事务无关的材料，他们之中有不到7%的人喜欢“伦理类”，0.05%最喜欢幽默栏。

怎么使这些偏爱与报纸提供的各种题材的篇幅相适应呢？不凑巧没有搜集当时芝加哥和纽约的调查对象所读报纸的情况。但是，20年前威尔科克斯曾作了一次有趣的分析，他研究了14个大城市中的110份报纸，并把题材加以分类，分为9000多种专栏。

通常全国各种报纸的题材可分为：

I 新闻 55.3	(a) 战争新闻 17.9	
	(b) 一般新闻 21.8	{ 外国 1.2 政治 6.4 犯罪 3.1 杂项 11.1
	(c) 专题新闻 15.6	{ 商业 8.2 体育 5.1 社交 2.3

II、插图3.1

III、文学2.4

IV、评论7.1 { (a) 社论3.9  
(b) 书信与交换3.2



## V、广告32.1

为了对这张统计表作合理的对比，有必要把广告的篇幅排除出去，重新计算百分数。因为广告只占芝加哥调查对象或大学调查对象有意识地偏爱的一个极小的比率，我认为我们这样作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广告需要多少篇幅，报刊都会给它刊印的，①在剩下的报纸篇幅中才考虑到它的读者的口味。所以这张统计表应是这样：

I、新闻81.4+	{	战争新闻 26.4-	{	外国 1.8-
		一般新闻 32.0+		政治 9.4+
				犯罪 4.6-
				杂项16.3+
		专题新闻 23.0-		商业12.1-
体育 7.5+				
社交 3.3-				

II、插图4.6-

III、文学3.5+

IV、评论10.5-  
                     {社论5.8-  
                     {来信4.7+

在这张修改过的统计表中，如果你把与公众事务有关的项目，例如战争、外国、政治、杂项、商业等新闻和评论加起来，你发现1900年提供的总篇幅为76.5%，1916年有70.6%芝加哥企业家提出一些理由偏爱某一报纸，以及1920年纽约有67.5%的大学生对五篇特写最感兴趣。

① 除非有些广告被认为会引起反对的；还有一些被版面挤掉的，这种情况很少。

看来，这说明了今天大城市的大学生的口味和企业家的口味多少与20年前大城市编辑的通常判断仍然是相一致的。从那时起，新闻的篇幅无疑是增加了，报纸的销数和总篇幅也增加了。因此，如果今天你能从比大学生或比企业家和专业人员更为典型的一群人中获得正确的答案，你就会发现注意公众事务的时间占了较小的百分数，同样，公众事务所占篇幅的百分数也较小了。另一方面，你会发现通常的人用于读报的时间超过一刻钟，而公众事务所占篇幅的百分数比20年前小，其实际篇幅却增加了。

並沒有从这些数字作出详细的推论。这些数字只是帮助我们具体地了解日久形成我们意见的数据资料。当然，这些报纸不是唯一的工具，然而主要的工具。杂志、公共讲坛、文化集会、教堂、政治集会、工会会议、妇女俱乐部、电影院中的新闻系列片都是报刊的补充。但是，就是作最充分的估计，每天的时间还是嫌少，我们任何人都是径直地从我们看不到外界环境接受消息的。

## 第五章 速度、言词与清晰度

### 一

看不到的外界环境，主要是通过言词报道给我们的。记者把这些言词通过电报或无线电传给编辑，再由编辑编印出来。电报费用很贵，设备也常常受到限制。因此，电讯通常都译成电码。

列举两条译成电码的电讯。

（两条电讯及电码从略）

在上述第二例中，曾从一篇长的讲话稿中选摘其实质部分，用外国口气译出来，编成电码，然后又从电码译过来。报务员边收这些消息边译它们，据我知道，一个好的报务员，一天八小时中能译14000个字或者更多，中间只用半小时午餐和休息两次，每次十分钟。

### 二

必须经常用很少的几个字说明一系列的行动、思想、感受和结果。我们读到：

“华盛顿12月23日讯：——今日朝鲜调查委员会在这里发布了一项声明，指控日本军事当局战时在比利时的行动是前所未见的‘可怕和残暴’，该委员会说，这项声明是根据从满洲发出的权威消息作出来的”。

这里，先是一些看得不太准确的目击者向“权威消息”的制造者报告；然后他们从5000里外把消息传送给一个调查委员会。

刊印这项声明的话，可能太长了，记者必须根据读者能给予这条新闻多少注意力的判断从中选摘3.5时长的篇幅。

一个权威的记者能不能用一百个字以完全公正的事实写一篇几个月中在朝鲜发生的事情的报道呢，实际这是值得怀疑的事。因为语言决不是一种十全十美的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正象货币一样，言词也是翻来覆去的，今天唤起一批形象，明天又唤起另一批。不管什么，对同一个词，记者这么理解，读者不一定也这么理解。理论上说，如果每一个事实和每一种关系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名称，并且每个人都同意这个名称，那么就可能不会在思想交流中产生误解。在精密的科学中，正在研讨这种理想，这就是部分道理，说明为什么全世界各种形式的合作和科学的调查是最有效力的。

人们有很多的思想要表达，但可以使用的言词则少得多，正如吉恩·保罗（Jean Paul）所说，一种语言是一部陈旧的隐喻词典。<sup>①</sup>新闻记者向五十万读者讲话，而他对于这些读者只有一种模糊的形象，讲话的人，他的话闪电一般传到遥远的乡村和海外，不能期望极少的几句话就包括他们的全部含意。布赖恩德向国民议院说：<sup>②</sup>“劳埃德·乔治的话有害地被理解和传播了，看来给了泛德意志主义者一种看法，开始有所作为的时候已经到了”。一位英国首相用英语向全部关注着世界的听众演说，用的是他自己的言词，讲的是他自己的含义，但是，不同的听众对这些言词会产生他们自己的意思。不管怎么，越是丰富或微妙——或者比他要说的更为丰富和更为微妙，他的含义越将受到损坏，因为它

---

① 怀特转引：《特征形成的过程》。

② 埃德温·詹姆斯（Edwin James）1921年5月25日致《纽约时报》专电。

是转变成一般性的语言，然后再传播到外国人的头脑中的。<sup>①</sup>

许许多多人听他讲而根本不能阅读，还有许多人能够阅读但不能理解它。在能阅读和能理解的人中，可以假设有3/4的人每天大约花半个小时思考这个问题，他们所获得的这些言词是一系列思想的线索，根据这些线索他们会得出一些没有告诉他的结论。我们读了这些言词所唤起的一些思想必然是形成我们的意见的主要原始资料，世界是广阔的，与我们有关系的许多情况是错综复杂的，而这些消息又极少，绝大部分的意见必须由想象得出来。

当我们采用“墨西哥”这个词时，纽约的一个居民就会联想起什么情景呢？很可能是沙粒、仙人掌、油井、涂油脂的工人、饮朗姆酒的印第安人、暴躁的老骑士、手舞足蹈的小胡子以及君权等等的混合物；或者可能是一些质朴的农民，象琼斯·雅克，受到烟雾弥漫的工业主义的袭击，以及为人权而斗争。“日本”这个词又勾起什么联想呢？是模糊的一群东方人，为黄祸、图画

---

<sup>①</sup> 1921年5月由于上西里西亚M·科范蒂的暴动，英国与法国之间的关系曾紧张起来。《曼彻斯特卫报》的伦敦通讯（1921年5月20日）包括下列内容：

“法英相互责难。”

“在军营里熟悉了法国的方式和特征，我发现我们的报刊和活跃的舆论曾表现出过分敏感的倾向，同时在当前的危机中法国报刊的不温和的语言。一位消息灵通的观察家以如下的态度对我谈了这种观点：

“言词就象钱一样，是价值的语言符号。它们代表着意思，因此就象钱一样，它们表现的价值是上下浮动的。博苏埃特（Bossuet）所用的法国字“étonnant”（惊人的）其含有的骇人的分量今天已经消失。对英文字“awful”（可怕的）也能观察到类似的情况。有些国家本质上趋向克制，另一些国家则趋向夸大其词。被英国汤米称作不卫生的地方，只能被意大利士兵用丰富的词汇借助于浮夸的形容加以描写。克制报道的国家保持他们言词的价值挺硬，夸大其词的国家则受到语言膨胀的害处。

“‘一个杰出的学者’、‘一个聪明的作家’这类表达的词必须译成这样的法文，如‘一个伟大的学者’、‘一个敏锐的作家’。这仅仅是交换的问题，就象在法国一镑兑换46法朗，而人们知道在国内它并未增值。英国人读法国报刊应该努力在思想上像银行家那样立刻能够把法朗换算成英镑，并且不要忘记正常时期换算率为25的话，因为战争现在是46。正像钱的换算一样，言词的交换上存在一种战时的波动。

“人们希望，这种论点适用于两方面，法国人了解到在英国的沉默背后正像他们自己丰富有力的语言背后一样，存在着同样的价值。”

新娘、扇子、武士、敢死队、技艺和樱花等等所包围吗？“外国人”（Alien）这个词又作何联想呢？按照一群新英格兰的大学生1920年所写的“外国人”一词就是：①

“一个敌视这个国家的人”。

“一个反对政府的人。”

“一个站在敌对一方的人。”

“战时的一个外国人”。

“企图损害侨居国的外国人。”

“一个来自外国的敌人。”

“反对一个国家的人”。等等……。

然而“外国人”这个词是一个非常确切的法定名称，比一些很容易表示“赞成”、或“反对”的词，例如：主权、独立、国家荣誉、权利、防御、侵略、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更为确切得多。

### 三

思想的洞察力能排除表面的相似之处，注意其区别，并认识到其变化。这是一种相对的才能。譬如说一个初生的婴儿和一位植物学家在检验，他们的洞察力是很不相同的。对这个婴儿来说，他自己的脚趾、他父亲的表、桌上的灯、天空的月亮和一本鲜黄色的法国作家莫泊桑的故事书，等等，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小的区别。对于“工会联盟俱乐部”的许多成员来说，一个民主党员、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一个窃贼，他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同时，对于一个很老练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就能看到巴枯宁、托尔斯泰和克鲁泡特金等人之间的整个体系存在不同。这些例子说明要在婴儿中间取得一种关于法国作家

---

① 《新共和》，1920年12月29日，第142页。

莫泊桑的强有力的舆论，或者要在“工会联盟俱乐部”中取得一种关于民主党的正确的舆论是多么的困难。

一个人只是乘坐别人汽车的话，可能区别不出福特汽车、出租汽车或普通汽车哪一种更好。但是，精神分析家说，就让这个人自己拥有一辆汽车，并且自己驾驶的话，让他全神贯注汽车，他就会在远远地看着汽车的后部，描绘出各种汽化器的区别。那就是为什么从谈论“普通话题”转向谈论自己的爱好时，常常会感到那么轻松。就象从客厅里的风景画转到户外耕耘过的原野一样。就象从画家根据模糊的记忆起的景色画出的图画回到了立体的世界一样。

费伦兹 (Ferenczi) 说，我们容易识别两件只是部分相似的东西<sup>①</sup>；儿童比成人更容易这样作，幼稚的或发育受阻的心理比成熟的心理更易作到。最早出现在儿童时代的意识看来是一种不能控制的感觉的混合物。儿童没有时间观念，并且几乎没有空间观念，他对于触到吊灯和触到母亲的乳头有着同样的信心，而且，首先具有差不多同样的期望，只是逐渐地以机能活动来表明它。对于完整的经验来说，这是一个连贯的和无差别的世界。正象一个学派的哲学家曾说，在这个人世中一切事实都生来是自由的和相同的。同属于这个人世的那些事实，还没有与那些偶然伴随意识的事实相分离。

费伦兹说，最初婴儿通过啼哭来索取他要的一些东西，这是“不可思议的幻觉具有无限威力的阶段”。到第二阶段，孩子指着东西要，而后他得到了它们，“通过不可思议的姿态而产生无限威力”。以后，孩子学习说话了，要求他希望得到的东西，部分地见效了。“这是有不可思议的思想和有不可思议的语言的

---

① 1913年国际杂志《精神分析》。由欧内斯特·琼斯博士翻译后在费伦兹的《精神分析学的贡献》第八章《现实意识发展的阶段》中重新出版。

阶段。”每个阶段都会存在某些情况，尽管这些情况是掩盖着的，有时才能看得到，例如，我们几乎没有人能够完全避免小小的无害的迷信心理。在每个阶段中，部分地如愿以偿，就会刺激起另一个要求。许多个人、政党、甚至国家，很少出现超越经验的魅力。一个最先进的民族，在其比较先进的一部分人中，经过反复失败之后的不断摸索，就会得出一种新的原理。他们认识到月亮，并不是因为犬的吠叫而使它移动。庄稼并不是由于春天的欢乐或者由于共和党员占多数而生长出来的，而是由于太阳光、水分、种子、肥料和耕耘才从土壤里生长出来的①。

考虑到费伦兹的反应分类的纯粹系统化的价值，我们注意到关键的特性是对原始的感觉与模糊的相似事物的分辨力。在实验室中曾经研究过这种分辨力②。苏黎世委员会的研究清楚地表明，轻微的精神疲劳，内在注意力的涣散或者来自外部的干扰，都会使反应的特性“变得迟钝”。很“迟钝”反应类型的例子是声响的联系，即一种对于作为刺激的言词的声音而不是其含义的反应。例如，一项试验表明，在第二个一百次反应的系列中“声响反应”增长了9%。此刻这种声响反应几乎是一种重复，是一种很原始的类比形式。

## 四

如果在实验室那样相对简单的环境中都能这么容易地使人们

---

① 费伦兹作为一个病理学家，并不把这个较成熟的阶段的经验写成有机地平衡的，也不认为现实主义的阶段是有科学基础的。

② 例如，参考苏黎世精神病大学诊所领导下的，由C·G·荣格博士主持的分析研究。这些试验主要根据所谓“Krapelin—Aschaffenburg”分类法进行的，它们显示反应的时间，将对于作为刺激的言词的反应分为内在反应、外在反应和声响反应，显示首批100词和第二批100词的各别的结果，当受试验的人被持有的想法搞得心烦意乱时，或者当他答复时同时用节拍器击时的时候，表明感应时间和感应质量的不同结果。有些结果概括在荣格著《分析心理学》第2章中，由康斯坦斯·E·朗翻译。



的辨别力变得迟钝，那么城市生活的影响应该是什么样？在实验室中，疲劳是很轻微的，精神也不容易涣散。两者都受到试验者的兴趣和自我意识的牵制。然而，节拍器的敲打会抑制才智的话，那么一个工厂中八小时或者十小时的噪音、臭气和热度，又会有什么影响？或者日复一日地处于打字机的声响、电话铃声和关门声响中，对于在汽车中或地下铁道中根据读报所形成的政治判断有什么影响？如果不是尖叫声的话，你能在喧哗声中听到什么？如果不是闪烁的电光信号，你能在一般的闪耀中看到什么？城市居民的生活缺少寂寞、安静、悠闲。夜间是喧闹的和兴奋的。大城市的人民受到持续的声响的袭击，一会儿强烈，一会儿陷入无休止的韵律中，然而这些都是没完没了的和无情的。在现代工业主义的条件下，思想是在喧闹声中进行的。如果它的辨别力常常是迟钝的和愚蠢的，这里所说的至少是一部分理由。

拥有最高权力的人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决定生存，死亡和快乐的：日常经验和科学实验同样表明思想是最困难的事。当这种条件使思想变得沉重时，“难以忍受的思想负担”便成为一种负担。而思索是像跳舞那样令人兴奋，那样自然。

每一个从事思考的人都懂得他必须在一天中为自己安排一段安静的时间。但是，在我们自诩为“文明”的忙乱的生活中的公民在可能出现的最坏的条件下履行着危险的政治事务。基于对于这种实际问题的浅近认识，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职工运动，例如，要求缩短工作日、要求延长假期、争取在工厂和办公室有较好的光线、空气、秩序、日光和尊严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一生的智力质量得以改进的话，那也仅仅是般起码的开端。只要那么多的职业都是没完没了的，对于工人来说，是一种无目的的机械方式，一种用一组肌肉进行单调型式的自动性劳动，那么他的全部生活就会趋向于一种自动性，除非发出霹雳声的宣告，否则在这种自动性中是区分不出什么特殊的東西来的。只要他的肉体在白天或者甚至在夜间被束缚在人群之中，那么他的注意力就会恍惚和放

松。很难肯定和清楚地指明，他在哪一方面是各种各样喧扰的受害者，在他的家里，单调乏味的家务活儿、吵闹的孩子、七嘴八舌的喧嚷、不易消化的食品、恶浊的空气和沉闷的装饰等等都需要加以调节。

或许我们偶然进入一幢平静而宽敞的房屋，或许走进一座现代演技已不吸引人的剧院，或者到海上去，到一个宁静的地方去，我们就会回想起我们日常的城市生活是多么喧闹、多么变幻莫测、多么多余以及多么吵吵嚷嚷啊！我们逐渐懂得，我们被搞得混乱了的头脑为什么不能精确地掌握事物，为什么会被标题和标语、口号吸引住而且象跳塔兰台拉舞一样，为什么在明显的区别中发现不了其异同。

## 五

但是，这种外部的杂乱被内在的因素搞得更为复杂。经验表明，速度、准确度和智力特质的联系被所谓感情上的抵触所搅乱。1/5秒中所进行的测量，一百次包括中性的词和激烈的词的连续刺激，或许出现5至32种不同的反应，或者甚至根本没有反应。我们的舆论明显地是与各种复杂事物，与意志和经济利益、个人的憎恶、种族歧视、阶级感情等等断断续续相连系的。这些因素在许许多多方面歪曲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谈话和我们的行为。

最后，由于许多意见并不限于智力正常的社会成员所发表的，由于对选举、宣传和网罗追随者而言，人数是构成权力的，这样舆论关注的水准更进一步降低了。那伙全文盲、低能者、严重神经过敏的人、营养不足和受挫折而灰心的人等等数量是相当多的，可以想象远比我们一般假设的更多。因此，在智力幼稚或者粗野的人、陷入生活困境的人、暮气沉沉的人、与外界隔绝的人以及那些自身经历与我们讨论的题毫无共同之处的人中间，流行着广泛和大众化的趣味。舆论被误解的小漩涡所阻塞，同时因偏

见和不相干的类比而改变了颜色。

一种“广泛的趣味”考虑到联系的特性，是适应那些分布广泛的情感的。“狭窄的”或一种“特殊的”趣味是适应那些不平常的情感的。但是，同一个人可能对不同的刺激作出很不同的反应，或者在不同的时间，对相同的刺激作出很不同的反应。人类的情感如同一个地处高山的国家，那儿有孤立的山峰，有广阔的高原，还有较深的地层，这些地层几乎不断延伸几乎为整个人类提供了生存环境。因此，个人的情感达到那些山峰的稀薄的大气层时，在Frege和Peano之间，或者在Sassetta的早期和后期，存在着一种异常的区别，也可能忠诚的共和党员在另一水平的趣味方面，以及当他们处于饥饿和恐惧时，与别的饥饿和恐惧的人难以区别开来。难怪销路大的杂志喜欢用美女的容貌而不是用任何其它商标来作封面，这副容貌，要美丽足以动人，又要天真无邪，使人易于接受。因为“心理水平”上的刺激行为决定了公众受影响的规模是大的还是小的。

## 六

因此，我们的舆论所涉及的现实环境是在许多方面受到阻扰的，例如，一方面在来源上受到检查和保密的阻扰，另一方面又受到自然界和社会的障碍，注意力的不集中，语言的贫乏，精神的涣散，感觉的无意识的体系，折磨、暴力和单调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接近现实环境的种种限制，加上事实本身的含糊不清和复杂性，就破坏了感觉的清晰和正确，以骗人的虚构代替真实的思想，并且不让我们对那些有意识地进行骗人的东西作适当的检验。

### 第三部分 固定的成见

#### 第六章 固定的成见

##### 一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地球表面的一个小小的部位上生活和工作，在一个小圈子里进行活动，只对很少熟悉的事有所了解。我们看到的任何有广泛影响的公众事件，最多只是一个侧面和一个方面。实际的情况是一些有才干的熟知内政的人起草条约、制定法律和发布命令，另一些人则受条约的约束、接受法律的实施和接受命令的实行。我们的意见不可避免地适用于比我们能直接观察到的范围更大，并且适用于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事情。因此，必须把别人报道的和我们能够想象的拼凑在一起而成为我们的意见。

然而，即使是见证人也带不回真实的情况。<sup>①</sup>因为经验证明，他本人带着一些成见到出事地点去，事后他带回来的多半是

---

① 例如，参看埃德蒙·洛卡德 (Edmond Locard)：《刑事审讯与科学方法》，关于见证的可靠性，近年来搜集了大量有趣的材料，这些材料表明，1921年8月18日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有才干的书刊评论家对洛卡德博士的书评论说，根据不同阶级的见证人和不同阶级的事件，以及不同类型的感觉，其可靠性各不相同。因此，触觉、嗅觉和味觉只有很低的作证价值。我们的听力在判断声音的出处和方向时是有缺陷和随意性的，在听取别人的谈话时，“没听到的词会由见证人理直气壮地加以补充。他会有一种会话意图的理论，用他听到的声音配合它。”甚至在鉴定、识别、判断距离、估计数目例如人群规模等，视觉也会有很大的错误。没有受过训练的观察者对于时间的概念也很不相同。记忆的不可靠和连续不断的想象又使所有这些原有的弱点更为复杂化。还可参考谢灵顿 (Sherrington) 著《神经系统的综合行动》第318至327页。

已故教授雨果·芒斯特伯格 (Hugo Münsterberg) 写过一本关于这问题的普及书，名《论见证人的立场》。

他想象的、已经真正改观了的一个事件的报道。看来纯粹属于他想象出来的事实是极少的。多数意识中的事实是属于部分捏造的。一篇报道是知情者和已知的事实混合产物，观察者在其中的作用总是带选择的，而且，通常是带想象的。我们处在什么地位和我们习惯的看法决定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事实。

一种不熟悉的情景就象婴儿世界，是“一种极大的非常嘈杂的混乱。”<sup>①</sup>约翰·杜威先生说，一个成人遇到任何新的东西时，只要这东西是真正新的和陌生的，就会是这种情形。<sup>②</sup>“我们不懂的外国话，听起来总是咿咿哑哑的，对它不可能分辨出肯定的、明确的个别音组来。好比一些例子，就象是乡下佬在一条拥挤的大街上，一个不懂得航海的人在海上，一个毫无知识的人参加一场专家的复杂比赛一样。把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放在一个工厂中，最初，在他看来一切工作都是毫无意义的杂乱一团。一个来访的陌生人看所有另一种族的陌生人都长得很相象。一个门外汉看一群羊，只能大体区别个子大小和颜色的差别，而对牧羊人来说，则能精确地区别每头羊的特点。界限不清和杂乱地转换吸引力造成了我们的不理解。理解事物的含意或者（用另一种方法说）形成简单的理解习惯，就是必须用意义上的（1）确切性和特性以及（2）一致性和稳定性代替意义上的含糊不清和动摇不定。

但是，采用什么样的确切性和一致性，决定于什么人采用它们。杜威在后来的章节中<sup>③</sup>举例说明一个有经验的门外汉和一个化学家对于“金属”这个词的解释是多么的不同。门外汉的解释可能是这样的：“光滑、坚硬、有光泽和色彩鲜明、量重，……是具有以下性能的耐用材料：锤不碎和拉不断，加热能软化，冷却能变硬，能保持制作的形状，能抵抗压力和腐蚀。”然而，化学家似乎也不忽视这些工艺的和实用的特性，但是，他们

---

① 见詹姆士《心理学原理》第一卷，第488页。

② 杜威：《我们怎么想》第121页。

③ 杜威：《我们怎么想》第133页。

对金属下的定义是：与氧结合形成碱性氧化物的任何化学原素。

对于大部分事物我们并不是先观察而后解释，而是先解释然后观察的。在非常嘈杂混乱的现实世界中，我们深知我们的文化已经对我们形成了固定的成见。聚集在巴黎那些解决人类事务的大人物们，他们之中有多少人能够看到欧洲对他们的期望，而不是只设想他们对欧洲承担的义务的？能有哪个人渗透到克莱门梭的思想中去得出1919年欧洲的形象？或是从1871年以来他所了解的德国类型？他知道这种类型，在从德国发来的一些报道中，看来他只相信那些与他思想类型相符的。如果一个年轻的贵族咆哮了，那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如果一个劳工领袖证明这帝国有罪，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

在哥丁根举行的心理学的大会上，对一群可能是受过训练的观察者进行了一次有趣的实验。<sup>①</sup>

“在坐着代表大会代表的大厅不远的地方，举行一个戴假面具的舞会招待会。忽然，这个大厅的门被打开，一个小丑在一个手持左轮枪的黑人疯狂地追击下冲进来，他们俩个人在屋子的中心打起来，小丑跌倒了，黑人跳在他身上，开枪，然后这两人冲出大厅。整个事件持续不到20秒钟。

“主席要求出席的人立即写出一篇报道，因为对这一事件，肯定要进行司法的调查。有40篇报道送上来，只有一篇在主要事实上有不到20%的错误，14篇有20%至40%的错误，12篇有40%至50%的错误。而且，在24篇报道中，有10%的细节纯属虚构，还有10篇报道起过这个比例，有6篇小于这个比例。简单地说，1/4的报道是不真实的。

“不用说，整个情节是经过安排的，甚至事先照了相。10篇虚假的报道可能被归入故事和传奇类，24篇是半传奇类，6篇被

---

<sup>①</sup> 冯杰内普 (A. Von Gennep): 《传说的形成》，第158—159页；范兰根霍夫 (F. Van Langenhove) 在《传说的发展》第120—122页中引用。

评为近似真实。<sup>①</sup>

这样，40个受过训练的观察者对他们眼前刚刚发生的情景写出了负责的报道，其中绝大多数看到了一种並沒有发生过的情景。那么，他们看到的是什麼？人们会设想，报道发生过的事总要比虚构没有发生过的事容易一些。他们看到了他们头脑里关于这样吵架的固定的成见。在他们的生活中，他们全都获得过许多吵架的印象，这些印象在当时闪现在他们眼前。有一个人用这些印象取代了将近20%的真实情况，有13个人用这些印象取代了一半以上的真实情况。在40个观察者中，有34个都以固定的成见首先取代了至少1/10的情况。

一位卓越的艺术批评家说过，<sup>②</sup>“一方面由于一个物体几乎有无数的形状，……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的感觉迟钝和不注意，事物很少留给我们那么确定和清楚的特点和轮廓，使我们能回忆起来，留下来的只是形成固定的成见的艺术形状。”真实的情况是比成见更为广泛的，因为留给世界的固定的成见不仅仅得自艺术、绘画、雕塑和文学的感受，而且还得自我们的道德信条、我们的社会哲学和我们的政治宣传。在贝伦森先生的下述一段文章中，用“政治”、“商业”和“社会”等词代之以“艺术”这个词，并不会削弱句子的真实：“……除非用许多年的时间研究所有艺术的学派以后，会教给我们也用我们的眼睛去观察，否则我们还是很快会陷入一种习惯的模式，使我们看什么东西都会得出一种我们熟悉的艺术形式。存在着一种我们的艺术真实的标准。假如有什么人给我们那些形态和颜色，而这些形态和颜色不能立即符合我们头脑里塞满的陈旧的形态和颜色，我们就会对他未能重新制作我们认为必然如此的东西摇头叹息，或者我们就指责他不真诚。”

贝伦森先生说，当一位画家“並不象我们那样设想客观物

---

① 伯纳德·贝伦森：《文艺复兴时期中部意大利的画家》第60页。

体”时，我们就不愉快，他还说到欣赏中世纪艺术的困难，因为从那时以来，“我们的观赏方式已改变过上千次”。<sup>①</sup>他继续说明我们怎么被引导去看我们看到的人物画像。“唐纳泰罗和马萨西沃创作的，以及人文主义者支持的新的画像的准则，新的面貌的特色。……呈献给那时的统治阶级的是最有可能赢得武力斗争的典型……谁有能力突破这种新的观赏标准？那些有才华的人们已确定了一些形态，人们在混乱的事物中怎么能有其它选择来更确切地表现真实的形态呢？没有谁有这种能力。人民必然按照这种方式去看事物，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式，只能去看绘出来了的形态，只能去喜爱提供给他们思想。……”<sup>②</sup>

## 二

在我们不了解别人认为他知道些什么以前，我们是不能够充分理解别人的行为的，因此，为了公正起见，我们不仅要鉴定他们得到的消息，而且要估量受这些消息渗透了的思想。因为公认的标志、流行的型式以及标准的看法都掺在消息中影响意识。例如，“美国化”至少表面上说就是以美国的成见代替欧洲的成见。因而，要教给农民按照美国的标准来看地主和雇主，不然的话，他就可能会把地主看成封建的庄园领主，把雇主看成地方上的权贵。这就是改变思想的问题，实际上，思想灌输成功的话，看法就改变了，他眼睛所看到的也就不同了。一位仁慈的女士坦白承认固定的成见是这样无比重要，如果她不迷恋于她的观念的

---

① 还可参看他论《但丁的视觉形象》和他的《意大利艺术的研究和批评》中的早期插图画家（见第一集，第13页）。“我们无法把弗吉尔装扮成罗马人，并给他一种‘高贵的形象’和‘庄严的仪态’，但是，但丁的弗吉尔形象可能与他对罗马诗人全部概念相同，中世纪的，基于一种批判的古罗马的重建，14世纪的插图画家把弗吉尔的画像画得象一个中世纪的学者。戴帽穿长袍，但丁对他的形象没有理由不应该是这样。”

② 《中部意大利的画家们》第66—67页。



话，她至少是不能接受男人的兄弟关系和上帝的父亲身份的：“我们出奇地受我们所穿衣服的影响。衣着造成一种精神的和社会的气氛。怎么可能设想一个具有美国习惯的人会坚持雇佣一个伦敦的裁缝呢？一个人的特殊的食品影响到他的美国习惯。在泡菜和凌恩格乳酪的气氛中能够产生哪一种美国意识呢？或者你怎么能够设想一个有美国生活习惯的人的呼吸里总会发出大蒜的臭味呢①”？

这位女士很可能是一个庆典的资助人，我的朋友曾去参加过这庆典。这庆典称为“融化锅”（Melting Pot），是7月4日在一个雇佣许多外国出生的工人的汽车城举行的。在棒球场的中心第二垒上，立着一个用粗大的木头和帆布作的锅。其两侧有阶梯，可以上到锅边去。当观众安定下来以后，乐队开始奏乐，一列队伍从场地的一边进口处走进来。这列队伍是由工厂雇佣的外国籍的人组成的。他们穿着本民族的服装，唱着本民族的歌曲，跳着他们的民间舞蹈，并举着所有欧洲的旗帜。这个庆典的主持人是穿戴得象“山姆大叔”的小学校长。他领着这些人到锅前，指挥他们从阶梯登上锅边，并进入锅中。他又叫他们从另一边走出来。他们带着圆顶礼帽，穿着大衣、裤子、背心、硬领和圆点花纹的领带走出来，我的朋友说，每人口袋里都有一支“永远尖”铅笔，并且都唱着美国国歌。

在这次庆典的发起人看来，或许在多数演员看来，好象他们有意地表现老一代的美国人 and 新一代的美国人之间很困难建立起最亲密的友谊。他们传统的固定的成见所造成的矛盾，妨碍了他们充分认识他们之间的共同人性。改名换姓的人懂得这一点。他们要想改变他们自己，还想改变陌生人对他们的态度。

当然、外界的实际情况与我们通过头脑观察到的外界情况这二者之间是有一些联系的，就象有一些长头发的男人和短头发的

---

① 爱德华·比尔施泰德引用，《新共和》杂志，1921年6月1日，第21页。

女人在激进派的集会中一样。但是，对于急匆匆的观察者来说，知道有一点联系就够了。如果观众里面有两个短头发的和四个络腮胡子，而对一个事先就知道这种集会是按照头发的情趣组合起来的记者来说，只要有一个短头发的和一个络腮胡子就行了。在我们的想象和一些事实之间有一种联系，但这种联系是奇怪的。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在一个地区除了能够看到有许多建筑物以外，很少看到一片风景，但是，他曾经看到过一些挂在客厅里的风景画。他学会了根据这些风景画去想象一片风景，例如，一片玫瑰红的日落景象，或者一条乡村的小道加上一个教堂的尖顶和一轮明月。有一天，他到乡间去，用了很长的时间也没有见到一片风景。后来，太阳落下去，呈现了玫瑰红的颜色，他立刻认为这是一片风景，並惊叹景致之美。但是，两天以后，当他试图回忆他看到的景象时，可能他会首先想起挂在客厅里的某幅风景画。

如果他不是喝醉了酒，或者做梦，或者神经不正常，他确曾看到过日落，但从日落中看到的，特别是他从日落中回忆到的，更多地是那幅油画教给他怎么去观察的，而不只是如一位印象派画家或者一个有素养的日本人可能看到和得到的。反过来说那个日本人和那个画家也将会看到和回忆起更多的他们所学习过的艺术形式，除非他们恰好是那些为数极少的为人类打开新的眼界的人。在没有受过训练的观察中，我们从现实环境中领会一些可以认识到的迹象。这些迹象意味着一些思想，而这些思想是由我们积存的许多印象形成的。我们並沒有看到这个人的那么多情况，或者那样的日落，更确切地说，我们注意到的是人和日落，然后看到的首先已经充满在我们思想上的这些题材。

### 三

这中间有个简易的问题。因为想要精神饱满地去观察所有事

物並仔细观察它们的细节，比认识其类型和概貌还更费劲，如果在匆忙的情况下，那在实际上是更不可能的了。在朋友的圈子中，在关系密切的同事之间或竞争者的关系中，不可能通过捷径，也没有其它办法可以用来了解个性。我们最喜欢和最钦佩的男人和女人们，他们的意识是与许多人有密切关系的，而不是与一些类型有关的，他们也不是把我们归入相应的类型中去了解我们的。因为甚至不需要对我们自己进行解释，我们就直觉地感到所有的分类方法都是与一定的目的有关联的，而不一定与我们自己的意图有关联；所以在两个人之间如果不尊重别人的话，那就不会有永恒的友谊。两个人在接触上有缺陷的话，也並不证明它是双方都不能触犯的原则。

但是，现代生活是匆促的和五花八门的，首先，物质上的距离，常常使有重要联系的人分开，例如，雇主和受雇者，官员和选民等。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取得密切的了解，我们只注意到一种众所周知的特性，另外就用我们头脑里的固定成见来充实这种形象。他是一个鼓动者，多半是我们注意到的或者是别人告诉我们的。好吧，一个鼓动者是这样子的人，因而他也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一名知识分子，他是一名富豪，他是一个外国人，他是一个“南欧人”，他是从“后海湾”来的人。他是一名哈佛毕业生，这种称呼是多么不同。他是一名耶鲁毕业生，他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西点军校毕业生，他是一个老的军士，他是一个格林威治的村民，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他是一位银行家，他是从梅因街来的。

所有影响中最微妙和最具有普通意义的是创造和保持固定的成见的储存物。在我们观察世界以前，已有人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样的了。对于大多数事物，我们是先想象它们，然后经历它们的。如果不是教育使得我们已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这些先入之见会深深地支配整个知觉过程，这些先入之见把某些事物划分为熟悉的或生疏的，强调了这种区别，所以，看到有一点儿熟

悉的东西就象是很熟悉；有一点儿生疏的东西，就象是非常陌生。这些先入之见是由小的迹象引起的，这些小的迹象可能是一种真实的标志，也可能是一种模糊的类似物。先入之见形成以后，旧的形象就会淹没新的视野，並影射到记忆中重新出现的世界中去。如果现实环境没有实际上的一致性，那就毫无简便之利，而人类接受先见之明的习惯也只能导致错误百出。但是，事实上是有许多非常准确的一致性的，而我们又不可避免地十分需要节省关注事物的精力，因而如果抛弃全部固定的成见，完全单纯地探讨经验，就会使人类生活枯竭。

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固定的成见的性质以及我们轻信这些成见的程度。归根结蒂依赖这些广泛的模式构成我们的人生观。如果在那种人生观中，我们假定这世界是按照我们掌握的一种准则安排的话，那么我们会写出我们的报道，来描写一个按照我们的准则行事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的人生观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只是这个世界的极小部分，因而他的智力最多只能领悟粗略的思想网络的一些方面，那么，当我们运用我们的固定的成见时，我们就会懂得它们只是一些成见，而把它们看轻些，并且乐于修改它们。同时，我们也会越来越清楚地知道我们的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在什么地方出现的，它们是怎样在我们头脑中产生的，为什么我们会接受它们。所有有益的历史都是这样不掺杂个人情感的。它使我们知道究竟是哪一个神话故事、哪一本教科书、哪一种传统、哪一部小说、戏剧，哪一幅图画、哪一个词组，在这种观念中灌输了这种先入之见，在那种观念中灌输了另一种先入之见。

## 四

那些希望搞检查魔术的人们至少没有过低地估计这种影响。他们普遍地误解它，而且几乎总是荒谬地阻止别人发现任何没经

他们批准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象柏拉图关于诗的论争一样，他们含糊地感觉到通过小说得到的形象会影响实际事物。因而毫无疑问，电影扎实地塑造了一种形象，而后人们又在阅读他们的报纸中唤起了对这种形象的回忆。在整个经验积累过程中，没有什么形象化的辅助物能比得上电影的了。如果一个佛罗伦萨人希望看到圣徒，他可以到他的教堂里去看壁画，在那里他可以看到乔多（佛罗伦萨画家）画的标准化的圣徒。如果一个雅典人希望看到上帝，他可以到圣堂去。但是，画像的数量是不多的。在东方，广泛地接受了第二戒律的精神，具体事物的画像甚至更少，因此，作出实际决定的才能就大为降低。在西方世界中，过去几个世纪非宗教的（世俗的）绘画、字画、记叙文、有插图的记叙文以及最后电影以至有声电影等的数量和范围都大大地增加和扩展了。

今天的照片在想象力上所具有的那种权威性就象印刷文字在昨天，或者口语在更早的时候所具有的权威性一样。它们看上去完全象真的一样。它们不通过人的干扰，直接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是最不费力的可以相信的东西。任何文字的描述，或者没有生气的图片，都必须费力地记忆才能在头脑中留下一幅图景。但是，在银幕上，观察、描写、报道然后想象的整个过程都替你完成了。只要清醒地观察，让你的想象随着银幕转动，除此以外，就不需要费更多的力气了。模糊的思想变得鲜明，譬如说，感谢格里菲思先生，当你观看《一个国家的诞生》时，关于三K党的模糊概念你就有了鲜明的形象。在历史上，它可能是错误的形象，而且我怀疑不管什么人只要看过这部影片，即使他所知道的关于三K党的情况并不比格里菲思先生多，也不会再听到三K党的名字而不想到那些骑白马的人的。

## 五

因此，当我们说一群人的思想、法国人的思想、军国主义者

的思想、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时，我们容易严重地混淆，除非我们同意把先天的资质与固定成见、类型和准则区分开来，因为后三者适应和反映本国特性的精神世界中起着那么决定性的作用。不能作出这种区别的话，则关于共同的思想、民族的精神和种族的心理等等都会流于广泛的空谈。固然，一种固定的成见可能那么连贯地和有权威地几乎象生物学上的实际情况那样，从父母代代相传给孩子。就象华莱士先生说的那样<sup>①</sup>，在某些方面我们会真正成为我们社会传统的寄生虫的。但是，还没有一点儿科学的迹象能让任何人证明，说人们是生来就带有他出生的国家的政治习惯的。就政治习惯而言，在一个国家里，这种习惯都是相似的，首先要到托儿所、学校、教堂，而不是到“集体思想”和“民族精神”的禁区中去寻找解释。在你完全认识不出传统是从父母、老师、牧师和叔伯那里相传下来的以前，就会错误地把政治上的差别归之于种质上的因素。

在同一类型的教育和经验中试图公正地判断出相对的差别来，这是可能做到的。然而这是复杂的事。因为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的经验。年长的孩子永远没有年幼的孩子的那种经验。因此，在我们对于教养上的不同持怀疑的态度以前，我们一定不先去考察天性上的不同。就好象你还不知道哪一块是“拉布拉多”的土壤，哪一块是“衣阿华”的土壤，也不知道它们是开垦过的并施过肥的呢，还是上肥耗尽了的或者是听任其野生的之前，就根据产量来判断这两块土壤的生产能力一样。

---

<sup>①</sup> 格雷厄姆·华莱士：《我们的社会传统》第17页。

## 第七章 作为防护手段的固定成见

### 一

当我们寻求一种公正无私的观念时，为什么却总是抓住我们固定的成见不放呢？除了省力以外，还有另一种原因。固定的成见的体系可能是我们个人传统的核心，是我们社会地位的防护。

这种固定的成见的体系是有条理的，对世界的想象，或多或少是始终如一的，我们的习惯、情趣、智能、安慰以及我们的希望都根据它来进行调节。它们可能不是完整的世界形象，但它们是一种适合我们可能存在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人和事物都有其熟悉的地位、并作着某些预料到的事。我们在其中感到很自在，感到很适应，我们是其中的成员。我们熟悉情况，在那里，我们发现熟悉的、正常的和可靠的魅力；我们惯常地找到它们适当的位置和状态。虽然在我们受它影响以前，我们曾回避它对我们的诱惑，但一旦我们牢固地产生了成见，就很难解脱它。

因此，对固定的成见进行任何干扰，无疑就象是对于这宇宙的基础进行了袭击。那是对我们的宇宙的基础所进行的袭击，而且那里事关生死存亡，我们並不乐意承认我们头脑中的宇宙与客观宇宙之间存在着任何区别。如果世界变成我们所尊敬的反而是一些不值得尊敬的，我们所鄙视的倒是一些崇高的，那就很伤脑筋了。如果我们的先后次序不是唯一可能存在的次序，那就产生混乱了。因为如果逆来顺受应该在地球上继承下去，如果第一应该成为最后，如果没有罪的人将投掷一块石头，如果你只是把西泽的东西报答给西泽，那么对于那些已经安排好了他们生活的人就会动摇自尊的基础，好象那些准则都不是正确的。

固定的成见的型式並不是中立的。它不仅是用来代替嘈杂混乱的现实的一种方法。它也不仅仅是一条捷径，除了这些以外，

它还有更多含义。它是我们自尊的保证；它反映了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自己的地位、我们自己的权力的看法。因此，一些固定的成见都是极大地包含了它们所附带的感情。它们是我们传统的堡垒，在它们的防卫下，我们能够继续感到我们所处的地位是安全的。

## 二

例如，纪元前四世纪的时候，面对着怀疑主义的兴起，亚里士多德写了他的保卫奴隶制度的作品<sup>①</sup>，说雅典的奴隶大部分与自由民难以区别。齐默恩（Zimmern）先生摘录了《老寡头政治的执政者》中有趣的一段，说明了奴隶受到的优待。“假定一个奴隶受到一个公民鞭打是合法的话，那么常常就会发生把一个雅典人误认为是奴隶或是外侨而遭鞭打；因为雅典人的穿戴既不比奴隶或者外侨好，个人的外表也没有任何优越的地方。”这种缺乏区别会自然地消除这种制度。如果自由民与奴隶看上去是相象的，那还会有什么区别对待它们的基础呢？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的第一册中清除了这种认识上的混乱。他以准确的直觉认识到，为了替奴隶制度辩护，他必须教育希腊人用一种方法去看待他们的奴隶以适应奴隶制的继续存在。

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sup>②</sup>。“他天生成为一个奴隶，成为另一个人的财产，结果就是这样。”所有这些，真正地说明了不管什么人当上了奴隶，都是天生注定的。这种陈述在逻辑上说是没有价值的，但是，事实上它根本不是一个命题，逻辑与它毫无关系。它是一种固定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固定的成见的一部分。其它问题几乎立即随之而来。在断言

---

① 齐默恩：《希腊的共和制》第383页注解。

② 《政治学》第1册，第5章。



奴隶们觉察到理智，但不能运用理智之后，亚里士多德坚持“奴隶和自由民之间有区别是上天的意志，他们中的一方应该是粗野的，而另一方则精神轩昂的，不需要从事这种奴隶劳动，只适合于文明生活。……那就很清楚，一些人生来就是自由的，而另一些人则生来就是奴隶。……”

如果我们询问我们自己，亚里士多德的论点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就会发现他在他自己与事实之间竖立起了一个很大的屏障。当他说那些奴隶是生来成为奴隶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排除了这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那些成为奴隶的人是不是生来就是注定要当奴隶的人。因为这问题会促使对各种奴隶身份的情况产生怀疑。由于成为一名奴隶这个事实并不足以证明他命中注定要成为奴隶的，没有一种检验能作出这样的证明。所以，亚里士多德完全排除了那种有害的怀疑。那些成为奴隶的人是甘心于当奴隶的。每一个奴隶主都把他们的奴隶看作天生的奴隶，当他学会了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时，他就会注意到这样的事实：他们从事着奴隶劳动，他们能胜任奴隶劳动以及他们有从事奴隶劳动的肌肉，这些都会成为他们具有奴性的证明。

这是毋庸置疑的固定的成见。其特点是它在运用理智之前就已存在；是观念的一种形式，在形成理智以前，它就对我们的意识施加了一定的影响。固定的成见象是“比根街”上淡紫色窗玻璃，象化装舞会上评定客人的化妆是否合适的守门人。对于教育或者批评再没有什么比固定的成见更为执拗的了。在寻求证据的过程中，他对所要寻找的证据已有成见了。那就是为什么一些旅行者回来叙述的常常是他在旅行前已经感兴趣的一些事。如果他主要地带着这样的一些想法出去：食欲、热心于瓷砖的浴室、深信普尔门卧车是人间最舒适的以及相信只需要付给侍者、出租汽车司机和理发师小费，但不付给车站代理商和招待员小费，那么他的长途旅程将充满了好吃的饭或不好吃的饭、洗澡的奇遇、列车厢的恶作剧和到处需要化钱。或者假定他是一位较严肃的人，

可能在旅程中发现他所到之处是些著名的地方。到达了目的地，对纪念碑偷瞧了一眼，埋头读导游手册，逐字地读，以及转移到下一个著名地点，这样，回来时带着对欧洲的牢固的和有条不紊的印象，评论哪个地方最好，哪个地方不太好。

来自外部的刺激，尤其是印刷文字或是口语在某种程度上唤起了某些成见，那么就使实际的感觉和先入之见同时存在于意识中，两者掺和起来，就好比是我们透过蓝色的玻璃看红色的东西，结果看到的是绿色。如果我们看到的東西很符合我们所预期的，这种成见又进一步加固了，正象我们事先就知道日本人是狡猾的，不幸正碰到两个不诚实的日本人一样。

如果经验与固定的成见相抵触，就会出现两种现象的一种。如果这个人是不再容易受影响的，或者如果有些强有力的兴趣使得他顾不上去重新整理他的一些固定的成见，他就藐视这种矛盾，认为是例外，怀疑所看到的，发现某处有缺陷，而设法忘却它。但是，如果他很认真和虚心，就会接受新事物而修改自己的成见。有时候，倘若这种事情很明显，而且对他已经建立起来的看法感到普遍的不对头，那么他可能动摇直至怀疑他在生活中所接受的各种看法，并希望正常的事物不将像他一般所期望的那样。在极端的情况下，特别是他若是文学家，他可能产生一种激情而在他的小说中把犹太，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或西泽·博奇亚写成英雄而颠倒了道德标准。

### 三

在关于比利时狙击手的德国故事中能够看到固定的成见所起的作用。那些故事过分离奇，最早曾被一个名叫帕克斯<sup>①</sup>的德国天主教神父反驳过。这些残暴的故事的存在本身并没什么值得注

---

<sup>①</sup> 费尔南德·范兰根霍夫：《传奇的成长》，作者是比利时的社会学家。

意的，德国人乐于相信它们也不足怪。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很大的德国爱国的保守团体早在1914年8月16日便已出面反驳对于敌方的一大堆诽谤，尽管这类虚构故事对消除他们同胞受到搅扰的良心有极大的价值。为什么这一家耶稣会团体要出面来毁坏一种对于德国的战斗精神那么重要的虚构故事呢？

让我引用范兰根霍夫陛下的叙述：

“德国军队刚刚进入比利时，奇怪的谣言就开始流传了。这些谣言从一地传到另一地，并被报刊转载，很快就传遍全德国。谣传比利时人被教士们煽动，背信弃义地和德国处于敌对状态，派出独立的特遣部队进行突然袭击，向敌方指出军队的驻地，谣传老人甚至儿童都对受伤的和无防卫的德国士兵犯下可怕的暴行，挖出了他们的眼睛割掉了他们的手指、鼻子或耳朵；谣传他们的布道坛的教士们曾劝说人民去犯这些罪行，许诺人们可以升入天国作为对他们的报答，甚至带头采取这种暴行。”

“公众轻信了这些报道。国家的一些最高的掌权者毫不迟疑地欢迎这些报道。并利用他们的权力加以认可。”

“德国的舆论被这种情况扰乱了，它本身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义愤，这种义愤尤其导致反对对所谓比利时人的暴行负有责任的教士们。……通过一种自然的转变，他们成为牺牲品的这种愤怒被德国人引导到普遍地反对天主教教士。新教徒们在他们心灵中重新点燃起对旧的宗教的憎恨，驱使他们自己去攻击天主教徒。引起了一场新的罗马天主教堂与德国政府的斗争。

“天主教徒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反对这种敌对态度。”①

也许曾有过一些狙击活动。如果每一个愤怒的比利时人都跑到图书馆去，打开一本国际法手册，了解他有没有权利射击践踏他的街道的凶恶而讨厌的敌军，这会是离奇的事。同样离奇的是，如果一支没有打过仗的军队，并不把打过来的每一颗子弹都看作

---

① 费尔南德·范兰根霍夫：《传奇的成长》第5—7页。

是没经认可的，因为那是给人添麻烦的，并且真的看作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为战术教练而作的军旗游戏的规则，而这种规则构成了这支军队仅有的战争经验。人们能够更敏感地确信，他们正在对其施加可怕的事情的人，必定是可怕的人。因此，这种传说可能被编造出来一直传到检查官和宣传人员那里，他们不管相信还是不相信，见它有价值，就让它德国公民中传播。他们也完全不为发现这些受其凌辱的人是下等人而感到遗憾。尤其是只要传说是来自他们崇拜的英雄，他们就不仅认为值得相信它，而且不相信的话，反而被认为是不爱国。

但是，因为行动的情景被战争的迷雾所掩盖，没法检验和控制，那么多情况就只好留待想象。残暴的比利时教士的传说很快激起了旧恨。由于多数爱国的新教徒，特别是上层阶级的，在他们的心灵中，俾斯麦的胜利是包括了与罗马天主教长期的不和的。通过一个联合的过程，比利时的教士成了传教士，比利时人的仇恨成了他们仇恨的发泄点。这些德国的新教徒作了一些犹如美国人所作的，即在战争的压力下，他们产生了复合的仇恨对象——国外的敌人和所有国内的反对者。反对这种假想的敌人，在德国的匈牙利人和盖特内的匈牙利人发泄了所有他们的憎恨。

天主教徒对于这种暴行故事的抵制当然就是防御。特别是对那些激起敌视全部天主教徒而不仅是敌视比利时天主教徒的捏造。蓝根霍夫说，消息机构仅仅有教会的思想感情，并且“把他们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限制在教士们应受申斥的行动。”然而人们不能不怀疑俾斯麦帝国涉及的关于德国天主教徒的思想动机；以及在知识与事实之间还有没有任何含糊的联系，使德国杰出的政治家——天主教中心党的领袖厄斯贝格<sup>①</sup>愿意停战来签署帝国的灭亡保证。

---

<sup>①</sup> 写完这章以后，厄斯贝格就遭暗杀了。

## 第八章 盲点及其价值

### 一

前面我说的是固定的成见，而不是说的理念，因为理念这个词通常用来表明我们所认为的真、善、美。所以它带有一种暗示，即这里是一些可以复制或获得的东西。但是，我们贮存的固定印象比那要广泛得多，它包含理念化的骗子、理念化的坦慕尼式政治家、理念化的侵略主义者、理念化的鼓动者、理念化的敌人。我们已形成成见的世界并不一定是我们愿意要的那种世界，它仅仅是我们预料会存在的那种世界。如果一些事件互相符合就有一种熟悉感，而且我们会感到，我们在随着事件的变动而变动。如果我们是希望作问心无愧的雅典人，那么我们的奴隶就必须是天生的奴隶。如果我们曾告诉朋友说我们击95次高尔夫球中得了18分，那么我们在一场中击球110次，我们就会告诉他们，我们今天是“身不由己”。这就等于说，我们并不认识那个打了15次坏球的笨蛋。

如果每一世代中相当少的人不是经常地把成见安排、统一和改进为逻辑体系，就象大家知道的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政治学的原则之类一样，那么，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要通过杂乱无章、变化无常的成见来处理事务。一般地说，当我们写到文化、传统和团体心理时，我们是考虑到这些天才人物已经整理得很完善的体系的。要经常研究和批判这些理念化了的看法，现在对这种必要性是没有争议的，但研究人的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宣传人员不能到此为止，因为历史上出现的事物，并不象天才人物所阐述的有系统的思想那样，而是个人头脑中变换的模仿品、复制品、比拟和曲解。

因而马克思主义不一定就象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写的那样，而是所有敌对派别认为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并且都自

称是正确的，你不能够根据基督福音来推断基督教的历史，也不能够根据宪法来推断美国的政治历史。对《资本论》所设想的，基督“福音”所宣讲的，说教所了解的以及宪法所阐明和实施的，你都必须照办。因为在标准看法与现行看法之间互有影响，正是这些现行的看法在人们中间散播以后，影响到了他们的行为。<sup>①</sup>

一位眼睛象利莎夫人那样显得疲倦的批评家说：

“‘相对论’有可能发展成为相当于‘进化论’应用于宇宙的一种原理。这后一种理论，从作为专门性的生物学的假设，变成几乎是从事每一门学问的鼓舞人心的指南：风俗习惯、道德、宗教、哲学、艺术、蒸气机、有轨电车——每件事都已‘进化’了。‘进化’成了一个普通的名词，又变成了含糊不清的，直到在许多情况下，这个词原来的确切的含意已失却了，这种理论曾经有过的描述被曲解了。我们很果断地预言，‘相对论’的历程和命运将是类似的。据现在不完全的了解，专门性物理的理论将变得更加模糊和朦胧。历史是会重复的，象‘进化论’一样，‘相对论’在它的科学的方面，接受了许多可理解的但有几分不准确的通俗说明之后，将开始一种征服世界的历程。我们设想，到那时候它将可能被称为‘相对主义’。许多这些较大的应用都无疑被证明是合理的；有些则是不合理的，我们料想有相当数量的会变成陈词滥调。随着这颗种子的茁壮成长，这种物理学的理论会再一次成为科学家们纯粹在技术上所关心的问题”<sup>②</sup>

---

① 但是不幸的是了解这种实际的文化比总结和评论天才的著作要困难得多。这种实际的文化存在于人民中，这些人不能够沉迷于形成他们的信念生疏的行业中，他们只是偶尔记录它们，学生很少知道他们的材料怎么典型，他们能做的或许充其量就是遵循布赖斯男爵的建议（《现代民主》第1卷第156页），自由地“在各种人的情况中”活动，从每一地区中挑选出不偏不倚的人，他们的技能不相上下。“有一种长期实践和含有‘同情心’的鉴别力，受过训练的观察者学会如何利用微小的迹象，就象一个老海员比新海员更快地识别风暴即将到来的信号。”总之，存在着大量的推测工作，无疑精确的学者们常常把他们的注意力局限在别的学者们的更为简洁的公式上。

② 《泰晤士报》（伦敦）文学增刊，1921年6月2日第352页。爱因斯坦教授说当他1921年在美国时，人们倾向于过高估计他的理论的影响，而过低估计它的必然性。

但是，这种征服世界的思想不管怎样不明确，也一定符合一些东西的。伯里（Bury）教授指出，那么长的时间这种思想的进展仍然是一种纯理论的玩意儿。他写道<sup>①</sup>：“让一个社会普遍深入地了解一种新的理论思想是不容易的，除非它呈现出一些客观的具体的体现，或者用一些显著的有形的迹象介绍出来。1820—1850年期间，在英国“进步党”的实例中这两个条件都完备的”。机器革命提供了最显著的例证。“这个世纪初出生的人，在30岁以前，都曾经见过轮船航行的迅速发展，城镇和屋子用煤油照明，第一条铁道通行。”象这样的一些奇迹使一般居民在意识中形成了他的信念——人类是可以达到完善境界的。

一位研究哲学问题、精神相当正常名叫坦尼森的人告诉我们，当他1830年乘第一列火车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时，他以为车轮是在车辙中跑的。他在那时写道：

“让这伟大的世界永远旋转在变化的、鸣响的车辙中吧。”<sup>②</sup>

就这样，一个或多或少适用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之间的旅程的概念，被概括到了宇宙“永远”的型式中去了。这种型式被别人采纳，被眼花缭乱的发明所加固，施加乐观的影响于进化的理论上。自然就象伯里教授所说的那样，那种理论在悲观和乐观之间处于中立的地位。但是，它还会有不断的变化，世界上看得见的变化标志了这么离奇的对于自然的征服，民众的思想把二者混合在一起了。“进化论”最初见于达尔文，然后由赫伯特·斯潘塞加以发挥，是“趋向完善的进步。”

## 二

固定的成见用“进步”和“完善”这样的词来阐述，基本上

---

① 伯里：《进步的概念》第，第324页。

② 坦尼森：《他的儿子的回忆》第1卷，第195页，伯里引用，同上，第326页。

是由于机械的发明。总的说来，机械的发明直到今天仍是基本的因素。在美国胜过于任何别的地方，机械发展的景象留给人的印象是那么深刻以致弥漫到了整个道德信条。一个美国人会忍受任何侮辱，却不能忍受说他不进步的指责。不论是长期祖居美国的人或者是最近移民进来的人，经常目击到美国文明巨大的有形的发展。它构成了他观察世界的基本的固定成见：村庄将变成大都市，最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小的东西会变成大的；慢的东西会变成快的；穷的会变成富的；少的会多起来；不管什么都将这么变化。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这样看世界。亨利·亚当斯就不这样看世界，威廉·艾伦·怀特也不这样看世界。但是，杂志中描写的那些一心追求成功的“美国缔造者”的人们就是这样看的。当他们宣扬进化、发展、繁荣和进行建设时，他们指的就是作各种事的美国方式。尽管这种看法容易被认为可笑，但是，实际上他们正在运用人类所作的努力的一种非常伟大的形式。第一，这是采用一种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尺度；第二是采用世俗的尺度；第三是使人们习惯于定量地思考。可以肯定，这种理念混淆了卓越与规模、快乐与速度以及人性与新发明的区别。然而，同样的动机在起作用，这种动机曾激励过或者将激励任何道德信条。这是追求最大、最快、最高的欲望，或者你若是制造手表或显微镜的人，那么你就会追求最小的；这是追求最高级和“无可匹敌”的东西的爱好，这种欲望和爱好在本质上可能成为一种高尚的热情。

当然，美国人对于进步的看法，在经济情况和人类本性方面对非常多的事实都曾适用的。这种观点把难以估量的好斗精神、占有欲和权力欲都转变为建设性的劳动。可以说直到最近，它也不曾严重地挫伤这个社会的积极分子的积极性。他们造就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使他们这些文化本身的创造者对工作、婚配和游乐都感到非常满意，他们征服群山，荒野和边远地区以及在



人类的竞争中取得的一连串胜利，甚至为宗教的感情尽到了职责，就某种意义上说，那种宗教感情与宇宙存在的目的是相交融的。这种文化型式是一种成功，它在一连串的思想、实践和成果中几乎都是那么完善，以致于对它进行任何挑战，都被称作是“非美国的”。

然而，这种型式是阐述世界的一种很不完全和很不适当的方式。把进步看作“发展”的作法，意味着完全忽视了环境的许多方面。美国人在他们的心目中带着“进步”的固定成见，他们所看到的大量情况，很少不符合这种进步的。他们看到了城市的扩建，但没有看到贫民窟数量的增大；他们欢呼人口统计数字，但不去考虑拥挤；他们骄傲地指出人口的增长，但不看土地的趋势或不受同化的外来移民的情况。他们猛烈地扩充工业而不惜消耗他们的自然资源；他们建立了庞大的企业而不去调节工业的关系。他们成长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而没有为结束他们的孤立制订他们的制度和武装他们的思想。他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并无准备便仓促投入世界大战，然后又仓促地退出了战争，幻想倒是破灭了，但是，没有吸取更多的经验。

在世界大战中，美国人的固定成见中好的和坏的影响都看得一清二楚。认为无限制地征募新兵、无限制地借债、建造无限量的船只、生产无限的军火等等，单单依靠这些就能在战争中取胜的思想正符合传统的固定成见，似乎由此创造了物质的奇迹<sup>①</sup>。但是，由于受成见影响最大，没有余地去考虑什么是胜利的果实，或者怎么得到这些胜利的果实。因此，目标被忽视了，或者被看成是自动会达到的，因为成见要求胜利，胜利就被设想为只在战场上歼灭敌人。在和平时期，你没有询问过最快的摩托车用来干

---

① 我想到供给200万海外部队的运输工具和给养。韦斯利·米歇尔教授指出，在我们参战以后，商品的总产量并没有大大超过1916年，但是，为战争的目的生产的物品确曾增加。

什么的，在战争时期，你也没有询问彻底的胜利是为了什么。然而，在巴黎这种型式就与事实不相符合。和平时期你能无休止地以大的东西取代小的东西，以更大的东西取代大的东西；战争期间，当你获得了彻底的胜利时，你就不可能继续追求更彻底的胜利。你必须按照完全不同的型式去行事。如果你缺乏这种型式，那么对于你来说，正象以往对那么多聪明人一样，战争的结束就意味着突然进入沉闷无聊的世界。

这就标明一点：不能忽视，在这一点上成见与事实之间肯定存在不同。常常有这样情况，因为我们关于事物怎样表现的印象总是比事态的起落更为简单和更为固定的。所以，会出现这种时候，那些盲点从视觉的边缘达到中心。那时，除非有些批评家勇敢地敲起警钟，一些领袖有能力理解这种变化，而受习惯、成见支配的人们，不是节省力量而是象1917和1918年那样集中力量，就可能由于受到蒙蔽而遭受挫折和浪费精力，正象对于1919年迫切要求迦太基式的和平和在1921年哀叹凡尔赛和约的那些人所作的那样。

### 三

不加鉴别地持有成见的话，那么这种固定的成见不仅丢掉了很多需要考虑的东西，而且当审核属实的时候，这种成见又损坏掉了，很可能连明智地注意到了的东西也随着消失了。那就是肖伯纳先生对于“自由贸易”、“自由契约”、“自由竞争”、“天赋自由”、“自由放任”和“达尔文主义”所进行的尖锐的批评。若在一百年以前，他肯定会是这些学说的有力的鼓吹者之一，他看待这些学说就不会象今天那样，在《不信教的半世纪》中<sup>①</sup>，对以下种种作了辩解：“使别的伙伴不受损害地下台，领

---

<sup>①</sup> 《回到梅休泽勒》序言。

导政体的所有干预，除警察机构以外的所有机构保护法律认可的反对斗殴的欺诈行为，所有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法则的对立物”的企图——想把人类的意图、设计和预谋引用到杂乱无章的工业中去。”然后，作为向天国的平原<sup>①</sup>行进的先锋之一，他就会看到象维多利亚女皇的政府中能找到的那种人类意图、计划和深谋远虑，这种东西越少越好。他就会看到不是强的胜过弱的，而是愚蠢的胜过强的。他就会看到意图、计划和深谋远虑在发生作用，阻碍着发明创造，阻碍着办企业，阻碍着他认为是“创造性的进化论”<sup>②</sup>的下一步行动。

即使现在，肖伯纳先生也不怎么渴求他知道的指导政体，但是，在理论上他曾整个兜了一个圈子反对自由放任。战前大多数先进思想曾同样转而反对确立的概念，这种概念认为，如果你放松每一件事的话，智慧就会产生并取得和谐一致。大战以来，根据一些指导政体得助于审查官、宣传家和密探的确定的表现，罗巴克·拉姆斯登和“天赋自由”重新被一些严肃的思想家们所承认。

在这些循环中有一件事是共同的。在每一组固定的成见的形成中都有人们力所不及之处，在那里事物仍按照自身的规律发生，就象你所希望的那样。关于进步的固定成见强有力地刺激工作，几乎完全使人忘却去判定做什么工作和为什么工作。“自由放任”使人们有幸从愚蠢的官僚作风中获得解放，它设想人们会从自发的混乱中进展到预先确立的融洽一致。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集体主义似乎是对无情的自私自利的矫正方法，设想一种经济决定论依靠社会主义官员发挥的效率和智慧。国内国外帝国主义的强有力的政府，深深地意识到价格的混乱，最后信赖这样的概念，即政府官员们知道所有需要管理的事。每一种理论中都存在

---

① 《易卜生的精髓》。

② 法国柏格森所提出的反科学学说一译注。

盲目自动的一点。

那种盲点掩盖了某种事实，如果把这一点考虑在内的话这种事实就会限制固定的成见所唤起的有生气的活动。如果进步人士象笑话中的中国人那样曾问他自己，他想用打破记录所节约的时间干什么；如果“自由放任”的鼓吹者不仅仔细考虑了人们的自由和旺盛的精力，而且仔细地考虑了某些人所称作的他们的人类本性的话；如果集体主义者把注意力的中心放在他怎么保证他的行政人员的问题上的话；如果帝国主义者敢于怀疑他自己的鼓动的话；你就会发现较多的哈姆雷特和较少的亨利五世。因为这些盲点看不到那些分散注意力的形象，而这些形象连同它们所伴随的情感可能在寻求一种目的时引起迟疑和软弱。因此，固定的成见不仅在繁忙的生活中节约了时间，也是我们社会地位的一种防护，但是，它趋向于使我们不去稳定地和整体地去看世界。

## 第九章 信条及其敌对者

### 一

任何一个曾经站在火车站站台尽头等候一个朋友的人，会回忆起他把他错认成了多么古怪的人。帽子的形状、略带特点的步态，在他的心目中唤起了逼真的形象。睡着时，一阵丁当声听起来可能就象一个大钟的嗡嗡声；远处的镗头敲击声听起来就象是雷声。因为我们的意象群会对一种刺激发出颤动，这种刺激可能只是与意象群的某些方面模糊地相似。在幻觉中，它们可能淹没全部意识。它们可能很少成为感性认识的一部分，我倾向于认为这样一种体验是极罕见和非常微妙的，正象我们茫然地注视一个熟悉的词或一件熟悉的物体时，它又渐渐地变得不熟悉了。当然，就绝大部分面言，我们看事物的方法就是把实际存在的和我们希望发现的加以综合。一个天文学家看天空与一对情侣看天空并不是同样的；康德著作的一页对于一个康德学派的人和一个激进的经验论者会引起一系列不同的思想；塔希提岛的美女在塔希提岛她的求婚者看来比《全国地理杂志》的读者看起来要漂亮得多。

实际上，任何学科的专门知识就是更多地去研究我们准备去发现的事物的各个方面，再加上对我们所期望的东西加以怀疑的习惯。毫无知识的人看东西都很相象，世界的事物正是一件事接另一件，而对于专家来说，事物都是极独特的。一名汽车司机、一名享乐主义者、一名鉴赏家、一名总统内阁的成员、或者一名教授的妻子，他们讨论到汽车、酒、古老的名家作品、共和党员和学院教职工等等时，都会说出明显的区别和特点，普通的人则根本说不出它们明显的区别和特点。

然而，肖伯纳先生说得很清楚，世事是那样地短暂，在我们

的一些舆论中，几乎没有能称得上专家意见的。专家们只对很少问题发表意见。正象我们在战争时期所了解的，即使在专门的士兵中，熟练的骑兵并不必要精通战壕战和坦克。实际上，有时候在一个小问题上的微不足道的专门知识就可能使我们人类通常的习惯作法更为扩大，那就是尽可能把一些东西塞进我们固定的成见中去，并且不适当地用来思索外界未知的东西。

如果我们很不留心的话，不管我们认识什么熟悉的东西，我们都会借助于我们脑子已经有的形象。因此，在美国人对“进步”和“成功”的观点中，存在一种对人性和社会的固定的看法。就是这种人性和这种社会，逻辑地产生出这种被认为是合乎理想的进步。那么，当我们试图描写或者解释确实有成就的人们，以及确实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时，我们就会用我们的固定的成见中预先假定好了的特性来复述它们。

这些特性都是经资格较老的经济学家们相当天真地标准化了的。他们企图根据他们经历过的情况来描写这种社会制度，他们觉得情况太复杂很难用言词来表达，因此，他们绘制了他们所真诚希望的一种简化了的图表，在原则上和真实性上，和一个孩子在平行四边形上加上足和头画出一头复杂的牛并没有多少区别。这种图表包括了一个资本家从他的辛勤的劳动中积累了资本，一个企业家设想了全社会有益的需求建立起一个工厂，一群签订了来去自由的劳动合同的工人，一个地主和一群从最便宜的市场购买经他们计算会给他们带来最大愉快的商品的消费者。这种模式曾是可行的。这模式所设想的人民，生活在这种模式所设想的那种世界中，永远地合作得和谐一致就象那些书籍中所描写的那样。

这种纯粹的虚构经过修改的润饰，被经济学家用来简化他们的思想，把它传播和推广出去，直至大部分人将它作为当代的经济神话来流传，它提供了对一个社会中的资本家、企业家、工人和消费者的权威的看法，自然是更倾向于取得成功而不是对它解释。一些大楼建立起来，一些银行帐户积累起来了，这些都说明

了事情是怎么作成的，证明这种成见是正确的。那些由于成功而得益最多的人，开始相信他们就应该是那样的人。难怪那些有成就的人的公正的朋友们在阅读官员的传记和附有传记的讣告时，必须制止他们自己问这样的问题：这究竟是不是他们真正的朋友？

## 二

对于被征服者和受害者来说，官方的描写当然是不可承认的。尽管举例说明进步的人并不常常停下来调查他们是不是达到了经济学家们或别的一些可信赖的人所制定的路线，不成功的人则进行了调查。威廉·詹姆斯说<sup>①</sup>：“人们从自己了解的详情中看到的東西比一般的概括中看到的要多。”工业界的首脑们看到的大托拉斯是他们成功的标记；被他们击败的竞争者看到的是他们失败的标记。所以，这些首脑们为这种经济和大企业的优点辩护，要求不加干涉，说他们就是繁荣的动力和贸易的发展者。被击败的人则坚决认为托拉斯是浪费和残忍的，强烈要求司法部使企业不受阴谋集团的影响。在同样的情况中，一方看到的是进步、节约和一种极好的发展，另一方看到的则是反动、奢侈浪费和一种对贸易的限制。出版了大量的统计资料和轶事说明事实真相、内部实情以及轶深较广的真实情况，用来证明双方的论点。

因为当成见的体系已牢固地形成时，我们社会注意那些能支撑成见的事实，而不去注意那些与成见相矛盾的事实。或许因为这种协调一败的关系，所以，仁慈的人就会发现那么多关于仁慈的道理，恶毒的人就有那么多恶意。可以很确切地说，我们看东西是通过玫瑰色的眼镜或者是带着偏见的眼睛的。正象菲利普·利特尔曾经写到过一个杰出的教授那样，如果我们是模糊地通过

---

<sup>①</sup> 《威廉·詹姆斯书信集》第1卷，第65页。

一个社会等级来看生活，那么我们对于最富裕的人和对于等级最低的人的成见都不会受到认识的影响。凡不相容的都会受到抵制，凡不相同的都会视而不见。我们不去看那些我们的眼睛惯常不重视的东西。我们有时候有意识地，更经常是不自觉地被一些符合我们的哲学的事实所感动。

### 三

为了描绘看不到的世界，这种哲学多多少少构成了一系列的形象。然而，不仅仅描绘了它，而且也判断了它。因此，许多固定的成见带着偏爱，充满了喜欢或不喜欢，附有恐惧、强烈的愿望、自豪和希望。不论什么产生了成见，都可以通过相应的思想感情来判断。除非我们蓄意带着偏见，我们不会去研究一个人并断定他是坏人。我们看到了一个坏人。我们看到一个清新的黎明、一个羞愧的少女、一个成为圣徒的教士、一个缺乏幽默感的英国人、一个危险的赤色分子、一个无忧无虑的波希米亚人、一个懒惰的印度人、一个狡猾的东方人、一个空想的南斯拉夫人、一个反复无常的爱尔兰人、一个贪婪的犹太人、一个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在日常的世界里，常常是在有证据以前很久就已有了真正的判断，这种判断本身就包含着结论，证据是很自然地进一步证实这种结论的。这种判断中，既不包含公正，也不包含仁慈和真实，因为这种判断在有证据以前就已有了。然而，一种不带偏见的人，一种带着完全中立看法的人，在任何珍视思考的文明世界里，都是那么不可思议的，因为没有什么教育方案能够建立在那种理想的基础上。偏见是能够被察觉、受到轻视和被琢磨的，但是，只要数量有限的人们为了对付浩瀚的文化，必须受短期的学校教育，他们就必然带着印象并怀有偏见。他们怎么想和怎么作，就决定于这些偏见是不是友好的，对别人友好，对别的思想友好；这些偏见是不是唤起了确实属于无可怀疑的爱，而不是在



好的看法中包含了憎恨。

道德，首先使好的情趣和好的形式标准化，然后着重某些潜在的偏见。就象我们使我们自己适应我们的信条一样，我们也使一些我们看到的事实去适应那种信条。理性地说，事实是不依赖于所有我们正确的和错误的观点而中立地存在的。实际上，我们的一些信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将看到什么。

因为一项道德法典是一种适用于典型事例的行为规范。按照法典行动就是照法典的意图行事。个人在一个良好的、坚实的三度空间得到拯救，在地球上有所成就，或者人类的服务等等，这些都可能是上帝或者帝王的意志。无论怎样，法典的制订者注意到某些典型的情况，然后通过某种理智或直觉的方式，推断出会产生他们认为是目的的那种行为。这种规则应用到他们所用的地方。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怎么会知道他的困境是不是就是法典制订者心目中料到会有的？他被告知说不要杀人。但是，如果他的孩子受到攻击的话，他能不能以杀人来制止一件凶杀案呢？基督教的“十诫”对这一点没有作答。所以，环绕着每一种法典，都有一大群解释者，他们推断更为具体的事例。那么，假定法学博士们决定，在自卫的情况下，可以杀人。另一个人也抱有同样的怀疑；他又怎么知道他给自卫下了正确的定义呢。或者怎么知道他不曾错误地判断事实，想象这是进攻，而实际上却是侵犯者呢？也许他曾挑动这次进攻。但是，什么是挑衅呢？正是这些混淆不清的事，在1914年8月影响到了德国人的思想。

现代世界中比道德法典的任何差别更为严重的是对于法典所采用的事实存在不同的设想。宗教上的、道德上的和政治上的准则远远不象它们的信徒所设想的事实相距那样远。因此，是有益讨论而不是观念的比较，重新检验了对事实的看法。希望别人对待你那样去对待别人，这样一种准则是建立在认为人性是一致的信念上的。肖伯纳先生说，你不应该象别人对待你那样去对待别

人，因为他们的情趣可能不同，依据一种信念认为人类的本性是不一致的。竞争是贸易的生命这个格言，包含了一整套关于经济动机、工业关系和特定的商业机制的设想。那种认为除非私人拥有和私人经营，美国就永远不会有商船的主张，是设想在追求利润和刺激鼓励之间有肯定的联系的。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人员对于专政、谍报和恐怖所作的辩护，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是一种暴力机关”<sup>①</sup>是一种历史的判断，这种说法真实与否，对于非共产党员来说，决非是不言而喻的。

每一个道德法典的核心都含有一种人性的写照、宇宙的面貌和对历史的看法。针对设想的那种人性，在那样想象的宇宙中，经历了一段这么理解的历史，就采用了这种法典的条例。由于个性、环境和记忆等等事实各不相同，因此，法典的条例很难采用得成功。现在每一项道德法典必须这样或那样地设想到人类的心理、物质世界以及传统。但是，在受科学影响的一些法典中，这概念被认为是一种假设，鉴于这些法典的内容没有经过检验，或者是从空想中冒出来的，这种概念不是作为要证实或反驳的一种假设，而是作为没有疑问地接受下来的一种虚构。在一种情况中，人对于他的信念很谦逊，因为他知道这些信念是不明确和不完全的；在另一种情况中，他很武断，因为他的信念纯属虚构。受科学训练的科学家懂得他虽然并不是什么都知道，但他正在学习某些东西；武断的人虽然缺乏识别真理和错误的标准，但他认为自己具有无限知识的部分洞察力，他运用虚构。因为虚构的显著标志就是认为真理和谬误、事实和无稽之谈、报道和空想统统都是可信的。

那么，虚构就不一定是假的。它可能碰巧是完全真实的，它也可能碰巧是部分真实的。如果它已长期地影响人类的品行，那

---

<sup>①</sup> 见苏联出版的《内线战斗的两年》，1920年莫斯科版。马尔科姆·戴维斯译，载于《纽约晚邮报》，1921年1月15日。

几乎它就一定包含很多深刻而重要的真理。一项虚构从来不包含判别它所包含的真理和谬误的力量。因为那种力量仅仅来自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认为没有一种人类的意见，不论它来自哪里，都是难以求证的，因为每一种意见都仅仅是某一个人的意见而已。如果你问为什么求证是认为别的意见更可取，没有其他回答，只能说是为了求证所以才去求证。

## 四

我认为这种说明突出地证明了道德法典对于种种事实都假设了一种特定的看法。我说的道德法典这个名词包括了各种法典：个人的、家庭的、经济的、职业的、法律的、爱国的、国际的等等。每一类法典的中心都有一个关于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成见的型式。各类法典对于人性、风俗习惯、传统等很少坚持同样的看法。例如，就以经济法典和爱国法典相比较，假定战争对它们的影响是相似的。有两名合伙经营商业的人，一名应征服役了，另一名签订了一项军火契约。前一名士兵牺牲了一切，或许甚至他的生命。他每天拿一美元，没有一个人说，也没有一个人相信可以用任何经济的刺激能使他成为一名更好的战士。那种动机已在他的人性中消失了。后一名签约的人则牺牲很小，获得了很可观的利润，几乎没有人可以说或可以相信如果没有经济的刺激，他会生产军火。对他来说，那种情况可能并不公正。问题是爱国法典设想了一种人性，而商业法典则设想了另一种人性。依此类推，一些法典可能都是建立在真正期待达到这种范围的基础上的，因而当一个人采纳了某项法典时，他就倾向于显示出这项法典所要求的那种人性。

那就是为什么对人性进行概括是那么难办的理由之一。一个慈爱的父亲能够成为一个讨厌的老板、一个热心的市政革新者和一个贪得无厌的在国外的侵略主义者。他的家庭生活、他做生意

的经历、他的政治见解和他的对外政策统统都依据关于别人是什么样和他该怎么做的完全不同的看法。同一个人因法典不同而这些看法也不同，同一个社会群的人中间信奉的法典稍有不同，社会群与社会群之间差异更大，至于两个国家或两种肤色之间，可能连共同的设想都没有。那就是为什么人们承认相同的宗教信仰的教系也能够发生战争。他们对于设想的一些事实的观点就是决定他们行为的信念要素。

那就是法典在舆论的形成中起着那么微妙和那么深刻的作用的地方。传统的理论认为舆论构成了对于一些事实的道德上的评价。在目前的教育状况下，我提出的理论是：舆论基本上就是对一些事实从道德上加以解释和经过整理的一种看法。我论证的是处于我们法典中心的成见的型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将看到哪些事实和将用什么眼光看待它们。从善意的角度看，那就是为什么一个报刊的新闻政策总是倾向于支持他的社论政策；为什么一个资本主义者看到的是一部分事实，并且不加夸张地看到人性的某些方面；与他对立的社会主义者看到的则是另一部分事实和另一方面的人性，由于他们之间真正的差异是观念的差异，各自都把对方看作是不合理的或违反常情的。那种差异是由于资本主义型式的成见和社会主义型式的成见之间的差异施加了影响所造成的。一位美国的编辑写道：“美国并不存在阶级。”《共产党宣言》则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如果你的头脑里已有这位编辑那样的成见，你就会清晰地看到那些能证实这种成见的事实，而含糊地和不起作用地看待那些相抵触的事实。如果你持共产党的成见，你将不仅寻找不同的事实，而且即使你看到的事实和编辑所看到的恰巧相同，你也会采用完全不同的着重点去看待它们。

## 五

由于我的道德体系是建立在我所接受的对于事实的看法之上

的，不论谁否认我的道德判断或者否认我对事实的看法，对我来说都是邪恶、异端和危险。我将怎样估量他呢？敌对者总是要被说明的，在任何时候，我们能寻找的结论性的解释就是他看到的是一些不同的事实。我们回避这种解释，因为它削弱的正是我们自己已在生活中稳固地和完善地看到了信念的基础。只有当我们习惯于认识到我们的意见就是通过我们的成见所看到的一部分经验时，我们才能宽容敌对者。没有那种习惯的话，我们就绝对相信我们自己的看法，因而认为所有的敌对者都不可靠。因为当人们愿意承认一个“问题”有两个方面时，他们并不相信他们所认为的“事实”也有两个方面。他们从来不相信这一点，直到受批评教育以后，他们才充分地意识到他们对于所得到的社会资料的理解是多么间接和主观。

所以，两派各自清晰地看到他们自己的一面，对他们看到的事物作出自己的解释，对他们来说，几乎不可能相信彼此是诚实的。在关键的一点上，如果这种型式与他们的经验相符合，他们就不再把它看作是一种解释，他们把它看作是“现实”。它也许不象是现实，除非最终在结论中它是符合真正的经验的。我可能通过地面上的一条直线来描绘我从纽约到波士顿的旅程，就象一个人可能把他的胜利看作是一条笔直而狭窄的小道的终点一样。实际上，我去波士顿的路可能经过了许多迂回曲折，就象那个人的道路可能包含了许多与纯粹的企业、劳工和兴旺之道无关的问题。但是，假如我们到达了波士顿，他也成功了，那么这条航线和这条直通的小道就成了现成的路线图了。只有当某人试图沿着他们的路去作而没有成功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提出异议。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的路线图，而他坚持反对它们，那么我们立刻就会把他看作是危险的蠢人，他也会把我们看作是说谎者的伪君子。就这样，我们逐渐地就为彼此画了像。正如一个人所说的，敌对者描述他自己是坏的话，我们看起来就是好的。他是一个与一些事情的方案不相适应的烦恼的人。不过，他进行了干扰。他应该承

认方案中的某些部分，因为这方案在我们的头脑里是以合乎逻辑的不容置疑的事实为基础的。在政治和工业的争论中，很难容许他面对同样的现实而仅仅承认看到了它的另一方面。那样就会动摇整个方案。

例如，对于在巴黎的意大利人来说，费姆曾属意大利的。并非仅仅想要把这个城市划归意大利的领域之内。它过去属于意大利。他们集中注意到这个城市的法定疆域内意大利人占大多数。美国的代表们在纽约看到了比费姆更多的意大利人，却不把纽约看作是意大利的面土，在他们的眼里，费姆是中欧的入口港。他们在郊区和没有意大利人的内地，清楚地看到一些南斯拉夫人。因此，巴黎的有些意大利人就需要说服别人，使其相信美国人的解释是反常的。他们发现不知从哪里突然出现了一种谣言，说是有一个有影响的美国外交家陷入了一个南斯拉夫主妇的圈套。她曾经被看到……。他曾经被看到……。在凡尔赛的大街尽头……，有大树的那座别墅。

这是为相反的看法进行辩解的很普通的方法。他们采取更多的诽谤形式的指责很少见诸报刊，一位罗斯福可能需要等上好几年，或者一位哈定需要等上几个月的时间，他才能够强行一个问题和制止一个流传很广的谣言。从事社会活动的人必须忍受极大数量的有恶意的俱乐部聚会室、晚宴桌以及闺房的造谣中伤，听任其重复、发挥和嘲笑，面且还把这些造谣中伤看作是妙事。我认为这种情况在美国不象在欧洲那么盛行，即使这样，美国的官员也很少不反复受到恶意的诽谤的。

我们在对立面中找出坏人和阴谋分子。如果物价无情地上涨，那就说明奸商搞了阴谋；如果报纸错误地报道了新闻，那就说明有资本家的阴谋；如果富人太富了，那就说明他们曾有侵占行为；如果争夺很激烈的竞选失败了，那就说明选民被收买了；如果一位政治家作了某件你不赞成的事，那就说明他被收买或者是受到某个有损信誉的人的影响。如果工人们得不到休息，

那就说明他们成了鼓动家的受害者；如果在广大的范围里工人都得不到休息，那就说明存在着一项阴谋。如果你没有生产足够的飞机，那就是间谍得逞了；如果爱尔兰发生了动乱，那就是德国的或者是布尔什维克的“宝贵的东西”。如果你严格地愤怒地寻找一些阴谋，你就会把所有的攻击、“普鲁姆计划”、爱尔兰的叛乱、伊斯兰教的动乱、康斯坦丁皇帝的复位、“国际联盟”、墨西哥的混乱、裁军运动、星期日电影、短裙、烈酒偷税法、黑人坚持自己的权力等等看作是由莫斯科、罗马、“自由共济会成员”，日本人或者“锡安山的长老们”所策划的大阴谋的一些局部谋划。

## 第十章 固定成见的察觉

### 一

老练的外交官们由于不得不响亮地向交战的人民发表演说，学会了怎么运用大量贮存的成见。他们在列强不稳定的同盟中周旋，这些大国都各自依靠最谨慎的领导方式来维持其战争的统一体。普通的士兵和他的妻子虽具有超过英勇史记载的英雄精神和忘我精神，仍然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愉快地面对死亡，尽管这些强国的外交机关曾说这种拼命对于未来的文明是极为重要的。那儿有许多港口、矿山、石头的山路和村庄，几乎没有士兵愿意为他们的盟国跨越“真空地带”去送命。

现在，碰巧在一个国家里，主战派控制了外交机关、最高司令部和大多数报刊，对于它的几个邻国提出领土要求。这些要求被有教养的阶级称之为“更大的留里塔族”，他们把基普林<sup>①</sup>、特雷切克<sup>②</sup>和莫里斯·巴雷斯<sup>③</sup>看作是百分之百的留里塔族人。但是，这种自以为是的想法在国外并没有激起什么热忱。所以，象他们的御用诗人说的那样，他们的心上怀着留里塔族天才的这枝最美好的花朵，留里塔族的政治家们就进一步瓜分土地，并加以征服，他们把这领土要求划分为一些区域，对于每一区域，他们都援引他们的一个或更多的同盟国难以抵御的某种固定成见，因为那些同盟国也运用这种相同的成见提出过希望得到赞同的领土要求。

第一个区域碰巧是外国农民居住的多山地区。留里塔族要求

---

① 基普林 (Kipling)，1865—1930年，英国作家。——译注

② 特雷切克 (Treitschke)，1834—1896年，德国历史学家。——译注

③ 莫里斯·巴雷斯 (Maurice Barres)，1862—1923年，法国小说家、政治家。——译注



完整地保留它的自然地理疆界。如果你长期把注意力放在不可言喻的自然的价值上，那些外侨农民就只是迷迷糊糊地看见山波。紧接的区域住着留里塔人，根据外侨条例，‘原则上不应有人住在这里，他们是被重新并吞的。然后是一个商业上相当重要的城市，没有住着留里塔族人。但是，直到十八世纪，它都曾是留里塔族的一部分，根据“历史权利”的原则，它就被吞并了。再远一些，是一个极好的矿床，属于外侨所有，并为外侨所开采。根据赔偿损失的原则，它被吞并了。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地区住着97%的外国人，构成了另一个民族的自然地理疆界，在历史上从来不是留里塔族的一部分。但是，其中有一个省曾经加入留里塔族的联邦，早先曾在那些市场中进行贸易，其上层阶级的文化是留里塔族的。按照文化的优越性和捍卫文化的必要性原则，提出了领土的要求。最后，有一个港口在地理上、种族上、经济上、历史上和传统上都完全与留里塔族没有联系，就以国防的需要为借口提出了要求。

在大战结束的许多条约中你能够见到大量的这类例子。现在我并不想说，我认为有可能一定根据这些原则中的任何一项来重新安排欧洲。我确信并不是那样。那么狂妄、那么专制地运用这些原则的本身就意味着和解的精神并不占优势，所以，和平的实体并不存在。在你开始对工厂、矿藏、山脉甚至政治权力，进行谈判，并作为某种不朽原则的完美典范的时刻，你不是在辩论，还是在斗争。那种不朽的原则排除了所有异议，使问题脱离其背景及其来龙去脉，使你产生很强烈的情绪，这种情绪足以适应这种原则，却很不适应于码头、仓库和地产。一旦产生这种情绪你就无法自制了。这里存在一种真正的危险。为了对付它，你必须援引更完善的原则来防卫易受攻击之处。然后，你必须防守防御点，设立缓冲点，为缓冲而缓冲，直到全部事务搞得混乱不堪，以致打仗比继续谈判还好办一些。

有一些线索常常有助于检测一种成见的错误的绝对性。在留

里塔人所宣传的情况中，这些原则互相否定得那么快，使人能够容易地看到争论是怎么造成的。一系列的矛盾显示出为了每一部分领土运用了哪些固定成见，这些成见忘却了与领土要求相抵触的所有事实。这一类矛盾常常成为一种暴露成见的很好的线索。

## 二

不能够考虑空间则是另一个问题。例如，1918年春天，很多人对俄国的撤退感到震惊，要求“重新建立一条东部的战线”。按他们的设想，这场战争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当其中的一条战线消失时，就立刻要求重建。未被利用的日本军队配备到前线代替俄国军队。但是，有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威）和东部战线之间，有5000哩土地横贯着一条垮掉的铁路。然而，那5000哩并没有为热心的人们所考虑。他们那么坚定地确信需要一条东部战线，他们对于日本军队的勇猛又有那么大的信心，因而，在精神上，他们把军队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波兰想象得如同站在一张魔术地毯上一样。我们的军官们挖空心思地认为，驻扎在西伯利亚边缘的军队是不会接触到德国人的，就象从沃尔沃斯大厦的地下室爬到楼顶够不到月亮一样。

这个例子中的成见就是两条战线上的这种战争。从此以后，人们一想到这次大战就想象德国是被控制在法国和俄国之间的。一代或者两代的战略家总是用这种形象化的想象作为他们所有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将近四年中，他们见到的每一张作战的地图都加深了对于这场战争的印象。当事态有了新的转变时，就不容易象过去那样看待它们。他们是通过这成见来看的，譬如象日本远离波兰这样一种与成见相抵触的事实，就不可能清晰地进入他们的意识中去。

有趣的是，美国官方对待新的事实要比法国更为现实。部分

地说，这是因为（在1914年以前）在美洲他们并没有一种关于战争的先入之见，另一部分原因是美国人全神灌注于动员他们的部队上，视野中只有两条战线，这种情况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成见使他们意识不到其它战区的任何情况。1918年春季，这种美国的观点不能够战胜法国传统的观点，因为尽管美国人相信自己的力量很强大，可是，法国人在那时（在坎第尼和马尼第二以前）则有很大怀疑。美国人的自信充满了美国人的成见，赋予它支配意识的那样的力量，那样的活力和明智的敏锐性，产生激励意志的强烈效果和作为一种欲望对象的充满感情的兴趣，并使之与正在进行的活动保持协调一致，而这就是詹姆斯所说的“实在的东西”<sup>①</sup>的特点。法国人则在绝望中仍然确信他们已接受的印象。当实际情况、总的地理事实与先入之见不相符合时，他们就或者不去考虑这些事实，或者歪曲了这些事实。因而，日本人要越过5000哩才能接触到德国人，这种困难是通过德国人挪过一大半路程与之相遇的办法来解决的。1918年3月至6月之间，曾想象有一支德国军队在西伯利亚东部进行活动。这种幻觉的军队是由一些见到过的德国俘虏和更多的想象中的德国俘虏所构成的，这种错觉主要想说明那5000哩並不真正地存在<sup>②</sup>。

### 三

真实的空间概念並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我在一张地图上画一条孟买与香港之间的直线来测量它们之间的距离，这仍然

---

① 《心理学原理》，第二卷，第300页。

② 参阅1918年2月26日《纽约时报》刊载的查尔斯·格拉斯迪先生访问马歇尔·福奇的文章：“德国正在步行通过俄国。美国和日本能够这么做，应该到西伯利亚去向它迎战。”

还参阅美国犹太洲参议员金在1918年6月10日的决定和1918年6月11日《纽约时报》塔夫脱先生的声明，以及俄国新闻局局长萨克先生在1918年5月5日向美国的呼吁：“如果德国处于协约国的地位……它在一年之内会有300万军队在东线作战。”

无助于我去了解我的航程究竟有多远。即使我估量了我实际必须经历的路程，我仍然不很清楚，除非我知道什么船在航行，它们的航班在什么时候，航行的速度怎么样，我们能不能定到舱位以及是否负担得起费用等等。在实际生活中，空间就是交通工具便利不便利的问题，並不是几何学上的平面问题，正象老铁路巨头所知道的，他曾威胁一个曾冒犯过他的城市，他可以使它冷落得街道上长起草来。如果我正在驾驶汽车，讯问到达我的目的地有多远，一个令人诅咒的十足笨蛋，竟告诉我有三哩路程，而没有告诉有六哩的曲折路程。如果步行的话，他告诉我有三哩路程，对我没有什么益处。如果象乌鸦飞行一样，他就会告诉我只有一哩路程。但我並不能象乌鸦那样飞行，我也不是步行。我必须知道的是汽车行驶有九哩路程，而且中间还有六哩是沟沟洼洼的路程。我称那个告诉我只有三哩路程的徒步者是一个讨厌的人，称那个告诉我只有一哩路程的飞机驾驶员是可恶的人。这两个人说的都是他们所要跨越的空间，而並不是我必须跨越的空间。

在绘制边界线中，因为没有能设想到一个地区的实际地理布局而发生了荒谬的纠纷。根据自作主张的政治家在不同时代绘制地图界线的某种普通方案，在现场勘测时，这条线会是在一个工厂的中间穿过，直到一条村庄街道的中心，斜线穿过一个教堂的中殿，或者一个农民的村舍的厨房与卧室。在一个畜牧的国家中，曾有一些边界线把牧场与水、牧场与市场分隔开；在一个工业国家中，则把铁路终点和起点与铁路分隔开。彩色的种族地图按种族特征划分界线是正确的，就是说，那张种族地图的领域是正确的。

## 四

但是，时间问题不亚于空间问题，同样具有缺点，举一个普通的例子，某人试图立下一个详细的遗嘱，以便在他去世以后很

长的时间中可用这遗嘱来支配他的财产。威廉·詹姆士的曾孙亨利·詹姆士<sup>①</sup>写道：“威廉·詹姆士第一曾期望按照他的孩子们（在他去世时，有几个孩子还未成年）的勤奋和阅历，合格地享受他希望遗赠给他们的大笔遗产。根据这种想法，他留下了一个遗嘱，它是一篇含有许多约束和指示的长篇遗嘱。表现出他是多么相信自己的判断和他后裔的道义、福利的关心。”法院推翻了这个遗嘱。因为法律不准许产业留待长期以后才转让，所以，规定了一些明显的限制，不容许任何人把他的道德模式强加于不可预测的未来。但是，希望施加影响是人类的品格，因而法律只允许在死后限定的时间内这样作。

任何宪法的修正条款都是制订者持有信心的一种很好的标志，他们相信他们的意见已经传到继承的世代中。我认为有些美国的州宪法几乎是不能修正的。制订这些宪法的人几乎没有关于时间流动的观念；对于他们来说，“这儿”和“现在”是那么鲜明确凿，“未来”是那么含糊或者那么可怕，以至他们敢于说生命终结以后怎么能追踪呢。而且，因为宪法是难于修改的，热心的人怀着对传统势力的爱好，都喜欢在这种不朽的铜牌上写下各种规定和限制，必须严格地限定“未来”，不能比正常的成文法所规定的期限更为长久。

在我们的舆论中已广泛地有一种对于时间的设想。对于一个人来说，存在于他的整个意识生命中的一种制度是宇宙的永远存在的一部分内容，对于另一种人来说，这种制度则是短暂的。地质学上的时间概念与生物学上的时间概念是很不相同的。社会性的时间概念最为复杂。政治家必须决定是应急的计划还是长期的计划。有些决定是依据两小时之内即将发生的情况作出的，另一些决定则是依据一周、一个月、一季、十年、他们的儿子长大或者他们孙子长大时将发生的情况作出的。重要的智慧之一，就在

---

<sup>①</sup> 《威廉·詹姆士书信集》第1卷，第6页。

于有这样的时间概念，能够识别那些属于着手要作的事情。忽视现在的空想家以至什么也看不见的庸人都属于运用错误的时间概念的人。一种真正的价值尺度要求有一种很敏锐的相对时间观念。

象过去和将来这种相隔久远的时间总带有几分设想。但是，正象詹姆斯说的：“关于较长的持续时间，我们没有直接的‘认识’感”<sup>①</sup>。我们能立即感觉出来的最长的持续时间称之为“瞬间的现在”按照蒂奇纳的说法，它的持续只有六秒钟<sup>②</sup>。“在这段时间里的全部印象是立刻呈现给我们的。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来设想各种变化和活动以及一些固定的物体。‘感性的现在’是受到‘观念形态的现在’的补充的。通过把感觉与记忆中的形象一过去的全部日子和年月——结合起来一起带进‘现在’中。”

象詹姆斯说的，在这种“观念形态的现在”中，其清晰度包含了相当数量我们领悟的识别力在内。例如，一个假期，我们厌烦地无事可作，日子过得很慢，然而在记忆中它却是过得很短暂。相反，重大的活动，时间消磨得很快，但是，在记忆中它持续的时间却象是很长的。詹姆斯在论述我们识别时间的长短和我们的时间观点之间的关系时，有一段饶有兴趣文章说道<sup>③</sup>：

“我完全有理由认为人类对于他们直觉地感到的持续时间的长短可能是不同的，好事情可能感觉长点。冯贝尔曾沉迷于一些有趣的计算，即计算这种不同在自然界变化中的影响。假设我们能够在一秒钟的时间内清楚地记录下一万件事情；而不是象现在仅仅记录十件的话<sup>④</sup>，如果我们一生注定要掌握同样数量的印象，那么时间就缩短了一千倍，我们就活不到一个月，就个人而言，也就分辨不了季节的变化。如果在冬季出生，我们就会认为夏天就象我们现在所认为的石炭纪时代的暑热。有机生物的动作

---

① 《心理学原理》第1卷，第638页。

② 沃伦引用，《人类心理学》，第255页。

③ 沃伦引用，《人类心理学》第1卷，第639页。

④ 在电影中，超速摄影机极妙地产生这种效果。

对于我们的感觉来说，就会慢得只能被推断出来而不是被看出来的。太阳在天空中象是静止的，月亮也几乎是没有变化的，等等。但是，现在把假设倒过来，假定一种生物在一定的时间内只能得到我们感觉的千分之一，因而活得长于一千倍，冬季和夏季对他来说就象一刻钟一样。蘑菇和其它生长得较快的一些植物，其生长之快，成了瞬间生物；年生的灌木在地球上的生长和枯萎，就象喷泉无休止地沸溢一样；动物的动作对于我们来说，就象射击出去的枪弹和炮弹一样，其移动令人看不清楚；太阳穿过天空象一颗流星，在它后面留下一道火焰，等等。

## 五

威尔斯（Wells）先生在他著的《世界史纲》中作了杰出的努力，来想象“地质学上的时间在历史上占据的真实比例。”<sup>①</sup>用三吋距离来表示从哥伦布到我们现在这一段时间的话，读者就必须以55呎的距离去看阿尔泰马拉山洞的一些画家的日期，以550呎的距离去看尼安德特人<sup>②</sup>，以二哩左右的距离去看更早的恐龙。相当精确的年代学在纪元前一千年才开始，在那时，“阿卡第安——萨默里安王国的沙冈一世<sup>③</sup>是相距很远的记忆，……从当代世界来说，更遥远的是康斯坦丁大帝……汉莫拉比去世已经一千年……英国的石头群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了。”

威尔斯先生这样写是有一种想法的。“在一万年的短时期里，这些群体（其中人是群居在一起的）是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小的家族部落发展到现代庞大的联合王国——虽然庞大，仍然是太

---

① 《世界史纲》第2卷，第605页。还参看詹姆斯·哈维·鲁宾逊：《新的历史》，第239页。

② 更新世纪晚期，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分布在欧洲，北非、西亚一带。——译注

③ 纪元前2300年阿卡第安王国的建立者——译注

小和不完全的。”威尔斯先生希望通过改变我们在目前问题上的时间观念来改变道德观念。然而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对于时间的测量，任何望远镜在测量上把现在缩到最小，都比不上显微镜的测量“更为准确”。西米恩·斯特伦斯基先生是对的，他坚决认为“如果威尔斯先生正在思考他的书名“人类可能的未来，”他就需要用几个世纪的时间来作出他的结论。如果他正在考虑抢救这种西方的文明，由于这次大战的影响，他必须考虑几个十年和几个二十年。”<sup>①</sup>这完全根据你测量的实际意图而定。在有一些情况下，时间的观念需要拉长，在另一些情况下，则需要缩短。

要是1500万个中国人死于饥荒，某人说这没有关系，因为两代人的出生率就将弥补上这个死亡数字，这个人运用了一种时间的观念来原谅他的无动于衷。一个人因为过分注重眼前的困难而忽略了长期的乞丐生活，使一个健康的青年陷入贫困。一个人为了眼前的和平，竟愿意迁就一个侵略王国的欲望，那就是为了贪图似乎是美好的现在而断送了他们子孙后代的安宁。不愿意和讨厌的邻居耐心相处的人，要在每一件事上决一雌雄，差不多都是只图眼前痛快的牺牲者。

## 六

几乎在每一个社会问题里都有特殊的计算时间的办法。举例来说，假定是一个木材问题。有些树木比别的树生长得快，因而，一个合理的森林政策就是要各个季节砍伐掉的每种树种和每种树龄的树木重新补种上。只要那种计算是正确的，就达到了最可靠的经济效果。砍伐得少了是浪费，砍伐得多了则是破坏。

---

<sup>①</sup> 评论《挽救文明》，载1921年6月18日《纽约晚邮报》第5页的“文学评论”栏。



但是，可能出现一种紧急的情况，例如，战争中需要飞机用的云杉木，那时，年伐量必定会超过。一个警觉的政府会认识到这一点，并把恢复这种平衡视为对未来的采伐量的预支。

煤则具有另一种不同的关于时间的理论，因为煤并不象一棵树，它是在一定的地质时间里产生出来的。其供应量是有限度的。所以，一项正确的社会政策包含了对于世界可利用的储藏量、预示的可开采量、当前使用的比率、当前采用的节约措施以及代用燃料等等复杂的计算。但是，当已经计算出来以后，这种计算结果就必须最后与一种理想的时间标准取得一致。举例说，假定工程师们断定当前燃料已经消耗到一定的比率，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就必须进行收缩，限制新设的工业。在所有适当的节约措施都采用以后，我们就需要决定我们将实行多么大的节约和自我克制，为的是不向子孙后代掠夺。然而，我们要考虑的子孙后代是什么？是我们的子孙们？还是我们的曾孙们？也许我们将按一百年来计算，如果这种必要性立刻弄清楚了，我们就相信那是充裕的时间来发现代替的燃料。当然，这种数字是假设的。但是，我们有什么理由采用这种计算方法？我们要让“社会的时间”在舆论中占据一定的地位。

现在让我们设想一种稍微不同的情况：一个城市与一个有轨电车公司之间签订一份合同。这个公司说，除非批准它享有那条主要公路的垄断权99年，否则他不投资。在提出那项要求的那个人的思想中，99年意味着象“永远”那么长久。但是，假定有理由设想再过20年，这种依靠中心发电厂的电力在轨道上行驶的路面车将不合时尚了；那么，签订这种合同是最不明智的，因为实际上你是在判定下一代的人去使用低档的交通工具。这城市的官员对于99年缺乏一种实感。为了吸引资金，现在给这个公司一项补助，远比迁就一种谬误的未来时间观念以刺激它投资为好。在谈到99年时，城市的官员和公司的官员全都没有真实的时间观念。

一般的历史往往造成时间观念的混淆。例如，对于通常的英国人来说，克伦威尔的行为、联邦法的腐败、1847年的饥馑、都是些坏事，遭受这些痛苦的人和干这些坏事的人都已死去很久了，活着的爱尔兰人或者英国人都与之没有任何实际的联系。但是，在爱国的爱尔兰人的心目中，这些事件几乎都象是当代的事那样。他的记忆犹如历史的画卷之一，维吉尔和但丁并肩坐在那里交谈。这些景象和缩影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极大的障碍。对于一种传统的人来说，再困难不过的问题是记住在另一种传统中，当代的事是什么。

判定为“历史上正确的事”或者“历史上错误的事”的作法几乎都不能称之为对于过去的真正客观的看法。举法国和德国关于阿尔萨斯——洛林的争论作为例子。这就要看你选择的原始日期而定。如果你从劳拉西和塞魁尼开始，这两个地方在历史上属于古高卢的一部分；如果你选择亨利一世时代，它们在历史上都属于德国的领土；如果你以1273年说，它们则属于奥地利王朝；如果你选择1648年和西法利亚和平条约，这两处的大部分属于法国；如果你选择路易十四和1688年，它们就几乎全属法国。如果你采用历史上的论据，那就相当肯定你会选择那些能够支持你现在应持的观点的日期。

关于“种族”和民族的争论，同样在时间问题上也常常采取任意的观点。战争期间，在强烈的感情影响下，“条顿族”居一方，“盎格鲁撒克逊族”和法国人居另一方，他们之间的争吵，曾经普遍地被看作是一种无休止的争论。他们一直是对立的种族。然而，一个世代以前，一些历史学家如弗里曼（Freeman）曾强调西欧的民族同起源于条顿族，人种学者则必定坚持德国人、英国人以及大部分法国人从前都是同一种族的分支。一般的规律是：如果今天你喜欢一个民族，你就会顺着这分枝寻到它的树杆；如果你不喜欢他们，你会坚持说这些单独的分枝是分属单独的树杆的。在一种情况下，你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民族可

以区分出来以前，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民族有明显区别以后。符合这种基调的观点就当作是“真理”。

家族世系图就是一种相近的变化。通常把一对夫妇定为原始的祖先，如果可能的话，这对夫妇是与一个象威廉征服英国（1066年）这样的受敬重的事件相联系的。他们并无祖先，他们也并非后裔。然而，他们曾是祖先的后裔，说某某人是他家族的创始人，其意思并不是指这个人就是他的家属的“亚当”，只是从他开始是合乎需要的而把他作为一个特定的祖先，或者有可能这个人是有记载的最早的祖先。但是，“家系表”显示出一种更深的偏见。除非通过男系追踪到女系恰好是特别优越的血统，世系图是以男系为主的。在不同的时刻，女系的自然增长正如巡游的蜜蜂偶然落到一棵古老的苹果树上一样。

## 七

但是，“未来”是时间观念中最最虚幻的。由于我们受希望或疑虑所控制，这就诱惑我们跳过必要的先后顺序去夸大或者缩小一个全过程所需要的各部分时间。讨论雇佣劳动者在工业管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就为这种困难搞迷惑了。因为，“管理”这个词包含着许多才能。<sup>①</sup>有些才能不需要训练，有些需要一点儿训练，另外一些则只能在一生中学到。真正独特的工业民主化的计划应该是建立在恰当的时间顺序基础上的，所以，设想责任就应该同时设想一项工业训练的补充计划。突然提议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企图去掉其间的准备时间；反对分担责任是企图否认在时间的历程中人类能量的交替。民主的原始概念，如轮流当权和轻视专家，都只不过是旧的神话所传说的“智慧的女神”是成熟和全副武装地从朱庇特的眉间跳出来的。他们所设想的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学习的东西是根本不需要学习的。

---

<sup>①</sup> 参看卡特·古德里奇：《控制的新领域》。

无论什么时候把“落后的民族”这个词用作政策的根基的话，那么时间的概念更是决定性的因素了。例如，“国际联盟的盟约”说<sup>①</sup>：“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权的性质必须根据这个民族的发展阶段而有所不同”，诸如根据一些别的理由。它宣称，“已经达到了发展阶段”的某些社会，能够暂时承认它们的独立，可以给予建议和帮助，“直到他们能够自立的时候为止。”受托管理国和托管国设想那种时间的方法会深深地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例如，就古巴来说，美国政府的判断实际上与古巴爱国者的想法恰好相符，尽管有过纠纷，在强权如何对待弱国的历史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记载了。历史上更常见的是这种判断並不恰巧相符的。不论有属地的民族的公开表现是什么样子，都曾确信落后民族的落后是那么不可救药，或者那么有利可图，因而不想去改善它，它们的关系恶化了，並损害了世界的和平。曾经有过很少这样的情况，统治的强权认为落后的民族需要制订一个向前发展的计划，在这种计划中规定明确的目标和明确地估量时间。较常见的是这种统治实际上的看法就是把落后设想成是一种固定的和永久的劣等标记。因而使之改变落后状况的各种企图都被不满地认为是煽动叛乱，在这些情况下，这种行动无疑就成了煽动叛乱。在我们自己的种族斗争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失败的结果，那就是没有认识到时间会使黑人的奴隶道德渐渐地消失，没有认识到建立在这种道德基础上的社会调节会开始瓦解。

不按照我们现在的意图去描绘未来，不去消灭延误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或者不去消除存在于我们与我们所恐惧的之间的任何东西，都是困难的。

## 八

要总括我们的舆论的话，我们不仅必须去观察超越我们的视

---

<sup>①</sup> 盟约第19条。

野所及的更大的空间，超越我们所能感觉得到的更长的时间，而且我们还必须去描写和评价我们从来都数不清或想象不清的更多的人、更多的行动和更多的事情。我们必须进行总结和概括。我们必须挑选出一些样本，并把它们当作典型看待。

从一个相当大的等级中选出一个好的样本，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属于统计学的技术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只懂初级数学的人来说，这是最困难的事。虽然我曾真诚地想过我已通晓半打教本，我的数学还很不行。它们只是使我稍微懂得进行分类和抽样是多么地困难，向整个天地万物稍作奉承却是多么容易。

前些时候，英国谢菲尔德的一组社会工作者着手准确地了解这个城市工人的智力特征以代替原有的印象主义的看法<sup>①</sup>。他们希望根据公正的情况来说明谢菲尔德的工人们是怎样受到训练的。正象我们都不让我们最初的看法占优势那样，他们发现他们被许多复杂的情况所困扰。他们所进行的测验除了一大堆问题以外，可说别无其它。为了进行说明，假定这些问题都是对英国城市生活的精神特征的公正测验，那么按理说，那些问题是应该提给工人阶级的每一个成员的。但是，要弄清楚谁是工人阶级并不容易。不管怎么样，再假设人口调查能了解怎样对他们进行分类。那么大约有10400名男人和107000名妇女应该接受调查。他们掌握到的答复可以证实或者驳斥那种随便的用词：“无知的工人”或“理智的工人”。但是，没有人能想象去向所有20万人进行调查。

因而，社会工作者们请教了一位著名的统计学家鲍利教授。他向他们建议说，一个合理的抽样应不少于408名男人和408名妇女。按数学计算，这个数字不会偏离平均数 $\frac{1}{22}$ 以上<sup>②</sup>。所以，他

---

① 《工人的特征》

② 《工人的特征》第65页

们至少要调查816个人之后，才能装模作样地谈论一般工人的意见。然而，他们应该向816人中哪些人去调查呢？“我们可能已对某些相关的工人进行过预先的调查；我们可能通过慈善事业的绅士和女士在俱乐部、教会、医院、教堂或者在贫民区进行福利工作的社会改革团体，与某些部分的工人有过接触。但是，这种选择方法会产生完全无价值的结果。这样选择的工人完全不能代表一般所谓的‘普通类型的工人’，他们只能代表与他们志同道合的那一小伙人。”

“正确地获得‘受害者’的办法就是运用一些‘中立的’或者‘偶然的’或者‘任意的’调查方法去抓住你的工人，我们坚持这样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就是他们所作的。在进行了所有这些谨慎的措施以后，我们也没有得到比他们的分类更为确切的结论，根据他们的问卷调查，20万名谢菲尔德的工人中，“大约 $\frac{1}{4}$ ”是“受过很好的训练的”，“将近 $\frac{3}{4}$ ”是“受过不充分训

练的”，其中的“大约 $\frac{1}{5}$ ”是“没受过好训练的”。

以这种认真的和几乎是学究式的取得意见的方法与我们通常对大部分民族的看法相比较，如反复无常的爱尔兰人、富有逻辑思维的法国人、守纪律的德国人、无知的斯拉夫人、诚实的中国人、不可靠的日本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从抽样中概括出来的，但是，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这种抽样的方法是完全不合理的。这样，雇主会通过最感烦恼的雇员或者他认为最驯顺的雇员来判断劳动，而一个又一个激进团体则想象那是工人阶级的一个合理的样本。究竟有多少妇女对“雇工问题”的看法没有超过她自己对待她们的雇工的态度？漫不经心的意向就是挑选或者偶而发现一个支持他的偏见或者蔑视他的偏见的实例，然后用它作为整个阶级的代表。

当人们拒绝采用我们的分类方法对他们自己进行分类时，就会产生一片混乱。要是人们由我们摆布，那么，作出预言就会容易得多。但是，事实上像工人阶级这样的词只是在部分时间中包含某些真实的情况。当你把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人全都称作工人阶级时，你就不能不假定，按照这种分类的人的行为会与你的成见相符合。但恰恰对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一点，你不是很有把握的。如果工厂的工人和矿山的工人多多少少相合的话，农场工人、小农、小商贩、小店主、职员、佣人、士兵、警察、司炉工则不相符合。当你向“工人阶级”呼吁时，你的意向是集中注意力于200万或300万多多少少是坚定的工会会员，并把他们当作“工人”；另外的1700万或1800万以统计上来说够“工人”资格的人，则被认为不言而喻地具有与组织起来的工人核心相同的观点。1918年至1921年工会代表大会的决议或知识分子的小册子所表明的观点曾多么严重地被误解为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观点。

把“工人”看成是“解放者”的固定成见，选择的是支持这种成见本身的迹象，而拒绝与这种成见不相符的迹象。所以，与真正的工人运动相平行的，还存在着一种虚构的工人运动，在这种虚构的工人运动中有一种理想化了的群众在为理想的目标奋斗。这种虚构涉及到未来。在未来，几乎难于辨别可能性与偶然性、偶然性与必然性。如果这种未来是相当长的话，人类就可能会把只是可以想象的事变成为很可能的事，并且把很可能的事变成肯定会发生的事。詹姆斯把这称为“信念的阶梯”，并说“它是好意的斜坡，在较大的生活问题中，人们习以为常地生活在这种好意的斜坡上。”<sup>①</sup>

“1，假定某种世界的观点是真实的，那么就没有什么是荒谬的，没有什么矛盾；

2，在某种情况下，它可能是真实的；

---

① 威廉·詹姆斯：《哲学的一些问题》，第224页。

- 3, 即使在现在, 它也可能是真实的;
- 4, 它是合乎真实的;
- 5, 它总该是真实的;
- 6, 它必定是真实的;
- 7, 它一定是真的, 无论如何对我来说是真实的。”

他在另一处又进一步说: ① “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 你这样做, 就可能是最终保证它真实的一种方法。”然而, 没有谁会比他更为坚信, 因为到现在为止, 我们知道怎么避免用目的来代替出发点, 应该怎么避免倒过来在现在就察觉将来可能产生的勇气、努力和技巧。然而这种不言而喻的道理是非常困难兑现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选择我们的样本方面还缺乏训练。

如果我们相信某一件事应该是真实的, 那么我们几乎总能发现或者就是真实的事例, 或者某人相信应该是真实的事例。当一件具体的事实表明一种能恰当地衡量那件事的希望时, 那是最困难不过的了。当我们最初碰到的六个人都同意我们的看法时, 我们不会轻易地想起他们有可能都曾在早餐时读过同样的报纸的。每当我们想要估计一种可能性时, 我们不能够总是向816个随意挑选的对象发送调查表格。如果我们根据偶然的印象来行事, 那么在对付大量事实的过程中, 这种作出推论的根据是违背我们已经得到的真实的样本的。

## 九

当我们为了寻找看不见的和复杂的事情的原因和效果而前进一步时, 杂乱的意见是很棘手的。社会生活中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原因和效果几乎很难立刻明显地看到的。对于已经研究了多年的学者来说, 这些问题的原因和效果也是不明显的,

---

① 《一个多元论的宇宙》, 第329页。



譬如说，研究商业循环，或者物价和工资运动，或者民族的移居和同化作用，或者外国势力的外交意图。然而，不知怎么地我们对这些问题都被认为是应该有意见的，而且並不奇怪，最普通的推理形式是直觉的，“因为这事就产生这后果。”

越是没有受过训练的头脑，越容易制造出一种理论，认为同时引起注意的两件事只是偶然的联系。我们已经谈了一些事物引起我们注意的过程。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获得消息是受到阻碍的和靠不住的，我们的领悟是深深地受到我们固定的成见的控制的，我们推理所能得到的根据是受到防卫、威望、道德、典型调查的错觉的影响的。现在我们必须注意到带着这种最初的影响，舆论都进一步受到搅扰，因为一系列的事件多数都是通过固定的成见来看的，我们很容易接受结果或者容易把类似的事看作原因和结果。

两种思想一起出现而引起同样的感情的这种情况最容易发生。如果它们一起出现，就很可能引起同样的感情，即使它们不一起出现，只要有一种强烈的感情附着在一种思想上，那就很可能吸引住全部记忆，任何思想都会觉得差不多是相同的。因而每一件事都竭力地趋向于汇集在一种因果体系中，每一件事又都是合意的。

“11月11日（1675）这一天我听说上帝曾将一支箭射入这座城市的中心。天花病就在一个小酒店里的“天鹅星座”的ye符号中，经营这个小酒店的人名叫温泽。他的女儿患上了这种病。看得出来这种疾病是在一个小酒店开始的，证明上帝不满意于这样的罪恶；喝醉酒和酒店正在成倍地增多！”①

英克里斯·马瑟和1919年一位天体机械学的杰出的教授因此讨论爱因斯坦的理论说：

“很可能是……实际上布尔什维克的暴动从性质上说是一些

---

① 伊丽莎白·迪林·汉思库姆编：《清教徒的心》，第177页。

潜在的、深奥的、精神纷乱的和世界范围的明显现象……与这相同的动乱精神已侵犯到科学。”<sup>①</sup>

在强烈地憎恨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它当作其它许多我们十分憎恨或者十分恐惧的事的因或果联系起来。它们之间的联系可能并不比天花和小酒店、或者相对论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它们被同样的感情捆在一起了。在一种迷信的头脑里，象那位天体机械学的教授的头脑那样，感情成了熔岩熔化的小川，无论接触到什么，都会把它抓住或埋置。当你挖掘它时，你会发现正象挖掘一座被埋葬的城市一样，各种各样的物体彼此荒唐可笑地纠缠在一起。假如觉得相象的话，任何事情都能与别的什么事情联系起来。没有一种心理状态会知道这是多么荒谬。旧时的恐惧为更多新近的恐惧所增强，凝结到纠结的恐惧中去，只要有什么事是可怕的，就会使得其它什么事也成为可怕的。

## 十

一般地说，总是把最最邪恶的事编造在一个体系中，把所有最最好的编造在另一个体系中。那么，我们对于绝对的爱就表现出来。因为我们并不喜欢修饰用的助动词<sup>②</sup>，它们乱七八糟地堆满一些句子，用不可抗拒的感情进行干扰。我们喜欢最多而不是较多，最少而不是较少；我们不喜欢宁可、也许、如果、或者、有助于、不很、几乎、暂时地、部分地这样一些词。然而，关于公众事务的每一种意见都需要用这一类词来降低其重要性。但在我们无约束的时刻，每一件事都趋向于表现得绝对——百分之百、无论那里、永远。

---

① 1919年12月24日《新共和》引用，第120页。

② 参看弗洛伊德讨论梦中的绝对论《梦的解释》，第6章，特别见第288页及其后的。

说我们这方面比敌人那方面更为正确，说我们的胜利比他们胜利更有利于民主政治，这都是不够的。人们坚信我们的胜利会永远结束战争，并使世界能安全地实现民主政治。战争结束后，虽然我们挫败了较大的邪恶，但那些邪恶仍在折磨我们，这种结果的相对性渐渐减弱，当前邪恶的绝对性战胜了我们的的心灵，我们感到我们是无能的，因为我们并不是非常坚强的。这种钟摆一样的东西就在无限威力与重要性之间摆动。

真正的空间、真正的时间、真正的数字、真正的联系、真正的分量都失去了。观点、背景和行动的范围都在固定的成见中受到修剪和冻结。

## 第四部分 兴趣

### 第十一章 谋求兴趣

#### 一

人类的思想并不象胶卷那样，可以一劳永逸地通过快门和镜头记录下每一个印象。人类的思想是无休止地和持续地产生的，当我们使这些形象更为完整地成为我们自己的印象时，其中有些形象消失了或者合并了，这处加强了，那处又压缩了，它们并不滞留在思想的表面，而是通过富有想象力的才能进行再加工之后成为我们自己的表现，我们区分这些形象的重点，并见之于行动。

为了这样作，我们趋向于给事物的数量赋予人的特征，并使社会关系戏剧化。除了很深奥微妙的思想以外，世界的事务都是以某种表喻的方式来叙述的。一些社会运动、经济力量。国家利益、舆论都看成是一些人物的作用，而象教皇、总统、列宁、摩根或皇帝这样一些人物又形成一些观念和制度。所有成见中最深的是关于人物的成见，它把人性赋予非生物的共同性的东西。

我们的各种各样令人迷惑的印象，即使当它们被用种种方式删改以后，仍倾向于强迫我们去采用更为简便的比喻。有那么大量的事物，以致我们不能够清晰地记住它们。因而，我们通常给它们定个名称，让这种名称代替整个印象。但是，一种名称总是有漏洞的。旧的含义被遗忘，新的含义填补上，要想保持这名称的完整的含义，几乎总要唤起一些原始的印象的。而一些名称都不足以用来传播思想，它们太空洞、太抽象、太缺乏人性。我们就是这样通过某种个人的成见着手去看这种名称，去理解这种名称，最后在其中看到某种人类品质的化身。

然而人类品质的本身都是含糊不清和动摇不定的。它们最容易通过有形的迹象被记忆起来。所以，我们倾向于用我们一些印象的名称来叙述人的品质，这些印象本身又常常具体化为有形的比喻。英国的人民，英国的历史，都凝结在“英国”这个名称中，“英国”又具体化为约翰·布尔，他是愉快的、胖胖的，不太聪明，但很能够照料他自己。一个民族的迁移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是顺着河流前进的，在另一些人看来，则可能认为是一场洪水的劫难。这个民族表现的勇气可能被具体形容成为一块石头；他们的意图被形容为一条路，他们的疑虑被形容为这条路的分岔，他们的困难则是许多车辙和石块，他们的进展被形容成肥沃的山谷。如果他们动员他们的“无畏战舰”，他们就宣战了。如果他们的军队投降了，他们就被掷到地狱里。如果他们遭受压迫，他们就受到极大的折磨或处在困苦之中。

当公众事务通过演说、标题、戏剧、影片、动画片、小说、雕塑或者绘画来加以宣传时，把它们改造成成为一种有人情味的东西，需要首先根据原始材料进行抽象化，然后使抽象化了的东西富有生气。我们不能对我们没有看见过的东西感到很大的兴趣或者很受感动。我们每个人对于公众事务见得很少，所以，当某人以艺术家的素质把它们转制成一部影片以前，我们对这些公众事务都一直是模糊的和不感兴趣的。这样，抽象化的东西得到了艺术的补充，而这种抽象带着我们接触现实的局限性和种种偏见，对我们的现实知识产生影响。我们并不是无所不在和无所不知的，对于我们应该思考和应该谈论的东西，并不能了解多少。我们是血肉之躯不会靠一些字词、名称和没有生气的理论吃饭。我们作为某种艺术家，把一些抽象化了的东西绘成图画、上演成戏剧和画成动画片。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些有天才的人来为我们提供形象化的东西。因为人们并不都赋有同样程度的绘画才能的。我设想，一个人可能维护伯格森所说的实际的智慧是最密切适应“空

间特性”<sup>①</sup>的。一个“清晰的”思想家几乎总是一个好的观察家。但是，同样的理由，因为他是“摄制电影”的，他常常是着重形式和不敏感的。对于这种人来说，他有直觉知识，这种直觉知识或许是另一种和谐的名称或者是强有力的概念，他常常远比想象家更赏识一个事件的特性和一个行动的本质。他们更加理解，当关键的因素还是一种愿望时，从来不是赤裸裸地外露的，只有在掩饰的姿态中或者在语调的抑扬中才呈现出来。想象可能抓住刺激因素和结果，但是中间的和内在的东西常常被一个想象家笨拙地用漫画加以表现，正象一个身材肥胖的女高音歌手笨拙地扮演作曲家意图中可爱的少女一样。

不过，虽然他们常常有一种特殊的判断，直觉知识仍然是很不适宜于公开谈论和很难传播的。但是，社会的交往则依靠传播，当一个人能常常依靠他的直觉知识很有效地驾驭他自己的生计时，他通常很难于使别人有真实感的。当他谈到它们时，听起来象是一团迷雾。因为当直觉知识确实在人类感觉上提供一种较清楚的概念时，在空间上和触觉上，带有偏见的理智对那种概念不能起多少作用。所以，在行动取决于人们是否同心同德の場合，可能下述情况是确实的：对于作出实际决定来说，在观念被形象化或具有触知的价值以前，起初没有任何观念是清晰的。但是，同样确实的是，当形象化的思想对于我们自己的个性有某些影响以前，它对于我们都是不重要的。在它释放或抵触，压抑或增强我们自身的某些渴望之前，它仍然是无关紧要的客体之一。

## 二

图片始终是传播思想的最可靠的方法，其次，语言能唤起记忆中的图片形象。但是，在我们自己没有验证某些形象以前，这

---

<sup>①</sup> 《创造性的进化论》第3,4章。

种图片传招的思想不会完全成为我们自己的。这种验证或者象弗农·李曾称作“神入”<sup>①</sup>的东西，可能是无限微妙的和象征性的。这种摹拟或许是不自觉的，有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维持我们自尊的某些品格。老于世故的人不一定参与到英雄的结局中去，可是会参与英雄与丑角並存的整个思想结局。然而这些都是精心的安排。

受大众喜爱的艺术品，几乎总是有一些明显可供鉴别的特点的。它使你立刻知道谁是主角。若是一个作品的特点不明确优点不明显的话<sup>②</sup>，那就不容易为人所喜爱。但不仅如此，观众必须参与点什么，注视它的真、善、美並不算是他们参与了。为了不使观众呆滞地坐在图片前面，同样为了不使读者不呆滞地对待报纸的报道、小说和电影，观众或读者必须被形象所吸引。有两种形式是最最吸引人的，两者都对激起的感情感到自在，並且热中于他们所得到的刺激。这两种形式就是情欲和搏斗，这两者有那么多的相互联系，那么密切地混为一体，以致关于两性的搏斗比其它的任何主题都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没有什么东西那么引人入胜或者那么不介意于各种文化和新领域的特性了。

这种两性的主题形象在美国政治的形象化描述中极为罕见，说起来是牵强附会，除非在某些小小的战争狂热中，在偶然的丑闻中，或者在与黑人或亚洲人的种族冲突中有这种主题，只有在电影、长篇小说和一些杂志的小说中，工业关系，商业竞争、政治和外交与少女和其它女人纠缠在一起的。但是，斗争这个主题则处处出现。当发生斗争或者说发生争端的时候，政治就引起人的兴趣了。为了使政治受大众喜爱，就必须提供争端。尽管在真理和正义之中並無争端，就判断、原则或者事实的差别这种意义来

---

① 《美与丑》。

② 这一事实对于新闻的性质有极大的影响。参看第七部分。

说，並不要求加进好斗的东西<sup>①</sup>。

但是，没有包含好斗内容的话，我们不会被吸引住，也就很难引起我们的兴趣。对于那些被吸引住了的人来说，即使没有包含争端的内容，有时也能够吸引住他们。他们可能被动作中的真正乐趣所吸引，或者被微妙的竞争或创造力所吸引。但是，对于那些感到整个问题都是外在的和相距较远的人来说，这些其它的因素就不容易发生影响。为了使某一事件的形象会对他们起一些作用，就必须使他们对于斗争，悬而不决以及胜利等问题引起爱好。

佩特森女士<sup>②</sup>坚认“悬而不决……构成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的名画与里弗利或里亚尔托影剧院的图画之间的区别。”她已清楚地表明，那些名画既缺乏容易鉴赏的表达方式，也缺乏对这一代人有一个通俗的主题，所以，他说这就“阐明了为什么人们三三两两稀稀疏疏地在“大都会”里，而在“里弗利”和“里亚尔托”则拥挤着数以百计的观众。三三两两的人在艺术博物馆观看图画，用不了10分钟的时间——除非碰巧是一些学习艺术的学生、艺术批评家或者艺术鉴赏家。而在“里弗利”或“里亚尔托”数以百计的观众则观看了一个多小时。就美的观点来说，两种图画的价值不能相比。然而电影片比名著却吸引更多的观众并保持了更久的注意力，这并不是由于它们本身直觉的价值，而是因为它描绘了表现出来的事件，观众正急切地等待着它的结果。

那么，为了使我们所生疏的情况不致于只在注意力的边缘上暗淡地闪现，就应该用一种容易认识的图画表现出来。如果不这样做，那些情况便只能在短时间内引起少数人的兴趣。它是属于视域的，是看到而不是感觉到的，是撞击我们的感觉器官而产生

---

① 参照弗朗西丝·泰勒·佩特森：《电影技艺》，第3章，第31—32页。如果情节缺乏悬而不决：1、添加一个敌手，2、添加一个障碍，3、添加一个问题，4、在观众心理中强调用这些问题中的一个。

② 同上书，第6—7页。



的激动，而不是认识上产生的激动。我们必须有所偏袒。我们必须能够有所偏袒。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必须从观众中站出来，登上舞台，并且象英雄那样为善良战胜邪恶而搏斗。我们必须给比喻倾注以我们生活的气息。

### 三

所以，不论批评家们怎么说，在过去的争论中，提出了关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问题。我们普遍爱好的是让戏剧发生在一种足以证明有理的现实主义的背景中，并且让它结束在一种合我们意愿的浪漫主义的背景中，但是，这种浪漫色彩并不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从开始到结尾的原则都是不受约束的，但是，真实的开头和快乐的结尾都是明显的标志。电影观众不赞成按逻辑发展的幻想，因为在机器时代，纯粹的幻想是没有立足点的。他们反对无休止地追求现实主义，因为当一场斗争变成了他们自己的斗争时，他们并不喜欢斗争失败。

将要接受的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好的、坏的、合意的东西，并不是永远固定的。这些都是由许多成见确定的，这些成见都是从早先的经验中所得到的并由后来的经验作出判断的。所以，如果一部影片和一些流行的杂志为了求得迅速和广泛的普及，其投资不是那么昂贵的话，富有生气和想象力的人们就象他们梦想过的那样去扩大和提炼、去核实和批评对我们的想象起作用的那些贮存的形象。但是，象别的时代的教堂和法院的画家那样，人们付出了目前的费用，制出电影片，这些人必定坚持他们的成见，或者为挫败预期的想法而付出代价。这些成见是能够改变的，但是，从现在起影片刚放映了六个月，还不足以保证改变成见。

有一些人的成见是得到改变的，先驱艺术家们和批评家们很自然地压低了，并且对于经理们和主编们维护他们的投资感到恼火。他们在冒一切风险，还有什么别的可计较的？那是不很公道的，因为在他们正当的愤怒中，他们已经忘却了他们自己的报

酬，这种状况是他们的雇主没能想象到的。他们不可能，如果可能也不会改变地位。在与伪善的庸人无休止的斗争中，他们已忘掉另外的事。他们忘记了他们正在用过去的艺术家和聪明人从未梦想乞求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成就。直到过去的几个世代，他们都在要求任何艺术家从来没有考虑过的销路和观众。当他们得不到它们时，他们就很失望。

就象辛克莱·刘易斯在《大街》所写的人那样，那些理解的人能够把别人脑子里大量含糊不清的东西明确地表现出来。“你已替我说清楚了。”他们建立起来一种新的形态，然后就不断地被复制，直至它也成为一种观念的成见。后来的倡导者发现很难让公众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大街》。正象辛克莱·刘易斯的先驱者们那样，他与公众有一场争吵。

这场争吵不仅因为成见的抵触，而且因为先驱艺术家对他的题材的尊重。他选择了不管什么画面的话，就保持那个画面。如果他正在探索一个事件的本质，那么不管会有什么困难，他都要追究到它的结论。他不会给自己幻想的作品贴上标签去迎合任何人，或者在没有和平的情况下叫喊和平。那儿是他的美国。但是，广大的观众並沒有这种严肃的胃口。他们对他们自己比对世界上的任何事更有兴趣。他们所感兴趣的是“自己”，是通过一些学派和传统所表现出来的“自己”。他坚决认为一项艺术作品应该是一种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它能传到国外；他们将不是按照国家的界限，而是到一时悠闲的地方去，以满足一批中间阶层的艺术家们的要求。他们能够並愿意弄混这些画面，把较伟大的人物的创作拼凑出一幅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混合物，正象帕特森女士所提出的，提供“真实生活那么少有的——一堆困难问题的胜利的解答；把美德的苦恼和罪恶的凯旋……改变为美德的颂扬和永远惩罚它的敌方。”<sup>①</sup>

---

① 弗朗西斯·泰勒·佩特森：《电影技艺》第46页。“男女主人公总的来说都必定具有年轻、美丽、仁慈等特点，並被吹捧为自我牺牲和坚定不移。”

## 四

政治的意识服从这些规律。那儿总是有现实主义的立足点。有一些真正邪恶的形象，譬如德国的威胁或者阶级斗争，在主题中是可以辨认的。有一些对于世界情况的描绘是令人信服的，因为它和熟悉的想法相一致。但是，当思想意识既涉及到看不见的未来，又涉及到有形的现在时，它立刻就微妙地越过了核实的界限。当描绘现在时，你或多或少地受到共同经验的限制。在描绘谁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时，你必定是放手的。你或多或少立足于亚美其顿，但你或许是为上帝而战……一个真实的开头（根据流行的标准来看是真实的）和一个快乐的结尾。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目前的暴行都是冷酷无情的，对于专政以后的日子则认为是最温暖的。战争的宣传者也是这样的：莱茵河以东或者莱茵河以西有德国人的地方，他们到处发现人性中存在着兽性。那里存在兽性是完全对的。但是，胜利以后是永恒的和平。许多这样的描绘都是带有相当的讽刺性并经过蓄意考虑的。因为熟练的宣传家懂得你必须用似乎有理的分析作为开头，可是你必定不能继续分析下去，因为真正冗长乏味的政治作品很快就会破坏兴趣。所以，宣传家通过一种似乎有理的开头竭力论述现实中有兴趣的事，然后用长篇生动的笔墨写下快乐的结尾。

当公开的虚构与个人的紧急需要掺在一起时，这种“配方”很起作用。但是，一旦掺和起来了，在火热的斗争中，原始的私心和原始的成见起作用的汇合点就可能完全被忽略了。

## 第十二章 重新考虑个人兴趣

### 一

因此，对于所有的听众来说，完全相同的报道听起来也不会是同样的。由于没有完全相同的经验，每一个人的领会也就有不同，每个人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它，并且掺入他自己的感情。有时候一位技巧高超的艺术家会迫使我们进入我们完全陌生的生活里去，这种生活第一眼看上去是暗淡的、令人讨厌的和古怪的。但那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几乎在每一篇引起我们注意的报道中，我们都成为其中的人物，并在其中扮演一个“哑剧”的角色。这种“哑剧”可能是微妙的或者显著的，可能是赞同这报道的或者仅仅是粗略的类似物；它会包含我们想象中的这种角色所引起的感情。所以，当这种原始的主题进行传播时，就被遇到的各种思想所强调、曲解和加以渲染。正象莎士比亚的戏剧那样，每演出一次，都根据不同的着重点以及根据演员与观众的意见改写一次。

还没有确切地写完的长篇叙述中的一些报道就曾发生过十分类似的情况。在我们的时代，印刷记载就是这样检验每一个人鉴赏力的丰富程度的。但是，与谣传相比起来，就很少或者得不到检验。原始的报道真实或者虚构，全由玩弄诈骗的人随便添翼加角，添足加嘴。第一个叙述者的叙述，并不保持它的形状和分量。由听到的人们随意编辑和修改，把它当作幻想到处传播<sup>①</sup>。

所以，观众越是繁杂，反应就越是不同。因为观众数量增多，共同的用语就减少了，报道中的共同因素变得更为抽象，这

---

<sup>①</sup> 作为一个有趣的例子，参看C. G. 荣格：《心理分析研究的中心》1911年第1卷，第81页。康斯坦斯·朗译：《心理分析学》第4章。

种缺乏自己精确的特性的报道，为特性很不相同的人所得知，他们就把自己的特性加给了它。

## 二

他们加给报道的特性不仅因为性别、年龄、种族、宗教和社会地位而各异，而且在这些粗略的分类中，根据个人先天和后天的素质，因而他的才能、他的职业、他职业的进展、他职业着重的方面，他的情绪和紧张情况、或者他在玩弄他的生活把戏中所处的地位等等也各不相同。凡涉及到他有关公众事务的事，报刊上的几行报道、一些照片、轶事，以及他自己的一些偶然的经验，他都通过他的一套模式来设想，从自己的感情中得到消遣。他不把他个人的一些问题看作是较大环境中的局部实例。他把他所属的较大环境的报道看作是类似他私生活的扩展。

但是，这并不一定是对他自己所描绘的那种私生活。因为在他的私生活中，选择的机会是狭窄的，在他不能够直接支配他的公开的行为的场合，他一大部分的自我都被压抑和消失了。因此，普通的人以一种好的意愿来设想他们自己生活的快乐，或者因猜疑和憎恨来表现他们的不快乐。除了这样的人以外，另有一些表面快乐的人，他们除了在自己的圈子之外，到处表现残忍，象这样的人，他们越憎恶他们的亲属、他们的朋友、他们的职业，就越是在表面上表现出对人类的愛。

当你从一般转到具体时，更为明显的是人们处理他们的事务的特点并不是固定的。很可能他们不同的个性有着一种共同的躯干和共同的品质，但是其分枝和细枝有许多形状。没有谁用相同的特性去对照每一种情况。因为他并不是一种机械般自动装置的人，通过时间和不断积累的记忆的影响，他的特性就有某种程度的不同。他的特性不仅因时间而异，而且根据情况而变化。传说在“南海”隐居的英国人总是刮脸和系上黑领带去赴晚宴，以证

明他自己是受教育的，唯恐失去他们得到的这种特征。日记、相册、纪念品、旧的信件、旧的衣服等等都属于同样的情况，这种喜欢不变动的成规，证明我们想象中的两次跨入赫勒克立旦河是多么困难。

一个人自己并不总是起作用的。所以，形成任何的舆论就极为重要，这种舆论自己参与在其中的。某个日本人要求在加利福尼亚州定居的权利。你设想这种要求是想要种植果树呢，还是希望与白人的女儿结婚，这两种情况显然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两个国家正在争执一块领土，那么人们把这项谈判看作是一种地产交易，企图使他们丢脸呢，还是用通常掩饰这些争论的激动的和挑衅的语言作为一种强夺，这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当我们想到柠檬或者边远地区时所体现出来的受私心支配的本能，与我们想到（即使是潜在的）一个家长受凌辱而出现的受私心支配的本能是很不相同的。在一种情况下，个人的感情渗入到意见中去并不强烈，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很强烈。所以说“个人兴趣”决定意见是不容置疑的，可是要在我们了解到在许多私心中究竟是哪种私心以及哪种私心指挥着这种兴趣以后，这种说法才得到阐明。

宗教的教义和大众的智慧在每一种人中间总是区分出几种品格。他们曾把这些品格称为较高的和较低的，精神的和物质的，神授的和世俗的；虽然我们可能不会完全接受这种分类的方法，我们也不能不看到那种区分的存在。一个现代的人可能注意到相当多不明显独立的本性而不是两个对立的本性。他会说神学家制订的区分是武断的和表面的，因为许多不同的本性被更高地归纳在一起，使他们符合于神学家的类目，但是，他仍然会认识到这里为种种人性提供了一种有根据的线索。

我们已学会了去注意许多本性，但是还不会对它们作出判断。我们懂得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人，但常常表现为不同的人，这就要看他是不是在应付一个社会地位平等的人、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呢，还是一个社会上层分子；他正在与一个符合结婚条

件的女人谈恋爱呢，还是与一个不符合结婚条件的女人谈恋爱；他是在向一个女人求爱呢，还是认为他自己就是她的占有者；他是不是在对付他的孩子、他的母亲、他最信任的部属呢，还是在对付能使他成功或失败的老板；看他是正在为生活必需品斗争呢，还是与敌对的侨民打交道；他的处境很危险呢，还是十分安全；看他是独自在巴黎呢，还是与他的家属一起在佩奥里亚。要根据这些不同的情况而定。

当然，人们性格的坚韧性是大不相同的，不同的幅度如此之大，从杰基尔医生的分化的性格到布兰德、帕西弗尔或堂吉珂德的单一性格，它们之间的差别截然不同。如果前后的本性太不相联系，我们就不信任这个人；如果他们固执一条思路，我们就会发现他是没有生气的、执拗的或是古怪的。在大量的性格中，孤独和傲慢的少，适应性强的则很不相同，有一整套的本性，从只有天晓得的最高的一直到我们自己都不敢想象的最低的。一个家庭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父亲、耶和华、暴君，——丈夫、业主、男子，——爱人，纵欲的人；从职业来看，——雇主、主人、剥削者，——竞争者、阴谋者、敌人，——部属、奉承者、势利的人。有些人从来不在任何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另一些人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才停止其工作。但是，各种性格的形成，取决于一个人对于他自己所处的境况的想法。如果引起他敏感的环境恰巧属于良好的环境，他就会采取他认为是适当的性格。那种性格又会成为他的举止、他的语言、他对问题的选择、他的偏爱等等的调制器。当一些陌生的情况犹如教授处在企业发起人中间、浸礼会执事在玩扑克牌、伦敦佬在乡村中、人造钻石混在真的钻石中间等等反映在人们的性格上时，就会产生许多生活的喜剧。

### 三

在形成一个人的性格的过程中所受到的种种影响，是不容易

分隔开的<sup>①</sup>。对其基本原则的分析或许仍然象纪元前五世纪那样含糊，当时，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医师——译注）系统地阐述了性格的学说，识别乐观的、忧郁的、性情暴躁的和不动感情的性情，并把它们归因于血液、黑色胆汁、黄色胆汁和痰液。最近的关于从外表的行为和内在的意识到身体的生理学的理论，就象有人在卡农（Canon）、<sup>②</sup>艾德勒（Adler）<sup>③</sup>、肯普夫（Kempf）<sup>④</sup>的理论中找到很相似的线索那样。但是，尽管技术已大有改进，也没有人可能声称有一些固定的结论能使我们把性格和教养区分开，并从后天的性格中抽取出先天的性格。只有在约瑟夫·贾斯特罗（Joseph Jastrow）称之为心理学的贫乏区，把对性格的解释看作是被颅相学者、看手相者、给人算命者能猜出别人心思的人和少数政治学教授所运用的一种固定不变的体系。你还会发现它断言说：“中国人喜欢种种颜色，并把他们的眉毛弄成拱形”，而“卡尔默克人的头部都是侧着向下接触风琴乐器的斜面的；而且这个民族的嗜好偷窃等等是被准许的”。<sup>⑤</sup>

现代心理学家倾向于把成人的公开行为看成是许多可变因素之间的一种平衡，例如：环境的阻力、被抑制的几种成熟的渴望和明显的个性<sup>⑥</sup>。虽然我未曾看到详细阐述这种概念，他们容许

① 更值得注意的早期试图说明性格的有趣的描写见约瑟夫·贾斯特罗的《服罪的心理学》中“性格和性情前例研究”一章。

② 《快活、痛苦和愤怒时的肉体变化》

③ 《神经过敏的素质》

④ 《自主作用和个性：心理病理学》还可参看路易斯·伯曼著《调节个性的腺》

⑤ 贾斯特罗，同前注，第156页

⑥ 肯普夫在《精神病理学》第74页制定如下：

显示的希望

超过

后来抑制的希望

超过

青少年抑制的希望

超过

青春期前抑制的希望

受到环境 = 行为的抵制对抗



我们假设，渴望的抑制和控制对于一个人来说，并不是一直固定不变的，而是或多或少与他的本性有关系的。当他并不认为他自己是一个爱国者时，他就不会作爱国者要作的一些事的。毫无疑问，在童年的早期，或多或少有一些冲动，这些冲动不会在一个人的整个一生中重新再发生，除非它们模糊地和间接地掺杂在其它的冲动中间。但即使这种情况也不是确凿的，由于抑制是不能恢复的。只有心理分析家能够发掘一种被埋藏了的冲动，一些社会情况<sup>①</sup>同样也能勾起这种冲动。只有当我们周围的事物保持正常和平静的时候，当我们所期望的和我们所遇到的相一致时，我们就不需要许多关于我们性情的学识。当意料之外的情况发生时，我们才对我们自己有所了解。

在所有影响我们的人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我们的本性告诉我们，对于某一典型环境来说，哪一种冲动，怎样强调，如何引导是合适的，而对于那种环境，我们早已学会了应具有的态度。对于一种可以辨别的感受型式，我们都有一种控制着我们全部外在表现的特性，例如，在文明生活中，杀气腾腾的仇恨是受到控制的，作为父母亲、儿童、雇员或者政治家，尽管你盛怒得喘不过气来，你也一定不能表现出来。你不会愿意表现出杀气腾腾的仇恨的个性来的。你表示出不满，你周围的人也表示不满。但是，一旦爆发战争，那就可能认为有正当的理由去杀掉或者憎恨你所爱慕的每一个人。最初这种感情发泄得很狭窄。表现出来的本性是真正的爱国，在鲁珀特·布鲁克的感情中，在1914年8月3日爱德华·格雷爵士的演说中以及在1917年4月2日威尔逊总统对国会的演说中都可以发现这种感情。战争的现实仍然是受到厌恶的，战争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是逐渐认识到的。因为过去发生的战争现在

---

<sup>①</sup> 参见埃弗雷特·迪安·马丁的很有趣的书：《大众的行为》。

同样见霍布斯：《有财势的人》第二部分第25章：“人们的感情分开来都是温和的，只是一种热量，合起来就象许多标记，互相影响，尤其是用演说相互鼓吹时……”莱昂（Lebon）：《大众》，详细地阐述了霍布斯的这种观察。

只是一些走了样的回忆而已。在处于战争狂热的阶段，对战争采取现实主义态度的人们正确地认为国民还没有觉悟，彼此劝慰说：“等着看伤亡名单吧。”这种杀人的冲动逐渐地成为主要的行当，所有那些可以制约它的特性都瓦解了。当这种刺激变成主要的，在道义上证实为正当的以后，就渐渐地变得不可控制。不仅是对敌人这种观念，即大多数人在战争中实际看到的所有敌人，在感情上寻求发泄，而且对曾经憎恨过的所有的人、对象和思想也进行发泄。憎恨敌人是合法的。还有别的憎恨都通过赤裸裸的比拟，通过已经一度平静了的，我们认为推导得最远的比拟，使它合法化了。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和进行努力来恢复自我控制，重新以文明的性格来对付一些和平的问题。

正象赫伯特·克罗利先生说过的，现代战争是现代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所固有的，但被社会观念认为是不合法的。对于平民来说，并不存在象士兵仍然具有的和骑兵团曾规定的理想的战时行为准则观念。平民是没有准则的，除非他们中间的杰出的人物设法临时凑成。他们所仅有的准则就是把战争看作是不幸的东西。然而，即使战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也绝没有为了战争事先对他们进行道德培训。仅仅是在他们较高的本性中有一种准则和模式，当他们不得不依照一种从较高的品性看来是较低的品性而采取行动时就产生了深深的困扰。

在准备种种特性来适应各种情况时，人们可能发现他们自己身上就有一种道德教育所产生的作用。那么，显然这就决定于是否成功地以真诚和学识去考察环境了。因为错误地设想世界的话，就会错误地表达我们自己的特性，我们就会行为不当。所以，道德家必须有所选择：或者是不论生活的某些方面可能是令人厌恶的，他必须对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提供一种行为的模式；或是他必

---

① 英国诗人。

② 1905——1916年任英国外交部长。

须保证他的学生永远不会对抗他不赞成的种种情况，或者他必须废除战争，或者是教育人民怎么用最大的心理经济来作战；或者他必须废除人的经济生活而用幻觉和露水来作为他的食物；或者他必须调查经济生活中令人困惑的一切事物，并且向一个谁都不能自给的世界提供可以适用的行为模式。但是，那正是流行的道德文化所普遍地反对这样作的。从最好的方面看，他对现代世界极复杂的情况是踌躇的，从最坏的方面看，就只是懦怯的。那么，不论是道德家们研究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也好，或者是社会科学家们教育道德家们也好，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每一代人都是无准备地进入到现代世界来的，除非有人事先教给他去设想他必须以某种个性对待他很可能会遇到的那些问题。

#### 四

朴素的个人兴趣的观点遗漏了去考虑大部分这种问题。它忽略了“个人”和“兴趣”都是以某种方式设想出来的，而且大部分都是按惯例设想的。个人兴趣的普通学说常常完全遗漏了认识的作用。事实上十分显著的是，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最终归诸于它们本身，因而并不停下来注意人们对于所有事物和对于他们自己的想法都不是本能的。这些想法是后天得来的。

因此，象詹姆斯·麦迪逊<sup>①</sup>在《联邦制的拥护者》的第十篇论文中所写的，可能就是很确切的，即“土地的兴趣、生产的兴趣、商业的兴趣、金钱的兴趣以及许多次要的兴趣，在文明国家中发展成为必然的，并且它们分为不同的阶级，受不同的感情和观点所驱使。”但是，如果你详细考察麦迪逊文章的上下文，你就会发现一些东西，我认为有助于理解天性的宿命论观点，有时称之

---

<sup>①</sup> 美国第四届总统。——译注

为历史的经济解释。麦迪逊是在论证联邦宪法，“在许多对联盟有利的条件中”，他阐明“它的趋向是要打破和控制派系斗争的暴力行为。”使麦迪逊忧虑的是派系斗争。他向“人的本性”方面探索造成派系斗争的原因，根据文明社会不同的环境，潜在的意向，“导致了不同程度的活动。对于涉及宗教、政府和许多其它论点不同意见的热忱，还有对投机和实践的热忱；依恋于不同的领导者雄心勃勃地争夺显赫名位和权力，或者依恋于曾经对人类感情引起兴趣的其它类型的人，依次地曾把人类分为党派，用相互间的仇恨激怒他们，促使他们更加恼火和彼此压制，而不是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而进行合作。人类陷入相互仇恨的这种倾向是那么强有力，以致没有很多时机来显示它本身，这种最无意义的和最怪诞的个性已经足以燃起他们不友好的感情和激起他们最强烈的冲突。但是，派系斗争最普通和最持久的根源曾是财产分配上的差别和不平等。”

因此，麦迪逊的理论就是说派系斗争的倾向可能是由于宗教或政治意见引起的，也可能是由于领导人而引起来的，但是，最通常地是由于财产的分配引起的。然而，注意到麦迪逊只是断定人们是由于财产关系而分裂的。他并没有说到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意见是因和果，而说财产的差别是导致意见差别的原因。在麦迪逊的论点中，关键性的词就是“差别”。由于存在不同的经济情况，你能够尝试性地推断出意见差别的可能性，但是，你不能够推断出必定会有哪些意见。

这种保留意见从根本上打破了这理论通常所持的断言。而这种保留意见是必要的，正统的社会主义者在教条与实践之间存在的巨大的矛盾就可作证。他们论证说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就是目前阶段的必然结果。但是，为了制造出不可避免的下一阶段，他们组织和煽动出了“阶级意识”。人问：为什么经济情况并没有在每一个人身上产生阶级意识呢？它就是没有，如此而已。所以，这种妄自尊大的断言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哲学

建立在预示洞察命运上。它信赖一种对于人性的假设<sup>①</sup>。

社会主义实践建立在一种信仰上，即如果人们在经济上处于不同的状况，因而就能导致他们持有某种观点。例如，他们作为地主或佃户、雇员或雇主、熟练工人或非熟练工人、雇佣劳动者或领薪金的职员、买主或卖主、承包人或经纪人、出口商或进口商、债权人或债务人、无容置疑地常常相信或因其地位导致相信不同的事物。收入的差别造成了交往和机会的极大差别。正象索尔斯坦·维布伦先生（美国政治经济学家——译注）曾经那么英明地说明过的，<sup>②</sup> 机器工人们阐述他们的经验与手工业者们或商人们是有差别的。如果这曾是政治学的唯物主义观念所断言的话，那么这种理论会成为每一个解释意见的人不得不采用的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假设。但是，他不得不常常抛弃这种理论，他又不得不总是提防着。因为在试图说明某种舆论时，一个人的许多社会交往中究竟哪些因素影响着一一种特定的意见，这是很不明显的。史密斯的意见是由于他是一个地主，一个进口商、一个铁路股票持有者、或者是一个雇主的问题而引起的吗？琼斯是一个纺织厂的织布工，他的意见是从他老板的态度、从新的移民的竞争、他妻子的食品杂货帐单、或者常有的与卖给他一辆福特汽车和一所房子的某公司签订的契约以及分期付款的份额等等得来的吗？不进行专门的调查的话，你就不能够断定。经济决定论者也不能够断定。

一个人的各种经济交往，限制或者扩大了他的意见的范围。但是，政治的唯物主义观念并不能够预言究竟是哪一项交往、在什么借口下、根据什么理论起作用的。如果某人拥有一个工厂，那么就有很大的可能性来预言，他在意见中会考虑到他的所有权而与那个工厂有一些联系。然而，怎么估计出一个业主的作用

---

① 参看索尔斯坦·维布伦：《科学在现代文明世界中的地位》一书中《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和他的信徒》部分，特别见第413页——418页。

② 《商业企业的原理》

呢，没有一个经济决定论者能够告诉你。一个工厂的老板不会对任何问题都持固定不变的一套意见的，对于劳动、财产、管理也没有一套固定的看法，更不用说对无关紧要的问题了。决定论者能够预言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例子中，业主会抵制剥夺他的所有权的企图，或者他会赞成他认为会增加他的利润的立法。但是，由于在所有权中并没有魔术能够使一个商人知道什么法律会使他发财，在经济实利主义中并没有叙述一种因果关联，使任何人能够预言某业主是否会采取远大的目光呢，还是短浅的目光；一种竞争的观点呢，还是合作的观点。

这理论有没有像它常常宣称的那种正确性，可以使我们能够进行预言呢？我们能够分析一个人的经济利益，从而推断这个人必定会作什么。马克思曾试图那样作过，在对托拉斯进行充分的研究以后，他完全错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经验，并不象他预言的那样，产生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西方，而是产生于前资本主义制度瓦解的东方。为什么他错了？为什么他的伟大的追随者列宁也错了？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人们的经济地位会不可阻挡地产生一种适合他们经济利益的明确观念。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就具有那种明确的观念，而且他们知道其它的人都会懂得它。情况已经表明，不仅每一个人不会自动产生这种明确的利益观念，而且马克思和列宁他们自己也没有产生这种明确的利益观念。归根结底，马克思和列宁曾经写下的人类的社会行为仍然是含糊不清的。不应该是仅仅经济地位就决定舆论。如果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话，经济地位不仅应该把人类划分为阶级，而且还应该为每个阶级提供对其利益的看法以及获得这种利益的首尾一致的方针。然而，再没有比这更为确凿的是，所有级阶的人们都因不知道他

的利益是什么而经常感到困惑<sup>①</sup>。

就现存的社会制度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强调了财产的冲突是意见的制造者，就定义放宽的工人阶级来说，它忽视把财产的冲突作为鼓动的基础，就未来而言，想象一个社会将是沒有财产冲突的，所以，也就沒有意见的冲突。现在，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中，可能比社会主义制度有更多的实例说明如果一个人获利，必定有另一人受损失，但是，对于每一种情况来说，一个人有所得，则必定有一个人有所失，有无数的情況，人们仅仅想象这种冲突是因为他们没有受教育的缘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绝对冲突的情况已消除掉了，每个人只能了解全部事实真相的一部分，仍然会引起冲突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将不可能免除教育、道德或者先进科学，虽然从严格的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看，财产的公有制应该使这些东而成为多余的。如果经济决定论能单独地决定俄国人民的意见，那么俄国的共产主义者们就不要以这样持续的热忱来宣传他们的信仰了。

## 五

关于人性的社会主义理论就象享乐主义的逻辑一样，是一种虚假的决定论的实例。两者都设想人的天生的意向必然地而明智

---

① 事实上，到检验的时候，列宁完全抛弃了政治的唯物主义解释。当他1917年夺取权力时，他真诚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准则的话，他就会对自己说：按照马克思的教导，社会主义将从成熟的资本主义演进而来……我现在管理的国家刚刚开始发展资本主义……我确实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我是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者……因此说一切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观念暂时是可能的……为了产生马克思所予预言的演进，我们必须推进资本主义。但是，列宁在这方面什么也没有作。他试图通过意志、暴力和教育去对抗他的哲学所设想的历史过程，而不是等待演进。

写了这段以后，列宁根据俄国并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所必需的基础，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他现在说俄国必须创立资本主义，它会创造一个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总有一天会创立共产主义。这至少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相一致的。但是它说明在决定论者的意见中有着多么少的决定论呵。

地产生某一类型的行为。社会主义者相信的这种意向是追求一个阶级的经济利益；享乐主义者认为他们是追求享乐，避免痛苦。两种理论都依据一种朴素的本能观点，这种观点曾被詹姆斯<sup>①</sup>基本解释为“这种行动的才能是为了产生某种目的，在完成这种目之中缺乏对这种目的的预见和事先的教育”。

使人产生怀疑的是这种本能的行动是否总是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因为正象詹姆斯指出的<sup>②</sup>：“一个有记忆力的动物的每一本能的行动只要重复过一次，就必定不是‘盲目的’。”不管出生时的资质是什么样的，固有的意向是从最早的婴儿期开始的很深的生活经验中得来的。而这种经验决定了什么样的刺激可以引起他们的兴奋。就象麦克杜格尔(MCcDougall)先生说的<sup>③</sup>：“他们的开始具有能力，不仅仅由于对那种直接刺激天生意向的事物的感性认识和自然的或本能的直觉，而且由于对这些事物的想法以及由于感觉和对别种事物的想法。”<sup>④</sup>

麦克杜格尔先生进一步说：“只有意向的中心部分<sup>⑤</sup>保持其独特的性质，并对所有的个性和种种本能受到刺激的情况保持一致。”认识的过程，和使本能达到目的的实际肉体活动可能是无限复杂的。换句话说，人有一种害怕的本能，但是，他会害怕什么，以及他怎么企图逃避，则不决定于先天，而是由经验所决定的。

如果不是因为这种变化的性质，就难于设想各种各样的无规律的人性。但是，当你考虑动物的所有重要脾性时，他的食欲、他的爱好、他的憎恨、他的好奇心、他的性的渴望、他的畏惧以

---

① 《心理学原理》，第2卷，第383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390页。

③ 《社会心理学引论》，第4版，第31——32页。

④ “大多数关于本能和本能行动的定义只重视它们的意动（心理学名词）的方面……忽视本能的内心过程中认识的和由感情引起的方面是一种通常的错误”，同上书，第29页注释。

⑤ 同上书，第34页。



及好斗等等，都大量地与各种刺激物和各种使人喜悦的事有关系的，这种人类本性的复杂性不是那么不可思议的。新的每一代都是前一代规定的那种方式的碰巧的牺牲品，又是其产生的环境的后继者，当你想到这些情况时，可能有大量的合并体和变更体。

没有一看就明白的情况，假定因为人们渴望某一特定的事物，或者以特定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么人性就是注定构成那种渴望和那种表现的东西。渴望和行动都是学会的，在另外一代中，学会得可能不一样。分析心理学和社会、历史学联合支持这个结论。心理学指出，特定的刺激和特定的反应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多么地偶然。人类学通过实例说明刺激人们感情的事物和他们了解这些事物的方法是根据年龄和场所永远不同的，因而，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加强了这种观点。

人们总是追求他们的兴趣的，但是，他们怎么追求兴趣，并不是命中注定的。所以，在不管什么样的时间限度内，这个行星（地球）将继续维持人类的生命，人不能够对人们的创造能力加以限制，他不能宣布自动作用的毁灭。如果有必要，他能够说他的生活凡是认出来是好的，是不会改变的。但是，那样说他就会把他的生活限制在能用眼睛看到的范围内，抵制他脑子能想得到的，他会只把他碰巧掌握的标准用来作为衡量好的东西的尺度。他找不到根据来放弃他最高的希望和放松他有意识的努力，除非他喜欢把不知道的事看作是不可能知道的，除非他认为没有人知道的事是不可知的，以及某人还没有学会的事是永远没有人能教给的。

## 第五部分 创造一种共同的意愿

### 第十三章 兴趣的转移

#### 一

这里将要说明视野以外的世界在每个人的印象中有许多变数。接触点不同，形成的期望不同，最微妙的是获得的兴趣也不同。很多人所得到的生动印象就是他们自己也都无法衡量的，在群众中则有难以处理的复杂性。那么，在人们的想象和客观环境中超出他们视野的东西之间怎样建立起任何实际关系的呢？在民主理论的语言中，很多人对于如此抽象的情景各有自己的感受，又怎么产生一种共同的意愿呢？从这种复杂的变数中怎么出现一种单纯和坚定的思想？那些被认为是人民的“意志”或“国家的意图”或舆论的东西，怎么使转瞬即逝和临时的“意象”定形化呢？

1921年春季，美国驻英国的大使与很多很多的美国人之间的愤怒论争就说明有一种实际存在的困难。哈维(Harvey)先生在一次美国的宴会上发表演说，他毫不踌躇地向世界断言，1917年美国人的动机是什么<sup>①</sup>。他所描绘的这些动机并不象威尔逊总统在阐明美国人的心理时所坚认的那样。当然，现在既不是哈维先生，也不是威尔逊先生，也不是任何批评家和支持者们，不是任何人能够从数量上和质量上知道3000万或4000万成年人心里在想些什么。但是，每一个人知道的是一场战争打过了，由于作出了极大的努力而获得了胜利。这场战争是由威尔逊说的动机刺激起来

---

<sup>①</sup> 见1921年5月20日《纽约时报》。

的、由哈维说的动机刺激起来的，还是由这两者的混合刺激起来的，没有人知道它们各占多大比重。人们应征入伍和参加了战斗，参加了工作，付了税，为共同的目的作出了牺牲。然而，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是什么东西推动他去作他作过的每一件事。一个士兵认为这是一场结束战争的战争，那么，哈维先生告诉他说他当时并没有任何这类想法，哈维先生这样讲毫无用处。士兵想到的是他所想的，而哈维先生想到的则是另外的一些事。

哈维先生在上述演说中同样清晰地阐明了1920年的选民们脑子里想的是什么。那样作是草率的，如果你简单地假定，所有与你投同样选票的人，他们的动机与你一样，那么，这样作是不真诚的。计数表明，1600万选民投了共和党的票，900万选民投了民主党的票。哈维先生说，他们这样选举是表明了拥护或反对国际联盟，为了证实这种主张，他能够指出威尔逊先生要求进行一次复决投票，并指出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民主党和考克斯（Cox）先生坚决认为国际联盟曾是问题所在。但是，说国际联盟是问题所在，并不就能使国际联盟真正成为问题所在，因为在选举日计算选票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在国际联盟问题上的真正意见分歧。例如，有900万民主党员，是不是你就能相信他们全是国际联盟的坚定拥护者呢？你当然不会是那样的。因为你所了解的美国政治告诉你，数以百万计的选民总是象他们往常所作的那样，投票赞成保持南方现存的社会制度，不管他们对国际联盟的观点是什么样，他们并没有在选举上表明他们的观点。赞成要国际联盟的人们，对于民主党也赞成要国际联盟，无疑会感到喜欢。那些不欢喜国际联盟的人在选举时也许曾摒住他们的呼吸。但是，这两部分南方人都投了同样的选票。

共和党员是不是更为一致呢？任何人都能从他周围的朋友中举出一些共和党的选民来说明他们的意见是各种各样的，有人赞成对国际联盟持势不两立态度的参议员约翰逊和诺克斯的观点，有人则赞成对国际联盟持拥护态度的国务卿胡佛和总法官塔夫脱

的意见。没有人能够肯定地说究竟有多少人对国际联盟持什么特定的看法，也没有人能肯定地说究竟有多少人在选举时是受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所决定的。要把数以百计的不同看法只用两类加以表达的话，那就不能确凿地知道怎么加以清楚地综合归类。参议员博拉在共和党的选票中发现一种投共和党员票的理由，但是，洛厄尔主席也发现一种选举共和党员的理由。大多数共和党的选民是由持各种看法的男男女女组成的，有些人认为共和党的胜利会扼杀国际联盟，有些人认为共和党的胜利是挽救国际联盟最切实际的办法，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共和党的胜利是使国际联盟得以修正的最可靠的办法。所有这些选民都无法摆脱在选举中夹杂着自己的愿望，或是想使生意搞得更好，或是想使劳工安守本分，或是痛击民主党员们参加战争，或是痛击他们没有早点参战，或者排斥伯利森先生，或者改善小麦的价格，或者减低税收，或者阻止但尼尔斯先生在建筑上超过世界，或者帮助哈定先生作同样的事。

然而，出现了一种决定，哈定先生入主了白宫。因为所有选票的共同意愿是民主党应该出去，共和党应该进来。那就是所有的矛盾彼此抵销以后留下来的唯一要素。而就是那个要素就足以在四年中改变政策。为什么1920年11月的日子要作这样的改变，并没有记载其明确的理由，即使个别的选民也记忆不起来了。理由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这些理由发展和改变并且溶合在其它理由之中，因此，哈定先生必须要对付的舆论并不是那些选举他的人的意见。在各种各样的意见和1916年每一个人都看见的特定的行动路线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威尔逊当选时明显地叫喊不让我们卷到战争里，五个月之后，他却领导我们国家卷入了战争。

所以，使群众的意愿发挥作用总是需要进行解释的。那些对反复无常的作用印象最深的人发现莱博恩是一个预言家，欢迎罗伯特·皮尔爵士所概括的：“愚蠢、软弱、偏见、错误的感情、正确的感情、顽固的报纸短评的巨大混合物就叫做舆论”。另外

一些人得出结论说，由于从放任自流和松散的情况中，是会出现既定目标的，所以，在一个国家的居民之上某处，必定有一种神秘的诡计在起作用。他们祈求一种集体的灵魂，一种民族心理，一种时代的精神，这些东西对随便的意见强加约束。看来需要一种“超灵”，因为在一群人的思想和感情中并没有发现任何那么简单、那么清晰地象某种公式一样的东西，而这些人将把这种公式作为其舆论的真实表述来接受。

## 二

但是，我认为不需要任何形式伪装的超灵的帮助，就能够更为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些事实的。总之，每一次政治竞选中，都在实际运用那种技巧，使不同想法的各种人都投同样的选票。例如，1916年，共和党的候选人必须从许多不同的共和党人中产生出共和党的选票。让我们看看体斯先生接受提名后的第一次演说<sup>①</sup>。它的内容在我们的头脑里仍然清楚得不必作许多解释，虽然这已不再是引起争论的问题了。这候选人曾是发表异常坦率的演说的人，他离开政治已经有几年，对于不久以前的一些问题，他个人也没有表过态。此外，他并没有象罗斯福、威尔逊或者劳埃德·乔治这些受爱戴的领袖们所具有的魔力，也没有象这些人物所具有的表演才能来体现他们的追随者的感情。从政治方面说，他运用的是气质和早先的训练。然而，通过仔细的分析，他还是懂得政治家的技能是什么的。有些人只知道怎么去作一种事，而不能够亲自去作它，他就是这种人中的一个。相比之下，他们常常是比较好的老师，而不是艺术能手，艺术对他来说仅仅是第二天性，因而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去表现它。这种说明认为能够作的人就去作，不能够作的就去教，听上去并不很象是一个教员的反映。

---

① 1916年7月31日在纽约卡乃基大厅发表的。

休斯先生知道这时机很重要，他谨慎地准备了他的手稿。刚刚从密苏里回来的西奥多·罗斯福先生坐在一个专席中。满屋坐着带有不同程度怀疑和沮丧的阿美其顿退役军人。在台上和在其它专席中可以看到一些过去的伪君子 and 1912 年的名流人物，这些人显然是健康极佳，但是带有伤感的心情。大厅外面远处的地方，有些人则表示强烈拥护德国，有些人则表示强烈拥护协约国；其中有东部和一些大城市的主战派，也有中部和太平洋沿岸的主和派。还有对墨西哥有强烈的感情的人。休斯先生必须把分裂为塔夫脱派和罗斯福派的、拥护德国的和拥护协约国的、战争派和中立派、赞成干涉墨西哥的和不成干涉的等等各种各样的人都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反对民主党的大多数。

当然，在这里我们没有关心到道德和智慧方面的情况。我们的兴趣仅仅限于不同意见的领袖在获得一致的选票方面所采用的方法。

“这种具有代表性的聚会是一种可喜的预兆。它意味着力量的重新联合。它意味着林肯的党派得到了恢复。……”

这些斜体字是连系物。在这种演说中，林肯与亚伯拉罕·林肯是没有关系的。它仅仅是一种固定的成见，通过它能够把围绕这名字的虔诚行动转移给现在取得了地位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提醒了共和党人，布尔·穆斯和老格尔德分裂以前，他们有过一段共同的历史。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这分裂的问题。但是，这问题存在着，还没有得到和解。

演说者必须使它和解。1912 年的分裂，出现在目前的国内问题上了；正象罗斯福先生宣称的，1916 年的重新联合是建立在共同愤慨地反对威尔逊先生对待国际事务的行为基础上的。但是，国际事务也是冲突的一个危险根源。必须找到一个公开的题目，这题目既不忽视 1912 年的分裂，又要避免 1916 年爆炸性的冲突。演说者技巧地选择了外交任命中的政党分赃制。“有功的民主党人”是一个丧失了名誉的短语，休斯先生立刻提到了这短

语。这种经历不可原谅，用力攻击是不容犹豫的。在逻辑上必然会导致一种共同的情绪。

然后，休斯先生用一种历史的评论作为开头，便转到墨西哥问题上。他曾考虑到普遍的思想感情，认为墨西哥的情况进展得不好；而且普遍认为应该避免这场战争；有两种强烈的意见趋势，一是认为威尔逊总统不承认韦尔塔是对的，另一是认为韦尔塔比卡兰萨更好些，两者都同意干涉。在记载中韦尔塔是第一个头痛的问题……

“他当然是墨西哥政府实际上的首脑。”

但是，道德家把韦尔塔看成是一个喝醉了酒的凶手，必须使他得到安抚。

“应该不应该承认他是一个需要进行明智的判断的问题，但需根据正确的原则。

所以，候选人没有说应该承认韦尔塔，而说应该采用什么正确的原则。每一个人都是相信正确的原则的，而且每个人当然都相信他是掌握这种原则的。为了更进一步弄混这个问题，就把威尔逊的政策描述为“干涉”。可能那是法律上的含义，而不是当前对这个词的含义。通过延伸这个字的含义使它适用于威尔逊作的事，也适用于干涉主义者真正想要作的事，两派之间的斗争问题是应受到约束的。

通过使“韦尔塔”和“干涉”这两个爆发点的词对所有的人都意味着差不多，这演说经过一会儿就达到了安全的境地。这位候选人讲述了坦皮科、维拉·克鲁兹、维拉、桑特·依沙贝尔、哥伦布斯和卡里查尔的事迹。休斯先生明确表示，或者因为报纸提供的事实是使人不愉快的，或者因为实际的解释（例如，关于坦皮科的）太复杂。这种记载不可能引起相反的感情。但是，最后这位候选人必须表态。他的听众期待他表态。这种指控正是罗斯福先生的主张。休斯先生会采用他的补救办法进行干涉吗？

“这个国家没有侵略墨西哥的政策。我们对它的领土没有任

何欲望，我们希望它得到和平、稳定和繁荣。我们应随时帮助它医治它的创伤，解除饥饿和贫困，以各种可行的办法给予它无私的救济。我们一定要在克服这届政府的行为所造成的困难……我们一定要采取新的政策，我们能够通过一种稳定和一致的政策来促进持久的友谊。”

友谊这个词是对不干涉主义者说的，“新的政策”和“稳定”的词是对干涉主义者说的。对于没有争论的记载，具体的细节写得很多；对于有争论的问题，则什么事都是模糊的。

关于欧洲战争，休斯先生使用了一种坦率的惯用语句：

“我主张对陆地和海上坚定地保持所有美国人的权力”。

为了了解那项声明在演说以后的力量，我们必须记住在中立的时期，各个派别反对欧洲一些国家，这种作法的本身都被看成是违反美国的权力的。休斯先生似乎是对亲协约国的人说的：我早就主张压制德国。但是。亲德国的人曾经坚持，英国的海上势力侵犯了我们大部分权利。这样的说法对“美国权利”这个象征性的用语包含了两种正好相反的含义。

但是，发生了卢西塔尼亚事件<sup>①</sup>。就象1912年的分裂一样，这事件对于协调一致来说是一种无敌的障碍。

“……我相信卢西塔尼亚的沉没不会造成美国人的伤亡。”

因而，当有一个问题我们大家不可能期望意见一致的时候，必须忘记那些不能让步的东西，让我们佯作它并不存在。休斯先生没有对美国与欧洲未来的关系发表意见。他说不出什么可以使这难以和解的两派都欢喜的话，因为这两派的支持正是他要求的。

几乎没有必要说休斯先生并没有创造这种技巧和没有出色地运用这种技巧。但是，他说明了舆论怎么由一些分歧的意见形成的问题是模糊的，它的意思近似于许多颜色混合起来形成灰色一样。目标是表面上的和谐的话，实际上就会是冲突，结果常常是

---

① 美国船名，1915年5月7日被德国潜水艇击沉——译注



公开呼吁蒙昧主义。在公开的辩论中，关键问题上的含糊不清，几乎总是自相矛盾的意图的征兆。

### 三

但是，模糊的思想怎么又常常有力量来粘合一些感受很深的意见的呢？我们回想起来，不管他们感受多么深，这些意见都不是从探讨那些他们频繁接触到的事实中得来的。对于未看到的外界情况，犹如墨西哥战争和欧洲大战，尽管我的感情是强烈的，然而我们的理解是很少的。最初产生的一些图片和文字丝毫比不上感情本身的力量。关于看不到和听不到的事情的报道，其所报道的事情发生在我们从来未到过的地方，除非偶而在作梦或幻想中想象过，我们从来都不可能了解其全部现实情况。但是。它能引起所有的有时甚至比实际事物更强烈的情绪。因为不止一次的刺激都能拨动感情的触发器。

最初的刺激所引起的反应可能就是文字或口头谈话所造成的头脑里的一系列的印象。这些印象渐渐退色、很难牢牢记住，它们的轮廓和意向是不定的，认识的过程逐渐地会使你感觉到什么东西，却完全不清楚你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感觉的。退色了的印象被另一些印象所代替，然后又被一些名称和符号所代替。但是，情绪再继续下去，可能现在的感情是被替代的形象和名称引起来的。这些替代物甚至产生于纯粹的思想，因为，如果一个人想要比较两种复杂的情况的话，他立刻就发现不可能记住两者的全部细节。他运用这些名称、特征和实例的速记。如果他要往前想的话，他必须这样作，因为他不能够记住他不断接受的一大堆字句。但是，如果他忘记了他已代替和简化了的东西，他立刻就在语言表达中失误，开始谈一些名称而不顾客观的对象。然后，他没有办法知道这名称是什么时候与第一件事相分离而继续与其它的事相结合的。在偶然的事件中，更难于防止偷换了的概念。

对于引起心理学家所称之为条件反射的东西来说，一种感情并不是仅仅与一种概念联在一起的。有没完没了的事物能够触发感情。有没完没了的事物能够满足感情。这是特别真实的，当刺激只是模糊地和间接地觉察到的情况下，客观事物也就会是间接的。对你来说，能够联系一种感情，譬如恐惧，首先联系某些直接的危险物，然后联系那件危险物的概念，又然后联系与那概念相类似的东西，等等。人类文化的整个结构，从一个方面说，是一种刺激和反应的合成品，而最初的感情的能量则仍然是其一个固定的中心。在历史的进程中，感情的内涵无疑已发生变化，但是，这与速度或合成物的变化完全不同，它已经使其条件产生了一些特征。

人们对于观念的敏感性是很不相同的。有一些人对于俄国饥饿儿童的概念简直栩栩如生地就象眼前就有一个那样饥饿的儿童那样真切。另一些人则几乎不可能被一种淡薄的观念所感动。中间有许多不同的程度，而且有人对于事实的感觉是迟钝的，感情仅仅是被观念引起的。但是，感情虽由观念引起，我们亦不可能亲临其境来对这种情景有所行动，以满足这种感情。比如，饥饿的俄国儿童这个观念唤起了一种想喂养这些儿童的愿望。然而，由观念引起感情的人，并不能自己去喂养儿童。他只能向一个非个人的组织捐钱，或者捐钱给一个他称之为胡佛先生的化身。他的钱并没有递给那个儿童。钱交给了一项总的基金，这笔基金能喂养大批儿童。正象这种观念是间接的一样，行动的结果也是间接的。这种认识是间接的，只有效果是直接的。这种过程有三个部分，刺激来自看不到的地方，反应达到某处也是看不见的，只有这种感情完全存在于这个人身上。他对于儿童的饥饿只有一种观念，他对于减轻儿童的痛苦也只有一种观念，但是，对于他自己要帮助儿童的愿望却有一种真实的体验。问题的中心事实是，他具有的感情是直接的。

在那种变化的限度以内，刺激和反应的感情都是可能变化

的。所以，如果在一些人中间，对反应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意向，你能够找出一种刺激会在他们许多人中间引起相同的感情来，你就可以用它代替最初的刺激。例如，如果一个人不喜欢国际联盟，另一个人嫌恶威尔逊先生，第三个人畏惧劳工，如果你能够找到某个信念，这信念是他们憎恨的对立面的话，你就有可能使他们联在一起。假定那个信念是美国的信仰。第一个人认为这个信念的含义是保持美国的孤立，或者称之为保持美国的独立；第二个人，认为这个信念意味着抵制一位政治家，他在关于如何当美国总统的问题上与其想法相抵触；第三个人对于这个信念，则认为是号召反抗革命。这种信念就其本身的字义看，并不特别表明什么，但是，它几乎与任何事都能联系起来，甚至与那些最初的隶属于根本不相同的观念的感情联系起来。

当一些政党或一些报纸宣布对美国的效忠、美国进步党的主义、法律和秩序、正义、人性时，它们希望消除派系冲突的感情而合并起来，如果没有这些信念，他们被邀请去讨论一个特定的方案的话，肯定会分裂。因为，当围绕着这个信念已出现联合时，在这种信念指导下的感情就趋向于一致而不是趋向于挑战。我认为要求多种多样这类象征性的用语是合适的，并且技巧上也是正确的。它们并不代表特定的观念，而是代表观念之间的一种休战或者一种联接点。它们象是战略上的铁路中心，许多铁路都在那里会合，不管它们最远的起点和最后的终点，还是什么地方。但是，谁获得了这些信念，谁就通过这些信念暂时抑制住公众感情，谁就能够通过它们把握住公众的政策。只要某一个特定的信念具有联合的力量，野心勃勃的派别就会争着占有它。例如，想一想林肯的名字或者罗斯福的名字。一个领袖或者一种兴趣能使它本身成为当前一些信念的优秀者的，就是当前形势下的优秀者。当然，有一些限制的。过分地滥用各种类型的人对于这信念所代表的现实情况的想象，或者过分抵制那种信念的名称而有新的意图，可以说是会毁坏这信念的。在这种意义上，1917年的时候，

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信念——《神圣的俄国》(Holly Russia) 和《小父亲》(Little Father) 冲淡了苦难和战败的影响。

#### 四

俄罗斯的崩溃在所有前沿阵地和在所有民族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后果。在把由战争搅起来的种种意见具体化为一种共同的意见中，这些后果直接导致了一种显著的经验。“十四点”<sup>①</sup>已向协约国、敌对国和中立国的政府以及所有的民族提出来。这“十四点”是试图使世界大战中的主要的无法估计的力量紧密地团结起来。这必然是一种新的方针，因为这是第一场大战，在这场大战中，能使所有发挥决定作用的人都会同时思考相同的观念，或者至少都同时思考这些观念的相同名称。没有海底电缆、无线电、电讯和日报的话，“十四点”的试验就不可能。这是一种企图，想利用现代通讯方法来使全世界开始恢复到一种“共同的意识”。

但是，首先我们必须考察一下1917年底他们描述的一些情况。因为所有这些考虑都以某种方式在文件的最后设想中阐述了。在夏秋之际，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情绪和战争的进程。7月中，俄国人发动了最后的一次进攻，惨遭击败，这种士气低落的过程导致11月开始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稍早些时候，法国在香槟遭受了一场严重的、几乎是灾难性的失败，因为在军队中发生了兵变，并且在文职人员中散布了一种失败主义的情绪。英国遭受了潜艇袭击的损失和弗兰德斯战役的惨重损失，11月英国军队在坎布雷又遭败北，吓坏了前线的军队和后方的领导者。极度的厌战情绪弥漫了整个西欧。

实际上，人们受到极度痛苦和失望的刺激，放松了对于已经接受的对于战争的看法的注意力。普通的官方声明已经不再吸引他们的兴趣了，他们的注意力开始离开正道，现在集中于他们自

---

<sup>①</sup> 美国总统威尔逊1917年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建议。

已遭受的损失上，集中于他们的党派和阶级的意志上，集中于普遍对政府的不满上。官方所宣传的有几分完善的组织概念，由希望、恐惧和憎恨刺激起来的兴趣和注意力，所有这些被称为信念的东西都行将垮台。各处人们的心理都开始寻找可以指望解除痛苦的新的寄托。

忽然，他们看到了一个极大的戏剧性的场面。在东部前线，出现了和平的保证。在布列斯特——列多夫斯克所有头脑简单的人开始从梦中苏醒过来：有可能进行谈判，采用一些不是与敌人拼命的办法来结束这场苦难。人民胆怯地开始将全神贯注的注意力转向东部。他们问道：为什么不？这全是为了什么？政治家们知道他们在作什么吗？我们是不是真正在为他们所说的进行搏斗？是不是有可能不经过搏斗就获得它？在检查制度禁令下，几乎已经不准许刊印这些了，但是，当兰斯多恩伯爵演说时，从心里有一种反应。较早的战争的信念已经变得陈腐了，已不能用它来作为联合的力量。实际上，各协约国里已广泛地展现出分裂。

中部欧洲也曾发生类似的情况。在那里，战争最初所具有的推动力已经减弱了，神圣的联合也破裂了。沿着垂直的战争分界线对直通过的水平面上，短兵相接的战斗仍在以各种预见不到的方式进行着。还没洞察到军事决定时，已出现了战争的道德危机。所有这些威尔逊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是了解的。当然，他们还没有精确地认识这种处境，但我在上面概略叙述的，他们都知道。

他们亦知道协约国的政府受到一系列协定的束缚，这些协定从文字上和精神上都与战争是什么样的普遍看法相反。当然，巴黎经济会议的决议是公共财富，许多秘密协定在1917年11月曾由布尔什维克公布<sup>①</sup>。各国人民只是模糊地知道这些秘密条款，但

---

<sup>①</sup> 由威尔逊总统在与参议员们开会时声明，在他到达巴黎以前，从未听到过这些协定。那声明是使人困惑的。正象原文所表明的，不了解秘密条约的话，就不可能制订“十四点”。当总统与豪斯上校在准备“十四点”的最后出版的文本时，那些协定的要义已经公之于总统了。

是，可以肯定地相信，它们与理想主义者的自主的口号并不一致，没有赔款，也没有吞并。一般的调查所采取的方式是询问多少英国人值得住在阿尔萨斯——洛林或者达尔马提亚，有多少法国人值得住在波兰或者美索不达米亚。这种调查在美国也不是完全不知道的。全部协约国的目标曾放在拒绝参加布列斯特——列多夫斯克会议的守势上。

这里有一种高度敏感的心理状态，任何有能力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会不考虑它。合乎理想的反应应该是协约国联合行动。10月，在协约国内部会议上考虑时，发现不可能这样作。但是，12月的时候，压力变得如此之大，以致乔治先生和威尔逊先生独立地作出了一些反应。总统采取的方式是陈述“十四点”和平条款。列举这些条款是为了求得精确性，并立刻造成一种印象，这是有条理的文件。用“和平条款”代替“战争目的”，是由于考虑必须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代替布列斯特——列多夫斯克谈判的东西。他们想要在世界范围中进行公开的辩论，通过这种更大的场面所引起的注意来对抗俄德谈判的场面所引起的注意。

谋取了世界利益以后，就必须保持这种利益的一致性和灵活性，以应付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情况变化。必须要让协约国的多数认为这些条款是有价值的。他们必须满足每一个民族的民族抱负，而又要限制那些抱负，使得没有一个国家会把它自己看作是为另一国所利用。这些条款必须满足官方的利益，使之不会挑起官方的不团结，而又必须符合普遍的想法，使之能够防止士气低落的蔓延。总之，他们必须维护和巩固协约国之间的团结，以防止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但是，这些条款必须是有可能实现的和平条款，因而假使德国的中间派和左派进行煽动的话，他们就有一个文本用来打击统治阶级。所以，这些条款必须推动协约国的统治者更接近他们的人民，驱使德国统治者远远脱离他们的人民，并且在协约国之间、非官方的德国人之间和奥匈帝国所属的民族之间建立起一种共同

的谅解。“十四点，是一项大胆的提高水准的尝试，几乎每一个人都可能对它加以修正。如果足够数量的敌方人民已作好准备，就会出现和平的局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协约国也会有较好的准备来承受战争的震惊。

制订“十四点”时，所有这些都曾考虑在内的。也许就一个人来说，不会想到所有这些点，但是，就所有的人来说，是想到了其中有些点的。根据这样的背景，让我们检验一下这文件的某些方面。前面的五点和第十四点涉及到“公开的外交”、“海洋自由”、“平等的贸易机会”、“裁军”、没有帝国主义吞并殖民地以及关于国际联盟。可能会把它们描绘成一种一般的概括性声明，那时候每个人都自认为信任的。只有第三点较为明确，它有意识地直接地针对巴黎经济会议的决议，并且意味着解除德国人民所担心的窒息。

第六点是涉及某一特定国家的第一点。它有意作为俄国猜疑协约国的回答，它所作出的保证的措辞是根据布列斯特——列多夫斯克的戏剧性事件来定调的。第七点涉及比利时，形式上和意图上都是没有限制的，实际对全世界包括中欧的很大地区都适用。我们必须对第八点稍作说明，它以绝对要求撤离和归还法国领土作为开头，然后提到阿尔萨斯—洛林问题。第一条款的措词最完善地阐明了一份公开声明的性质，它必须精炼地用极少的几个词来表明极复杂的利益。“1871年普鲁士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上对法国的错误处理，使世界和平动荡不定了将近50年，应该得到纠正……”。这里的每一个字都经过谨慎仔细的选择。作错了的应该纠正过来；为什么不提阿尔萨斯—洛林应该归还？没有这样说，因为不清楚那时候如果提供一次公民投票，所有的法国人会不会为了重新兼并而无限期地打下去；还因为更不清楚英国人和意大利人是不是会打下去。所以，这方案必须适用于两种可能性。“纠正”这词保证了法国满意，但读上去并不是赞成简单的兼并。可是，为什么说是1871年普鲁士作错了的？普鲁士这个

字当然是要提醒南部德国人，阿尔萨斯-洛林曾经属于普鲁士而不属于他们。为什么说和平动荡不定了“50”年，以及为什么用“1871”？首先，法国人和世界其它国家的人记忆起来的是1871。那是他们冤情的结节。但是，“十四点”的制订者知道法国的官员想要的比1871年的阿尔萨斯-洛林更多。1916年沙皇的大臣和法国官员之间传递的秘密备忘录，包括了并吞萨尔流域和某种意义上的公分莱茵地带。它是想要在“阿尔萨斯-洛林”的名称下把萨尔流域包括进去，因为这流域在1814年曾经是阿尔萨斯-洛林的一部分，虽然它在1815年附属于阿尔萨斯-洛林，但是，普法战争结束时，它已不属于法国。法国官方的方案要把萨尔归入“阿尔萨斯-洛林”的名称下加以吞并，它是指1814-1815年的阿尔萨斯-洛林。威尔逊总统通过坚持1871年就真实地规定了德国和法国之间最后的疆界，总统注意到了秘密条约并把它抛在一边。

第九点不那么微妙地对意大利说明了同样的问题。“清楚地可辨认的民族界线”恰恰不是“伦敦协定”所指的界线。这些界线有的部分是从战略考虑的，有的部分是从经济、从帝国主义、从种族的因素考虑的。其中只有恢复真正应属意大利而被别国统治的地区，才有可能取得联合一致。正象每一个获悉的人所认为的。所有其它的各点，仅仅是推迟即将发生的南斯拉夫的反抗而已。

## 五

假定说明显一致地欢迎“十四点”的热忱是表示同意整个方案，那就错了。每个人看来都找到他所喜欢的，不是强调这个方面就是强调那个细节。但是，没有谁敢于冒风险进行一场讨论。被接受的这些用词都是那样地充满了文明世界的潜在的冲突。他们持相反的意见，但是，他们被唤起了一种共同的感情。在那种含义上讲，他们为了激励西部的民族而参与了他们还必须忍受的为时



十个月的殊死战争。

当极度的痛苦即将结束的时候，只要“十四点”涉到那种模糊的和快乐的未来的话，解释中的真正的争论就不会显露出来。它们是解决整个看不见的客观环境的方案，因为这些方案对所有的集团都产生它自己私下的希望，所有的希望汇集起来就成为一种公众的希望。正象我们在休斯先生的演说中所得知的那样，协调一致是等级的信念。当你追溯等级时，才能包含越来越多的派系，你可能暂时保持感情的联系，然而你丧失了理智。甚至感情也变得淡薄了。当你离经验更远一点的时候，你就进入更高的概括和抽象化。就象你乘坐汽球上升时，你就会抛弃越来越多的东西，当你带着这样的一些词句如“人类的权利”、或者“使世界稳健地发展民主”达到顶点时，你就会看得更远而广，但是，你实际看到的東西却很少。然而，人们的感情已经产生了的话，就不会保持消极。当公众的呼吁越来越多地要求所有的东西归大家时，当这种含义散播开来而感情被搅起来时，它们很个别的含义就为普遍所适用。不管什么，你最最需要的是“人类的权利”。这个词再空洞不过了，几乎能指任何东西。很快变成为指的近乎是每一件事。威尔逊先生的用词被全世界每个角落理解成无数不同的情况。没有协议出一项文件並使它成为公开的记载用以纠正这种混乱的状态<sup>①</sup>。因此，当和解的日子来临时，每一个人都期待着最重要的东西。起草条约的欧洲作看们有着很大的选择，他们愿意实现他们的同胞所坚持的期望，这些同胞们要求在国内行使最大的权力。

他们降低等级，把“人类的权利”降为“法国的权利”、“英国的权利”、“意大利的权力”。他们並沒有放弃运用一些象征。他们放弃的只是那些战后已没有永久根基的想象。他们运用象征主义来保持法国的统一，但是，他们不会为欧洲的统一冒任何风险。

---

① 美国在刚刚停战以前向协约国的政治家解释“十四点”。

“法国”这个象征已深深地受到依恋，而“欧洲”这个象征则只是最近历史上的事。不过，在“欧洲”这个混合体与“法国”这个象征之间，区别是不明显的。国家的历史和帝国的历史其统一概念的范畴表现出来有时扩大，有时缩小。任何人都不能够说人们总是从小的忠诚转向大的忠诚的。因为事实不会证实这种断言。罗马帝国和神圣的罗马帝国的概念比起19世纪那些主张国家统一的概念更为膨胀，认为要建立“世界国家”的人在讨论中曾以此作为类比。可是，不管一些帝国暂时地膨胀了还是缩小了，真正的合并已有所增多，这或许是真实的情况。

## 六

象这样真正的一体化的情况在美国的历史上无疑也发生过。1789年以前的十年中，看来多数人对于他们的州和他们的市镇的感觉是真实的，但是，对于一些州的联盟的感觉则是虚幻的。他们的州、州的旗帜、州的著名领袖、或者是代表马萨诸塞州或弗吉尼亚州的什么人物等这些概念都是名副其实的信念，那就是说，他们是从童年时代、职业、居住等等之类的实际经验中熟悉这些的。人们经验的广度曾很少超越他们想象中的州的边界。“弗吉尼亚”这个词与大多数弗吉尼亚人历来所知道的和感觉到的几乎每一件事联系在一起。最广泛的政治观念是与他们的经验有真正的联系的。

这里指的是他们的经验而不是他们的需要。因为他们的需要是从他们真实的环境里产生的，在那时候，这种真实的环境至少有13个殖民地那么大。它们需要建立一个共同的防御。他们需要一个象“邦联”<sup>①</sup>那样广泛的财政和经济的地区。但是，只要“州”这样的“假环境”环绕着他们，“州”的信念就使他们对政治的兴趣

---

① 美国1781—1789年间的13州联邦。——译注。

丧失殆尽。象“邦联”这样的一种州际概念。代表了一种没有力量的抽象的观念。它是犹如公共汽车一样的多种联合体而不是一种信念，这种联合体造成的背道而驰的集团之间的协调是短暂的，

我已说过，“邦联”的概念是一种没有力量的抽象观念。然而，这种联合的需要在通过宪法以前十年就已存在了。所谓存在这种需要，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的，即除非考虑了联合的需要，其它事务都谈不上。于是，每一殖民地的某些阶级就逐渐开始打破州的体验。他们个人的利益导致他们超越州的界线而有了州与州之间的感受，然后又逐渐地在他们的思想中建立起一个真正属于国家范围的美利坚客体这样的形象。对他们来说，联盟的思想就变成一种真正的信念，而不再是一个多种联合体。在这些中间，最富有想象力的人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恰巧他原先对任何一个州都没有依恋，因为他出生在西印度群岛，从他最初开始外交活动时，就曾与各州的共同利益有联系。在那时候，关于首都应该建立在弗吉尼亚州还是建在费拉德尔菲亚州的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最关重要的，因为他们的地方观念很重。对于汉密尔顿来说，这个问题不受感情的影响；他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承担国债，因为他们要根据联合的提议进一步组成国家。所以，他乐意地以首都的地点作为交换条件，从波多马克地区的人们那里得到两张必要的投票。对于汉密尔顿说，“团结”代表了他的利益和他的全部信念；对于来自波多马克的怀特和李来说，他们为他们的州所尽的责任就是争取最高度的政治统一，然而他们不愿为争取这种政治统一而付出代价。杰弗逊说，他们同意改变他们所投的票，“怀特的志趣的突变，几乎是使人前仰后合的。”<sup>①</sup>

在具体实现共同意愿中，总是见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起作用。

---

<sup>①</sup> 原著第4章，第87页，比尔德转引，见《杰弗逊民主经济的起源》，第172页。

## 第十四章 是或非

### 一

信念常常是那么有用处和那么具有神秘的力量，以致某个词本身会发出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在思索一些信念时，诱惑着你去看待它们就象它们具有独立的活力似的。信念一旦引起任何人入迷，就永远不会停止它的影响。博物馆和民间传说的书籍都充满了无生命的信念和符咒，因为这信念已没有力量，除非它与人的思想有联系。一些信念已失却它们的力量，一些信念连续不断地使人想起而没有能生根，这就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去具体地研究一种信念的循环，我们就应该注视完整的长期的历史。

在休斯的竞选演说中，在“十四点”中，在汉密尔顿的方案中，都使用了信念。但是，这些信念都是某个人在特定的时刻使用的。这些词本身并不具体化为感情。这些词必须由处于战略地位的人说出来，而且必须在适当的时刻说出来。不然的话，它们仅仅是空话。这些信念必须是有特征的。因为它们本身没有什么含意，选择信念的可能性总是那么大，我们就应该象一头驴站在等距离的两大捆干草之间那样，在一些争相吸引我们的信念之间不能有丝毫犹豫。

例如，在1920年刚要进行选举之前，某些不愿意透露自己姓名的公民向一个报社声明了下列他们选举的理由：

对于哈定：

“今天的有爱国热忱的先生们和女士们，谁投票选举哈定和柯立芝，谁就会坚持让子孙后代去签署我们的‘第二个独立宣言’。”

——发明家〈威尔莫特·××先生

“他将保证使美国不参加‘纠缠不清的联盟’。华盛顿作为一个城市，将会由民主党人控制政府改变为共和党人控制政府而得到益处。”

——售货员〈克拉伦斯·××先生

对于考克斯：

“美国人民认识到在法国的战场上我们保证过加入国际联盟。我们必须分担在全世界实现和平的重任。”

——速记员〈玛丽·××小姐

“如果我们拒绝加入国际联盟提供国际和平，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自尊和别国对我们的尊敬。”

——统计员〈斯潘塞·××先生

这两组词句同样高尚、同样真实而几乎是正反两面可以使用的。会不会克拉伦斯和威尔莫特曾一时承认他们想不履行我们在法国战场上保证过的责任，或者他们并不想要国际和平？当然不会。会不会玛丽和斯潘塞承认过他们曾喜欢纠葛的联盟；或者放弃美国的独立？他们会与你争论说国际联盟就是象威尔逊总统所说的一种纠葛的联盟；也是一种对全世界的独立宣言，加上这个地球的门罗主义。

## 二

由于提供的信念是那么丰富，能注入的含义是那么灵活，某一个特定的信念怎么样在某个特定的人的头脑中生根的呢？那是由另一个被我们认为有权威的人栽在人的头脑里的。如果这种信念被栽得很深，那么我们就会在后来称这个向我们示意那信念的人是权威的。但是，首先造成的一些信念是惬意的和重要的话，那是因为它们是惬意的人和重要的人传导给我们的。

因为我们并不是在18岁的时候带着现实的想象力从鸡蛋里生出来的，正象肖先生回忆的那样，我们仍然处在伯奇和卢宾的时

代，我们婴儿期的交往是依靠比我们年龄大的人的。所以，我们通过某些心爱的和权威的人士与外部世界进行接触。他们是通向看不见的世界的第一座桥梁。虽然我们将渐渐地通过我们自己来掌握更大的环境的许多方面，总仍有较大的一部分是不知道的。对于那一部分，我们还是通过权威人士来使我们自己了解它的。对于全部事实都超越我们视线的地方，一篇真实的报道和一篇似乎有理的错误报道，读着相似、听着相似、感觉也是相似的。除非对于少数问题我们自己有大量的知识，不然我们是不能够在真实的报道和虚假的报道之间作出选择的。所以，我们就只能在可信赖的记者或者不可信赖的记者之间进行选择<sup>①</sup>。

从理论上说，我们应该对每一个问题都选择最好的专家。选择专家虽比选择真理要容易得多，但仍然是非常困难而且常常行不通的。专家们自己也丝毫不清楚在他们中间谁是最好的专家。在这点上，即使我们能够识别出来的专家，他也可能会因太忙而不能接受咨询，或者根本不可能找到他。但是，对于有一些人，我们很容易识别，因为他们是一些事务的头头。家长、教师和名家的朋友都是我们首先遇到的这类人物。我们不需要去研讨为什么儿童们信任一个家长而不信任另一个，信任历史教师而不信任主日学校<sup>②</sup>的教师之类的困难问题。也不需要去研讨怎么样通过一张报纸或者一个对公众事务感兴趣的熟人渐渐地信任一些社会名流。心理分析学的文献中，启发性的假设是很丰富的。

无论如何，我们确实发现我们自己信任某些人物，这些人物制定了我们与几乎全不知道的事务之间的联结方法。很奇怪，这种人的面目有时是被看作生来就不威严的，就象类似绵羊、类人猿般本性的形迹。但是，在这个世界里，完全的独立简直是不可

---

① 参看一本有趣而相当离奇的旧书，乔治·康沃尔·刘易斯：《论权威在一些问题的意见中的影响》。

② 教堂办的星期日学校。

想象的事。如果我们不能够把几乎每一件事都看作是当然的话，我们就将把我们的一生消磨在纯属琐事上。最近似乎有完全独立的成年人，就是一个隐士，而一个隐士的行动范围是很小的。他的行动全部为了自己，他只能为了简单的目的在一个小范围内行动。假如他有时间去思考伟大的思想，我们可以肯定在他去当隐士以前，毫无问题地他已尽力获得了一大堆知识：关于怎么保暖、怎么不致挨饿，以及关于什么是重大的问题。

总的说，除了我们生活中短期的极少问题以外，我们能行使的最大的独立自主就是增多权威的数量，友好地倾听他们的见解。我们作为志趣相投的非专业人员，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就得打扰专家，强求他们回答任何有说服力的异端邪说。在这种争论中，我们常常能够判断谁已获得辩证的胜利，但是，我们实际上无法反对一种不正确的前提，这种前提还没有被争论者提出过异议，或者它是一种还没有被人提出争论的被忽视的方面。我们能看到后来民主理论怎么提出了相反的假设，设想了政府的意图就是对一种自给自足的个人的无限补充。

我们接触客观世界所依靠的人就是那些被看作是管理世界的人<sup>①</sup>。他们可能只管理很小一部分世界。护士喂养孩子，给孩子洗澡，让他上床睡觉。那并不能使这护士成为物理学和动物学的权威和较高级的评论家。史密斯先生经营一个工厂，或者至少是雇人经营一个工厂，那并不能使他成为美国宪法的权威，也不能使他成为福特尼税率效果的权威。斯穆特先生领导犹他州的共和党，这本身并不证明他是征询税制最好的对象。但是，那护士可能仍然在考虑这孩子在一段时间里要学什么动物学，史密斯先生在考虑宪法对于他的妻子、他的秘书甚至他的教区牧师意味着什么，以及谁将限定参议员斯穆特的权威的范围等问题上有许多话要说。

---

① 参看布赖斯（Bryce）：《现代民主政体》第2章，第544—545页。

牧师、庄园的领主、一些舰长和皇帝、一些政党的领袖、商人、老板、不管这些人是根据出生、继承权、掠夺或者选举等等还是根据什么挑选出来的，他们以及他们有组织的部属管理着人类的事务。他们都是官员，虽然同一个人可能在国内是陆军将军，在机关里是中尉，以及在政治上是地位低微的人，虽然在许多机构中等级制度的排列是模糊的或隐蔽的，然而在每一个机构中需要许多人合作，这样的一些等级制度是存在的。<sup>①</sup>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我们把它称为一种机构，或者“组织”。

### 三

在机构的成员与普通职员之间有一些重要的区别。领导人们、筹划委员会和核心集团，都是与他们的周围环境有直接接触的。固然，他们应把周围环境解释为什么，他们可能有一种很有限的概念，但是，他们涉及的几乎完全不是抽象的概念。他们希望某些人能够当选，他们希望某些资产负债表能得到改进，一些具体的目的必须达到。我并不意味他们逃避人类爱好直至形成成见的看法。他们的而定成见常常使他们成为墨守成规的人。但是，不管他们的局限是什么，这些头目都与那较大的环境的一些关键部分有实际的接触，他们作出决定，他们发号司令，他们进行交易。可以肯定的是，实际发生的，可能根本不是他们所想象的。

他们的部属并不是通过一种共同的信念与他们拴在一起的。那就是说，一个机构的少数成员根据他们对领导人的智慧的独立判断，并不表示他们的忠诚。在等级制度中，每一个人都从属于一个上级，反过来，又优越于他部下的某个等级。使机构结合在一起的是特权制度，这些特权可能因机会不同和追求者的趣味不

---

<sup>①</sup> 参看M·奥斯特罗戈斯基：《民主与政党组织》、R·米歇尔斯：《政党》以及布赖斯：《现代民主政体》特别是125章；还有罗斯：《社会学原理》第22章、第24章。



同而各不相同，它们产生于他们部属的各方面的亲属关系和恩惠、英雄崇拜，或者一种固定的思想。由于军队中军衔、封建制度中的土地和服役、现代民主政治中的职业和名声等不同，这些特权也不相同。那就是为什么你能通过取消特权来打破某个机构。但是，我认为在每一个前后一致的集团中，这种机构肯定会再出现的。因为特权完全是相对的，一律是不可能的。设想你所想象的最专制的共产主义，那里没有一个人拥有任何别人所没有的物品，仍然，如果共产党集团必须采纳任何行动的话，我肯定，一个人要发表演说以争取多数选票而有人乐意作他的朋友，仅仅这种乐意就足以在他周围结成一个内部人的组织。

那么，没有必要去创造一种集体的智慧才能解释为什么集体的判断比普通人的评论通常更加一致，并且常常更加正确地形成。一个头脑和少数几个头脑能探求一系列的思想，但是一群人要试图想得一致，就几乎只能表示同意或异议。一个统治集团的成员能够有一个共同的传统。就象学徒从师傅那里学习贸易一样，反过来，当师傅是学徒时也是这样学的。在任何长期稳定的社会里，统治集团内部人事的更动是慢得足以传递某些重大的固定成见和行为模式的。从父亲到儿子，从高级教士到见习修道士，从老兵到军校学员，某些作法和看法都是教给的。这些看法和作法都变得熟悉起来，并为大量局外人所认识。

## 四

仅仅距离问题就使人们对下述看法产生迷惑：如果，没有少数几个人管理的中央机构的话，大量的人们在任何复杂的事务中如何合作的。布赖斯<sup>①</sup>说：“没有人能够取得几年领导立法事务或者领导一个政府的经验而不先观察极少数的人是怎样管理世界

---

<sup>①</sup> 布赖斯：《现代民主政体》第2章，第542页。

的。”当然，他谈的是国家事务。固然，如果你认为这些人统治的是所有人类的事务的话，那是值得考虑的，但是，如果你指的是任何特定的机构，诸如一个立法机关、一个政党、一个工会、一个民族主义运动、一个工厂或者一个俱乐部，他所统治的这些机构的人数只占在理论上假定他要统治的人数的很小的百分数。

山崩能够破坏一个机构，建立另一个机构；革命有时则完全废除某个机构。民主革命建立了两个交替的机构，在几年的进程中，各自从对方的错误中受到益处。但是，这种机构任何地方都存在，这种生动逼真的民主理论却任何地方都没有实现，社会主义政党中没有实现，共产党政府中也没有实现。在同心圈子包围之下，有一个核心集团，它在漠不关心和不感兴趣的老百姓中影响逐渐减弱。

民主主义者从来没有向这种陈腐的集团生活让步过。他们总是认为它是违反常情的。因为对民主的想象有两种：一种预先假定个人是自给自足的；另一种则认为有一种“超灵”控制着每一件事。这两者中，“超灵”有一些优点，因为它至少承认群众作出的一些决定并不是自发地产生于每个成员的胸怀之中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政府机构的话，“超灵”作为指挥共同行为的天才就成了一种不必要的秘密。政府机构是一种十分平凡的现实。它由一些人组成，这些人都穿着衣服和住在屋子里，是能够被人称呼和描述的，他们履行所有的职责，这些职责通常都是由“超灵”指定的。

## 五

这种政府机构的理智并不是违反人性的。从任何一些个别的想法本身是不能产生出共同的理想的。因为一大群人在超出他们影响的情况下所能直接发挥作用的办法是有限的。他们中间的有些人能够移居，他们采取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能够罢工或者联

合抵制，他们能够鼓掌表示欢迎或者用嘘声表示反对。他们能够通过这些手段偶尔抵制他们不喜欢的事，或者强制那些阻挡他们意愿的人。但是，通过群众的行动，什么东西也不能够得到创立、得到设计、达成协议或者得到实施。象这样的公众，没有一个组织起来的统治集团得以聚集在其周围的话，就只能是：物价太高时，就拒绝购买，或者工资太低时，就拒绝工作。一个工会组织通过群众的一次罢工行动而爆发一种反抗，从而工会的官员就能够商订一个协议。例如，可能赢得参加管理的权利。但是，不通过一种组织它是不能行使这种权利的。一个国家能够叫喊要求战争，但是，当进行战争时，它本身又必须服从一个总参谋部的命令。

实际上，直接行动的界限就是权威在群众所面临的一个问题上说“是或非”。<sup>①</sup>因为只有在十分简单的情况下，一个问题才自发地以及在近乎相同的时间以相间的方式表现出来。有一些没有组织的罢工和抵制行动，不仅仅是工业的罢工行动，那里不满情绪是那么明显，因而没有领导，在许多人中间也出现了相同的反应。即使在这些发展不完全的情况中，也会有一些人比其它人更快地懂得他们应该作什么，因而他们就成了临时的头目。如果那里不出现这样的人的话，一群人就会无目的地打转，被所有他们的个人目的所困扰，或者听天由命地站在一边，就象不久前某天，约有50个人围观一个人自杀那样。

因为我们从看不到的世界得出的多数印象是一种幻想中显现出来的表意动作。我们要对于超出我们视域的一些事件有意识地作出任何决定，是不太可能的。如果他想尝试，那么每一个人能够得出的意见也是很少的。很少有一个实际问题，所以也惯于不

---

<sup>①</sup> 参看詹姆斯：《哲学的一些问题》第227页。“但是，对于多数我们的突然事件来说，部分的解决办法是不可能的。我们很少能部分地行动。”  
参看洛厄尔：《舆论和得人心的政府》第91、92页。

作决定。多数消息传给我们时，若不是随若它带来一种暗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去认识这新闻的话，那么情况就不会较明显。我们是需要那种暗示的，如果我们在新闻中找不到它，我们就会转向一些评论，或者转向一个我们所信任的顾问。如果我们感到我们自己受到了影响，那么在我们知道我们处于什么地位以前，这种幻觉都是不自在的，那就是，直到事实已经系统地阐述了，我们才能认清它们的“是与非”。

当一些人都说“是”的时候，他们可能有各种理由这么说的，他们通常是这样的。因为正象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他们大脑中的形象是以微妙的和明白表示的方式变化多端的。但是，这种微妙保持在头脑里面；它公开地变成为被一些象征性的用词所代表，这些象征性的用词在抽去大部分意图以后，就带有个人的感情。如果两个统治集团发生一场争夺，那么统治集团就把这些信念与一种确切的行动、一次是与非的表决、一种赞成与反对的态度联系起来。于是，史密斯是反对国际联盟的，琼斯是反对第十条条款的，布朗是反对威尔逊先生和所有他的作品的，每个人都为了他自由的理由，都以多多少少同样象征性用语；登记投票选举共和党人，用以反对民主党人。一种共同的意愿就表示出来了。

必须表示一种具体的选择，通过一些信念转移了兴趣，这种选择就一定与个人的意见相联系。关于这一点，专业的政治家们远比民主主义的哲学家们更早懂得。所以，他们组织了美国政党选举候选人或者是决定政策的秘密会议、提名大会、筹划指导委员会等作为形成一种明确选择的手段。每一个需要有大量的人合作去完成任何事情的人都以他们为榜样。有时候做得很蛮横，就象“和平会议”将自身降为“十人委员会”，“十人委员会”又降为“三巨头”或“四巨头”会议，制订出一个条约，允许少数协约国、他们自己的成员以及敌人对这个条约表示接受或者放弃。本来，更多的磋商一般是可能的和合乎需要的，但是，基本的事

实仍然是少数头头向大多数人提供一种选择。

## 六

滥用筹划指导委员会导致了各种提议，例如，创始权、复决权和直接选举权。但是，这些提议拖延了或者模糊了需要使选举复杂化的机构，或者象H·G·威尔斯有一次以严格的准确度说过的“选择”。因为选票的数量并不能够排除会产生一个争论点，不管这争论点是关于一种方法或者是一个候选人，选举者们只能在选票上填写“是”或“非”。其实，并不存在象“直接立法”这种东西。假定存在的话，又会发生什么呢？公民到投票处去，接受一张选票，充其量他也只能填写“是”或“非”。他可能想到世界上最辉煌的修正案，他也只能在表格上填“是”或“非”，不能填别的。你反对英语称作的“立法”就必定犯罪。当然，不论你把这过程叫作什么，我并不争辩说没有益处。我想对于某些种类的问题是有明显的益处的。但是，考虑到实施那些决定的世界的不可避免的复杂性，有必要简化任何群众的决定，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事实。我认为，任何人所能提议的最复杂的选举方式就是选择选举制的选票。在那种制度下，选举人从一些提供的候选人中，不是对某一个候选人填“是”；对所有别的候选人填“非”，而是写明他挑选的次序。即使这样，虽然它有较大的灵活性，群众的行动还有赖于所提供选择的质量<sup>①</sup>。这些选择是由有力量的排外小圈子提供的，这个小圈子的人给予压力并且包围代表们。“少数”提名以后，“多数”能够选举。

---

<sup>①</sup> 参看H.J.拉斯基(Laski)：《统治权的基础》第224页。“……比例代表制……通过领导，看上去是领导的，对于集团制度……可能剥夺选举者选择领导人”。拉斯基先生说，集团制度无疑倾向于更间接地挑选政府人选，但是，它无疑有助于产生更充分代表意见的趋势的立法会议。它是好是坏不能事先加以肯定。但是，能够说的是，一个合作得更好和负责的更准确的代表制议会比一个严格的两党制议院更需要一个较高的政治情报组织和政治特性，它是一个更复杂的政治形式，因此，可能工作进行得差一点。

## 第十五章 领袖与普通群众

### —

有成就的领袖，由于他们超乎寻常的实际重要性，从来都不会不树立一些信念，用来组织其追随者。统治集团内部的特权有什么作用，信念就对普通群众起什么作用。这些信念维护了统一。从图腾柱到国旗，从木质的偶像到无形的帝王——上帝，从有魔力的词到亚当·斯密或边沁的某种普及版本，一些信念受到领袖们的珍爱，他们中的许多人本身是怀疑论者，只是因为它们是一些分歧结合的焦点。超然的观察家或许藐视“星条旗”的仪式，认为这种仪式妨碍了信念，而那位国王对自己说，得到了巴黎，做几次弥撒也是值得的。<sup>①</sup>但是，领袖通过经验懂得，只有当信念发挥了它们的作用时，他才能用它们去调动一群百姓。信念中的感情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发泄，真实思想的特性就抹掉了。难怪他憎恨他所谓的破坏性批评，有时一些自由人士呼吁要消除废话空话。巴吉特（Bagehot）说：“首先，我们的忠诚是应该受到尊敬的，如果你开始轻率地指摘它的话，你就不可能尊敬它。”<sup>②</sup>因为以清晰的定义和坦率的陈述进行指摘，可以服务于所有人类所知道的高尚意图，却不能从容地保留一种共同的意志。就象每一个负责任的领袖所怀疑的那样，轻率的指摘会破坏从个人意见到社会化的信念的这种情感的转换。正象他所说的，那样作的第一个结果就是造成一种个人主义的混乱和敌对的派系。象“神圣的俄罗斯”或者“铁迪亚期”一样，信念的瓦解总是长期动乱的开始。

---

① 指法王亨利四世，他原信新教，讨厌天主教的弥撒，后改信天主教——译注

② 《英国宪法》第127页，D.阿普尔顿公司1914年出版。

这些伟大的信念是通过传递对一个古老的和有固定成见的社会的全部细致而具体的忠诚来取得的。它们唤起了每个人对于某种景色、某种家俱和某些面貌的感情，这些记忆都是他最初得到的，也是他在一个固定的社会得到的，是他仅仅知道的现实。那些形象和忠诚的核心是国家观念，没有这种核心的话，他对自己都难以置信。一些伟大的信念都包含着这些忠诚，不需要追忆那些原始的形象就能够唤起这些信念。公开讨论信念较少，随意唠叨政治较多，如果可能联系到原始的信念的话，都总是认为其根源在这些原始的信念。一个市办的地下铁道列车的票价问题象征了“人民”与“利益集团之间的问题，然而“人民”又是附着在“美国”这个信念之中的，所以，最后在一次激烈的竞选运动中，八分钱的票价就变成不合美国国情的问题了。

由于信念有力量从独特的思想中吸吮感情，它既是一种团结的手段，也是利用的手段。它使人民能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工作，正因为少数人处于战略的地位，必须选择具体的目标，信念也就成了一种工具，使极少数人能够用它指使许多人，使批评转向，并且吸引人们对于他们并不理解的事物迸发感情。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个性是现实主义的、自信的和自制的，那么，从许多方面说我们服从信念并不是出自奉承。然而，不可能断定“信念”全都是邪恶的工具。在科学领域和意图中，它们本身无疑是调合物。但是，在行动的领域，它们可能是有益的，有时也是必要的。必要性往往是想象的，危险则是制造的。但是，迫切需要很快见效时，通过一些信念来操纵群众或许就是解决紧迫问题的唯一最快的办法。行动常常是比理解更为重要。往往也会有这样的事，如果每个人都知道了，事情反而会导致失败。有许多事情不能等待公民投票，或者不容许公开宣传。有些境况，例如战争时期，一个国家、一个军队、甚至其指挥官必须只让很少几个人知道战略。当有两种意见冲突时，虽然会有一种意见是正确的，但是，发生冲突比有一种错误意见更危险。尽管错

误的意见可能产生坏的效果，但两种意见则可能因毁坏团结而留下灾祸<sup>①</sup>。

因而福煦和亨利·威尔逊爵士预见到高夫军队眼前的灾难是被分隔和预备军分散造成的后果，然而他们懂得在一个小范围内很好地保持一致的意见，即使冒一次惨重失败的风险，也自然比在报纸上进行一场激动的辩论危害较少。因为在1918年3月出现的那种紧张气氛下，最关紧要的不是某次移动的正当与否，而是继续不断地期望统帅的消息。如果福煦“到人民中去过”，他一定会赢得那场辩论的胜利，但是，远在他赢得辩论胜利以前，他统帅的军队早就被毁了。因为奥林匹斯山上骚动的场面就是转移和毁灭。

但是，同样还有一种无声的阴谋，赖特上尉说：“在最高统帅部而不是在前线部队，多数都要欺骗的花招，而且达到了顶点。所有的领袖人物在各地都被无数忙碌的宣传员不断地画着像，远看上去，画得简直会被误认成拿破仑。……由于隐瞒或掩饰这些‘拿破仑’的失败，夸大或捏造他们的成就，不管他们多么不够格，都几乎不可能被置换。……但是，对于这些将军本人进行高度的造假，形成了最危险和最坏的印象：他们是最谦虚的和最爱国的，让绝大多数人必须接受和追随这种崇高的军事职业，最后他们本人也受到这些万能的假象的影响，每天早晨读着报纸上的这些材料，他们越来越自信，他们都是战争的风云人物，是没有错误的，不论他们有多大的过错，保持他们的统帅地位是一种那么神圣的目的，因而不惜用任何手段为之辩护。……这种种情况中，采取极大的欺骗行为是至关重要的，最后，使所有总参谋部的人员都摆脱了一切控制。他们不再是为某个国家而生存，而是某个国家为他们生存或者灭亡。胜利或者失败都不再是最主要

---

<sup>①</sup> “最高军事委员会”助理秘书长彼得·赖特上尉虽对协约国领袖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他的著作《在最高军事委员会》中关于指挥的秘密和统一问题还是值得细读的。



的利益。对于这些半主权的组合来说，究竟是亲爱的老威利还是可怜的老亨利将要成为他们的头头，或者是香蒂利一伙胜过波利伐残废人一伙，那是紧要的事。”<sup>①</sup>

然而，尽管赖特上尉对沉默的危险能够富有那么的雄辩和那么的洞察力，也仍然不得不赞成福煦保持沉默而不公开破除假象。正象我们将在以后更充分地看到的，这里正出现一种复杂化了的怪论，因为已经设想出来的传统的民主生活的观点，不是对付紧急情况 and 危险，而是为了安宁和融洽。因而，人民群众必须在一种变化无常的和战争爆发的环境中进行合作，通常不经过实际的同意就维持团结和灵活性。信念就是起这样的作用。它模糊个人的意图，中和偏见，冲淡个别的企图。它使个性固定，而同时加强了集体的意旨，并使这个集体紧密团结去进行有目的的活动，没有任何别的力量能够在危机中起到这种作用。虽然它使个性固定化，它又使得群众有所活动。信念就是这样一种工具，通过它使群众在短期内越出他自己的惰性，优柔寡断的惰性，或者轻率行动的惰性，使他们能够沿着情况复杂的弯曲道路走过来。

## 二

但是，在较长的时期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交换意见增多了。在普通老百姓评述他们领袖的心理状态时最常用的词就是道义。当各别的人竭力去作分配给他们的那部分工作时，当各人的全部力量都被上级命令调动起来时，那就是说很好。因此，每一个领袖必须在头脑里以此部署他的政策。他不仅根据“价值”来考虑他的决定，而且要考虑这种决定在他的任何一部分追随者中的影响，他需要这些追随者们的支持。如果他是一位将军正在部署一次进攻，他懂得若是伤亡的百分率上升得太高时，他编组

---

<sup>①</sup> 《最高军事委员会》第98页，第101—105页。

的军队就会溃散成乌合之众。

在大战中，先前的统计数字已使人心烦意乱到非凡的程度，因为“到法国去的每9个人中就有5人伤亡。”<sup>①</sup> 疲劳的极限远比任何人想象的大得多。但是，有一个限度问题。因为一方面对敌人会产生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因为对部队和他们的家属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哪个统帅部敢于刊印一个关于他们伤亡的坦率声明，法国从来没有刊印过伤亡人员的名单，英国、美国和德国刊印的大战役的伤亡人数曾长时期地传播开来，为的是消除伤亡总数所造成的统一印象。只有知内情的人很久以后才知道桑姆伤亡了多少，或者弗兰德斯战役伤亡了多少；<sup>②</sup> 鲁登道夫<sup>③</sup>无疑地远比在伦敦、巴黎或芝加哥的任何个人都有更准确的概念。各兵营所有的领导人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来限制实际战役的数量，这些战役都是任何士兵或者老百姓能够逼真地想象出来的。当然，象1917年法国军队那样老的退伍军人中间所知道的战争情况比公众所知道的要多得多。这样，一支军队就开始根据它自身损失的大小来衡量它的司令官。因而，当一个非常有指望的胜利变成惨败的结果时，你就可发现在某个相对次要的错误上会爆发一场兵变<sup>④</sup>，就象1917年的尼韦莱的进攻是由于积累起来的错误导致的。一般在连续发生一大串小的错误以后，就会爆发革命和反叛<sup>⑤</sup>。

政策所发生的影响程度决定了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他的计划中需要的那些人离开采取行动的地方很远，如果效

---

① 《最高军事委员会》，第37页，数字由赖特取自陆军部档案馆中战争的统计摘要。数字明显地是单独指英国的损失，也可能指英国和法国的。

② 同上书，第34页。桑姆死伤近500,000人，1917年阿拉斯和弗兰德斯进攻中英国死伤人数为650,000。

③ 战时德国的将军。

④ 协约国遭受许多比在达姆洛更惨重的失败。

⑤ 参看皮尔富的报道，出处同上，关于索埃生斯兵变的原因和贝当讨论它们所采用的方法。第1卷，第三部分以及下述。

果是隐蔽的或延缓发生，如果个人的义务是间接的或者没有尽到，最重要的，如果赞同就是体现某种愉快的感情，这领袖似乎就可以自由行事，那些马上就能取得人心的计划，如在绝对禁酒的人中间禁止制酒，这种计划并不立刻冲击追随者们的个人习惯，那就是为什么政府在外交事务上有放手处理问题的权力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两个国家之间大多数冲突，包括一系列含糊的和冗长的争斗，偶而发生在国境边界上，但更经常发生在学校的地理课没有提供明确的概念的地区。捷克斯洛伐克把美国看作是“解放者，”但在美国报纸的短评和音乐喜剧中，或在美国人的谈话中，总的说，从来还没有弄清楚我们所解放的国家到底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是南斯拉夫？

在外交事务中，政策在哪里产生了影响，很长时间都是见不到的。没有发生什么实际能察觉的事。因而，在美国南北战争以前的时期，由于不需要什么人当兵，不需要什么人纳税，政府根据其见识行事，与人民没有多大关系。在地方事务中，政策的代价是容易见得到的。所以，几乎是最例外的领导人才喜欢采用尽可能是间接代价的政策，他们并不喜欢直接税制，他们不喜欢为实施政策而付出代价，他们喜欢长期债务。他们希望选民们相信外国人会付代价的。他们总是宁愿从生产者方面而不是从消费者方面去计算繁荣，因为落到消费者身上就会分布到许多很琐细的项目上。劳工领袖总是愿意增加工资，降低物价。人们对于百万富翁的利润比对于工业制度中的浪费总是更普遍地感兴趣，因为前者是看得见的，然而相对地说是不重要的，后者则是大量的，然而却是难以捉摸的。一个立法机关在处理住房的短缺问题（当我写这本书时，这样的问题是存在的）时，阐明了这样的规定，首先，对于增加住房的数量不作努力，其次，加重打击贪婪的地主；第三，调查牟取暴利的建造业者和工人们。因为一项建设性的政策涉及的是遥远的和不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而一个贪婪的地主或者一个牟取暴利的铅管建筑工人则是看得见的和能直接觉察

到的。

但是，尽管人们会毫无疑问地相信某项政策将在意料不到的未来和未被看到的地方有益于他们，而实际上政策是根据与他们意见不同的逻辑制订出来的。一个国家可能会认为提高运费就能使铁路繁荣起来。但是，如果那些运费价格影响到农民和托运人，因而他们把商品的价格抬高到消费者买不起的地步的话，那么，提高运费就不会促使铁路繁荣。消费者会不会付这价钱并不决定于几个月前提出涨价和挽救商业的建议时他曾点过头，而决定于他现在是否能够凑足钱去买一辆新的汽车的问题。

### 三

领袖们常常自以为他们只不过是揭示了存在于公众头脑中的方案。当他们这么认为时，通常只是欺骗自己。方案并不同时产生在一批人的头脑中，这并不是因为许多人的头脑一定次于领导人的头脑，而是因为思想是一种有机体的功能，而一批群众并不是一个有机体。

因为群众不断地受到暗示的影响，所以，对于事实却是模糊的。新闻读上去不是一般的新闻，而是含有一种暗示气味的新闻，暗示你采取某种行动。听上去是报道，可是并不象事实那样客观，而是已经带有某种行为模式的成见。因此，名义上的领导人常常发现真正的领导者是一张强有力的报纸的老板。但是，我认为如果象在实验室里那样，一个人能够从大量的经验中把所有的暗示和领导撇开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样的情况：一群人受到同样的刺激，会产生在理论上被称为多角形错误的反应。就会有一些反应被认为十分相象而足以归纳在一起。两个极端会有各种感觉的变形，当每一类别中的个人反应都用语言表达出来时，这些分类就会趋于固定化。那就是说，当那些模糊地感觉到的含糊不消的感情已用文字表达出来时，他们就会更明确地知道他们感觉

到的是什麼，然後就會更明確地感覺到它。

接觸到民眾感情的領導人們都會很快地意識到這些反應。他們知道高物價正沉重地壓在民眾身上，或者知道某些階級的人正變得不受歡迎，或者知道哪種感情對另一個國家是友好的或是敵對的。但是，某種領導人員的建議只是新聞記者的設想，如果總是阻止這種建議產生影響的話，群眾就會在選擇何項政策時感到無所適從。群眾的感情要求的就是，政策的發展和披露如不是合乎邏輯，那麼就是類推地和聯想地与原始的感情相聯系的。

所以，當一項新的政策將要推行時，要預先得知公眾的感情，正象馬克·安東尼對於布魯特斯的追隨者的演說<sup>①</sup>。在開始的階段，領袖說出了群眾的普遍意見。他有時通過講一個好的報道，有時通過表白他的愛國精神，經常是通過訴苦，使他自己與他熟悉的聽眾的態度相一致。群眾反反覆復琢磨，發現他值得信任，就轉過來接近他。然後，就會期望他闡明一項競選計劃。但是，他不會發覺那項計劃在口號上傳達了群眾的感情，甚至不會總是通過口號來表明。若是政策的影響落在遠處，那麼，很重要的就是這項計劃從開始就要在字句上和感情上都與群眾所談論的相聯系。處於親近地位的受信任的人們不需要說明他們計劃的實質，就憑他們自己的積極性就能長時期贊成一些公認的信念。

但是，聰明的領袖們是不滿意那樣作的，假如他們認為宣傳上不過分反對，爭論不會延誤行動太久的話，他們就會尋求幾分贊同。如果他們不是把全部群眾當作知心朋友的話，至少也是把統治集團的部屬充分地作為知心人以便他們可能發生什麼事，使他們感覺到他們已經自願地下決心要這種結果。但是，不管領袖們會是多么真誠，當事實非常複雜時，在這些磋商中總會有一定量的幻想的。因為所有的公眾不可能象比較有經驗和更富有想象力的公眾那樣，對於一切意外的事都同樣清楚。有相當比例的人必然

---

① 見馬丁：《群眾的行動》中所作的卓越的分析，第130—132頁。

会立刻同意，或者不需要了解背景就赏识领导人提供给他们选择。无论如何，没有谁会有更多的要求。只有理论家们会这样作。如果有法庭上的经验，如果我们必须说出我们听到的，然后，如果这样作的结果是好的话，那么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并不会迟疑到底有多少我们的意见是影响到了正在进行中的事的。

所以，如果建立起来的政权是敏感的和消息灵通的，如果看得出来他们是在试图满足公众的感情，并且实际上在消除一些不满意的因素，不管他们进行得多么慢，只要看得出他们是在这样作，他们就不怎么担忧。只有发生惊人的和连续的大错误，再加上几乎总是不机智，才会爆发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宫廷革命和各部门之间的革命则是另外一回事。蛊惑民心的宣传也是同样。通过表达感情来缓和这种紧张关系的话，革命和煽动就停止了。但是，政治家懂得这种缓和是暂时的，如果经常满足于这些，是不健康的。所以，一项计划所涉及的事与某种感情有关的话，他就注意不激起那种感情，并且不能够把那种感情倾注到这计划中去。

但是，所有的领袖都不是政治家，所有的领袖都不喜欢辞职，而且，多数领袖难于相信情况是那么坏，也很难相信别人不会搞得更糟。他们并不消极地等待公众去试探政策的影响所在，因为这情况已存在于他们的头脑之中。所以，他们断断续续地忙于争取政治上的支持和巩固他们的地位。

争取政治上的支持包括：提供一名偶而的替罪羊，平息影响到有权力的个人或派别的一个较小的怨气，重新安排某些职务，安抚一些想要在家乡建立一个兵工厂或者想要制订一项法律来阻止某人不道德行为的人。研究任何一个依靠选举而成为公众官员的日常活动，你就能够扩大这里所列举的内容。有一些年复一年地当选的众议员，从来不想把他们的精力花费在公众事务上。他们宁可为许多人在许多小问题上作极少的事，而不是在空白点上争取作出很大的贡献。但是，任何机构能卓有成效地为之服务的人

数是有限度的，精明的政治家们或是把注意力放在有影响的人身上，或是只注意到那些吵吵嚷嚷地没有影响的人身上，对他来说，给予注意力，就是一种极为高尚的行为的标志。极大多数人不能够被支持者们控制，没有个性特征的群众则受宣传的影响。

为任何组织确认的领袖们都自然有很大的有利条件。人们认为他们有较多的消息来源，他们的办公室里有很多书籍和报纸，他们参加重要的会议，他们认识重要的人物，他们负有责任，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比较容易得到人们的注意，也比较容易以令人信服的语调说话，而且他们也通过很多控制的办法来获得事实。每一个官员都有一定程度的检查权，不论是采取隐瞒消息的办法还是忽略一些消息的办法，他都是根据他希望公众知道些什么来查禁消息的。所以，就某种意义来说，每一个领导人都是一个宣传家。处于策略的地位，常常不得不在同样具有说服力而对制度的安全有抵触的思想与坦率地对待公众这二者之间选择最好的，只有这样的官员才能发现他自己越来越有意识地注意在什么背景下，以什么作为伪装来决定他允许公众知道什么事实。

## 四

我认为，没有人会否认经过很好的精心安排是能够得出一致意见的。产生舆论的过程当然和这里所写的情况一样复杂，凡是很清楚地了解这种过程的人，都有操纵它的机会。

取得人们的赞同，并不是一种新的策略，它已是一种很老的手段，曾有人认为在民主政治出现以后它已不复存在。但是，它并没有消失。实际上，它在技巧上已大大地改进了，因为现在是以分析为基础，而不是单凭经验办事。所以，采用心理学研究的结果，结合运用现代传播工具，民主政治的实践已经有了转机。正在进行一场比转移任何经济权力重要得多的革命。

在现在一代人的生活中，说服已经成为控制事务的一种自觉

的艺术，也是受欢迎的政府常用的一种手段。我们之中，没有人着手去了解其后果，但是，可以预言，懂得怎么得到人们的赞同，就会改换一切政治打算和修改一切政治前提。在宣传的影响下，我们思想中的旧的常数已经变成了变数，宣传这个词本身的含义不一定就是坏的。例如，人们已不再可能相信民主政治的原有教条；管理人类事务所需要的知识已从人类内心自然地产生。我们按照那种理论去行动的话，便会使我们遭受自欺，并且接受种种我们无法核实的劝说。事实已经证明，如果我们对付的是我们不能直接接触到的世界的话，那么我们不能够信赖直觉、良心、或者对意外事件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意见。



## 第六部分 民主政体的偶象

### 第十六章 自我中心的人

#### 一

由于“舆论”应该是民主政体中的原动力，人们就有理由期望找到大量有关的文献资料，可是，人们却找不到这种文献资料。有许多论述政府和政党的极好的书，那是在论述政府机构时从理论上记载了已经形成的舆论。但是，关于产生这些舆论的来源和形成这些舆论的过程的材料却比较少。而存在着“舆论”这样一种力量则是基本肯定的。美国的许多研究政治的作家最感兴趣的是：或者弄清楚怎么样使政府表达共同的意愿，或者怎么样防止共同的意愿破坏政府所具有的意图。按照他们的传统，他们曾希望或者是制服舆论，或者是听从舆论。因此，一系列著名的教科书的编者写道：“政府最为困难和最为重要的问题是怎么把个人意见所具有的力量传导到公众的行动中去。”<sup>①</sup>

但是，确实还有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证实我们个人对政治形势的看法。正象我将更进一步指出来的，通过发展的原理，已展示了根本改进的前景。但是，这种发展将取决于我们怎么很好地运用综合意见的学识，并密切注视我们自己的意见是怎么被综合起来的。因为作为局部接触、传统和个人兴趣等引起的临时意见，理所当然地不能采用以真实记录、衡量、分析和比较为基础的政治思想的方法。正是最初的实际意见阻挠了一些心理

---

① 艾伯特·布什内尔·哈特为A·劳伦斯·洛厄尔著的《舆论与民众的政府》所写的绪言。

素质，而这些心理素质将决定什么是有兴趣的、重要的、熟悉的、个人的和戏剧性的。所以，除非在那个普遍确信偏见和直觉都不充分的社会里，要弄清楚实际意见，就需要时间、金钱、人力、有意识的努力、耐心和镇定，不然，就会得不到足够的支持。自我批评的增加，那种确信也就随着增长，使我们能神志清醒地对待欺骗选民的演说，使我们蔑视它，并且警惕地觉察到它。当我们阅读、讲话和决定的时候，没有一种分析意见的经常习惯的话，我们的大多数人就几乎不会觉得需要更好的意见，当更好的意见出现时，既不会对它们感兴趣，也不能够防止被政治情报的新技巧所操纵。

然而，假如我们判断的是最老的和最强大的民主政体，这些民主政体已从舆论中得出了一种神秘的力量，曾经有一些熟练的意见组织者，他们很懂得这种神秘。因而能够在选举的日子里获得多数选票。但是，政治科学家曾把这些组织者看成是低微的人或者看成是“令人困惑的人”，而并不把他们看成是最有实际知识懂得怎么制造和运用舆论的人。当民主政治还没有被付诸实践的时候，人们就已经表达了民主政治的思想；一些学生、雄辩家、编辑看待舆论就象别的社会的人们看待神奇的力量那样，它们归结为指导事件的定论。

因为几乎在每一种政治理论中，总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因素在这种理论的全盛时期没有得到检验。在其外貌背后隐藏着一种“天数”，有一些“卫护精神”或“上帝特选子民的委托”、一种“神授的民主政体”、“天国的副总督”或者“出身较好的阶级”。比较明显的天使、神灵和皇帝都已从民主思想中消失了，但是，必须相信还保存着一些指导的力量。坚信设计出民主政体模型的十八世纪的那些思想家。他们有一个苍白无力的上帝；却没有温暖的心地，他们在流行的主权学说中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答案，即新的社会秩序的一种确实可靠的起源。曾经有过神秘的力量，但是，只有人民的敌人用不圣洁和好奇的手触及过它。

## 二

他们并没有除掉面纱，因为在一场剧烈的和不能断定的斗争中，他们是有实际经验的政治家。他们自己渴望民主政体，这种民主政体比任何一种政府的理论都更为深刻，更为本质和更为重要。他们反对时代的偏见，忙于维护人类的尊严。使他们着迷的并不是约翰·史密斯对于任何社会问题有没有正确的观点，而是约翰·史密斯历来都被认为是属于地位低下的世系的后裔，现在则再也不要对别人下跪了。正是这种情景使它成为天堂面“生存于那种黎明之中”。但是，每一个分析家似乎都贬低这种尊严，否认所有的人始终是有理智的，或者是受过教育的，或者是见闻广的，注意到人民是被愚弄的，他们并不总是知道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样地适合于当统治者的。

这些评论受到欢迎就象一个小孩欢迎一个玩具拨浪鼓一样。每一种关于人难免犯错误的观察都受到最大可能的利用。如果民主主义者承认任何贵族式的辩论中存在真理的话，他们就会在防御中打开一个缺口。所以，正象亚里士多德必须坚持奴隶生来就是奴隶那样，民主主义者也必须坚持自由人生来就是立法者和行政官员。他们必须进一步说明：人类的灵魂可能没有，可能也永远不会有这种专门的性质，然而有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不被用来当作别人的不情愿的工具。地位较高的人那时仍然非常强硬和非常肆无忌惮，他们不会不去利用这样一种坦率的陈述。

所以，早期的民主主义者坚持说，一种有理智的正义是自然地一大群人中间涌现的。他们全都希望有各种个人的保留，他们中的许多人确信象托玛斯·杰弗逊这样最聪明的人也有过各种个人的保留。但是，有一件事是无疑的：如果舆论并没有自然地涌现出来的话，那么在那段时期就根本没有人相信会涌现舆论。因为以民主为基础的政治科学，在基本的方面与亚里士多德制定的

政治科学是同样的。民主主义的、贵族的、保皇主义的和共和主义的科学，它们的主要前提都同样地假设统治的技艺是一种天生的才能。人们可以列举一些人所具有的根本不同的才能，但是，同意这样的想法，那就是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发现那些具有内在的政治智慧的人。保皇主义者确信皇帝生来就是统治人的。亚力山大·汉密尔顿认为尽管“各行各业都有一些很有智慧的人。……对政府很有影响的议会机构则将由地主、商人和有学问的职业人员组成。”<sup>①</sup>杰弗逊认为政治才能是由上帝赋予农场主和种植园主们的，有时说起来似乎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才能<sup>②</sup>。主要的前提是同样的：统治是一种天性，根据你的社会选择，这种天性表现在一个男人或者挑选的几个人身上，或者表现在所有男人或只是表现在白色人种年龄在21岁的男人身上，也或许甚至表现在所有男人或所有女人身上。

在决定谁来统治最为适合的问题中，世界的知识当然是重要的。贵族政治论者认为那些处理重大事务的人是具有天性的，民主主义者断言所有的人都具有天性，因此都能处理重大事务。在任何情况下，政治科学都没有彻底解决世界的知识是怎样传给统治者的问题。如果你是为了人民，你就不曾想去解决怎么使选民熟悉情况的问题。当年龄达到21岁时，他已有了政治才能。重要的是善良的心地、理智的头脑和公正的判断。这些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熟起来的，但是，并不需要考虑如何去得到这种心地和培育这种理智。人们就象在呼吸中吸收氧气一样地在接触实际中吸取有益的东西。

### 三

但是，人们不费力气就能掌握的事实是有限的。他们能够熟

---

① 《联邦主义者》第35、36期。参看亨利·琼斯·福特：《美国政治的兴起和发展》第5章。

② 见下述第17章，第3节。

悉他们居住过和工作过的地方的风俗和较为明显的特点。可是，对于客观世界他们只能设想，他们既没有凭直觉进行设想，也没有仅仅凭生活中汲取的可靠知识去设想。所以，对外界自发的政治见解只可能限于统治者的指引和某些知识范围之内。无论哪里你发现政府是建立在人们才能的天赋知识范围之内，这种结论就没有例外。正象亚里士多德说的：<sup>①</sup>“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们是按照优点来评定和配置官员，他们就必须了解彼此的特性；他们若不具备这种知识，则选举政府机构和法律诉讼的决议都将发生错误。”

这种准则显而易见地对各个政治思想学派是有约束力的。但是，它给民主主义者提出了特殊的困难。那些相信阶级政府的人，能充分断言在皇帝的宫廷中或者在贵族的乡间宅第中，人们是知道彼此的特点的，只要其余的人都是驯服的，人们需要知道的就只是统治阶级成员的特性。然而，民主主义者们要提高所有人们的尊严，立刻就受到他们支配阶级的庞大数量和混乱状态所包围。他们的科学告诉他们，政治是一种本能，而且这种本能只在一个有限的环境中发生作用。他们的希望曾告诉他们要坚信在一个很大的环境中，所有的人是能够被统治的。在他们的理想和他们的科学之间的这种致命的冲突之中，唯一的出路就是不经过很多的讨论就设想人们的愿望就是上帝的愿望。

这种自相矛盾的谬论太明显了，这种赌注下得太大了，他们的理想太经不住严格的检验。他们不可能说明一个住在波士顿的公民怎么能想象出一个弗吉尼亚人的观点，一个住在弗吉尼亚的弗吉尼亚人怎么能够具有关于华盛顿政府的真正意见，住在华盛顿的国会议员又怎么能够掌握关于中国和墨西哥的意见。因为那时候，对于许多人来说，还不可能有人将一种见不到的情况提供给他们作判断用。当然，从亚里士多德以后，已经有了某些进

---

<sup>①</sup> 《政治学》第七篇，第4章。

步。有了一些报纸，有了一些书籍，有了较好的道路，又有了更好的船只。但是，进展还不很大，18世纪的政治设想基本上就是在政治科学中已流行了二千年的设想。先驱的民主主义者并没有掌握这种材料，来解决人的注意力的已知范围和对自身尊严的无比信念这二者之间的矛盾。

他们的假设不仅早于现代报纸、世界通讯社、照片和电影，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早于测量、记录、定量分析和比较分析、一些证据的准则以及心理分析的能力，以纠正和不全信见证人的偏见。我并不认为我们的记录是值得满意的，我们的分析是不偏不倚的，我们的衡量是可靠的。但我确实认为一些重要的发明曾为我们的判断提供了我们所看不到的情况。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还没有这些重要的发明，在卢梭、孟德斯鸠和汤玛斯·杰弗逊的时代的政治理论对这些发明还没有足够的重视。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甚至在人类建设的最新理论中，就象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那样，所有较深的前提都是接受了这种较老的政治思想的。

必须假设当那种思想体系有力量和可靠的时候，人也只能对公众事务有很小的一部分经验。在这种意义上说，他只能化很少的时间在这些事务上，那种假设还是真实的，最终的后果也是这样的。但是，古代的理论不得不承认，不仅人们只能对公众问题给予很少的注意力，而且所能注意到的问题也只限制在手边的一些事情。曾有人富于想象地假定，会有这样的时候，能够用一种方式把距离遥远的事件和复杂的事件报道、分析和提供出来，使一个非专业人员能够进行真正有价值的选择。这样的时候现在已经出现在眼前了。把一种看不见的情景继续不断地报道出来是办得到的事，这已是不再存在任何怀疑的了。常常是作的还不好，而事实上已经作到了，这就说明了那是根本能够作到的，而且我们既已发觉常常作得那样的不好，那就说明还能作得更好。每天，由工程师和会计向企业人员，由秘书和公务员向官员，由情报官

员向总参谋部，由许多记者向读者们以各种不同的技能和诚实的态度报道遥远的和复杂的情况。这些是初步的开端，然而根本的，远比重复战争、革命、退位和复辟等字眼的含义都更带有根本的性质；论其程度，就象改变了人类生活的规模，使得劳埃德·乔治先生可能于早餐后在伦敦讨论威尔斯煤矿的问题，晚饭前在巴黎讨论阿拉伯国家的命运问题。

因为，把人类任何方面的事务提供到判断的范围内的这种可能性，打破了建立在一些政治理论上的迷惑力。当然，有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注意力的范围是政治科学的主要前提，他们把它建立在沙土上。他们已论证了他们自身体验到的一种很有限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的知识效果。但是，对于数得出来的一些政治思想家，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经过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到民主主义的理论家们都曾围绕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来思索，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依赖他头脑里的很少的情景来观察世界的。

## 第十七章 自给自足的社会

### 一

如果一群群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互相残杀，就会陷入求生存的斗争中，这常常是显而易见的事。《利维坦》的著名章节中讲有很多真理，霍布斯（Hobbes）在该著作中说：“尽管任何时候都不曾在什么地方有过某些人与另一些人处于战争的状况，然而皇帝和君主统治者们由于他们是独立的，都在不断的猜忌，并处于格斗状态中，把武器指向对方并且互相觊觎……”<sup>①</sup>

### 二

人类思想的一个重大分支，它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学派，这个分支围绕这个结论曾设想人类关系的一种理想的合理型式，每一个人的作用和权利在这种型式中都被恰当地规定好了的。如果他有意识地完成了规定给他的任务，不论他的意见是对的或是错的都没关系。他尽了他的职责，另一个人也尽了他自己的职责，所有负责的人共同造成了一个融洽的世界。每一种等级制度都说明着这种原则，同样，在封建的理想中、在但丁的天堂领域里、在社会主义的官僚类型中和在自由放任的社会中，直到一种令人惊异程度的辛迪加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罗伯特·兰辛先生所理想化了的国际法体系中都能找到这种原则。它们都假设了一种预先建立的融洽，通过启发、灌输或遗传，使固执己见的人、阶级或者社团与其余的人和谐地结合起来。独裁主义者更多地想象他是一个交响乐队的指挥，他注意

---

<sup>①</sup> 《利维坦》第8章：“人类的自然状况中关于他们的幸福和痛苦”。



的是每一个人都演奏他的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倾向于认为如果一个演奏者在演奏中临时再演奏点什么，听起来就格外地和谐。

但是，也曾有一些厌烦于这些权利和义务的方案 的 哲 学 家 们，他们认为发生论争是当然的事，只是想看到他们的观点怎么胜过别的观点。即使当他们看来令人惊恐时，他们也总是好象更现实，因为他们应该做的全部工作就是毫无遗漏地概括经验。马基雅维里是这个学派的古典作家，是受到最冷酷无情地中伤的一个人，因为碰巧他是第一个自然主义的作家，在迄今为止被超自然主义者预先占领的领域中曾运用朴素语言的人<sup>①</sup>。他比以往任何政治思想家的名声更坏，然而信徒却很多。他真实地描述了自给自足的国家生存的技巧，那就是他有那么多信徒的缘故。他有个坏名声主要是因为瞟视了美第奇家族，晚上臆想他穿着他的“高贵的宫廷服饰”，犹如马基雅维里，他自己就是王子，并且尖刻地描述了那种一味唱颂歌的办事方式。

在其最著名的一章<sup>②</sup>中写道：“一位王子应该注意他从来不说漏嘴而有损上而提到的五种品质，听和看都表现得是仁慈的、忠诚的、人道的、正直的和虔诚的。再也没有什么品质比最后的一条更为必要的了，因为人们的判断一般是凭眼睛而不是凭手，因为每一个人只能看你而很少来接触你，因为每个人都只是看你象什么样子，而极少人知道你实际上是什么样子。那些极少数的人自己不敢反对得到国家君主保卫的多数人的意见，在所有人的行动中，特别是王子们的行动，是不会受到深谋远虑的猜疑的，一个人是根据效果来进行判断的。……一位现代的王，并不宜指

---

① F. S. 奥利弗在他的《亚力山大·汉密尔顿》一书中说到马基雅维里（第174页）“假设存在的条件——人和事物的性质——是不变的，象论述青蛙的演讲者那样，他用平静而非道德观念的方式说明一个英勇的、明智的统治者怎么能够使事件变成对他自己有利，并对他的王朝也有利。”

② 《王子》，第18章，“关于王子应该保持忠实的方式”。W. K. 马里奥 特译。

名，除了和平与真诚以外，他从来不鼓吹任何别的东西，而实际上他对于这两者都是敌视的，如果他暴露出敌视其中之一的話，则常常会丧失他的声望和领域。”

那是嘲弄，但那是嘲弄一个真实地看到了而并不了解为什么他看到那情况的人。马基雅维里认为人们的统治和王子们的统治“一般地说，他们更多地用眼睛而不是通过实际接触来进行判断的，”他这样说，就是认为他们的判断是主观的。他装作很熟悉世事的样子，称他的时代的意大利人扎实地看到了世界而且看到了整个世界。他不会沉溺于幻想之中，他并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料，来说明一个民族的人们已经学会了怎样纠正他们的看法的。

象他所发现的，这个世界是由一些观点很难纠正的人组成的，马基雅维里知道由于这样的人是以个人的方式来看待所有公共关系的，他是陷在不断的冲突之中。他看到的是他们个人对一些事务的看法，是他们本阶级王朝对一些事务的看法，或者他们市政当局对于一些事务的看法，而这些事务实际上都是超越他们视域范围的。他们看到的是他们的那一方面。他们认为这种看法是对的。但是，他们与其它同样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们相交锋了。因而，他们的存在就遇到了危险，或者说由于未知的非公开的原因，他们把那看作是他们的存在并视为出现了危险。目的可以证明手段是正当的，而这种目的是牢固地建立在真实然而是个人的经验基础上的。他们将牺牲这些理想中的任何一个以保存所有的理想。……“一个人是根据效果来进行判断的。”

### 三

这些基本的真理摆在民主主义哲学家的面前。他们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懂得政治知识的领域是有限的，自治的领域也应该是有有限的，因而当一些自给自足的国家在相互摩擦时，就是象格斗者的姿态那样。但是，他们必定懂得在人间是有一种意志决定着人

们的命运的，要去寻求一种不是由武力造成的和平。他们怎么才能够使希望和事实取得一致呢？

他们在寻求答案。在古希腊和意大利的城乡中，他们找到了贪污、腐败、阴谋诡计和战争的记述<sup>①</sup>。在他们自己的城市中，他们看到了派系斗争、人为的纠纷和狂热。这并不是民主政治的理想得以昌盛的环境，也不是一群独立而同样能胜任的人自发地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的场所。他们在琼·雅克·卢梭的指引下，进一步向未败坏的乡村寻找，他们足以使自己信服地看到了这种理想在那里是适合的。特别是杰弗逊感觉到了这一点，杰弗逊在塑造美国民主政体的形象上比任何别的人都出了更多的力。区乡产生的力量促使美国的革命达到了胜利。区乡产生的选票使杰弗逊的政党得到了权威，如果你戴上眼镜除去奴隶的痕迹，从马萨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农牧公社中，你就能想象出民主政治的形象是什么样的。

托克维尔说<sup>②</sup>：“美国革命爆发了，区乡培育起来的人民统治权已经占有了这个国家”。这种人民主权的学说当然占据了那些制订和推广民主概念的人的头脑。杰弗逊写道<sup>③</sup>：“人民的拥护是我们的原则。”但是，拥护的人几乎全部是占有小土地的农民：“那些耕地者都是上帝选择的人，如果一旦被上帝选中，上帝就赋予他们的胸怀以殷实和纯真的美德。中心的问题是上帝使神圣的火焰不停地燃烧着，不然，这种火焰就会在地球上消失。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在大量的耕种者中找不到一个道德败坏的实例。”

虽然这种说法中含有很多回复到原始状态的浪漫主义色彩，其道理也还是有一些根据的。杰弗逊认为一群独立的农民比任何

---

① “民主政治从来都是充满骚乱和斗争的……一般说，它们的生命是短促的，就象它们在死亡时的狂暴一般。”麦迪逊，《联邦制拥护者》第10期。

② 《美国的民主》，第3版，第1卷，第51页。

③ 查尔斯·比尔德：《杰弗逊式民主的经济来源》第14章引证。

其它社会阶层更近于去履行自发的民主要求，但是，如果你维护这种理想，你必须把这些理想的村社与世界上令人憎恶的事物隔离开来，如果农民要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他们必须把管理范围限制在他们熟悉的事务上，杰弗逊描绘了所有这些逻辑的结论。他指责了制造业，对外贸易和一支海军，指责了财产的难以捉摸的形式，在理论上，他赞成任何以小的自治群为中心的政府形式。在他的时代，他受到一些批评，其中之一指出：“外表上十足的妄自尊大和强大得实际能抵御任何入侵者，似乎我们可以永远享受乡村特点和生活得满意，因而，一种自私和满不在乎掩盖了冷漠和粗俗。”<sup>①</sup>

## 四

杰弗逊制定的民主思想是由一个理想的环境和一个挑选出来的阶级所构成的，与他那时的政治科学并无抵触，它与现实曾有抵触。当这种思想用抽象的话来叙述时，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丰富有力的语言，另外，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竞选的目的，不久就忘却了这种理论最初是为了很特殊的形势设计的。它成为政治的流言蜚语，为美国各党派的人士提供了考虑政治的固定成见。

那种流言蜚语是根据需要确定的，因而在杰弗逊的时代，没有人能够设想舆论不是自发的和主观的。因此，民主的传统总是想要看到这样一个世界：人们所特别关心的那些事务，其因果关系，全都是在他们居住的区域发生作用的。民主的理论从来没有能够在一种广泛的和无法预言的环境的前后关系中设想它本身的。这镜子是凹面的。虽然民主主义者认识到他们接触的是外界事务，他们相当确实地认识到每一次与自给自足集团以外的世界的接触总是对原先设想的民主的一种威胁，那是一种明智的忧

---

<sup>①</sup> 查尔斯·比尔德：《杰弗逊式民主的经济来源》第426页。

虑。如果民主是自发的话，那么民主的利益必定仍然是简单的、明白的和容易驾驭的。如果消息的供应是听任偶然的经验，那么，环境必定是接近于那些孤立的农村区乡。其外界情况必定局限于每个人直接了解的和一定的知识范围之内。

民主主义者似乎已经懂得舆论的分析说明了：对待见不到的情况时，作出一些决定都是任意的，而这些决定又明显地不应是这样的。”<sup>①</sup> 所以，他总是试图这样或那样地缩小那种看不到的环境的重要性。他害怕对外贸易，因为贸易包含了对外关系；他不信任制造业者，因为他们产生了大城市和集中的人群；如果他仍然需要一些制造业的话，他就必须保护自给自足的利益。如果他在现实世界中不能够找到这些情况，他就充满幻想，并找到毫无对外交往的空想社会。他的口号表现了他的偏见。他是为了自治、自决和独立。这些思想所含有的任何赞成政治统治权或者区社的概念都没有超越自治集团的界限。民主行动的领域是有限的。在保护的疆界之内，其目标是达到自给自足和避免纠纷。这种控制不限于对外政策，但在这方面比较明显，因为国界外部的情况较明显地不同于国内的任何方面。正象历史所表明的，民主政体在其对外政策上，或者是显著的孤立，或者是采取违背他们理想的外交手腕，一般必须在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实际上，瑞士、丹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这些最有成就的民主政体，直到最近都不曾有欧洲含义的对外政策。即使象门罗主义这样一种规定，也是为了给两个海洋围绕着一个缓冲地区的国家以补充，这些国家都是充分的共和政体，没有对外政策。

鉴于专制主义国家造成了一种重大的或许也是必然的威胁<sup>②</sup>，如果民主政体要发挥作用，那么安全就有其必要性。自给

---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7册，第4章。

② 费希尔·阿米斯受到1800年民主革命的惊恐，1802年写信给鲁弗斯·金说：“正象所有国家一样，我们需要外界周围有一个难以对付的邻国，它的存在，时刻有较强烈的恐惧刺激性过人民对他们的政府所能激起的危险。”福特在《美国政治的上升与发展》一书中第69页引用。

自足的独立的社会的 premise 是必须使动乱尽可能减到最少的程度。所谓不安全包括了突然袭击，它意味着有人对你的生命采取行动，对这种人你既无法控制，也不能与之磋商。暴力一般意味着破坏了一般常规，提出一些新的问题需要作出快速和独特的决定。每一个民主主义者都确信威胁性的危机是与民主政治不能共存的，因为他知道群众惯于迅速行动，极少数的人必须作出决定，其余的人则盲目地跟从。这并没有在民主主义者中产生不抵抗主义者，而结果使所有的民主主义的战争都成了为和平主义的目标而战。即使实际上是为征服而战的时候，他们也真诚地相信是在为保卫文明而战。

这些各种各样企图禁闭地球表面的一块地方的尝试，并不是由懦弱、冷漠或者象杰弗逊的批评者之一所说的愿意在修道院的纪律下生活所引起的。民主主义者曾注视到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可能性，那就是每一个人应该提高他完美的道德水准，摆脱人为的一些限制。用他们所了解的行政管理技巧，他们能够设想出一个自治个体的社会，这种社会和先前亚里士多德想的一样，是一个封闭的简单的社会。如果他们所要达到的是这样的结论，即所有人民能够自动地管理他们的公共事务，那么，他们就不可能选择其它的前程。

## 五

出自他们强烈的希望，他们采用了这种前提，也引出了一些别的结论。为了有自发的自治，你就必须有一个简单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每个人都有能力去管理这些简单和独立的事务的。在那里，“希望是思想之父”这样的逻辑是有说服力的。在农村的区乡中，“有全权的公民”这种学说，从最富实际意图的角度说，是真实存在的，乡村的每一个人迟早都试着插手乡村的每一件事。办公室由一些杂而不精的人交替轮换。在

民主政治的概念被普遍地采纳以前，这种全权公民的学说並沒有碰到严重的困难，所以，人们着眼于一种复杂的文明，看到的则是一种封闭的村庄。

个别公民不仅适合于应付所有的公众事务，而且他是一贯热心公益和有持续兴趣的人。他在区乡中十分热心公益，因而他了解每一个人，并对每一个人的事都感兴趣。这种完全地为区乡的思想，很容易变成完全地为任何目的的思想，因为象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数量的思想并不适合一种固定的概念。但是，有另一周转的变化。既然每一个人都被认为是对重要问题有浓厚的兴趣，而这些重要问题只是指对每一个人感兴趣的。

这就意味着人们是根据他们头脑中的无异议的形象来形成他所想象的客观世界的。他们的父母和老师把对于这种形象的固定的成见传给他们，他们再根据经验稍加校正。他们之中只有很少的人有些事需要越出州界，有必要到国外去的人就更少了。大多数选民终生住在一个环境中，除了少数的报纸、一些小册子、政治演讲、他们受的宗教训练以及流传的谣言以外，他们不接触任何东西，而他们要去设想的却是而业和财政、战争与和平等等较大的问题。有客观根据的舆论比起随意的想象来，数量是很小的。

所以，由于许多不同的理由，在美国初创时期，自给自足是一种高尚的理想。区、乡自然条件的孤立，开拓者的孤独，民主政治的理论，新教徒的传统和政治科学的局限，汇集起来使人们相信，必须从他们自己的良知中得出政治智慧，从抽象的原理中推演出来的法律，这些一定耗费了他们很多精力，这是不奇怪的事。美国人的政治心理必须依靠其首都。在文牍主义中，可以发现从一条法规的正文中能引出新的法规，而不需要花费力量从经验中去了解实际情况。这些准则成为那么难以理解的神圣的东西，以致每一个好的外国观察家对于美国人民能动的实践精力与他们社会生活的静止的推理主义之间所形成的对照都曾感到惊奇。坚

定地喜欢固定的原则就单纯地被认为是达到自给自足的唯一途径。然而，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社会关于客观世界的舆论，主要是由极少数带有成见的印象所构成，这些印象又是从他们的法律信条和道德信条所推论出来的，是由地区经验产生的感情所赋予生命力的一种模式中形成的。

因此，民主的理论从它对人类最高尊严的美好想象开始，由于缺乏报道周围环境的工具，不得不求助于在选民中偶而积累起来的智慧和经验。用杰弗逊的话说，上帝“特别赐予人的胸怀以重要的和真诚的美德。”这些被选择出来的人在他们有自制力的环境中面对着所有的事实。这环境是那么熟悉，使人能够想当然地认为人们都谈论着实际上相同的事。所以，唯一真正的争执就是对于同样的事实的判断。没有必要去保证消息的来源的可靠性。它们是显而易见的所有的人都可以平等地得到它们。也没有必要担忧最终的判断标准。在自给自足的社会中，人们能够设想，或者至少曾经设想过一个相似的道德法规。因此，唯一的意见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如何逻辑地运用公认事实的公认标准。由于这种论证的才能也是充分统一了的，论证的错误就会很快在自由讨论中暴露出来。接着，这些限度内的自由就能够提供真理。假定这种社会是能够提供消息的，其信条通过学校、教堂和家庭得到传播，那么，智力训练的主要目的就被认为是从一个前提进行推理的能力，而不是找出这种前提的能力。



## 第十八章 武力、官职委任权 与特权的作用

### 一

汉密尔顿写道<sup>①</sup>：“已经发生的事正是曾经预见到的。联邦的措施并没有执行；州的失职已经一步步地发展到顶点，阻碍了国家政府的工作，使之处于可怕的停顿状态。”……因为“我们的情况，在邦联之下统一13个独立的统治意志，以完全执行邦联发出的每一项重要措施，是必不可少的。”他问：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各自的统治者……会着手判断这些措施本身合宜不合宜。他们将考虑提议的事或者要求的事与他们眼前的利益或目标是否一致；也会考虑采取了这种措施会导致暂时的便利或者不便利。要作出所有这些考虑，就要带着感兴趣和疑虑的精神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如果不掌握作出正确判断所必须了解的全国情况和州的理由，而是带着强烈的地区问题的偏见，那就一定会作出错误的决定。机构建成以后，每个成员都必须反复这种同样的过程；整体计划的执行总是由于分立而消息不灵通和每个部分存在偏见而有波折。那些熟悉一般会议事项的人，那些曾经看到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对于重要问题常常是多么难以作出一致结论的人，将很容易想像召集这样的一些集会，一定是极其困难，这些人彼此远隔一定距离、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影响下相互协商，渴望在相同的观点和事务中进行合作。”

经过十年以上的大动荡以后，强调召开一次议会，正象约翰·亚当斯说的那样<sup>②</sup>，那“仅仅是一次外交的集会”，当一些

---

① 《联邦主义论》第15期

② 福特在《美国政治的上升与发展》一书中第36页引用。

以自我为中心的社团在同样的情景中纠缠不清时，这次会议曾留给革命领导者们一种“有指导意义然而却是苦恼的教训。”<sup>①</sup>所以，1787年5月当他们到费拉德尔费亚（即费城）去修订邦联条款时，他们确实是完全反对十八世纪民主的基本前提的。不仅是这些领导者有意识地反对当时的民主精神和民主气氛，正象麦迪逊所说“民主政体从来是骚乱和斗争的场面”，而且他们决心在国家的疆域以内，尽他们的能力来抵消在自给自足的环境中建立自治社会的思想。他们看到了这种空洞的民主的冲突和失败，因为那里的人都自发地管理所有他们自己的事务。他们认为问题是要重新建立政府来反对民主。他们把政府看成是作出全国的决议并强制在全国执行的政权；他们认为民主是一些地区和阶级根据眼前的利益和目标实行自决的坚定要求。

经过仔细分析，他们不能认为这样一种组织可能使分离的区、乡根据一些相同的看法同时行动。我们只是开始设想在世界上某些新闻能自由传播和有共同语言的地方才有这种可能性，而且也只是局限于生活的某些方面。工业和世界政治中志愿联邦制的全部思想仍然是那么初步的，正象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看到的，真正进入到实际政治中去的，仅仅是很少和很有节制的。一个多世纪以后，经过世代知识分子的努力，我们所能设想的东西，宪法制订者是根本无法设想的。为了建立全国性的政府，汉密尔顿和他的同事们必须制订出计划，不仅根据人们有共同利益的观念可以进行合作的这样一种理论，而且根据另一种理论，那就是如果运用权力均衡来保持特殊利益的平衡，人们是能够被统治的。麦迪逊说过<sup>②</sup>：“必须用野心抵销野心。”

正如一些作家所想象的，他们并不打算平衡各种利益，所以，政府就成为永远的一种僵局。他们有意要僵持地方利益和阶

---

① 《美邦主义者》第15期。

② 《联邦主义者》第51期，为福特引用。

级利益，使这些利益阻碍政府。麦迪逊写道<sup>①</sup>：“设计一个由一些人管理一些人的政府；最大的困难在于首先必须使政府能够支配被统治者，其次，责成它支配它自己。”那些，在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上说，制衡的学说是拥护联邦制的领导人对舆论问题的补救办法，他们看到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用“地方行政官的温和的影响”来代替“残忍的武力机构”，<sup>②</sup>除非设计出一种巧妙的机构来中和地方意见。他们並不懂得怎么去操纵一次大的选举，他们也看不到以共同的消息为基础达到一致意见的可能性。1800年，当艾伦·伯尔得到坦慕尼协会的支援控制住纽约市的时候，确曾告诉过汉密尔顿一个给他印象很深的教训。但是，在汉密尔顿能够考虑这项新发现之前就被杀害了。正象福特先生所说<sup>③</sup>，伯尔的手枪打得联邦党的脑袋开了花。

## 二

当宪法草拟以后，“政治仍然能被绅士间的会议和协议所支配”<sup>④</sup>，汉密尔顿把一个政府交给了绅士们，当地方的偏见受宪法的制衡作用而达到平衡时，绅士们就应该管理全国的事务。无疑汉密尔顿通过继承是属于这个阶级的，他在他们的爱好方面有一种人类的偏见。但是，仅仅这样来解释他管理国家事务还嫌不够，当然，他对联合有极大的热忱，那是没有问题的，而我认为，说他建立联邦来保护阶级特权而不是说他运用阶级特权来建立了联邦，这是颠倒真实情况的。汉密尔顿说：“当我们发现他以后，我们必须采用他，如果我们期望他为公众服务，我们就必须

---

① 《联邦主义者》第51期。

② 《联邦主义者》第15期。

③ 福特：《美国政治的上升与发展》第119页。

④ 福特：《美国政治的上升与发展》第144页。

对他热心于为公众服务感兴趣。”<sup>①</sup>他需要一些人管理公众事务，这些人能最迅速地将自己的热情倾注于国家利益。这些人是绅士、银行家、制造商、运输商和商人<sup>②</sup>，汉密尔顿采用了历史上还没有过的手段，这手段比一系列财政措施更为机灵而有明确的目的性，从而使地方上的显要人物都归属于新的政府。

显然，立宪会议是秘密进行的，虽然以“可能不到六分之一男性成年的投票”<sup>③</sup>强行批准，但毫不掩饰，联邦同盟盟员论证的是联盟而不是民主，对于当时已任了两年多的共和党总统乔治·华盛顿来说，甚至连共和国这个词听了都不高兴。宪法曾是一种坦率的尝试，用来限制民众统治的范围；能够让政府拥有唯一的民主机构就是众议院，它是建立在选举权极大地受财产条件限制的基础上的。即使那样，众院仍然被认为是政府的很破格的一部分，因此，它受到参院、选举团、总统的否决权和法院的解释权等精心的制衡。

因此，当时法国革命正激起了全世界民众的感情，1776年美国的革命家们制订出了一个宪法，就权宜之计而言，它回过来以英国君主政体作为样板。这种守旧的行为是不能持久的。制订宪法的人是少数派，他们的动机受到怀疑，当华盛顿退位以后，绅士们的地位就不足以将这场不可避免的斗争坚持到胜利。元老们最初的计划和这个时代的道德感情之间，距离是那么远，以致不能被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所利用。

### 三

杰弗逊谈到他的当选是“1800年伟大的革命”，但是，更重

---

① 福特：《美国政治的上升与发展》第47页。

② 比尔德：《宪法的经济说明》，到处可见。

③ 比尔德：《宪法的经济说明》第325页。

要的它是一场心理革命，没有重大的政策上的改变，然而，建立了一个新的传统。因为杰弗逊是第一个教育美国人民把宪法看作是一种民主工具的人，他把这种形象、观念甚至许多词汇都固定化了，从此以后，美国人都照这样来描述政治。精神上的胜利是如此圆满，以致二十五年以后托克维尔在受到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家庭接待的过程中，注意到即使是那些“厌烦这种描述”的人，“当他们在公开场合时”，也能听到他们“赞美共和制政府的可喜和民主机构的优越。”<sup>①</sup>

制订宪法的元老们虽以他们全部洞察力也看不到人们会长久地容忍一个直率而不民主的宪法。冒失地否定民众的统治，必然容易给人提供攻击的观点，以杰弗逊为例，就他的宪法见解看，与汉密尔顿相比，更无丝毫意思。想把政府交给具有“粗俗”意志的人民<sup>②</sup>。联邦同盟的领导者们是一些直率地表明他们具有明确的信念的人。他们的公开观点与秘密观点几乎没有真正的差异。但是，杰弗逊则有大量可作多种解释的思想，不象汉密尔顿和他的传记作者所认为的完全因为其缺点，而是因为他相信联盟，又相信自发的民主，在他的时代，政治科学还没有令人满意的方法来调和这二者。杰弗逊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被人搞糊涂了，因为他有过一个新的和惊人的思想观点而没有人理解其全部意义。但是，虽然没有什么人清楚地懂得民众的统治权，看来它包含了提高人类生活一种伟大的意义，因而，宪法都不能够直接地否认它。因此，从意义上就勾销了直接的否认，从表面上看，这个文件是有限的立宪民主制的真正范例，它是作为直接的民众统治的一种工具来谈论和思考的。杰弗逊实际上认识到北部联邦同盟盟员们曲解了这个宪法，在他想来，他们已不再是这宪法的制

---

① 《美国的民主》，第1卷，第10章，第216页（1938年第3版）。

② 参看他为弗吉尼亚宪法的计划，他关于参议员必须是财产持有者的见解，以及他的关于最高法院有否决权的观点。比尔德：《杰弗逊民主的经济根源》第450页以及其后的。

订者了。所以，这个宪法从精神上说已经过重新修改。一部分是通过实际的修正法案，一部分是通过实践，例如，选举团就是例子，但主要的是通过另一套固定成见来看待它，其外观再也不被人认为是鼓吹寡头政治的了。

美国的人民终于相信他们的宪法是一种民主的工具，他们也是这样对待它的。他们把这种设想归功于杰弗逊的胜利，并且认为是一种保守的设想。可以合理地猜想，如果个人总是把美国的宪法看作是起草人们所写的那样，那么这宪法早就被用暴力废除了，因为忠诚于宪法与忠诚于民主被认为是不相一致的。杰弗逊通过教育美国人民，把学习宪法当作民主的表现来解决了那种自相矛盾的谬论。他自己就到此为止了。但是，二十五年左右的过程中，社会情况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安德鲁·杰克逊进行了政治的革命，杰弗逊曾为这场革命留下了传统<sup>①</sup>。

## 四

那场革命的政治中心是委任官职权的问题。建立政府的人把官职看成是一种所有权，不让别人轻易打扰，无疑他们希望把那种官职继续保留在他们的社会等级手里。但是，民主的理论把全权的公民学说作为其主要原则之一。所以，当人民把宪法看成是一种民主的工具时，肯定就会把官职的永久性看作是不民主的。在这里人们天生的雄心与他们时代的重大的道德冲动正好相一致了。杰弗逊曾推广了这种思想而没有竭力地使它付诸实践，在弗吉尼亚的总统中党派立场的变动相对地说是极少的。杰克逊开始实行把社会官职变成委任官职。

把官职短期轮换的原则看成是一种重大的改革，在我们听起

---

<sup>①</sup> 读者如果怀疑革命的扩展使汉密尔顿的意见与杰克逊的实践分隔开来，应参看亨利·琼斯·福特：《美国政治的兴起和发展》。

来是稀奇的事。这种做法不仅是把普通人都看作是适合担当任何官职的，因而就承认了普通人的新的地位，不仅是打破了一个小的社会等级的垄断而变成对有才能的人开放的职业，而且“它曾在几个世纪被当作一种医治政治腐败的特效药来提倡，也当作预防官僚政治的一种办法。”<sup>①</sup>这种官职迅速更换的实践，是从自给自足的村庄衍生出来的，以后又变成运用于一个大地区的民主形象。

它在国家中所取得的效果与在基于民主理论的理想社会中的效果当然是不相同的。它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它形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取代了已消失的一些联邦制拥护者。官职委任权为广大选民无意地作了汉密尔顿的财政措施曾为上层社会所作的事。我们常常不能理解对于巩固我们的政府，究竟有多少需要归功于官职的委任权。因为，正是官职委任权使一些领导人断绝了对于自我中心的社会过多的依附，正是官职委任权削弱了地方精神，并且带来了某种和平的合作，也正是那些使地方著名人士的人缺乏共同利益的观念，会把联盟拆开。

但是，民主理论当然不应该产生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它也从来不曾使它自己迁就事实。当民主主义者要求废除官职的垄断，要求轮换任期和短的任期时，他想到的是乡镇，在那里任何人都能为公众服务并谦让地回到自己的农场去。政治家作为一种特殊阶级的观念正是民主主义者所不喜欢的。但是，他不能够有他所喜欢的，因为他的理论是从一种理想的环境中引伸出来的，而他则是生活在一种现实的环境中。他身受民主政治的道德影响越深，他就越看不到汉密尔顿的断言中包含的深刻的真理：许多城镇在相隔一定的距离和在不同的感想下考虑问题，是不能够在相同的观点和相同的事务中长期合作的。因为那种实际情况延缓了任何事情，就象直到取得一致意见的技巧有了根本的改进以后，

---

<sup>①</sup> 福特，在《美国政治的上升与发展》一书中第169页引用。

才在公众事务中对民主政治有充分的认识。所以，当杰弗逊和杰克逊领导的革命产生了官职委任权时，就造成了两党制度，就创造了一种代替绅士们的统治的东西，也为制衡统治的僵局创造了一种纪律，所有这一切就象已经发生的那样无形地发生了。

因而，官职的轮换可能是虚伪的理论，实际上官职只是在亲信之间转移。任期可能不是一种永远的垄断，但是，职业的政治家则是永久性的。正象哈定总统有一次说过的，政府可能是简单的东西，但是，在选举中取胜则是一种很复杂的把戏。官职的薪金可能象杰弗逊的家庭花销那样虚夸地节俭，但是，政党的开支和取胜的代价则是很高的。民主的成见控制了有形的政府，美国人民对于他们环境的真实情况所采取的纠正、异议和采纳却不得不是无形的，即使每个人懂得关于他们的一切情况，也只能这样作。只有法律的条文、政治家的演说、讲坛和正式的行政机构都必须符合于民主政治的原来的形象。

## 五

如果有人问到一位富于哲理的民主主义者，这些自给自足的区社当它们的舆论是那么地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究竟是怎么进行合作的呢？他就一定会指出，代议制的政府是以国会来体现的。当总统的权力增大的时候，毫不奇怪他会发现代议制政府的特权已经削弱了。

有些批评家曾了解到地方上有选派著名人士到华盛顿去的习惯。他们曾想如果国会由全国杰出的人物所组成，那么首都的情景就会更加美好。当然，如果退休的总统们和内阁官员们能够学习约翰·昆西·亚当斯，那么将会是件好事。但是，缺少这些人并不说明国会的困难处境，因为在国会还是政府最显著的部门的时候，相对地说它的作用就开始衰落了。恰巧相反的是，正因为国会失去了制订国家政策的影响，它才失去了杰出人物对它的吸



引力。

国会在世界范围内失去信誉的主要原因，我认为这是由于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代议制的国会基本上是由一些对广阔而陌生的世界什么也不知道的人组成的。如果有一些例外的话，那就是在宪法中或是在代议制政府的理论中所承认的，使国会获得消息的唯一方法就是管区与管区之间相互交换意见。此外，再没有系统的、适当的和公认的办法使国会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这种理论就是通过每个地区的优秀分子将其选民中最有才智的人送到中心地区，所有这些聪明才智合在一起就成了国会所需要的全部智慧。现在再也不用怀疑表达和交换地方意见的价值问题了。国会作为一个大陆国家的行情中心，是有重大的价值的。在美国国会的衣帽室、旅馆休息室和供膳寄宿处中，在国会主妇们的茶话会上和世界主义的华盛顿客厅临时通道上，新的前景展开了，眼界更开阔了。但是，即使采用了这种理论，一些地区也总是选送他们最聪明的人，他们的总数加上地区的影响，综合起来作为国家政策的基础还是不够广泛的，也根本不能成为支配外交政策的基础。由于多数法律的真正效果是神秘的和隐蔽的，它们不能够为渗入地区经验的各州的心理所理解，只能够通过被控制的报道和客观的分析来了解它们。正象一家大工厂的首脑，只通过与工头谈话，是不能完全知道效率如何的，还必须检查成本帐目和资料，只有会计能够为他提供这些材料。所以，立法者通过综合地方情况是不能完全知道真实国情的。他是需要了解地区情况的，但除非他掌握衡量这些情况的手段，使一个情况比另一个情况更清楚。

总统通过发表国情咨文，确实起到了国会助手的作用。他所处的地位可以使他这样作，因为他统辖大量的办公署及其代理人，他们能写报告也能尽职责。但是，他是有选择地向国会报告情况。他不可能受到诘问，关于什么符合公众利益的审查权掌握在他的手中。这完全是一种片面的和耍花招的关系，这种关系有时

候达到如此荒谬可笑的程度，以致国会为了获得一个重要的文件还必须求助于一家芝加哥报纸的企业，或者依靠一名下级官员的透露。立法者们接触到的必要的事实也是如此欠缺，致使他们只能依赖私下的小费，或者依赖那种合法的掠夺。由于众议员观念上缺少立法知识，因而国会的调查发生野蛮的和狂热的角逐，甚至不惜互相残杀。

这类调查极少数产生效果。此外，还有行政部门发生的临时通讯，私人搜集的感兴趣和不感兴趣的材料，国会议员所阅读的这类报纸、杂志和书籍，以及一种新的极好的措施，即求助于专门机构，如州际商业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关税委员会，所以，国会意见的形成是杂乱的。由于这样，或者是全国性的立法由极少数见闻广的了解内情的人所制订，通过党派力量来贯彻，或者是某种立法分裂成一堆地区性条目，各条的颁发都有地区性的理由。关税细目、海军造船厂、陆军哨所、江河和海港、邮局和联邦建筑物、养老金和资助，这些都作为明显的国家生活的利益在地方上反映出来，他们能发现由联邦经费支付建造的白色大理石建筑，提高了地区房地产的价值和雇佣了地区的承包商，比起政治分配的累积开支来说，这些更容易识别出来。可以说，在一个大的集会中，与会的每个人都只具有他自己本地区的实际知识，涉及到超越地区问题的一些法律，一大群国会议员表示反对或接受，实际他们并无任何实践经验。他们只能参与制订有关一大堆地区问题的法律。因为一个立法机关没有有效的报道手段和分析方法的话，一定會在盲目的规律性当中动摇不定，为偶然的造反而发怒，以及互投赞成票，以通过对彼此有利的提案。正是因为互投赞成票，以通过对彼此有利的提案，因而达到了满意的一致。一个国会议员就是以这种做法，向他的较为积极的选民，证明他是在捍卫着他们所设想的利益的。

这不是个别国会议员的过错，除非他以这样做而自满。最聪明和最勤劳的代表也不能够期望理解他所表决的法案的细节。

他能够作的，充其量也只是对极少数的法案进行专门的研究，对于其它法案就相信别人的话。我认识一些国会议员，在他们专政一个问题的时候，在通过了最后的调查，喝完了大杯黑咖啡，拭去额头的汗水之后，又去研究那些没有研究的材料。他们必须探究消息，正为整理和检验事实材料而烦恼，而在任何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政府中都应该易于获得这些以适合于决议的形式出现的事实材料。即使当他们真正了解一个问题时，他们的忧虑也还只是开始。因为在他们的家乡主编们、贸易董事会、中央联合工会和妇女俱乐部都不再在这些工作上费力，准备通过地区的眼光来观察国会议员的表演。

## 六

国家政府中的政治领袖存在着官职委任权的话，自我中心的社会就有无穷无尽的各种地区的津贴和特权。官职的委任权和政客假公济私给手下人以好处，使无数的特殊意见、地区的不满和个人的野心混合在一起，并趋于稳定。只有另外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恐怖和顺从来建立政府，另一种则是把政府建立在这样一种高度发展的依靠信息、分析和自觉的制度的基础上，使每个人都清楚地了解关于“国家形势和治国之道的知识”。专制制度正在衰败，具有自由意志的制度正处在早期发展阶段；所以，在考虑巨大的团体之间的联合、国际联盟、工业国的政府或者一个联邦国家的前景时，为了维持一个共同的需要多大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就决定了合作将在多大程度上依靠武力，或者依靠较温和的武力的代替品——官职委任权和特权。象亚力山大·汉密尔顿这样的伟大的开创一个国家的人物，他们的秘密就在于懂得怎么去算计这些原则。

## 第十九章 新形式中的旧偶像： 基尔特社会主义

### 一

每当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集团争吵得忍受不了的时候，过去的一些改革家往往被迫在两种大的可供选择的办法中作出选择。他们可能走罗马的道路，并且把罗马式的和平强加给战争的部落。他们也可能走孤立的道路，达到自主和自给自足。他们几乎总是选择一条距自己最近走得最少的道路。如果他们试验了失去生命力而单调的帝国道路，他们深深感到珍爱的东西就是他们自己社区的无条件的自由。但是，如果他们已经看到这种无条件的自由在狭隘的猜忌中被驱散了，他们就渴望得到一个强盛帝国的貌似有理的秩序。

无论他们作出了什么选择，基本的困难都是一样的。如果决定是分权制的，那么立刻就陷入地方意见的一片混乱之中。如果这些决定是集权制的，那么国家的政策就以首都一小群人的意见为基础。无论如何，武力是必要的，用以保卫一种地方权力，反对另一种权力，或者用以把法律和法令强加给地方，或者用以抵制中央的阶级政府，或者用以反对外来的野蛮人。

现在的民主制度和工业体制都是在反对皇帝、王国政府和一种具有详细经济法规统治的时候产生的。在工业领域中，这种反应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权力下放的形式，称之为自由放任主义。每一项经济上的决定都由拥有财产的人作出的。因为几乎每一件东西都是为一定的人所拥有，每一件事也就由一定的人所控制。这是力量极强的双重统治权。

从任何人的经济哲学说，这都是经济统治，虽然，它应该受

到不可改变的政治经济规律所支配，最终必然出现协调一致。它产生出许多极好的事情，但是，也产生出一些够肮脏可怕的事情而引起了逆流。其中之一就是托拉斯，这种托拉斯在工业内部建立了一种罗马式的和平，而在外部则建立了一种罗马式掠夺性的帝国主义。人民为了减轻压迫而求助于立法机构。他们恳求代议制政府建立在区、乡农民的典型上，以调节半自主的公司。工人阶级求助于劳工组织。接着一段时期出现了继续增强的中央集权和一种军备竞赛。一些托拉斯实行联锁，一些行业工会结成同盟并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由于一些革新者试图与大企业较量，政治体制的发展趋势是华盛顿的力量较强，各州的力量较弱。

在这个时期中，几乎所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学派从马克思主义左派到西奥多·罗斯福周围的新民族主义者，把中央看作是一种演变的第一阶段，这种演变会通过政治国家来结束吸收企业的一切半自主权力。这种演变从来不曾发生，除非进行战争的几个月中。那也足够了，时间的车轮又转过来反对全能国家，而有利于多元论的几种形式。但是，这时候社会就不是转回到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和托玛斯·杰弗逊的农民的“原子个人主义”，而是转到一种志愿集团的“分子个人主义”了。

在所有这些理论的动摇不定之中，有兴趣的事情之一，就是没有一个人为了生存必须追随马基雅维里式政治家（指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政治家——译注）的世界。他们都建立了某种形式的高压统治，为了保存自身，他们都实行了高压统治，由于高压统治的结果，他们都被抛弃了。然而，他们并不承认高压统治不论在物质的权力或特殊的地位、官职委任权或特权等方面都是他们理想的一部分。个人主义者认为自我开导的自身利益会带来内部的和外部的和睦。社会主义者肯定侵略的动机将消灭。新的多元论者希望他们会是那样<sup>①</sup>。除了马基雅维里的理论以外，

---

<sup>①</sup> G. D. H. 科尔：《社会理论》，第142页

几乎在所有的社会理论中都把高压统治看作是无理的。因为高压统治是荒谬的、无法形容的和难以控制的，对它置之不理就成为想要使人类生活理想化的任何人所关注的压倒一切的企图。

## 二

G. D. H. 科尔先生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书说明，一个聪明人为了避免充分承认武力的作用，有时会走得相当远。他说，现在的国家“基本上是高压统治的一种工具”；<sup>①</sup> 在一个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社会中，虽然会有一个协调的机构，但不会有统治权力。他称这种机构是“公社”。

然后他开始列举公社的一些权力，据我们回忆，这种公社基本上是不作为武力统治的工具的<sup>②</sup>。它调节价格争端，有时候它制订价格，分配剩余物资或者分摊损失。它也分配自然资源和控制发放信贷，它亦“分配公社的劳动力”，它批准基尔特和行政机构的预算，它征收税款，“全部收入问题”属于它的管辖范围。它向公社的非生产人员“分配”收益。它是全部政策问题和基尔特之间的权限的仲裁者。它通过组织法来确定职能机构的作用。它任命法官，它授予基尔特以强制的权力，并批准包含强制的地方规章。它宣布战争与媾和。它控制军队。它是对外的最高代表。它在全国范围内解决边界争端。它建立新的职能机构，或者对旧的职能机构分配新的职能。它掌管警察。它制订调节个人行为和个人财产所必须的一切法律。

这些权力并不是由一个公社来行使，而是由一个有全国公社领导的地方和省的公社的联盟机构来行使的。当然，科尔先生是欢迎坚持说这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但他却忘记提到是否存在一

---

① 科尔：《基尔特社会主义》，第107页。

② 科尔：《基尔特社会主义》，第8页。

种受到现代政府所喜爱的武力统治的权力呢，我们不能想象这一点。

不论怎么样，他告诉我们，那种基尔特社会将是非武力统治的：“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这种社会在精神上将设想为不是武力统治的，而是免费的服务”<sup>①</sup>正象许多男女一样，每一个同意那种希望的人，都密切注意到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计划中所允许的把武力统治降到最低限度，纵然这样，今天的基尔特人已经为他们的公社保留了最广泛的武力统治的权力。人们立刻认识到，这种新的社会的存在还是不能得到普遍赞同的。科尔先生太老实，以致不能逃避为了促使这种转变所需要的武力因素。<sup>②</sup>很明显，尽管他还不能够指出可能会发生多少内战，但他很清楚必须有一个阶段让工会直接发挥作用。

### 三

还是先把转变的问题搁在一边，而且也先不考虑其未来活动的效果，当人们在已作出保证的领域进行探索的时候，就让我们想象这种基尔特社会是存在的。那么，维持这样一个非武力统治的社会的是什么呢？

科尔先生对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一个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答案，即废除资本家的财产将会除掉侵略的动机。然而，他并不真正相信那个答案，因为如果他相信它的话，他就会象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几乎不担心一旦工人阶级掌了权，他们会怎么掌管政府。如果他的判断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下列说法就会是正确的了：如果其弊病在于资产阶级，而且只是在资产阶级，那么，挽救的办法自然就是消灭它。但是，科尔先生极大地关心革

---

① 科尔：《基尔特社会主义》第141页。

② 参看科尔：《基尔特社会主义》第10章。

命以后的社会是否由国家集体主义来管理，还是由一些基尔特或一些合作社，由一个民主政体的议会或由职务上的代表来管理。实际上，由于是代议制政府的新的理论，基尔特社会主义就引起了注意。

基尔特的人们并不期望在取消资本主义的财产权以后产生出一个奇迹。他们确实期望如果收入均等成为一种规定，那么社会关系就会有深刻的变化，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据我的理解，他们在这方面与正统的俄国共产党是不一样的。共产党提出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建立平等，认为如果一旦人民在收入和服务上都平等化了，他们就会失去侵略别人的刺激。基尔特人也提出通过武力建立平等，但是，他们十分敏锐地看到，如果一种均等是需要加以维护的话，他们就必须提供一些维护均等的机构。所以，基尔特人信仰他们认为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

科尔先生说，他们的目的是“建立正确的机构，并且尽可能使它表达人们的社会意愿。”<sup>①</sup>这些意愿在自治的“任何和每一种社会行动的方式中，”都需要有自我表现的机会。这些言词的背后是真实的民主冲动，是增强人类尊严的愿望，也是传统的设想，即如果每个人的意愿不在参与管理每一件与他有关的事上体现出来，那么这种人类的尊严就会受到指责。所以，基尔特人象早先的民主主义者一样，寻求能实现这种自治的理想的一种环境。从卢梭和杰弗逊以来，已过去了一百多年，注意的中心已从乡村转到城市。新的民主主义者已不能把理想化了的农村区乡变成民主的典型。现在他转向车间，“这种联合的精神必须在最能充分地表达出来的领域里得到自由地发挥。这种领域明显地就是工厂，在工厂中，人们有一起工作的习惯和传统，工厂是工业民主政体的自然的和基本的单位。这意味着不仅工厂必须尽可能自由地管理它自己的事务，而且，工厂这个民主单位必须成为较大的

---

① 科尔：《基尔特社会主义》第16页。



基尔特民主政体的基础，成为较大的基尔特行政机关和政府必须主要地建立在工厂代表制的原则基础上。”<sup>①</sup>

当然，工厂是一个含义很宽的词，科尔先生要求我们把它理解为矿山、船坞、码头、车站以及属于“生产的自然中心”<sup>②</sup>的一切场所。但是，在这种意义上说，工厂与工业是很不同的东西。科尔先生所设想的工厂是一个人们有真正的个人接触的工作场所，是一种足以使所有工人都能彼此直接了解的小的环境。

“这种民主政体如果真正存在，必定是为基尔特的每一个成员所理解，而且能够为基尔特的每一个成员所直接运用的。”<sup>③</sup>这是重要的。因为科尔先生象杰弗逊一样，正在探索一个行政管理的自然单位。唯一的自然单位就是一种完全熟悉的环境。现在的一个大工厂、一个铁路系统、一个大煤田都不是这种含义的自然单位。除非那是一个确实很小的工厂，科尔先生真正思考的是车间。那是能被人们设想为有“一起工作的习惯和传统”的场所。其它的工厂、其它的工业则是一种推断出来的环境。

#### 四

任何人能够看到，而且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承认，纯粹车间内部事务的自治就是管理那些“能够用一种单一的观点加以处理”<sup>④</sup>的事务。但是，对于什么是一个车间的内部事务，会引起争论。例如象工资、生产的标准、原料的购买、产品的产销、较大的工作计划等这些最大的利益，明显地决不是纯粹的内部问题。车间的民主政体有自由，但要服从大量来自外界的限制条件。它能够处理一定范围的为车间所安排的工作，它能处理个人的性情和脾

---

① 科尔：《基尔特社会主义》第40页。

② 科尔：《基尔特社会主义》第41页。

③ 科尔：《基尔特社会主义》第40页。

④ 亚里士多德：《政治经济学》，第7册，第4章。

气问题，它能执行小规模的个人裁决，并且在一些较大的个人争执中担当初审法庭。最重要的是它能够作为一个单位与别的车间或许整个工厂打交道，因而孤立是不可能的，这种工业民主政体的单位彻底地纠缠在外部事务中。正是这些对外关系的管理，构成了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的检验。

他们必须受代议制政府的管理，这种代议制政府按照联邦的秩序从车间到工厂、从工厂到部门工业，从部门工业到国家，再加入中间地区的代表组成。但是，所有这些结构都由车间衍生出来，所有它的优点都归之于这种起源。科尔先生宣称，一些代表选出另一些代表，由一种真正的民主政体选出最终“协调”和“调节”车间的代表。因为他们最初产生于自治的单位。整个联邦的机构会受到自治的精神和现实情况的鼓舞。代表的目标是要实现“他们所理解的工人的实际意愿，”<sup>①</sup>那也就是一些车间中的个人所理解的。

如果历史起什么指导作用的话，一个政府呆板地按照这种原则来行事，就会成为或是一种永远互相捧场的局面，或是一种车间互相争斗的混乱局面。因为当车间的工人能够对于纯属车间内部的问题有一种真正的意见的时候，他对于那个车间与工厂、部门工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意愿”是受到很多限制的，这些围绕其他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見的限制有获得信息的机会的局限、固定的成见、自身利益等。他在车间中的经验至多只是产生全部注意力的一些方面。他对车间内部问题的意见，能够根据对基本事实的直接了解来得出。在广大的看不见的复杂环境中，如果只是从个别车间的经验来概括，那么，他的意见多半是错误的。就经验而言，基尔特社会的代表们正象工会的高级办事人员今天发现的一样，他们必须作出决定的大量问题并不包含一些车间“所了解的意愿”。

---

① 科尔：《基尔特社会主义》第42页。

## 五

不管怎样，基尔特的人们坚决认为这样的批评是盲目的，因为它忽视了一种重大的政治发现。他们会说，你认为车间的代表们必须对车间没有主意的许多问题作出他们自己的决定，你的这种想法可能是很对的。但是，你只不过是纠缠在一种古老的谬论之中：你是在寻找某个人去代表一群人。这种代表是不可能找到的。唯一可能找到的代表是发挥“某种特殊职能”的人，<sup>①</sup>所以，“有多少种独特的基本职能需要发挥”，每一个人就必须帮助选择多少代表。

假设这些代表不为车间的人说话，而是为这些人感兴趣的职能说话。你注意，如果他们所属的那个集体认为他并没有传达他们的意愿的话，<sup>②</sup>那么，他就是不忠实的。这些发挥职能的代表相会了，他们的任务是协调和调节。每一个人用什么标准来判断别人的建议呢？我们必须假定，车间之间是有意见分歧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协调和调节的必要了。

由于职能民主制的特殊优点应该是人们公正地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进行选举，这种利益被认为是从日常的经验中得来的。在自治的集体之内，他们能够那样作。但是，在整个集体或其代表的外部关系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则是超出直接经验的。车间对于整个情况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得出一种看法。所以，一个车间关于它在部门工业和社会中的权利和义务的舆论，是教育或者宣传的问题，而不是车间意识的自动的产物。不论基尔特人选举一个一般性的代表或者正式的代表，他们并不回避正统的民主主义者的问题。无论是整个集体，或者是选出来的发言人，都必须把他

---

① 特尔：《基尔特社会主义》第23、24页。

② 参看本书第5部分：《创造一种共同的意愿》。

们的思想扩展到直接经验的限度以外。对于别的车间提出的问题对于整个部门工业领域以外的事情，他都必须发表意见。车间主要感兴趣的事甚至都不包括整个部门工业的使命问题。一种行业、一个庞大的工业、一个地区以及一个国家的职能都属于一种概念，而不是一种经验，是需要加以想象、创造、教育和信奉的。即使这样，你尽可能仔细地给职能下定义，从前你认为每一个车间对于职能的观点不必要与别的车间的观点相同，现在你说，代表一种利益的提议与代表别种利益的提议仍然是有牵连的。就是说，他必须设想一种共同的利益，在选举他的时候，你在选择一个不只代表你对你的职能看法的人，这是你直接了解的，而且要代表你对别人那种职能观点的看法。你就象正统的民主主义者那样不明确地在进行选举。

## 六

基尔特人通过玩弄“职能”这个词已经在思想上解决了怎么设想共同利益的问题。他们想象在一个社会中，世界所有的主要工作都已被分解为许多职能，这些职能又反过来协调地综合起来<sup>①</sup>。他们假定，对于整个社会的意图已基本协商一致。对于每个有组织的团体为实现这些意图所承担的任务也基本协商一致。所以，就是这种美妙的想法促使他们依据天主教封建社会里产生的一种制度为他们的理论命名。但是，他们应该记住，他们所假设的那个时代的聪明人的职能方案并不是由必有一死的当时的人们制订出来的。基尔特的人们怎么设想将制订出这种方案来，并且使它能为现代世界所接受，这个问题是不清楚的。有时候他们似乎主张这种方案将由工会组织来提出，在另一些时候又主张公社将规定这些团体的固有职能。但是，他们是不是相信这些团体

---

① 参看科尔：《基尔特社会主义》第19章。

会规定它们自己的职能，这是有很大的实际区别的。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科尔先生都假定社会是能够通过一种社会契约继续存在的，这种社会契约是以“发挥主要职能的团体”都能接受的思想为基础而商订出来的，人们怎么来辨认这些主要的团体呢？根据我所能理解的，科尔先生认为一种职能就是一群人感兴趣的事。“职能民主政治的实质就是一个人应该多少次地来考虑他所感兴趣的一些职能。”<sup>①</sup>现在，对于“感兴趣”这个词至少有两种含义。你能用这个词来指一个人受到牵连，或者指一个人的思想被吸引住了。譬如说，约翰·史密斯可能曾对斯蒂尔曼的离婚案感兴趣，他就可能把每天夜间最后一版中这条新闻的每一个字都读过。另一方面，年轻的盖伊·斯蒂尔曼的合法地位发生危险，可能根本没有引起他自己的烦恼。而约翰·史密斯却对于他“利益”并无影响的一件诉讼案有兴趣，可是，盖伊则对于决定他的一生的问题却不感兴趣。我恐怕科尔先生是倾向于约翰·史密斯的。他是在回答“很愚蠢的反对意见”，即根据职能去选举就是要常常进行选举：“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兴趣，也不能够引起他足够的兴趣去对许多明显的问题进行投票，他放弃了他投票的权利，其结果与他盲目地去选举和不感兴趣地去选举，在民主的程度上是相似的。”

科尔先生认为没接受指示的选举人“放弃他的选举权利”，从这点推论，接受了指示的投票人表现了他们的兴趣，而且他们的兴趣表明了这种职能。”<sup>②</sup>“布朗、琼斯和鲁宾逊因此就不是各自投各自的票，而是象许多不同的起作用的选举人那样，有许多不同的问题要求他们感兴趣而联合行动。”<sup>③</sup>我相当地怀疑，科尔先生认为是布朗、琼斯和鲁宾逊在任何他们宣称感兴趣的选

---

① 《社会理论》第102页以及以后诸页。

② 参看本书第18章。“由于每个人都被假定为对重大的事件有足够兴趣的，看来只有那些每个人都感兴趣的事件才是重要的。”

③ 科尔：《基尔特社会主义》，第24页。

举中都一定具备合格的条件，还是未指名的其他什么人承担了他们所应该感兴趣的那种职能。如果要求我相信科尔先生所说的，那就是他克服了困难，通过大量奇妙的设想，说明放弃选举权利的人是没有接受指示的选举人，并得出结论说，起作用的选举不是受上级权力的安排，就是“从下面来”的商定，原则上说，一个人在他对选举感兴趣时他才可能去选举，只有受指示的人，不管怎么，总会去选举。所以，机构将起作用。

但是，有两种没接受过指示的选民。有一种人他不了解，而且他知道自己并不了解。一般说来，他是一个开明人士。他就是放弃选举权的人。然而，也有一种人没有接受过指示，并不知道他处于什么地位或应注意什么。如果政党机构在起作用，他能够被抓到投票处去。他的选票是这个政党机器的根基。由于基尔特社会的公社对征税、工资、物价、信用和自然资源都有很大的权力，所以，一些选举至少就会象热忱地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一样。

人们显示他们兴趣的方式就不会限定于一个职能社会中的种种职能。有两种别的方式可能限定职能。一种是通过工会，它进行了斗争才使基尔特社会得以形成。这种斗争使得一些集团的人在某种职能关系中团结得更紧，这些集团因而就成为基尔特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其中的有些人，象矿工和铁路工人，就会是很坚强的，这可能与他们在向资本主义斗争中，认识到他们的作用有很深的关系。就象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处于有利地位的工会，会成为团结一致和统治的中心。但是，一个基尔特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发觉他们是难以对付的问题，因为直接行动会表现他们战略性的权力，他们的某些领导人至少不会在自由的圣坛上欣然同意奉献这种权力。为了使它们“协调”一致，基尔特社会就必须集合这些力量，我想，很快就能发现基尔特社会主义中的一些激进分子，他们一定要求加强公社，使它足以去限定基尔特的职能。

但是，如果你打算由政府（公社）来限定各种职能，那么，这种理论的前提就不存在了。为了使自给自足的车间会自动地把

他自己与社会联系起来，就必须假定关于职能的方案都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每一个选民的脑子里没有固定的职能方案的话，那么，基尔特社会主义并不比正统的民主政体使他有更好的办法把一种自我中心的意见转变成为一种社会的判断。当然，可能不存在这种固定的方案，因为即使科尔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设计出了一个好的方案，产生所有权力的车间民主政体就会通过他们对这个方案的学习和他们的想象，在实施中来对这种方案进行判断。各个基尔特会用不同观点看待同一方案。所以，不是这种方案成了保持基尔特社会一致的骨架，而是在基尔特社会主义下象别的地方一样，把试图解释这方案应是什么当成了主要的政治事务。如果我们能够承认科尔先生的职能方案，我们就几乎能够承认他的一切了。不幸的是他把他所希望的一个基尔特社会的推论插入他的前提中了<sup>①</sup>。

---

① 我曾论述科尔先生的理论而不曾论述苏联的经验，因为证据是不完全的，所有有能力的观察家似乎都同意1921年俄国并没有体现出是一个正常运行中的共产主义国家。俄国正在革命中，你能从俄国学习到的乃是革命是什么样的。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是什么样的，你能学到的则很少。无论如何，极为重要的，首先是实际的革命家，然后才是公务员，俄国共产党人没有依靠俄国人民的自发的民主，而是依靠一个特殊阶级——共产党的忠诚和受灌输的成员——的纪律、特殊利益和高尚义务。没有规定“过渡时期”的期限，我认为，在“过渡时期”中对阶级政府和强制的国家的对策就是严格的顺势疗法。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为什么选择了科尔先生的书而不是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韦布写的更周密地评论的著作《大不列颠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宪法》，我十分钦佩那本书，我始终认为那是理智的特殊成就。在我看来，科尔先生在社会主义运动的精神方面更有根据，所以是更好的证明。

## 第二十章 一种新的偶像

### 一

我认为这教训是相当清楚的。在缺乏一种组织机构来对环境进行很详细的报道和通过报道来进行教育的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现实与自我中心的意见形成鲜明的对照，共同利益为整个舆论很不理解，只能够由个人利益超越地区的特殊阶级来掌管。因为这个阶级是根据大家都不知道的消息去行事的，在公众一般不去设想的情况下，它不负责任，只根据既成事实，它才能承担责任。

由于民主的理论不承认自我中心的意见是不足以实现好的行政管理的，它就陷入了理论和实践之间不断的抵触之中。正象科尔先生所说，根据这种理论，人的十足的尊严要求他的意愿应该“以社会行动的任何方式和每种方式”表现出来。因为设想他们出于本能都具有行政管理的技巧的，所以，表现他们的意愿是消耗人们的热情。但是，就单纯的经验而言，自决只是人类的许多利益之一。一个人想要作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是一种强烈的愿望，但是，还必须与其它一些同等强烈的愿望相调节，例如，要求一种好的生活，要求和平，要求解除一些负担。在民主的一些最初设想中，曾认为每个人的意愿的表现，不仅自发地满足他自我表现的愿望，而且满足他要求一种良好生活的愿望，因为在良好的生活中表达一个人的私利是固有的本能。

所以，着重点总是放在表现意愿的机能上。民主主义的艾尔特拉多<sup>①</sup>一直是很完美的环境和很完美的选举和代议制度，在那里，每个人固有的良好意愿和天性的政治家才能都可以化为行动。在有限的区域内和短暂的期间，这种环境是那么有利，那就是

---

① 假想中的南美洲的黄金国，理想中的幸福地。——译注。



说，那样与世隔绝，那样充满机会，以致这种理论很足以坚定人们的信念，认为它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都是合理的。那么，当孤立终止时，社会变得复杂，人们必须调节他们自己相互间的关系，使之更为密切，民主主义者化费了时间试图设计更为完善的选举单位，正象科尔先生说的，他希望以某种方式“把机构搞得正确，并且尽可能使它适应人们的社会意愿”。但是，当民主主义的理论家忙于这一点时，他是远离了人性的实际利益的。他被一种兴趣——自治所吸引。人类对于各种其它事物感兴趣，按顺序说，那就是对其权利、对繁荣、对视域和听力范围以及对于不受干扰都感兴趣。至于自发的民主政治并不满足他们的其它利益，在多数人看来，大部分时间都成了空洞的东西。因为成功的自治本领并不是本能的，人们并不是为了自治而渴望自治。他们期望的是自治的结果。那就是为什么当反对不利的形势时，自治的冲动总是最强烈的。

民主政体的谬误在政府的起源中就已存在，而不是产生在其过程和结果中。民主主义总是假设如果能够以正当的方法取得政权，那将是有益的。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权力的起源上，因为他迷信表达人民的意愿是重大的事，首先，因为表达就是人最感兴趣的；其次，因为意愿天性地就是好的。但是，在源头上进行再多的调节，也不能完全控制其行为，当民主主义者全神贯注地试图寻求一种创始社会权力的好机构，也就是一种好的选举和代表制的机构时，他们几乎忽视了人们的各种其它兴趣。因为不管权力怎么创始，关键的兴趣在于权力是怎么行使的。决定文明的质量的是权力的运用。而这种权力的运用是不能够在权力的来源上加以控制的。

如果你想要在根源上完全控制政府，你就不可避免地使所有根重要的决定都成为无形的。由于并不存在自动作出一些政治决定来创造美好生活的本能，实际行使权力的人不仅不能够表达人民的意愿，因为大多数问题并不存在什么意愿，而是他们按照向全

体选民隐瞒的意见来行使权力的。

那么，如果你发现民主哲学全部设想的结果中说明政府是本能的，所以，它能根据自我中心的意见来管理，那么，在人的尊严中又有什么东西会表现为对民主的忠诚呢？它通过联系整个人格而不是联系人格的不足的方面来取得富有希望的新生。因为传统的民主主义者在一个很危险的设想上有冒犯人类尊严的风险，而他要在明智的法律和良好的政府中本能地显示那种尊严，选民们并不那样作，所以，民主主义者永远被讲求实际的人们看得有点愚蠢。但是，如果你不是把人类的尊严连结在自治的设想上，而坚持人的尊严要求一定的生活水平，并且可以适当地发挥他的才能，整个问题就有所改变。你对政府提出要求的标准是：是否创设了某种最低限度的健康条件、象样的住房、物质需要、教育、自由、乐趣、美好的事物等等，而不单纯是在牺牲所有这些东西的情况下，它是否震动了一时浮动在人们思想里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见。在这些标准能够比较明确和客观的范围内，作为由比较少的人所关心的政治决策，实际上与人们的利益联系起来。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设想这样的景象，即所有的人都会对整个超出视野以外的环境了解得那么清楚，致使他们对政府的全部事务自然而然地都能产生健全的舆论。即使有这种景象，我们中的许多人是否会希望去操这份心，或者会逐渐地对影响我们的“任何一种和每一种社会行动的方式”去提出一种意见。唯一不属于空想的景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范围内对于视野外的世界的现实图景能有越来越多的作为，而且我们将使越来越多的人成长为保持这些图景的现实性的专家。在我们自己可能注意到的相当狭窄的范围以外，社会控制依靠设想出一些生活的标准和决算的方法，衡量公务人员与工业主管人的行动也通过这些标准和方法。我们自己不能够象神秘的民主主义者所一直想象的那样去授意或者指导所有这些行动。但是，我们可以坚决要求把所有这些事清楚地记录下来，对它们的结果也进行客观的衡量，这

样，我们就能对这些行动扎实地加强真正的控制。或许我们可以说，我们能够希望逐步地坚持这种要求。因为设计这样一些标准和制订这样一些予算的工作还刚刚开始。

## 第七部分 报 纸

### 第二十一章 买主们

#### 一

人们为了统治世界，必须进一步研究世界，这种观点在政治思想中只占极次要的地位。它所能说明的东西是很少的，因为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到建立了民主政治前提的时代，用各种方式向政府报道世界的有用的机构只取得了很小的进展。

如果你讯问一位民主主义的先驱者，消息是从哪里来的，人民的意愿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他会被这些问题搞得迷惑不解。看来有点儿象是你曾问他，他的生命或者他的灵魂是从哪里来的一样。他几乎总是假设，人民的意愿在任何时候总是存在的；政治科学的责任是制订出关于投票权和代议制政府的一些设想。如果这些都适当地设计出来了，并且应用于合适的环境下，譬如存在于自给自足的乡村或者自给自足的车间，这种机构以某种方式克服了亚里士多德观察过的那种短暂的注意力，以及为自给自足的村社理论所默认的狭窄的范围。在最近，我们曾见到一些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怎么被这种概念所戳穿，这种概念说，如果只有你能够依赖正确的选举和代表制的单位，那么就可能出现一种错综复杂的共和国。

使人信服的是，如果你能发现智慧，智慧是存在的。民主主义者曾把形成舆论的问题看作是法律规定的公民自由权的问题<sup>①</sup>。“究竟有谁知道真理在自由和公开的交锋中曾经被击败

---

① 最好的论文是泽卡赖亚·查非的《言论自由》。

过？”<sup>①</sup>假定没有人曾见到它被击败过，那么，就象火是由两根木枝摩擦产生的一样，我们还相信真理是通过交锋产生的吗？美国的民主主义者以这种经典的自由理论为后盾，体现在他们的人权法案中的，实际上有几种不同的关于真理的起源的理论。其中之一是信念，相信在意见的竞争中，最真实的是会取胜的，因为真理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如果你允许这种竞争延长到一段足够的时间，还可能是正确的。当人们在这种意向中进行争论时，他们相信历史的裁决，尤其是料想到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会受到持异端的人的迫害，死后会被奉为圣徒。弥尔顿的问题也依赖一种信念，即认识真理的智能是所有的人所固有的，所以，真理在自由的流通中会赢得承认。从经验中同样推知，如果人们不能够说出真理，真理是不大可能会被发现的，除非在一个不明底细的警察监视之下。

没有人会过高地估计这些公民自由权的实际价值，也没有人看到保持这些自由权的重要性。当这些自由权处于危殆时，人类的精神也处于危殆中，一旦需要限制这些自由权利的时候，如战争期间，对这种思想的压制从文明来说是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可能很难从战争的影响下恢复过来，如果谁由于歇斯里的发作，而需要利用它，那么谁就会把战时的禁忌沿用到和平时期。幸运的是大多数人已忍受不了专业的调查人员，在人们不愿接受恐怖统治的批评下，十之八九的调查人员逐渐地被揭露出来，他们都是一些无知、卑鄙之徒<sup>②</sup>。

但是，不管公民自由权有多么大的根本重要性，就这种意义说，它并不对现代世界的舆论起保证作用。因为它总是假设，或

---

<sup>①</sup> 弥尔顿：《*Arsopagitica*》（反对新闻检查提倡思想自由的小册子），查非先生著书的开头曾引用。对于弥尔顿、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和伯特兰·拉塞尔所论述的这种自由的经典学说，见我著的《自由与新闻》第二章。

<sup>②</sup> 参看纽约勒斯克委员会的出版物，以及威尔逊总统患病期间美国司法部长米奇尔·帕尔默先生的公开声明和预言。

者真理是自发的，或者在没有外来干扰时，获得真理的手段是存在的。然而，当你涉及到一个超出你视野的环境时，这种假设就是错误的了。遥远的事物或者复杂的事物的真相并不是不言而喻的，而汇集消息的机构是需要技术和财力的。但政治科学，特别是民主政治科学，从来还没有使它自己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原始假设中解放出来，充分地重申那种前提，以使政治思想有可能设法解决怎样使现代国家的公民们了解那超越他们视野以外的世界的问题。

这传统是那么深，例如，直到最近在我们大学政治学的教学中就象报纸并不存在一样。我不是说新闻学院，因为它们是专业学院，旨在培养一种专业人员。我谈的是培养未来的企业家、律师、公务员和一般公民的政治学。在那门科学中，不研究报刊和流行的消息的来源，这是难以理解的事实。任何一个对政治学没有常规兴趣的人几乎很难理解，竟然没有一个研究行政管理的美术学者，也没有一个社会学家曾写过一本关于新闻采访学的书。有些偶而提到报刊，一些说明应该是“自由的”和“说真话的”，实际却不是。但是我几乎找不到其它东西。这种专业性的鄙弃同样存在于舆论中。普遍地说，都承认报刊是接触超越视野以外的环境的主要工具。实际上，无论在那里都假设报刊应该自发地为我们办事，就像原始的民主政体所想象的我们每个人都能为自己所做的那样，每天和一天两次为我们提供我们所感兴趣的所有现实世界的真实情景。

## 二

一种明显而古老的信念认为真情并不是自己求得的，而是他人授与、揭示和免费供给的，这种信念是非常简单地从我们作为报纸读者的经济偏见中产生的。我们希望报纸给我们提供真实情况，而不管提供这种真情是多么赔钱。我们承认这种供应是非常

重要的，但对这种艰难而且常常带有危险性的供应，直到最近，我们只愿意用铸币厂制造的最小的硬币付给报纸。我们现在已习惯于在平日（星期日除外）付给二分甚至三分钱，在星期日，对于附有插图的百科知识和轻歌舞的娱乐材料等等增刊，我们适当地多付给五分或甚至一角。没有人认为他应该付钱给他的报纸。他期望真实的情况像泉水一样涌出，但却没有缔结任何法律的或者道德上的合同，他自己不承担任何风险、费用或者麻烦。在合意时，他就付给微不足道的价钱，什么时候他不想付就不付，当另一张报纸合意时，就会转向另一张报纸。有人曾说得十分恰当，每天都必须重新选择报纸的主编。

读者们与报刊之间的这种临时的和单方面的关系是我们文化的一种异常现象。再没有别的什么与这种关系十分相象的了，所以，很难以报刊与任何别的企业或别的机构相比较。报刊不是一种纯粹的和单纯的企业，原因之一就是这种产品的售价经常低于成本，但主要是因为社会用一种伦理的尺度来衡量报刊，而用另一种伦理尺度去衡量商业或制造业。从伦理上说，一张报纸被认为就象一座教堂或一所学校。但是，倘若作这样的比较，你又错了；公立学校是由纳税人供给经费的，私立学校是学费资助或支持的；教堂则有津贴和捐助。你也不能够把新闻事业与法律、药品或者工程相比，因为这些专业中的每一种都是由消费者付给劳务费用的。如果你从读者的态度来衡量，那么一张自由的报刊就意味着报纸实际上是送给的。

然而，当报刊的批评家们期望报刊这样的机构与学校、教堂和那些无私的专业保持同样的水平时，他们仅仅是按社会的道德标准说的。这再度说明民主政体的凹向性质。没有必要人工地获得消息，消息必须自然地得来，那就是说无偿的，如果不是出自公民的内心，就是无偿地出自报纸。公民付费给他的电话、他的火车、他的汽车、他的娱乐。但是，他不公开付费给他的新闻。

不管怎样，他会付优厚的待遇找人读关于他的报道，他会直

接支付广告费。他还会间接支付别人的广告费，因为他并没有实际认识到那是隐藏在商品价格中的一笔钱。尽管公众将付出更多的钱来购买刊登过广告的商品，倘若知道为了所有世界新闻而必须公开付费给优质冰淇淋、汽水的价钱。只是当支付的这种款项是隐蔽的时候，公众才付钱给报刊。

### 三

所以，发行量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只有当它能卖给广告商的时候，它才成为一种宝贵的财富。广告商用间接向读者征得的税收来购买发行量<sup>①</sup>。广告商要购买的发行量是根据他必须卖什么而定的。他卖的可能是“高级的”商品，也可能是“大众化”的商品。总的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因为通过刊登广告销售商品，它们的顾客既不是数量小的很富裕的阶级，也不是数量小的很贫穷的阶级，而是一些购置必需品以后还有足够的盈余去自由购买其他一些东西的人。所以，大量报纸销售到相当富裕的家庭里，大体上这些家庭购买刊登广告的商品最多。报纸也销到穷人家，但某几种商品除外，分析广告代理商并不把那部分发行额列为大的财产，除非象赫斯特所拥有的某些报纸，其发行量是庞大的。

一张报纸如果激怒了最出得起钱购买广告商品的人的话，对于出钱刊登广告的人来说，它就成了一个不好的媒介。从来没有人声称过广告是慈善事业，刊登广告的人出钱在那些出版物中购买版面，当然是为了要赢得未来的顾客。一张报纸不需要耗费时

---

<sup>①</sup> 《纽约时报》的出版人阿道夫·S·奥克斯(Adolph S. Ochs) 1916年6月26日在世界联合广告俱乐部在费城召开的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一张确立的报纸有权利决定其广告价格，所以，它的发行纯收入记在损益帐的贷方。为了得出总收益，我将从总额中扣除推销、发行的开支和其它发行的附带开支。”见埃尔默·戴维斯(Elmer Davis) 著《纽约时报的历史》1851—1921，第397—398页引用。



间去忧虑没有报道谷类商人的丑闻，这些丑闻不体现真正的重要性，这一类的事件比许多自由报刊的批评所设想的要少见。真正的问题是一张报纸的读者不习惯于支付新闻采访的费用，只能被利用来作为销路卖给制造商和商人。那些最有钱购买东西的人就是最重要的可以利用的人。这样的报刊必定尊重买主的观点。报纸就是为这些买主而编辑和出版的，因为没有那种支持，报纸就不能生存。一张报纸能够藐视刊登广告的人，能够攻击强大的银行界或者公共运输业界，但如果它疏远买主的话，那就失去它的存在所必不可少的一种财产。

《纽约太阳晚报》早先的约翰·L·吉文(John L. Given)先生<sup>①</sup>1914年宣称美国出版的2300种日报中，大约有175种在10万居民的城市出版。这些是提供“一般新闻”的报刊。它们是收集重大事件新闻的主要报纸，即使是不读这175种日报中任何一种的人，最终也依靠它们得到外界的新闻。因为它们组成大的新闻协会，相互合作地交换新闻。所以，每一张报纸不仅为它自己的读者提供消息，而且还为其它城市的报纸担当通讯员。乡村报刊和专业的报刊基本上是从这些主要报纸取得它们所需要的一般新闻的。这些报刊比较起来，有一些是资本很雄厚的，所以，全国报刊的国际新闻大体上都依靠新闻协会和少数大都市日报的专门供稿社的报道。

粗略地说，一般新闻的采访费用，是由10万以上居民城市中相当有钱的那部分人在购买刊登广告的商品所化的钱中支付的。这些购买界是由一些家庭成员构成的，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贸易、经商、制造业方面和金融方面。他们是报纸广告最好的顾客，他们行使一种集中的购买力，这种购买力可能在总数上少于农民和工人；但是在一张日报经营的范围内，这种购买力是兑现最快的资

---

<sup>①</sup> 《报纸的制作》，第13页。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技术书，每一个讨论报刊的人都应该读它。迪尔利先生写的《国内大学图书馆中的报纸》一书中说（第253页）：“吉文先生的书是我所知道的关于报人论报刊的唯一好书。”

产。

#### 四

而且，他们在两方面都是需要予以注意的。他们既是广告主的最好顾客，又是广告主本身。所以，报纸在这部分公众中造成的印象极重要。幸亏这部分公众并不是意见一致的。他们可能“赞成资本主义的”，但是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以及怎么实行资本主义都存在着背道而驰的观点。除了危急的时候，这种值得尊重的意见足以导致不同的政策。如果出版者本人不是这些城市社团的成员，而且不是忠实地用他们的合伙人和朋友的眼光来观察世界的，那么这种分歧会更大。

他们从事一种投机生意<sup>①</sup>，这种生意视交易的总的情况而定，更为特殊的是，销路不是建立在与读者的“婚约”关系上，而是建立在“自由恋爱”的关系上。所以，每一个出版者的目的是要使他的销路从报摊的随意购买者变成一伙忠实的坚定读者。一张报纸能够真正依赖它的读者的忠诚的话，就能尽量达到独立，这是现代新闻事业的经济学。<sup>②</sup> 一群在任何情况下都紧倚着的读者是一种力量，这力量比任何广告主所能发挥的力量更大，这种力量大得足以打破广告主的联合体。所以，任何时候你发现一张报纸为了广告主而背叛了它的读者的话，你能相当地肯定，或者是出眼人忠实地同意广告主的观点，或者是他可能错误地认为如果他公开对抗广告主的命令，他就能指望他的读者的支持。那就是对新闻不付现金的读者是不是会对新闻表示他们的忠实的问题。

---

① 有时候那么地投机，为了获得贷款，出版者不得不陷入贷款人的束缚中。关于这问题的消息是很难得到的，而且为了那理由，常常过分地夸大它的重要性。

② 阿道夫·奥克斯（《纽约时报》的出版人）曾说：“这是出版报纸的一句格言——‘有更多的读者，就有更多的脱离广告影响的独立性；读者较少，则更多地依附于广告主’。看上去这对资产似乎是相矛盾的（然而它是真实的）；广告主的数量越大，他们能够对出版者施加的影响就越小。”参看上述出处。

## 第二十二章 坚定的读者

### 一

买主们忠于一张报纸，并没有在任何契约中订明的。可是，在其它的几乎每一种企业中，谁期望得到它的服务而与之缔结了一种协议的话，这协议就会控制他一时的兴趣。至少他得到的东西是付钱的。在期刊的出版中，一定期限内最接近于协议的东西就是预付订阅费，而我认为这在大都市日报的经济中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读者是对它的忠诚的唯一的和每日的判断者，倘若他毁约或者不支持，你不能控告他。

虽然每一件事都会影响读者的坚定性，但是，在读者心理中不存在什么模糊的传统。他的坚定性要看他碰巧怎么感觉或者看他的习惯而定。这些并不仅仅依靠新闻的质量，而更经常地依靠我们与报刊的非正式关系中的许多含糊的因素，这些因素几乎是我们难于意识到的。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要评价一张报纸，我们每一个人都注意通过与我们有关的那部分新闻的处理情况来评价。报纸涉及大量超出我们经验的事件。但是，它亦涉及一些我们经验以内的事件。我们常常通过它对这些事件的处理情况来决定我们喜欢它或是不喜欢它，信任它或是拒绝订阅它。如果这张报纸对于我们所了解企业、教堂、政党的报道是满意的，那么就肯定不会受到我们强烈的批评。一个人在早餐桌上除了用自己的观点与报纸的观点相核对以外，还能有更好的尺度吗？所以，有能力要求报纸担负最严格的报道义务的，多数不是普通的读者，而是那些专门为他们自己的经验辩护的人。

除感兴趣的当事人以外，很少有什么人能够检验一篇报道的准确性。如果是地方新闻，而且如果存在着竞争，编辑就知道他可能会听到关于他的描写是不公正或不准确的意见。如果不是地

方新闻，那么这种纠正的意见就会减少，因为题材离得很远。别的城市刊印的他们认为是歪曲了他们形象的报道，只有一些团体的成员能够纠正这样的报道；他们组织得很好，可以雇用一些宣传人员。

现在值得注意的是，普通的报纸读者如果认为他被新闻报道错了，那么，他在法律上是找不到立足点的。只有受侵害的当事人才能够对诋毁或者诽谤进行控诉，而且他必须提供伤害到他自己的证据。法律体现了这样的传统，那就是普通的新闻并不是共同关心的问题<sup>①</sup>，除非把事情模糊地描写成不道德或者带有煽动性的。

新闻虽然在总体上没有受到不感兴趣的读者的检验，但是，新闻的主要部分是包含了一些读者对之有很明确的先入之见的内容的。这些内容是他借以作出判断的材料，而人们阅读不带这种个人尺度的新闻时，他们就用其它的一些标准而不是正确的标准来判断。在这里，他们所阅读的题材在他们看来很难区别于小说的。真实的准则是不适用的。如果这种新闻与他们的成见相符，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接受它。而且如果对他们有兴趣，他们就会继续阅读它。<sup>②</sup>

## 二

即使在大城市，有一些报纸也是根据读者希望读到他们自己的消息这样一些原则来编辑的。这种理论是：如果够多的人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他们的名字，能够谈到他们的结婚、丧事、社交、

---

<sup>①</sup> 读者不会误认为这是对新闻检查的抗辩。无论如何，如果有足够的陪审员席，那将是好事，宁可不是官方的，在那里指控新闻中的不真实和不公正，能够得到详细审查，参看《自由与新闻》第78—79页。

<sup>②</sup> 例如，请注意厄普顿·辛克莱对社会主义报纸是多么缺乏愤慨，即使那些报纸对雇主是不公平的，他引用的某些报对激进分子也一样是不公平的。

国外旅行、分会会议、学校奖金、他们的50岁生日、他们的60岁生日、他们的银婚、他们的户外活动和海滨野餐会，报纸就会打开确实可靠的销路。

1960年4月3日霍勒斯·格里列写给正开始办一张农村报纸的弗兰德·弗莱彻的一封信中谈到这样一种报纸的最著名的公式。<sup>①</sup>

“1、开头用一种清楚的观念说明一般人最感兴趣的主题是他自己；其次，他最关心他的邻居。亚洲和汤加群岛在他所关心的问题中远远排在后面……。不漏掉这类新闻：一个新教堂建立起来，或者新的成员加入已建立的教堂，一个农场卖掉了，一幢房子建起来了，一个磨坊开工了，一家商店开业了，也不放弃发生的对十多户家庭感兴趣的任何事情，这些都要有充分的事实，虽简短，但都要记入你的专栏。如果一个农民砍了一棵大树，或者种了一棵巨大的甜菜，或者小麦和玉米丰收，尽可能简要地和不例外地报道这种事实。”

正象李先生所说的，“家乡的印刷日志”的作用就是不管什么地方出版的每一张报纸在一定程度上所必须具有的。象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里所销行的普通报纸，广播是不能代替它的，那里存在着一些为市内各区出版的格里莱式的小报。在曼哈顿和布朗克斯行政区有大约两倍于地区日志数量的普通报纸。<sup>②</sup>它们附有贸易、宗教、民族等各种专页增刊。

这些日志是为对自己的生活感兴趣的人出版的。但是，也有大量的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单调沉闷，他们希望象赫达·加布勒那样过更为惊心动魄的生活。有少量全张报纸是为他们出版的，附有一些其它的栏目，刊载一些想象的个人生活，读者从这些人的各种不道德行为找到与他自己相一致的地方。赫斯特先生对高等

---

① 詹姆斯·梅尔文·李在他的《美国新闻事业的历史》第405页引用的。

② 参看约翰·吉文的《制作一张报纸》第13页。

社会有持续的兴趣，迎合了从来不敢希望进入高等社会的人，让他们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一些提高，犹如他们也享受到了他们所读到的部分内容。大城市中的“家乡印刷日志”趋向于办成一套时髦的印刷日志。

正象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些城市的日报肩负着向公民报道远处的新闻的责任。但是，并不是依靠它们的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来保持其销路的。这方面的兴趣是断断续续的，极少出版人能单独指望它。所以，报纸还有各种各样的特写，全部都是为吸引读者而设计的，至于一些大的新闻并不可能成为关键性的。而且在任何城镇，大新闻的竞争并不很严重。新闻通讯社使主要的事件的报道都标准化了，只是偶尔抢先得到一次大的新闻，这种大型的报道并没有很多读者，这种情况造成了《纽约时报》成为具有各种意见的人所必不可少的读物。为了使各报本身有所区别，并吸引住稳定的读者，大多数报纸都走出普通新闻的领域。趋向于适应令人眼花缭乱的各个社会水平，刊载丑闻和犯罪新闻、体育运动的报道、图片、女明星、失恋的建议、中学告示、妇女专页、购买者专页、烹调法、国际象棋、惠斯特（类似桥牌的一种纸牌游戏——译注）、园艺、连环画页、极大的合伙关系等等，并不是因为出版人和编辑们对什么东西都感兴趣而就是对新闻没有兴趣，而是因为他们必须想些办法抓住作为主人的读者的个人兴趣，这些读者批评报刊总是叫喊真实，除真实以外，什么也没有。

报纸编辑处在一个奇妙的地位。他的企业依赖他的一些广告主间接向他的读者征税；一些广告主的光顾，依靠编辑的技巧把一批实际的顾客掌握在一起。这些顾客按照他们个人的经验和他们固定的期望来作出评论，因为他们对于所阅读的大多数新闻理所当然地并没有独立的知识。如果评论不是不利的，那么编辑至少就能保持销路。但是，为了获得那部分销路，他不能够完全依赖较大范围的新闻。当然，他尽可能注意掌握这一点，然而，一

般新闻的质量，特别是关于公众事务的新闻质量，是不足以使大量的读者在一些日报中产生偏见的。

报纸与社会消息之间的这种多少有几分不正常的关系在新闻记者的薪金中有所反映。从理论上说，报道工作是整个报纸工作的基础，然而却是报酬最低的报纸工作部门，也是最不受尊敬的。总的说来，有才干的人只是由于需要，或者为了取得经验，而且带着尽可能早点取得资格的明确打算才去干报道工作的。因为正直的报道工作并不是一项薪金很高的职业。新闻事业中的酬金付给专业工作，付给具有社论质量的署名通讯，付给主管行政职务的人，以及付给有技巧和有自己风格的人。无疑这应属于经济学者所谓的“才能的租金”。但是，在新闻事业中却如此违反这种经济原则，致使新闻采访并不象它的社会重要性那样，对一些受过训练的和有能力的人具有吸引力。我认为有能力的人带着尽快离开的想法来从事“正直的报道工作”这个事实，正是为什么它从来没发展到足以使那些共同的传统给予它一种专业的特权和一种唯恐失掉的自尊的主要原因。因为就是这些共同的传统造成了行业的骄傲，它倾向于提高准许加入的标准，它对违反法规的加以惩罚，并且给人们以一种力量去争取他们的社会地位。

### 三

然而，这还没有谈到问题的根底上。因为当新闻事业的经济学家这样降低新闻报道的时候，我认为，只有一种错误的决定论才会放弃对那问题的分析。记者固有的权力看来是那么多，为什么不象医学、工程学或者法学那样，在提高职业水平方面作出认真的努力呢？其中必有原因。

当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先生在一本他称为《大财团给报界人士的贿赂》(The Brass Check)的书中自称发现

了这种较深的原因时，他说代表了美国的一种主要意见。<sup>①</sup>

你为我们的报纸和杂志写稿、刊印和分发的话，你就在每周的工资中得到“大财团给报界的贿赂”。你拿着真理的纯洁的驱体，在市场上将它出卖，你把人类纯真的希望出卖给令人讨厌的大企业的妓院，你的耻辱的代价就是“大财团给报界的贿赂”<sup>②</sup>。

从这里看来，似乎存在着一种已经知道的真理的驱体和一种牢固的希望，这种真理和希望都或多或少地被一些有钱的报纸老板的有意识的阴谋所出卖了，如果这种理论是正确的话，那么，就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那就是在与大企业没有任何联系的报刊上，真理的纯洁驱体就会是没受损害的。因为，如果确有一张不受大企业所控制，并且连大企业的朋友也说不上来的报刊，不知怎么并没有包含真理的纯洁的驱体，那么，辛克莱先生的理论就出了毛病了。

是有这种报刊的。说也奇怪，辛克莱先生并没有建议他的读者去就近订阅激进的报纸，作为补救的办法。为什么不这样作呢？如果美国新闻事业的毛病一直追溯到大企业的贿赂，那么，为什么不把补救的办法放在阅读那些一点也不接受大财团给报界的贿赂的报纸上呢？为什么津贴一张具有“各种信念或动机”的庞大董事会的《全国新闻》去刊登充满了伤害不论什么组织——钢铁托拉斯或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美孚石油公司或社会主义政党——的事实呢？如果毛病在于大企业，即钢铁托拉斯、美孚石油公司之类，为什么不力劝每个人去阅读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或者社会主义的报纸呢？辛克莱先生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但是，这理由很简单，他不能够说服任何人，甚至不能说服他自己，怎么反对资本主义的报刊就是挽救资本主义报刊的办法。他不论是

---

① 希莱尔·贝洛克先生对英国报纸作出几乎相同的分析，参看《自由报刊》。

② 厄普顿·辛克莱：《大财团给报界的贿赂——美国新闻事业的研究》，第436页。



在他的“大财团对报界的贿赂”的理论中，还是在他的建设性的建议中，都忽略了反对资本主义报刊。但是，如果你在诊断美国新闻事业的毛病，你就不能够忽略它。如果你关心的是“纯洁无瑕的真实”，你在一组报纸上收集了全部不公正和撒谎的实例，而忽略了在另一组报纸上也能轻易找到的全部实例，然后肯定撒谎的原因，这在逻辑上并不犯严重的错误，其实，你根据想象的报刊的共同特点限制了你的调查。如果你为了报刊的错误而去谴责“资本主义”，你就不得不证明要不是资本主义对报刊的控制，那些错误就不存在。然而，辛克莱先生不能做到这一点，事实表明，当他调查分析时，他把各种东西都追溯到了资本主义，而在他的解决办法中，他却既忽视了资本主义，也忽视了反对资本主义。

人们会假定，不能把非资本主义报纸作为真实的和合格的模特儿，这就使得辛克莱先生和那些同意他的观点的人的假设看上去更值得批评。例如，他们会责问他们自己：“纯洁无瑕的真实”在哪里？大企业出卖了它，但反对大企业的看来也没有得到它。我认为，因为那些问题涉及到了实质，涉及到了什么是新闻的问题。

## 第二十三章 新闻的性质

### 一

全世界的记者整天地工作，也不能亲眼目睹世界上发生的全部事情。记者的人数不多，而且没有人能够在同一时间身处两地。记者并没有超人的视力，他们并不能象透视一个水晶球那样任意地观察世界，他们也得不到思想传授。如果不是一种标准化了的日常工作，这么少的人根本不可能报道这么广泛的题材。

报纸并不想要注意全人类的事。<sup>①</sup>它们有值守人员驻在某些场所，如警察局、验尸所、区事务所、市政厅、白宫、参议院、众议院等处。在多数情况下，驻守人员都属于一定的组织，这些组织雇用一些人观察“一小部分知名的场所，注意什么时候什么人的生活发生了反常的现象，或者什么时候发生了值得报道的事件。举例说，假定约翰·史密斯当了经纪人，他平平稳稳地经营了十年，除了他的顾客和他的朋友以外，没有别的人注意到他。对于报纸来说，他就象不存在一般。但是，在第十一年中，他遭受到严重的亏损，最后，他的资产全部蚀光，于是请来他的律师，清理他的财产。律师向区事务所宣告破产，区事务所的一个办事员在记事表上作了必要的登记。在这个时候，报纸就插手了。当办事员在写史密斯的破产宣告时，一个记者越过他的肩膀瞥见了，几分钟以后，记者们就都知道了史密斯的不幸，就象十年来有记者驻在他的营业所那样，消息灵通地熟悉史密斯的营业情况。”<sup>②</sup>

当吉文先生说报纸知道“史密斯的不幸”和“他的营业情

---

① 见约翰·吉文音的书中间明的章节，已引用关于“揭露新闻”第5节。

② 同前，第57页。

况”时，并不意味着报纸了解其情况象史密斯了解的一样，或者象阿诺德·贝内特在一部三卷的小说中把史密斯写成英雄那样了解他。一些报纸只是在区事务所记录赤裸裸的事实的几分钟内了解到的。那种公然的行动“宣布”了关于史密斯的新闻。这新闻要不要继续报道是另一回事，关键是当一系列的事情成为新闻之前，它的本身总常常有或多或少值得在意的明显的行动，而且是一种赤裸裸的明显的行动。史密斯的朋友可能知道他在冒风险已好多年了，如果史密斯的朋友是多咀的人，许多谣言甚至已经传给了财政金融的编辑。但是，离开了事实，这些谣传都不可能刊登出来，因为会构成诽谤的，在这些谣传中，没有足以写成一篇报道的确切的事实。某件事必须确切发生了，而且有不易误解的形式，它可能是面临破产的行动，它可能是一次火灾，一次撞车，一次袭击，一次暴乱，一次逮捕，一次谴责，采用一个法案，一次演说，一次选举，一次会议，一位知名公民发表的意见，一篇报纸社论，一次削价出售，一张工资表，一次价格变动，建筑一座桥的建议……。必须是一种明白表示出来的言行。事态的发展必须表现一种确凿肯定的状况，直至某些方面已成为既成事实，新闻才从大量可能的事实中分离出来。

## 二

一些事件什么时候才算达到了可以报道的状态，这问题自然会有很不同的意见。一个好的新闻记者比一个生手更能发现新闻。如果他看到一座建筑物危险地倾斜了，他就不必等到它倒塌在地上才认为这是新闻。当一个出色的记者听到某某勋爵在询问一些气候情形时，他就猜得出下一届印度总督的名字。有些猜测很幸运地猜中了，但能够这样幸运的人是很少的。通常某事件在一个显著的地方表现出了固定的形式，新闻就报道出来了。最显著的地方就是负责办理人民事务的机关，法律不管小事。就是在

这些地方公布婚姻、出生、死亡、契约、失败、抵达、启程、诉讼、混乱、时疫和灾祸。

因此，新闻首先并不是社会情况的一面镜子，而是一种突出的事实的报道。新闻并不告诉你种子如何在地里发芽，但它告诉你第一棵芽是什么时候出土的。它甚至会告诉你某人说种子在地下发生了什么情况。它也可能会告诉你芽没有在预期的时候长出来。任何偶然发生的事能被确定、具体化、衡量和定名称的越多，则能报道的新闻也越多。

所以，如果某天有一个立法机关已用尽了所有别的改善人类生活的办法，它认为应禁止足球比赛的评分，即使这样，仍然可以进行一些比赛。在这些比赛中，仲裁人根据他自己认为是公正的想法来决定比赛进行多长时间，各个球队参加球赛的时间，以及谁应该被认为是优胜者。如果这种比赛在报纸上报道了，它就会包括裁判员裁判的记录，加上记者对观众叫喊和欢呼的印象，最多再加上简要报道有少数人在场地上没有固定的座位，在一块无标记的草坪上转来转去，转了几个小时。你对这种荒谬的情况逻辑地想象得越多，你就越清楚新闻采访的效果（不管比赛的效果），没有叫名字、记分数和记录的器械及规则，是不可能进行许多工作的。因为器械远不完善，裁判员常常是心烦意乱的。许多比赛的紧要关头都要靠眼睛来判断。如果有人认为每场比赛都值得录相的话，那么，争执点就可以取出来。由于人的眼睛慢，对登普西的那一拳击倒卡本迪尔，还是由影片最后解决了许多记者思想上的真正疑虑。

哪里有好的记录器械，哪里就有新闻报道的精确性。股票交易所有记录器，价格变动的新闻以可靠的准确性闪现在股票行情记录器上。选举结果的报告有一架记录器，当计数和列表的工作做得好时，全国的选举结果通常在选举当天的夜间就能揭晓。在文明的社会里，死亡、出生、结婚和离婚都有记录，除非隐瞒或忽视，都能准确地知道的。企业和政府的有些部门有记录器，证

券、货币和主要商品、银行清理、房地产交易、工资级别各方面所用的记录器的精确度各不相同。进出口贸易因为要通过海关，能够用记录器直接记录下来。贸易方面特别是通过经纪人事务所的交易，都有一定程度的记录器。

我想，这就说明新闻的确凿性与记录体制有很直接的关系。如果你回忆革新者控告报纸的一些问题，你就会知道是由于报纸在没有评分的足球比赛中站在裁判员的地位的缘故。所有叙述心理的新闻都是这种性质的。例如，描写人物的品格、诚意、志气、动机、意图的，描写群众感受、民族感情、舆论、外国政府的政策的。描写什么事将要发生的新闻也是这样的。关于私人利益、私人收入、工资、工作条件、劳动效率、受教育的机会、失业<sup>①</sup>、生活单调、健康、歧视、不公正、贸易管制、浪费、“落后民族”、保守主义、帝国主义、激进主义、自由、荣誉、正义等问题的报道也都是这样的。全部包含的材料都是最易激动的记录。这些材料可能因为一种检查制度或一种保密的惯例被隐藏起来，也可能因为没有人认为它是重要的资料，或是因为被当作官样文章，或是因为没有建立一种可供衡量的客观制度而不存在了。因此，这类题材如果没有全被忽视的话，必然会引起争论。没有记录的事件，或者作为个人意见和会议意见发表，或者它们并不是新闻。在没有人反对、被人调查、或被人公开地在语义上对他们提出问题以前，这些事件并不是新闻。

这就是存在报刊宣传员的根本理由。关于什么事实和观感可以报道的决定权十分重大，这使每一个有组织的民众团体坚定地相信，不管是需要保证宣传还是避免宣传，都不能把报道的决定权让给记者。在民众团体和报刊之间雇用一名报刊宣传员是较为合适的。雇用了他，利用他的战略地位，其诱惑力是很大的。弗兰克·科布 (Frank Cobb) 先生说：“战前不久，纽约报纸调查了

---

① 记得1921年的《失业报道》有猜测的材料。

固定受雇用和固定委派的报刊宣传员，大约有1200名。现在(1919)有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确实知道新闻的许多直接渠道已关闭，公布的消息都是首先通过报刊宣传员传播的。大企业、银行、铁路、所有商业组织和社会活动的组织都有报刊宣传员，他们是一种传播新闻的媒介。甚至连政治家也有报刊宣传员。”<sup>①</sup>

如果只是报道简单的明显的事实，那么报刊宣传员就只是一个办事员。但是，多数大的新闻题材的事实并不简单，也根本不明显，而要选择和提出看法，这就自然地使每个宣传员都希望由自己来选择事实提供报纸刊登。宣传员就是干这项工作的。他为记者提供清楚的情况，这当然给记者减少不少麻烦。但是，宣传员给记者提供的情况是他希望公众知道的。他是审查者和宣传者，仅仅对他的老板负责，全部事实只是忠于老板所谓的自己的利益。

宣传员的发展，表明现代生活的事实并不是自发地被认作是新闻，这些事实必须由某些人提供；由于记者在日常工作中不能把事实报道出来，由于情报组织没有兴趣，于是就有必要由有兴趣的一伙人提供新闻。

### 三

一个好的报刊宣传员懂得他职业的美德并不在于报道新闻，除非在日常生活中突然发生了什么事。这并非因为报纸不喜欢新闻，而是因为在没有人注意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就不值得报道说没有发生什么事。准确地说，如果宣传员想要无约束地宣传，那么他就得制造点什么事。他安排一个绝招：阻塞交通、戏弄警察、莫名其妙地把他的委托人或他的事业与一个新闻事件纠缠在

---

<sup>①</sup> 1919年12月11日在纽约市妇女俱乐部的演说。1919年12月31日《新共和》重印，第44页。

一起。主张妇女有参政权的人们懂得不仅仅要有理性认识，而且要用行动去争取，在新闻中对参政权问题一直从正反两方面进行长期争论，以后人们就会静下来考虑，把参政运动作为美国人生活中的一种确认的制度。<sup>①</sup>

幸亏主张妇女有参政权的人与女权主义者截然不同，他们有一个非常具体而简单的目的。最有才能的鼓吹者和最有才能的反对者懂得，选举所象征的都是不简单东西。但是，选举权则是一种简单而通晓的权利。现在劳工争议可能是指责报纸的主要问题。就象选举的权利一样，罢工的权利也是很简单的，但是，就一次特定的罢工而言，其原因和目的象妇女运动的原因和目的一样，却是非常微妙的。

假定导致一次罢工的条件是坏的。什么是坏的标准？是指特定的生活水平、卫生、经济保障和人类尊严的某种概念。可能这种工业的条件远远在同一地区居民假设的水平之下，那儿的工人已经悲惨得无法抗议了。也可能条件在一般水平之上，而工人则强烈地抗议。水平问题说得最好也只是模糊不清的尺度。无论如何，我们将假定这些条件是低于一般水平的，因为编辑了解一般水平。偶而也有这样的情况，那就是不等到工人发出威胁，就迅速地由社会工作者出来说话，他派记者去调查，对坏的条件引起注意。但是，毕竟不会经常这样作。因为这些调查花费时间、金钱、需要专门的才能和很多版面。要报道条件坏并说得有理有据，就得占好多版面。为了报道匹兹堡区工人的真实情况，就需要一批调查人员，需要大量时间和许多篇幅。不能设想任何一张日报能够把匹兹堡的调查或甚至把“英特丘其钢铁报道”作为他自己的一项工作。象报道这样的新闻会有多么大的困难，超出了

---

<sup>①</sup> 参看伊内兹·海恩斯·欧文：《妇女政党的史话》，它不仅是有重大鼓动性的一篇极重要的好报道，而且是现代公众注意力、公众兴趣和政治习惯等条件下的成功的、非革命性的、非阴谋性鼓动材料的汇集。

一张日报的财力所能负担的。<sup>①</sup>

照这样说，坏的条件并不是新闻，除非例外的情况，因此，报刊文章并不是原始材料的直接报道，它是体裁化了的材料报道。如果卫生部报告说在一个工业区死亡率异常高，那么，坏的条件就能成为新闻。如果没有这种插进来的事，这些事实并不能成为新闻，除非工人组织起来向他们的雇主提出一种要求。即使这样，如果不费力地达成了和解，其新闻价值也很低，不论怎样，这些条件本身在和解中已得到改善。但是，如果工人与雇主的关系破裂而发生罢工或封闭了工厂，新闻价值就增加了。如果这次停工立即影响到报纸读者的利益，或者涉及违反纪律，其新闻价值就更大了。

某些显而易见的征兆，如一项要求、一次罢工、秩序混乱等等，是形成新闻基础的东西。从工人的观点或从无偏见地追求正义的人看来，这些仅仅是过程非常复杂的事件。但是，所有即将发生的事实，对于受多数报纸支持的记者或特殊的公众来说，都缺乏直接经验，一般都必须等到有了公开行动的信号以后，他们才能认出来。当产生那种信号时，比如说一群人罢工或一些人召唤警察，这就告诉人们发生罢工和秩序混乱了。看不见的斗争是嗅不出气味来的。它抽象地表明出来，读者和记者凭直接经验才形成这种概念。很显然，这种经验与罢工工人的经验是很不相同的。比如说，罢工工人们感觉到的是工头的脾气，使人心烦的单调的机器声，使人沮丧的坏空气，他们的妻子的工作是单调乏味的，他们的孩子发育不全，以及住房黑暗，等等。罢工的标语含有这些感受。但是，记者和读者首先看到的只是一次罢工和一些标语口号。他们注入了他们自己的感受。他们的感受可能是罢

---

① 巴布·卢斯不久前因超速行驶而坐牢。恰好在那天下午比赛前获释，他跑进等候站他的汽车，抢时间超过时速赶到赛场。警察没有阻止他，只有一名记者记录了他的时速，第二天早晨刊登了出来。卢斯是一个例外的人。报纸不能记录所有驾驶汽车的人的时速。他们必须从警察局索取他们需要的关于超速行驶的新闻。



工影响到他们的职业不牢靠了，因为罢工工人停止供应他们工作所需要的货物了，也可能是缺货和物价上涨，也可能是一切非常不方便。这些也都是现实，当他们给一篇号召罢工的新闻加上色彩时，工人当然就处于不利地位。这就是说，在现存的劳资关系的制度中，由工人的不平或希望而造成的新闻几乎总是通过一次对生产的公开打击而表露出来。

因此，你就懂得了所有错综复杂的情况，公开的行动以信号表明这些情况，有固定成见的新闻公报刊印这些信号，读者掺入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是从直接影响他的经验中得出的。或许读者对一次罢工的体验是很重要的，但从引起这次罢工的主要问题来看，它是没有涉及的。然而这种没有涉及的内容又自然是最引人注意的。”<sup>①</sup>读者要跳出他自己的圈子，进入很不同的生活，才能富于想象地考虑罢工的主要问题。

报道罢工最容易的方法就是通过公开的罢工行动来揭示新闻，并把它描写成是干扰读者的生活的。这就能引起读者的注意，也最容易吸引他的兴趣。工人和革新者认为被报纸故意歪曲的大量新闻（我自己认为关键的部分）是由于报道中的实际困难和对疏远的事实难于从感情上使它产生兴趣所直接造成的，除非象埃默森（Emerson）说的那样，我们能够“把这些新闻看成只是对我们熟悉的经验进行一种新的描述”，并能够“立刻把它们解释成我们熟悉的事实。”<sup>②</sup>

如果你研究一下报刊上许多罢工新闻的报道方法，你常常会发现，争论中的问题很少以头条新闻发表，几乎没有登在重要地位的，有时甚至不登。关于别的城市的劳工问题的争议，在还没有报道其明确的争议内容以前，本身应该是很重要的。日常的新闻都是这样报道的，关于政治问题的新闻和国际新闻也是这样报道的，但

---

① 参看本书第11章“谋求兴趣”。

② 根据他的文章：《艺术与批评》，布朗教授：《作家的艺术》一书中第87页引用。

有所更动。新闻就是有兴趣的公开情况的报道，迫使报纸遵循这种常规的压力来自许多方面，如为了简便，只按陈规报道一种情况；记者难于看到他们还没有学会去看的东西；一种几乎难于避免的困难，即难于找到足够的篇幅让一个最能干的记者花言巧语地叙述一个不落俗套的看法；经济上需要很快把读者吸引住，或者怕担经济上的风险根本不去吸引读者，或者用描写得不充分或笨拙的意料之外的新闻去触怒读者，等等。在紧要关头，所有这些困难交织在一起，造成了编辑拿不定主意，迫使他自然地偏爱无可争辩的事实和更能够引起读者兴趣的处理办法，无可争辩的事实就是罢工本身，容易引起注意的就是因罢工而造成读者的不方便。

在现在的工业组织中，所有较微细和较深的真实情况都是不可靠的，这些情况涉及生活水准的判断、生产率的判断和人权的判断，而这些问题是可以无休止地争论的，因为没有确实的记录和定量分析。只要工业中不存在这种问题，那么这方面的新闻报道就象埃默森引用艾沙克拉泰兹的话说，就会“小题大作和大题小作”。<sup>①</sup>在工业中没有规定的程序，对证据和要求也不能进行内行的挑选的情况下，能够轰动读者的事实就是几乎每一个记者寻求的事实。假若劳资纠纷盛行，即使有会谈或仲裁，而没有对于事实的独立的检验可供决断，报界的争论的议题将不是产业本身争论的议题。因此，通过报纸的呼吁进行争论的话，就会给报纸和读者增加一种不能承受的和不应承受的负担。只要真正的法律和规章一天不存在，大量的新闻如不有意识地、勇敢地自行纠偏的话，就会去反对那些没办法守法、守纪律以维护自身权益的人。从罢工的地点发出的新闻会注意到由于维护权益所引起的麻烦，而不会注意导致这场麻烦的原因。罢工的原因是不可捉摸的。

---

① 埃默森：《艺术与批评》

## 四

编辑坐在办公室处理这些新闻报道，他所阅读的这些新闻，很少亲自去看看这些事件的情况。他每天都必须吸引住一部分读者，因为如果有一张敌对的报纸吸引住他们，那么这部分读者就会断然地离开他。编辑是在极大的压力下工作，因为报纸的竞争常常是几分钟的事。每一篇新闻报道都要求编辑作出迅速而准确的判断。必须理解，编辑要根据读者对报道可能有多少兴趣来设想把新闻拔高或是贬低，没有可作验证的标准、没有固定的成见、没有日常的判断、对微妙性不断漠视，编辑就无法生存。最后的版面是有一定尺寸的，必须在规定的时候完成，这些新闻都有一定数量的标题，每个标题的字数是规定好的。经常有销数不稳定、诽谤法以及其它可能有的无穷无尽的烦恼。缺乏秩序化就完全不能驾驭，因为在标准化的产品中，要节约时间和精力，又要局部地保证不致失败。

报纸与报纸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很大的。当战争爆发了，美国报纸面临一个没有经验的问题。有些日报有足够的钱支付海底电缆电话费，就领先获得新闻，这些新闻就成为全国报纸的样板新闻。这种样板新闻从哪里来的？它来自英国的报刊，并不是因为北岩爵士拥有美国报纸，而是因为首先购买英国的通讯比较容易；其次，对美国记者来说，阅读英国报纸比阅读其它任何报纸容易。伦敦是电缆电报和新闻的中心，某些报道战事的技巧也是在伦敦发展起来的。在俄国革命的报道中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俄国人和协约国方面的人都由于军事检查制度而不能获得俄国的消息，加上俄国语言的困难，便封锁了这种报道。而首先，封锁了用事实有效地报道的新闻，但是最难于报道的是混乱，纵然这是发展中的混乱。这样，关于俄国的新闻报道，只能来源于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日内瓦、巴黎和伦敦的新闻审查者和宣传者的

手。很长时期这些新闻没有任何办法查对，直至被他们搞得荒谬可笑。我们承认，在大量俄国大动乱的真实情况里面，一系列的报道引起了憎恨和恐怖，新闻事业最好的天性——希望到那里去、观察和报道——长期受到破坏。<sup>①</sup>

## 五

当一张报纸到达读者手里时，一系列的选择如刊登什么新闻、把这些新闻刊登在什么部位，每条新闻将占多少篇幅，各条新闻要强调什么等等都已作了决定。这没有客观的标准，而有一些惯例。以同一城市同一天早晨出版的两张报纸来看，一张报纸的头条标题是：“英国保证援助柏林反抗法国进攻，法国公开支持波兰人。”另一张报纸的头条标题是：“斯蒂尔曼太太的另一个情人”。你喜欢哪一条是个口味问题，但不完全是编辑的口味问题。这是编辑的判断问题，他要判断用什么才能吸引住相当一部分读者，让他把半小时的注意力放在他的报纸上。要获得读者的注意力并不等于在新闻中发表对宗教教义或道德修养的看法，而是要激起读者的感情，要引诱他在阅读时就产生与新闻相一致的感情。读者必须通过他个人感情的共鸣进入新闻，就象同样的情况进入戏剧一样，就象当一个女主角在危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屏住呼吸一样，就象他帮助巴布·鲁斯挥舞球拍一样，读者在较微妙的方式下进入新闻。为了进入新闻，在新闻报道中他必须找到一个熟悉的立足点，而这个立足点是由固定成见提供的。如果把一个铅匠业者的协会称作“集团”，就会引起他的敌意，如果称之为“工商业领导人的团体”，就会得到好的反应。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使之产生看法。社论起加强的作用。有

---

<sup>①</sup> 参看《新闻的检验》，沃尔特·李普曼和查尔斯·梅尔茨著，菲伊·李普曼协助，载《新共和》，1920年8月4日。

时候新闻版太复杂不许可起一致的作用，它们至少会使读者联系自己得到一点启发。他要求的某种启示，譬如说，他设想他自己是如此这般的人，这种启示就告诉他要把他的感情与他阅读的新闻结合起来。

沃尔特·巴奇哈特 (Walter Bagshot) 写道<sup>①</sup>：“曾有人说，如果你让一个中产阶级的英国人思考是不是‘天狼星上有蜗牛’，他会立刻对这问题有一种见解。叫他思索是困难的，但是，假若他思索了，他就不可能停留在消极状态，他会作出某种结论。对于任何普通的题目都必然是这样的，一个杂货商对于外交政策有一整套信念，一个年青的妇女对圣礼有完整的理论，而且他们对各自的信念是毫无怀疑的。”

然而，就是这个杂货商对他的杂货却会有许多怀疑，而那位年青妇女对圣礼坚信无疑，对于要不要与杂货商结婚，或是不结婚的话，要不要接受他的关心，却充满着疑问。读者之所以能保持一种存疑的态度或是因为对结果缺乏兴趣，或者是因为有一种活跃的意识去考察可供选择的互不相同的观点。外交政策或圣礼的例子表明读者对结果有强烈的兴趣，然而无法检验其意见对不对。这就是读者对一般新闻的处境。如果他仔细读它，那么他就必定是感兴趣的，他就必定研究这种情况并关注其结果。他如果这样作了的话，就不能处于消极状态，除非有单独的方法检验报纸给他的引导是否确实，否则他感兴趣的那种事实可能与多数近乎真理的意见难于达到一致。他掺杂的情绪越多，他不仅越是憎恨不同的观点，而且讨厌新闻中引人烦恼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报纸发现它作为一张报纸已在读者中引起了真正的派系偏见的原因，若是编辑认为那些事实有根据，也不容易改变立场。如果需要改变立场，在转变时也必需掌握最高的技术和灵巧。通常一张报纸不会做这种冒险的尝试。比较容易和比较妥当的办法

---

① 《论信服的感情》，载《文学研究》，第3卷，第172页。

是逐渐减少这种主题的新闻和不再刊登它，这样釜底抽薪，把火熄灭。

## 第二十四章 新闻、真实和一个结论

当我们开始对报刊进行越来越多的精确的研究时，很多情况将依靠我们所持的假设。如果我们与辛克莱先生，还有多数他的反对者都假设新闻和真实是说明同一件东西的两个词，那么，我相信我们将一无所得。我们将证明报纸在这问题上撒了谎，我们将证明在那个问题上辛克莱先生的报道撒了谎，我们将论证当辛克莱先生说某人撒谎时也是在撒谎，而当某人说辛克莱先生撒谎时，某人也是在撒谎。我们将发泄我们的感情，但是，我们将是空发泄。

在我看来，最有益的假设是新闻和真实并不是一回事，必须清楚地加以区分。<sup>①</sup>新闻的作用是突出地表明一个事件，而真实的作用是把隐藏的事实显露出来，将它们联系起来构成一幅真实的情景，人们能够根据它来行动。只有当社会形势呈现可以认识和觉察得出来的状态时，真实和新闻才恰好相符。那是人情味的整个范围中的一个比较小的部分。在这个部分，也只有在这个部分，对于新闻的检验足够地精确，因而使关于曲解或隐瞒事实的现象的指控不再只是一个偏颇的判断。当报纸掌握的唯一消息说列宁已去世，而这个消息是从一个反复证明为不可靠的来源发出的，那么这家报纸对于六次报道列宁已去世是无法辩护的，也是无法辩解的，什么借口也没有。在这个例子中，新闻不是“列宁已去世”，而是“赫尔辛基说列宁已去世”。如果编辑最应负责的一个问题是判断消息来源的可靠性，那么你就能够要求一张报纸不要报道列宁去世的消息，而更多地对消息来源的可靠性负责。但是，举例说，当牵涉到报道什么是俄国人民需要的东西

---

<sup>①</sup> 当我写《自由与新闻》时，我还不很清楚这样说明其区分，但可参看（原文）第89页。

时，这种可靠性的检验就不存在了。

我认为，缺乏这些精确的检验就是这种职业的特点，没有其它解释。有很小一部分精确的知识是不需要杰出的才能或者训练就可以应付的，剩下的就要依赖记者自己的判断。一旦他从某地区离开，而那里的区事务所明确地记录了约翰·史密斯已经破产，所有固定的报道标准就消失了。关于约翰·史密斯为什么会失败的报道，如他的个人弱点，对于使他遭到毁灭的经济条件的分析，凡此种种能有上百种说法。不象医学、工程学甚至法学，都有一种专业训练，在应用心理学中没有专业的训练，因而新闻记者是从新闻报道中寻求含糊的真实的进程中得不到权威的引导。没有准则可以指导他的思想，也没有准则可以强制读者的判断或者出版者的判断。他对真实的看法只是他的看法。当他看到真实情况时，他怎么能够证实这种真实呢？辛克莱·刘易斯先生能够表明他对《大街》已写出了全部真实情况，记者所能表明的超不过他。他越了解他自己的弱点，就越承认没有客观检验的标准，他自己的意见主要由他自己的成见，根据他自己的准则和他自己迫切的兴趣所形成的。他知道他是通过主观透镜在观察世界。正象诗人雪莱所指出的，他不能否认他也是一座带有许多颜色的玻璃圆屋顶，使永恒的白色光辉染上了颜色。

由于这种认识，他的自信减弱了。他也许有各种道义上的勇气，也许有时候有，但是，他缺乏那种确信最终使自然科学从神学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某种技能。正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无可非议的方法，给了自然科学以理性的自由来反对世界上的一切权力。他的论证是那么清楚，他的证据是那么明显地胜过传统，使他最终突破了一切控制。但是，新闻记者凭他的良心或者从实际上说都没有这种支持。他的雇主和他的读者的意见对他所施加的控制不是偏见对真理的控制，而是另一种并不能证明是更真实的意见对一种意见的控制。法官加里断言工会将破坏美国的宪法，冈珀斯先生则断言工会是人权的机构，在这两种断言之间进行选



择，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受到让人相信的意愿所支配。

缩小这些争论，或使这些争论缩小到一点上能作为新闻报道出来，这样的工作不是记者所能作到的。新闻记者可能做到和必须作到的是把还不能断定是真实的情况带回来给人民，使他们根据这些情况形成我们的意见，并通过评论和鼓动去促使社会科学对社会实情作出更有用的系统阐述，以及促使政治家们去建立更多有形的机构，换句话说，报刊能争取扩大可报道的真实情况。但是，今天社会的真实情况都是有机联系的，报刊并不能一版接一版地提供舆论的民主理论所需要的大量知识。这并不象激进报纸中的新闻质量所说明的，是由于大财团给报刊的贿赂所造成的，而是因为事实上报刊所报道的社会对其统治势力所作的记录是那么不完整。认为报刊能够自行记录那些势力的理论是错误的。它只能正规地记录一些机构为它准备好了的记载。其它的就是争论和意见，并随着一些变迁、自我意识以及人类理智的勇气而有所起伏。

如果报刊并不是那么普遍的恶劣，也不是象辛克莱先生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大搞阴谋，它至少也比民主政治的理论目前所承认的远为脆弱。它脆弱得难以实现人民主权论的全部义务，难以自发地提供民主主义者所希望的天生的真实。当我们希望它提供这样的真实时，我们运用了一种使人误解的判断标准。我们误解了新闻的有限性和社会的无限复杂性，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我们自己的忍耐力、热心公益的精神和各方面的竞争。我们想象人们对于令人乏味的真实有一种欲望，而遍过对我们自身的趣味的任何公正的分析，并没有发现这种欲望。

那么，如果要求这些报纸有责任说明全部人类社会生活，使每一个成年人都能够对各种争论未决的问题得出一种意见，它们做不到，它们必定做不到，人们可以设想在将来任何时候，它们还是做不到的。不可能设想一个劳动分工和权力分散的世界，能够由全体居民的普遍意见来统治。这种理论无意识地把单一的读

者树立为理论上说是有全权的，并且让报刊去完成代议制政治、工业组织和外交所没有能完成的义务。要求报刊在24小时内的30分钟时间内对每一个人都起到作用，要求它们产生一些叫做“舆论”的神秘力量，这种力量会调整社会机构中的松散情况。报刊常常误以为它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它曾付出很大的精神代价促进民主，仍然限于其原始的假设，希望报纸自动地为政府的每一机构，为各种社会问题提供一些为机构一般不提供的消息。一些机构不能够为它们自己提供了解消息的手段，就产生了一大堆“问题”，居民作为总体来说，期望通过阅读报刊来解决这一大堆“问题”。

换句话说，报刊已经被当作直接民主的喉舌，要求每天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发挥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的作用。“舆论的法庭”日夜开放，始终对一切事物制订法令。它不是切实可行的。当你考虑新闻的性质时，这甚至是不可想象的事。因为新闻正象我们见到过的，恰好是与报道的事件的精确性相称的。除非某个事件是能够叫得出名字的，能够衡量的，具体的，有特性的，否则就不能具备新闻的特点，或者在观察上要受到偶然性和偏见的影响。

所以，总的看来，报道现代社会的新闻，其质量是社会机构状况的一种标志。机构较好的话，就更有效地代表了所关注的一切利益，就能使更多的问题得到解决，就能采用更客观的标准，就使一个事件能更完美地成为新闻提供出来。就其最好的方面说，报刊是一些机构的有用的工具和捍卫者，就其最坏的方面说，报刊是少数人利用社会瓦解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一种手段。根据一些机构不能发挥作用的程度，不讲道德的新闻记者就能够混水摸鱼，而认真的记者必定只能对一些不确定的事情下赌注。

报刊不能代替一些机构。它就象探照灯的光束一样，不停地照来照去，把一件又一件事从黑暗处带到人们的视域内。人们不

能够单凭这种光线来从事世界上的工作。他们不能够通过事件、事变和战争的爆发来统治社会。他们工作的时候只能凭他们自己坚定的见解，当报刊的见解与之相符时，就展现出一种清楚的情况足以作出为一般人能接受的决定。毛病在于比报刊更深的地方，医治的办法也要更深地去探求。毛病在于以一种分析和记录体制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在于那种原理的一切推论，在于有全权的公民放弃了这种理论，在于分散的决定，在于通过类似的记录和分析作出的协调的决定。如果在一些管理中心有一个连续的审计，它就会使执行工作和指挥工作的人容易理解，产生问题时就不致是盲目的冲突。那么，同样地，用一种情报系统为报刊揭露新闻的话，它对报刊也是一种检验。

那是根本的办法。因为报刊的一些毛病，就象代议制政治的一些毛病一样，不论是地区性的还是机能性的；就象工业的一些毛病一样，不论是资本主义的、合作化的，还是共产主义的，追溯到共同的根源：自治的人民未能通过发明、创造和组织一种消息的机构来超越他们偶然的经验和他们的偏见。由于在对世界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的状态下采取行动，所以，政府、学校、报纸和教堂只取得了很小的进展，相反，民主政治遭受了更明显的失败，存在着强烈的偏见和冷漠，与沉闷的重要东西相比，在人们心目中更喜爱稀奇古怪的琐事，并渴望杂耍和三条腿的小牛。这是普通政府的主要缺点，是它的一些传统中的固有缺点，我认为，所有其它的缺点都能归结到这个缺点上。

## 第八部分 有组织的情报

### 第二十五章 打入的楔子

#### 一

如果补救的办法是令人感兴趣的话，那么，象查尔斯·麦卡锡、罗伯特·瓦伦丁和弗雷德里克·泰勒这些美国的先驱者们就不会为一次审讯而进行那么艰巨的斗争。但是，为什么他们必须斗争，以及为什么政府的研究机构、工业的决算、预算等等，都是改革的“丑小鸭”，这是很清楚的事。他们颠倒了建立令人感兴趣的舆论的过程。他们不是介绍一种偶发的事实，一幅由种种成见构成的大屏幕和一种戏剧性的见证。而是中断了戏剧，打破了一些成见，给人们描述一些陌生的和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事实，这种事实若不是令人苦恼的，那就是沉闷的，职业的政治家和政党的党徒有许多事要隐瞒，常常利用公众的沉闷感来消除他们自己的苦恼。

#### 二

然而，每一个复杂的社会都曾寻求专门人员的帮助，寻求预言家、牧师、长老的帮助。我们自己的民主政体虽然是建立在一种普遍权限的理论基础上，仍然请求律师们管理政府，并帮助管理工业。人们认识到受过训练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比非专业人员头脑中的自发思想更适应一种较广泛的真理的体制。但是，经验表明，传统的律师的资质已不足以辅助。“伟大的社会”通过采用技术知识，已经急剧地发展并达到了非常大的规模。工程师学会

了运用精确的测量法和定量分析法。人们开始发现，仅仅依靠推论是非曲直是不能够进行统治的。只有依靠创造它的技术，人类才能够控制它。于是，越来越多的有知识的指挥人员召集了一些受过训练的专家，或者他们自己接受了训练，使管理这个“伟大的社会”的人员懂得怎么来管理它。受过训练的这些人有各种名称，如统计员、会计、审计员、工业顾问、许多种类的工程师、科学的管理人员、人事管理人员、研究人员、“科学家”以及有些只是普通的私人秘书。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行话，还有一些文件柜、卡片目录、图表、活页等新物品。更重要的是一个行政官员的完美理想坐在一个写字台前，面前放着一份打好字的文件，由他决定一些事情的政策，并在为他准备好的表格上签注他不同意或批准的意见。

这整个的发展与其说是自发地引起的演变，不如说是自然选择造成的。政治家、行政官员、政党领袖、一个志愿社团的领导人，如果感到他必须在一天的时间中讨论两打（24个）不同的问题，那么必须有人辅助他。他开始叫嚷要有备忘录。他感到他不能够阅读那么多送给他的信件，他要求有人在重要信件中用蓝铅笔勾出应该注意的句子。他发现他不能够消化积攒在他桌子上的一大堆打印的报告，他要求作出一些摘要。他发觉他不可能阅读没完没了的种种数字，他感谢把那些数字作成彩色图片的人。他发现他确实不懂得各种机器，因而他雇佣一些工程师来挑选机器，并向他说明这些机器值多少钱和能作些什么。他卸除了一个又一个负担，就象一个人要卸除笨重的负担时那样，先摘掉他的帽子，然后脱掉他的外套，又去掉他的领带。

### 三

然而，相当奇怪的是，虽然他知道他需要帮助，但是他却迟缓地招请社会科学家，而较早地接受更友好的邀请的是化学家、物理学家和地质学家。他们为他们建造了一些实验室，提供了一些

优厚待遇，因为对于征服自然所取得的胜利总是立即受到赏识的。但是，研究人性的科学家，他的问题则属于另一种情况，这有许多原因，主要的原因是他能展示的胜利成果是那么少。除非他研究的是已成为历史的过去，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公之于众来证实他的理论。自然科学家则能够作出一种假设，加以验证，可以许多次地修正这种假设，即使最终错了，谁也不需要付代价。但是，社会科学家不能够打开始就提供一种实验室检验的保证，如果随后提出他的建议，并且表明他是错了，其后果则可能是无法计算的。他理所当然地负更多的责任，而把握是更少的。

但是，还不止是那样。在实验科学中，学生已经战胜了思想和行动的困难。他把活动的标本带到一个安静的场所，能够在那里任意地重复试验，得空时就进行检验。然而，社会科学家则经常陷于困难境地。如果他呆在图书馆里，在那里他有时间进行思考，他只能依靠极不正式和极不充分的印刷记录，这些记录都是通过官方报告、报纸和访问得来的。如果他走进事情正在发生的“天地”里去的话，那么必须长期地、常常是浪费时间地处于一种见习的身分，然后他才能够进入书房作出判定。他不能够在任何对他合适的时间进行反复的探索。没有特许的听众。决定事务的人注意到社会科学家所知道的情况仅仅是从外部了解到的，至少只有一部分是从内部了解到的，认识到社会科学家的假设并不具有能在实验室验证的性质，那种验证只可能在“真实的”世界中去进行，这种情况已形成了对于与决策人持不同社会政策观点的一些社会科学家有一种很低的评价。

社会科学家在内心深处同意这种对他的评价。他对于他自己的工作缺乏内心的肯定，他只是半信半疑，什么把握也没有，对于坚持他自己的思想自由，他找不到任何使人信服的理由。凭他自己的良心说，他实际上还能要求什么呢？<sup>①</sup> 他的资料是靠不住

---

① 考看查尔斯·E. 梅里亚姆 (Charles E. Merriam)：《政治科学的现状》，刊载1921年5月《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15卷，第2期。

的，又缺乏试验的方法。他身上所具有的最好的品质就是他遭受挫败的根源。因为如果他的科学精神是真正严格而且饱满的话，他就不可能是空谈理论的人，为了一种他还不肯定的理论而到阿美其顿<sup>①</sup>去反对评议员、学生、“公民联盟”和保守的报刊。如果你到阿美其顿去的话，你就必须为上帝而战斗，但是，政治科学家总是有几分怀疑上帝会不会召见他。

倘若社会科学在那么大的程度上是辩解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那么对这一点的解释在于社会科学的机遇而不在于“资本主义”。自然科学家们设计出一种方法，从而产生了不容压制或忽视的结论，这就从教权主义取得了他们的自由。他们使自己信服和取得了地位，并且了解他们是在为什么而奋斗。社会科学家设计出他的方法时，也会取得他的尊严和他的实力的，但要达到这种状况，就得成为掌管“伟大的社会”的人们所需要的分析工具，使一种看不到的极难弄清的环境能变成易于理解的。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社会科学家要从一大堆相关的材料中整理出他的资料来。社会的进程是间歇地记录下来的，常常是政府机构的一些偶发事件。象致国会的报告、一场辩论、一项调查、法律的摘录、一次人口普查、一张关税表、税收一览表等等，这种材料象是“辟尔唐人”<sup>②</sup>的颅骨，当研究人员对他正在研究的事件还没有得到任何情况前，就凭单纯的推断来把它装配在一起。虽然这种材料涉及他的同胞们的有意识的生活，但经常都是令人烦恼地难以理解的，因为试图概括这些资料的人实际上没有办法监督他的资料是怎么搜集来的，设想由一些研究者进行医学研究，他们很少能到医院去，就是到医院去也没法从事动物实验，不得不从患过病的人的叙述中，护士们的报告中，她们各有自己的诊断系统，以及一些由“内部税务局”汇编的关于药商超额利

---

① 《圣经》上善良与邪恶最后决战的地方。——译注

② Piltdownman，被认为是早期原始人类的化石——译注

润的统计中写出结论。社会科学家通常从政府官员头脑中未加鉴别的各类情况中尽可能取得资料，而政府官员执行一部分法律，或者去辩护、劝说、声明或作证。研究人员懂得这一点，为了防范起见，开发了一门学科，这种学科就是抱着仔细的怀疑态度，看看他所获得的信息在哪些方面应打折扣。

那是一种优点，但如果它仅仅是为了纠正社会科学所处的不正常的地位的话，它就是一种微小的优点。因为这种学者被指责说，他们只是尽可能机敏地猜测，在一种他并不大理解的境况中，为什么发生了某件事或其他事。但是，究竟专家是被任用来作为议员中的调解人，还是用作政府的镜子和衡量者，这对事实的处理是很不相同的。专家不是成为根据执政者丢给他的事实来进行概括的人，而成了为执政者准备一些事实的人，这是他在战略地位中的一个深刻的变化。他不再站在外面细细捉摸忙于事务的人提供给他的事实，而是站在决策的前面，而不是后面。可是今天，这种顺序是决定事务的人发现他的事实，根据它们作出一些决定；然后，过些时候，社会科学家推断出极好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他聪明地作出了一些决定或没有作出一些决定。这种事后追溯的关系对“学术”这个漂亮的词加上了坏的含义。真正的顺序应该是无偏见的专家首先为决策人发现并系统地阐述一些事实，然后在他所理解的决策与他组织起来的事实之间聪明地作出他所能作的比较。

#### 四

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这种战略地位的改变，开始时缓慢，后来才加快速度。有一段时间，当发明家和工程师是传奇式半挨饿的局外人时，人们把他们看作是狂热者。商人和手工艺工人懂得他们的职业的全部神秘。接着，这种神秘越来越发展，最后工业开始依靠物理学定律和肉眼看不见的化学合成，只有受过训练的头脑



才能设想。科学家从他在拉丁区的高贵阁楼迁到办公大楼和实验室去了。只有他能够建立一种支撑工业的工作现场。根据这种新的关系，他从中取得的报酬与他付出的劳动是一样多，或许更多些。纯粹科学比应用科学发展得更快，虽然它从经常不断地接触实际决策中得到经济上的支持、大量的鼓舞以及更多的关心。但是，由于决策人们只掌握普通的常识用以指导他们的决定，所以自然科学的工作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他们管理着一个被科学家搞得复杂化了的世界而没有得到科学的帮助。而且，他们还必须与一些他们不能理解的事实打交道，就象曾经招请一些工程师来协助工作一样，他们现在就必须招请一些统计员、会计员以及各种各样的专家。

这些实际的研究人员都是新的社会科学的真正先驱。他们被“卷入前进的车轮”，<sup>①</sup>科学和实践两者都从实际的啮合中受益很多；实践依靠一些信念来阐明；一些信念依靠在实践中继续检验。我们正处在最早的开始阶段。但是，如果承认所有人类广泛交往的形式中必定包括许多人，由于实际的困难，这些人会认识到有必要对他们所处的特定环境提供一种专门的报道，然后想象就有了一种前提，工作可以根据这前提进行。在专业人员之间交换技术和成果中，我认为，人们已经能够看到社会科学中实验方法的开端。当每一学校地区和预算、卫生部门、工厂以及关税一览表等等对于别的部门来说，都是学识资料的时候，这种相互比较的各种经验的数量就开始积累到合乎真正的实验的范畴。在48个州、2,400个城市、277,000个校舍、270,000个制造业、27,000个矿山和采石场中，有丰富的经验，只要是记录下来的和可用的，而且有试验的机会，错误所承担的风险是那样轻微，因而任何合理的假设都可以接受公正的试验而不会动摇社会的基础。

---

<sup>①</sup> 参阅美国哲学协会主席拉尔夫·巴顿·佩里1920年12月20日的演说，刊载在20周年纪念会议上。

楔子已经打进去了，不仅通过一些需要帮助的工业领导人和政治家，而且通过市政研究所<sup>①</sup>、立法机关的参考书阅览室、公司企业专设的门厅或休息室、工会、公共事业，通过象妇女选民同盟、消费者同盟、制造商协会这样一些志愿组织；通过许许多多贸易协会和公民联合会；通过象《对国会的探照灯》(Searchlight on Congress) 和《眺望》(Survey) 一类刊物；还通过象普通教育委员会之类的基金会。总而言之，並不都是无私心的，但那不是问题所在。它们都确实开始表明了与普通公民与牵连到他的广阔的环境之间，需要设置某种类型的专家。

---

<sup>①</sup> 在美国，这些组织的数量是很大的。有些还有活力，有些已半死，它们变化快。这里提到的单位是下列的人提供给我们的：底特律政府研究局的L. D. 厄普森博士、纽约市市政参考阅览室的丽贝卡·B·兰金女士、威斯康辛州教育委员会秘书爱德华·A·菲茨帕特里克先生、纽约市工业研究局的萨维尔·齐曼德先生等许多人。

## 第二十六章 情报工作

### 一

民主政治的实践曾经走在理论的前面。因为这种理论认为，成年的选民们是根据他们本人的意志来作决定的，但是，由于逐渐形成了一些统治的集团，这在理论中是见不到的，同样有大量建设性的修改，在民主的形象中也没有加以说明。人们曾经找到一些方法来阐述许多在正常状态下看不到的利益和作用。

在我们的法庭理论中我们最意识到这一点，当我们阐明它们的立法权和它们的否决权时，有一些在理论上要捍卫的利益可能会被选出来的官员所忘记。但是，人口普查局在计算、分类和关联人、事及变化的时候，也是在说明环境中看不到的因素。地质调查弄明白矿藏资源，农业部在国家议会中阐述每个农民所看到的只不过是极小部分的事实。学校当局、关税委员会、领事馆和国内税务局阐明一些人、思想和物体，而这些都不可能期望通过一次选举自动地得到说明的。儿童局是全部复杂的利益和机能的代言人，这些通常是选民看不到的，所以，就不可能自发地成为他的舆论的一部分。因而，刊印婴儿死亡率对比的统计数字常常被用来说明婴儿死亡率的降低。在公布这些数字以前，在市政官员们和选民们关于周围世界的想像中，是没有这些婴儿的位置的。这些统计数字使他们一目了然，犹如婴儿们曾选出了一名市参议员来为他们诉说苦情一样。

政府在国务院中设置了一个远东事务部。它是干什么的？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都在华盛顿设有使节。难道他们对远东的事都没有发言权吗？他们都是远东的代表。然而，没有人会争辩说美国政府能够通过这些外交使节来调查了解全部它所需要知道的关于远东的情况。即使他们很坦率，知道什么说什么，他们仍然是有

限的消息渠道。所以，为了补充他们的不足，我们在东京和北京都设有大使，并在许多地方还设置了领事馆。我设想还有一些秘密情报员，要求这些人通过远东事务部把一些报告送给国务卿。然后，国务卿希望远东事务部作什么呢？我知道有人曾希望它使用其拨款。但是，有一些国务卿否认与他们有特殊的关系，他们就转向远东事务部求援。最后的事是他们期望找到一个简洁的论据来为美国的地位辩护。

他们要求专家们把远东的情况带到国务卿的桌面上，其中要包括所有的材料，就象他亲自接触到了远东一样。这种专家必须进行翻译、简化和概括，但是，从成果所得出的推论一定要适用于远东，不仅仅只论述报告的前提。如果国务卿是称职的，那么他将不能忍受他的专家们怀疑他们有一项“政策”。他不想从他们那里知道他们喜欢不喜欢日本人对中国的政策。他想要知道的是中国人、日本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俄国人的不同阶级对它有什么想法以及由于他们的想法他们很可能作些什么。他要求向他提供所有这样的材料以作为他决策的根据。远东事务部忠实地提供日本使节、美国使节和太平洋沿岸的参议员或众议员所不能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越多，那么他就能成为较好的国务卿。他可能从太平洋沿岸来决定他采取的政策，但是，他对于日本所持的观点是来自日本的。

## 二

毫不意外，世界上最好的外交机构都是最出色地将搜集消息和控制政策这两者区分开。战争期间，在许多英国大使馆和在英国外交部几乎总有一些人，不管是常任官员或是其它特别任用的人，他们都不去重视流行的战争心理。他们抛弃了辩论中的冗长废话，抛弃了有民族偏爱的胡言乱语、痛恶的东西以及他们的内心没表达的结论。他们把那些东西留给政治领导人去关心。但

是，在一个美国大使馆，我曾经听一位大使说，他从来不向华盛顿报告任何会使国内人们感到不高兴的事情。他迷住了所有遇见过他的人，并且极好地为一个纪念碑揭了幕。

他并不理解专家的力量就在于把他自己与那些作决定的人区分开来，就他的专家本人来说，不关心作出了什么决定。一个专家如果象大使这样，采取一条路线，干预决定，很快不受欢迎。他恰好偏在问题的某一边。因为当他开始关心太多的事物时，他就开始去看他希望看到的事物，由于这种情况，就不再看到他在那里所看到的事物了。他在那里是为了揭示没有看到的事物他代表了不属选民的人，体现了不明显的选民的作用，显示出视域外的事件，代表着缄默的人，未来的人并表示了事物和人之间的关系。他有一批无形的赞助者。无形的赞助者是不能够形成政治上的多数的，因为选举是最后测试力量的解析，是一场理想化了的战斗，而专家不代表直接有效的力量。但是，他能通过打乱一些力量的组合来行使力量。由于使看不见的事物看得见了，他就使行使物质力量的人面对一个新的环境，使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发挥作用，显示出他们的地位，就这样，以最深刻的方式来影响决策。

人们不能长期以与他所设想的环境相矛盾的方式来行动。如果他们决心按某种方式去行动，那么他们就要重新认识这种环境，他们必须修改认识，必须合理地思索。但是，如果在他们面前，有一种明显的事实，它是那么突出而他们不能作出解释，那么以下三条出路将必居其一：他们可以违反常情地忽视它，尽管他们会在在这个过程中丧失活动能力，会在履行其职责时作得过分，並导致不幸；他们也可以考虑它但拒绝去行动，他们会在内心付出不安和挫折的代价；或者，他们会调整他们的全部行为去适应扩大了的环境，我认为这种情况是最常见的。

如认为专家是一种徒劳无益的人，因为他让别人制定决策，这种思想是与经验正相反的。在决策中掺入的难以捉摸的成分越

多，专家就越难以承担责任。而且，因为日益增加的事实会使选民和行政官员不理解，他无疑将比以往发挥更多的力量。所有的统治机构将趋向于建立研究机关和消息报道机关，这些机关将伸出触角和扩展开来，例如在世界上所有军队都设置情报部门。但是，专家终究是人，他们会喜爱权力，他们的向往就是任命他们的检查官，在决策中起真正的作用。除非他们的作用是被正确地限定的，否则他就会趋向于提出他们认为适当的事实，并且传达他们所赞成的决定。简单地说，他们将变成官僚。

在制度上唯一的保障措施就是尽可能将执行人员与调查人员完全分开。二者应该是平行的，而又是身分截然不同的人，二者互相补充，如果可能的话，从不同的经费中支付薪金，对不同的领导负责任，对于各自的个人成就没有真正的利害关系。在工业中，审计员、会计员和检验员应独立于经理、监督人和领班之外；我认为，总有一天会看到，为了把工业置于社会的控制之下，档案机构将有必要对董事会和股东保持独立。

### 三

但是，在建立工业和政治的情报部门时，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清楚的想法的。除非坚持这种将职能基本分开的原则，否则在任何特定的形式下都难以明确地进行工作。有一些人是相信而且要采用情报工作的；有一些人则并不理解情报工作，但是，他们在工作中不能没有它；也有一些人要抵制情报工作。然而，在每一个社会机构里，某个地方为这种原则提供了一个立足点的话，就会有进展，创始的办法就是去创始。例如，在联邦政府中，并不需要为了寻找一块适当的地方给华盛顿建立它急切需要的情报局，而去整顿一个世纪发展形成的行政上的紊乱和不合理的重叠。选举以前，你能够答应勇敢地冲破违反法律的事，然而，当你上气不接下气地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一种谬

误的事情都与习惯势力、强大的利益和有交情的国会议员有关系。全线出击的话，你就会受到各种力量的回击。正象诗人说的，你战斗下去的话，你总是失败。你能在这里砍掉一个陈旧的机构，在那里去掉一伙办事员，你也能够合并两个机构。到那时候，你就忙于关税和铁路，而改革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且，为改组成一个真正合理的政府，正象所有的候选人总是答应的，你就会搅起更多的情绪而得不到平静。假定你准备好了一个新的方案，你就得为它配备人员。譬如说，要什么人担任官员呢，即使苏联，也喜欢把许多老的人员找回来，倘若冷酷地对待这些老官员，那么就会破坏空想的社会改良计划本身。

没有良好的意愿的话，什么行政计划都不是切实可行的，没有教育的话，也不可能以好的意愿去对待没有经验的实践。较好的办法就是不论在哪里你能找到空隙，你就在现存的机构中安插进一些情报机关，他们就会逐周，逐月地反映真实情况。然后，你才能使管理这机构的人、负责的领导人和外界的公众都能看到这机构的工作。当这些官员看到他自己的情况——或者更确切地说，当局外人们、领导人们和一些下属都开始看到同样的事实时，那么障碍就会减少。改革者的意见说某个办事机构效率不高，那只是他的意见。在这个机构的眼里认为不好，也只是它的意见。但是，把那个办事机构的工作分析和记录下来，然后与别的机构并且与私营公司相比较，这种论证就变成另一种情况。

内阁在华盛顿有十个部。那么，假定每一个部都有一个常设的情报部门的话，一些有效的情况将会是什么样？最重要的是情报官员应该既独立于分管那个部的国会委员会，又独立于该部的部长，使他们既不卷入决定，又不陷入行动。主要应在经费上、任期上和获取事实上都保持独立。因为，很明显，如果一个特定的国会官员或部的官员能够剥夺他的经费、解雇他们或者封闭档案的话，所有的工作人员就成了它的奴仆。

## 四

经费问题既是重要的，又是困难的。如果一个研究机构依靠不论是善于猜疑的或者过分节俭的国会每年所给予的施舍的话，它是得不到真正的自由的。然而，经费的控制最终离不开立法机关。财政的安排应保证职工反对持恶意的人、爱开玩笑的人和欺诈的人的攻击，反对狡诈的破坏，并且同时保证它的发展。职员应该善于职守，使威胁其存在的攻击都成为公开化。或许它会利用联邦宪章创造一笔信托基金，并对情报局所属的部的拨款制定出一个几年中的调整比例。不管怎样，没有涉及大笔款项。信托基金可能用于通常的开支和对最低限度的职员的经费开支，调整的比例可作扩充之用。无论如何，拨款应该不管意外开支，就象任何长期的债务款项一样。这种办法比通过宪法补充法案或者颁发政府公债更容易“束缚国会的手脚”。国会可以废除这种宪章，但是它只能废除它，而不能破坏它。

任用期应该是终生的，加上提供优厚的退休金，还给予用作进修和训练的休假年限，而且只有经过同行的审判才能解雇。对于任何非营利的知识分子的职业所适用的条件，在这里都适用。如果工作突出的话，那么作这项工作的人就一定受到尊重和有安全保障，还至少给予较高的级别。因而只有在人们不太直接关心实际决策的情况下，你才能感到思想上的自由。

在组织法令中应订明可以获取材料。情报局应有权检查所有的文件，并询问任何官员或任何局外人。这种连续的调查与惊人的立法机关的询问和间歇性的摸底不一样，这是现在我们政府的一个通常的特点。情报局应该有权对这个部提出清查帐目的方法，如果这种提议遭到拒绝，或者在接受之后有所违犯，可以根据宪章向国会控告。

首先，各个情报局都会成为国会与部之间的联系环节，根据



我的判断，虽然一种建议并不排斥另一种，这比内阁官员出现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席位上的联系方式更好。情报局会成为国会执行其政策的眼睛。它会成为部对于国会的批评的答复。而且，由于部的工作永远是可见的，或许国会会不再感到有必要根据不信任和谬误的权力分离的学说来制定微细的立法，它会使效力高的行政机关产生困难。

## 五

但是，十个情报局中的每一个当然都不可能是工作在一个不透水的密封舱内的。它们彼此之间，有最好的机会去进行“协作”，而这种“协作”听说得那么多，见到的却那么少。不论哪里有可能，就需要选用各种人员，衡量的标准都是类似的。他们会交换档案记录。那么，如果国防部和邮政局都买木材，雇木匠，或者建造砖墙，他们就不需要通过同样的机构作这些事，因为过分集中可能是不方便的，但是，他们能用同样的尺度去衡量同样的机构，有意识地进行比较，以竞争者相待。这种竞争越多越好。

因为竞争的价值是由衡量它的标准的价值决定的。那么，就不是问我们自己是否相信竞争，我们应该问问我们自己，竞争者为了什么而竞争。没有人有意识地希望“取消竞争”，因为当竞争的痕迹最后消失时，社会力量就会机械地服从一种惯例，受本地的鼓动而趋于少数。然而，没有人希望通过一次杀气腾腾的相互斗争而使竞争逻辑地得出结论，问题是选择竞争的目标和比赛的规则。最见得到和最明显的衡量标准几乎总是决定比赛的规则，例如，金钱、名望、喝采或者维布伦先生的“显著的浪费”。我们的文化通常提供了什么其它衡量标准吗？对于我们一直叫嚷的效率、生产率和贡献，它是怎么衡量的？

总的说来，不存在什么衡量的办法，所以，也没有那么多的

竞争来达到这些理想。较高的动机与较低的动机之间的区别并不就是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之间的区别。<sup>①</sup>那是为容易理解的目的而行动与为不引人注目的模糊的目的而行动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激励一个人去谋取比他的邻居更多的利润，他懂得向什么目标去努力。激励他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他怎么能明确知道什么服务是社会性的呢？用什么来检验，用什么来衡量呢？用一种主观的感觉和某个人的意见？在和平的时候，告诉一个人他应该为他的国家服务，你就是说了一句老生常谈的话。若是战争的时候，告诉他这句话，那么“服务”这个词就有许多含义：应征入伍、买公债、节约食品、领取象征性薪俸等等，这类服务的每一项，在他看来，都肯定地是为了使前线的军队比敌军更强大和有更好的武装的具体措施。

所以，你能够更多地分析执行的情况并且能够找出可作比较的因素越多，你为提高质量而发明的定量方法越多，你就能够使竞争达到理想的结果。如果你能够设计出正确的指数<sup>②</sup>，你就能够在—一个车间的个别工人之间，在车间与车间之间，工厂之间，学校之间<sup>③</sup>，政府各部之间，军团之间，各师之间，舰只之间以及州、区、市之间开展一种竞赛，你的指数越好，竞争就越有益处。

## 六

交换材料有明显的可能性。政府的各个部始终在寻找情报，而这种情报或许已经被别的部通过某种不同的方式获得了。譬如

---

① 参看本书第12章。

② 我不是从其纯粹的技术含义上来采用“指数”这个词的，而是适用于类比衡量社会现象的任何设计。

③ 例如，见伦纳德·P. 艾尔斯著的《州立学校体系的指数》，拉塞尔·塞奇基金会，1920年版。定额的原则很成功地应用于“自由贷款运动”，并被“协约国的海上运输委员会”在更为困难的情况下所采用的。

说，国务院需要知道墨西哥石油储备的限度，他们与世界其余地区供应的关系，墨西哥油田现在的所有权，现在正在建造或正计划建造的石油小军舰的重要性，不同油田的比较成本。今天怎么获得这种情报呢？这种情报可能分散在内政部、司法部、商业部、劳工部和海军等部门。或者是国务院的一个办事员在一本参考书中查找墨西哥石油的资料，这种资料可能准确也可能不准确；或者是某人的私人秘书打电话给另一个人的私人秘书要查找一份备忘录，在这过程中正好一个送信人带到一大包莫名其妙的报告。国务院应该能够指派它自己的情报局按照要作决定的外交问题去搜集一些事实，外交情报局会从中央情报交换所得到这些事实。<sup>①</sup>

这种机构很快就会成为最特别的情报中心，就会使得这机构中的人知道政府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他们会涉及一些定义问题、术语问题、统计的技巧问题、逻辑问题；他们会详细而具体地研究全部社会科学。很难理解，除了少数外交和军事秘密以外，所有这类材料为什么不应该向全国的学者公开。政治学家正要从这里寻找真正需要探讨的问题，并且为他的学生寻找真正需要研究的问题。这种工作不需要全部在华盛顿完成，而只需要在工作中与华盛顿取得联系，这样，中央情报机构本身就会具有全国性大学的素质，从大学毕业生中为这些局补充工作人员。他们会与散布在全国大学的管理人员和教师磋商选择命题进行研究，如果这种联系具有其应有的灵活性的话，那么就可以稳定地从大学选聘一些临时的和特约的人员作为常设工作人员的补充，并从华盛顿请来一些交换的讲师。因此，工作人员的训练和补充就合在一起了。一部分研究工作可以由学生来完成，大学中的政治学就会与美国的政治联系起来。

---

<sup>①</sup> 在一些贸易协会中间，这种服务曾有很大的发展。1921年“纽约建筑贸易”的调查，表明了一种歪曲应用的可能性。

## 七

其主要提纲中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州政府、市政府和乡村的区政府，州、市和区的办事处的联合机构能够进行对照和交换工作。在那些联合机构之内，能够组织任何合乎需要的地区合作。只要报道的系统是类似的，就可以避免大量的重复。地区的协作特别合乎需要，因为法定的边界往往与实际的环境是并不相符的，而且它们都有一定的习惯上的根据，去扰乱它的话，就要付出根大的代价。通过互通情报，几个行政区域能够用合作来调解自治的决定。例如，纽约市从市政厅的良好管理来说，已有一个庞大得难以管理的单位。在那个区域里，还存在着一些大的市区如杨格斯、泽西城、帕特森、伊丽莎白、霍布根和贝容。它们不可能都由一个中心来管理，然而它们应该一起履行许多职责。最后，适当的解决办法，可能是正象悉尼和比阿特丽斯·韦布曾经建议过的灵活的地方政府体制。<sup>①</sup>但是，第一步并不是在决策和行动方面的协作，而是在情报和研究方面进行协作。让各个不同的自治城市的官员根据同样的事实看到他们共同的问题。

## 八

否认这样一种情报机构网在政治中和工业中可能成为一种负担和一种不断的刺激物的话，那是愚蠢的。人们能够轻易地想象到这种情报机构网对于寻找轻松工作的人，对于空谈家们、对于爱管闲事的人们都有诱惑力。人们能看到官样文章、堆积如山的文件、令人作呕的调查表、一式文件七份、签字、延误、遗失文件、用136号表格纸代替296号表格纸，由于用铅笔代替墨水笔，

---

① 《大不列颠社会主义联邦的宪法》中的第4章《地方政府的改组》。

或者用黑墨水代替红墨水而退回文件。工作只能作得很坏。没有十分简单明了的制度。

但是，如果人们能够设想在政府各部、工厂、办事机构和大学之间的整个系统，都有人员的流动、材料的流通和互相的批评的话，那么，内部腐败的危险就不会那么大，如果说这些情报机构会使生活复杂化，那也不真实。恰恰相反，通过揭示现在大得难以应付的复杂性就可以使它们趋向于简单化。目前基本上不显眼的政府体制是那么复杂，使大多数人都已不想遵循它，由于他们并没有尝试，他们就把它想得比较简单。正相反，它是难以捉摸的，隐蔽的，含糊的。采用一种情报体制就意味着能减少单位的人员，因为可以利用各种经验，就能减少反复的试验和错误；还因为使社会过程看得见了，这就有助于个人进行自我批评。如果你考虑到一些特别调查委员会、大法官、地区律师、改革组织和为难的官员现在都徒劳地化费时间在无知的混乱中摸索的话，你就会认为这种情报体制并不会增添一大批官员。

如果联系现代环境来对舆论和民主政体的理论进行分析，从原则上说是健康的话，那么，我就不理解怎么能逃避这样的结论即情报工作有助于改善情况，我并不是指本章所指出的少量建议，这仅仅是一些例证。经过训练的人是能够研究出工作的技巧的，他们今天甚至连工作方式都没有预见到，更不用说具体的细节了。现在能够记录下来的现象是很少的，分析的器械也很原始，一些概念也常常是模糊的和未经讨论的。但是，我认为已有的成就足以说明，未被察觉的外界情况是能够有力地被报道出来的，能够把这些情况报道给不同集团的人，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消除偏见，并且可以克服他们的主观主义。

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人们在制订情报工作的原则中，将会找到办法来克服自治的主要困难，克服对付未经发觉的现实情况的困难。由于那种困难，任何自治的社会就不可能既保持必要的孤立，又保持必要的广泛接触，既有地方决策的尊严和个性特

点，又有安全和广泛的协作，保证有力的领导而不减弱其责任心，取得有益的舆论而不是试图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般的舆论。只要对未见过的事件无法建立共同的想法，对分散的行动也无法进行衡量，那么，根据亚里士多德著名的格言，即使在理论上说，只会出现一种民主的形象，这种形象是以孤立社会的人民为基础的，由于他们看法的局限，他们的政治才能也是有局限性的。

但是，目前有一条出路，固然是一条漫长的路，然而是一条出路。基本上它是同样的方法使芝加哥的市民几乎具有和雅典人的眼睛一样，能够看到和得知很遥远的地方的情况。今天已有可能，在付出较多的劳动以后，将更加可能使设想的情况与实际的情况之间缩小差异。达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就会越来越赞成联邦制，越来越少地出自强迫。因为在自治的集团之间，只有联邦制才是唯一可能达成联合的方法，<sup>①</sup>任何地方，这种联合如果不是建立在正确地、共同地接受联邦制问题的思想基础上的话，联邦制社会或者摆向帝国的中央集权，或者摆向地区的无政府状态。这些思想并不是自然产生出来的。它们必须是经过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概括而形成起来的，而那种分析所用的手段是需要经过研究来进行创造和检验的。

选举的设想、地区的操纵、财产制度的改变，都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你不能够从人类所具有的智慧之外去要求更多的政治智慧。任何改革，不管它是多么惊人，都不是真正彻底的，它并不有意识地提供一种办法来克服在有限的个人经验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主观主义意见。有许多政治制度和选举制度，其中代议制是较引人注意的。然而，归根结蒂，知识必竟不是产生于意识，而是产生于意识涉及到的现实环境。当人们根据情报工作的原则去做时，他们走出去查明事实，形成他们的智慧。当他们忽视这样

---

<sup>①</sup> 参看H. J. 拉斯基著《主权的基础》和其它论文，特别是这种题材的论文，以及《行政区域的问题》，《普遍主权的问题》和《多元论的国家》。

作时，他们就到他们自己内在的思想中寻找所存在的东西，他们就发展了他们的偏见，而不是增加了他们的知识。

## 第二十七章 诉诸公众

### 一

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人按照这样一种理论行事，这理论就是对于每一个社会问题都能有一种民意，不过这种事实常常是隐蔽的，因为没有民意，一个人往往就认为并不存在什么社会问题。但是，在我们的政治学理论中，我们继续想得比洛德·布赖斯（Lord Bryce）所预期的更为确实，那就是“舆论的作用是延续的，”<sup>①</sup> 纵然，“其作用……只涉及到广泛的原则。”<sup>②</sup> 而且因为我们试图认为我们自己有着延续的意见，根本不清楚广泛的原则是什么，我们就很自然地以苦恼的困倦和争论来迎接一些事，包括阅读更多的政府报告、更多的统计资料、更多的曲线和图表。因为，首先所有这些都只象带有党派偏见的修辞一样混乱而缺乏兴趣。

假设全国的公民专心阅读情报局的出版物以后，都会变得警觉、消息灵通和渴望知道大量从来都不符合广泛原则的实际问题，而任何这样的假设都太不被人注意了。我并不是在制造那样的假设。情报局主要地是活动家的一种工具，是负责决策的代议制的一种工具，也是工人进行其工作的一种工具，如果它对他们没有用处的话，它最终就将对什么人都没有用处了。但是，就它有助于他们去了解他们工作在其中的环境而言，它确实使他们看到了一些情形。由于这样，他们对一般的公众更加负责任了。

那么，其目的并不是要求每一个公民在所有问题上，都听取专门的意见。而是要求负责的行政官员这样作。情报制度作为一般

---

① 《现代民主政体》第1卷，第199页。

② 《现代民主政体》第1卷，第158页。



消息的来源，作为对日报的核对，是有价值的。但那是属于第二位的。其真正的用处是它在政治和工业两方面都是代议制政府和行政机关的助手。并不是公众，而是从事公众事务的人们需要象会计员、统计员、秘书处成员等等所形成的专门报道员，他们再也不能凭经验办事了。从出发点和从理想上说，它都是一种使公众事务作得更好的手段，而不是更多地了解公众事务作得不好的一种工具。

## 二

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选民，谁都不可能想去领悟这些文件。但是，作为争论的一方、作为立法机构中的一个委员会成员、作为政府、企业、工会中的一个官员、作为一个工业委员会的成员，将会日益欢迎对于争论中的特殊问题的报道。公民就象他现在作的那样，对于民间社团的一些事感兴趣，这些社团雇佣了一个职员阅读文件和写出报告作为对官员的一种检验。许多新闻记者对这些材料进行了一些研究，许多专家和政治学家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除了对现代生活极少的一些方面有点了解以外，就整个现代生活来说，都是门外汉，既没有时间，又缺乏注意力、兴趣和设备来作出专门的判断。行家则在有利的条件下工作，社会行政当局日常必须依靠他们。

外界的普通公众只能根据事后的结果和事先的过程来判断这些条件是否真正可靠。舆论能连续起作用所依靠的广泛原则主要就是关于过程的一些原则。门外汉能要求专家们告诉他是不是已充分地考虑了有关事实，在多数情况下，他自己不能判定什么是有关的事实，或者什么是应该考虑的。门外汉或许能够判断这些集团是不是对自己听到的决定感兴趣，如果有一次投票的话，是不是采用正当的手段进行的，或许是不是用正当的手段认可其结

果的。当新闻报道指出有些情况值得注视时，他就能够注视其过程。如果其正常的结果与他美好生活的理想发生矛盾时，<sup>①</sup>他就能提出疑问，询问这种过程本身是否正确。但是，如果他想在每一种情况中都以他自己的想法去代替客观的过程，象“幸运大叔”在一场比赛的转折点那样去引进“舆论”的话，他就将使自己的混乱变得更加混乱。他就无法遵循一条连贯的思路。

在各种复杂的问题上都做到对公众有感染力，就是意味着总是想要取得大多数没有机会了解情况的人的赞助，而逃避那些了解情况的人的批评。这就要看谁有最响的声音，或者谁有最迷人的声音，谁是最熟练或者脸皮最厚的宣传人员，谁最能在报纸上获得最大的篇幅等等才能作出定论。因为即使编辑对于“另一方”严格地采取公正的态度，这种公正态度也是不够的。或许还有没有被任何有组织的、出经费的和现行的党派所提到的几个别的方面。

普通的公民受到党徒的包围，要求借用他的“舆论”时，或许他很快就会理解到这些要求并不是对他的智慧的赞美，而是对他善良的本性的一种过分要求以及对他的求实意识的冒犯。由于他所接受的公民教育考虑到他的环境的复杂性，他自己就会关心处理过程中的公正和判断正确，在多数情况下，他甚至因此而期望他选出的代表替他注视。他将拒绝他自己去对这些决定承担责任，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他将反对那些为了仓促取胜而抢先从会议上给记者发内部消息的人。

只有坚持在他们还没有通过一种程序之前，不要向他们提出一些问题，现代国家忙碌的公民才能够希望以一种明白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因为由一个党派所陈述的一些问题，几乎总是包含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实际情况的，正象他观察这些情况时总是被一大堆充满他的感情的带有成见的措词所包围一样。按照当时

---

<sup>①</sup> 参看《现代民主政体》第20章。

的风气，他会出现在会议室中，坚持他想望的某种充满热情的理想，例如正义、福利、美国方式、社会主义等等。外界的公民有时能被这些问题激起恐惧或者赞美，但是，永远不能作出判断。在他能对这种论题有任何作为以前，必须先为他除掉其中虚夸的成分。

### 三

如果内部有代表能够当着主席或者策划者的面进行讨论，并能促使讨论关于专家们提供的分析的话，那么事情就好办了。这是任何代议制机构处理生疏的事务的主要组织形式。这里会有人抱有带偏见的意见，但是，这些有所偏袒的人会发觉他们自己面对的是一些与私利无关的人，对方掌握足够的事实，有辩证的技巧，能够从固定的成见、型式和复杂的事物中清理出真实的观念来。这是苏格拉底式的对话，用苏格拉底的全部能力来了解字句的含义，并且更进一步，因为现代生活中的论证必定是由那些曾经探究过环境和人类心理的人们来完成的。

例如，在钢铁工业中有一场严重的争论。每一方都发表了一篇充满最高尚的理想的宣言。这时候唯一值得重视的舆论就是有一种意见坚决主张召开一次会议。说它的事业会受到会议干扰的那一方是几乎得不到同情的，其实在人世间哪儿也不存在这种事业的，或许反对开会的那些人不会那么说。他们可能会说另一方太邪恶，他们不能与奸诈的人握手。于是，舆论所能主张的就是由社会官员组织一次意见听取会，以听取邪恶的证据。不能够用偏袒的话来作证。而是假定会议同意，主席又是中立的，并有一些听他使唤的企业、工会或者劳工部的咨询专家。

贾奇·加里真诚地声明，他雇佣的人都是报酬优厚的，劳动也不过度，然后他又继续概述了从彼得大帝的时代到刺杀沙皇这一段俄国的历史。福斯特（Foster）先生站起来也同样真诚地声

明，这些人受到了剥削，然后他也继续地概述了从那撒勒（巴勒斯坦北部的古城——译注）的耶苏基督直到亚伯拉罕·林肯的人类解放的历史。在这个问题上，主席为了弄清楚“报酬优厚”和“剥削”这两个字眼，拜访了情报人员，询问工资表。这工资表说明了不同阶级的报酬是什么情况的。贾奇·加里是提出他们所有的人的报酬都很优厚吗？他是这么认为的。福斯特先生认为他们都受剥削吗？不，他认为C组、M组和X组是受剥削的。他指的剥削又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指的是他们没有得到能够满足生活所需要的工资。贾奇·加里则说他们得到了。主席问：一个人凭那一点工资怎么能购买生活必需的物品呢？福斯特先生说什么也买不到。贾奇·加里则说能够买到他需要的每一件物品。会议主席就查阅政府的预算和物价统计资料。<sup>①</sup>他作出裁定说，X组能达到一种平均水平的预算，但C组和M组则达不到。贾奇·加里宣布，他并不认为官方的统计资料是正确的，他说预算太高，物价则已跌下来了。福斯特先生则提出异议，说预算太低，而物价已上涨。主席裁定说，这个问题已经不属于会议的裁判权限之内，官方的数字仍然有效，贾奇·加里的专家和福斯特先生的专家应该把他们的意见提到联邦情报局的常务委员会去。

贾奇·加里说，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变更这些工资等级的话，我们将要倒霉的。主席问，你说的倒霉是什么意思？公布你的帐簿好了。贾奇·加里说，我不能，这些资料是秘密的。主席说，什么是秘密的，我们并不感兴趣，我们要向公众发布一项声明，说明C组和M组工人的工资如此这般低于官方公布的足够维持最低限度生活的工资，而贾奇·加里却拒绝增加这些工资，他拒绝说明理由。在经过那种程序之后，一种值得称赞的意义上的

---

<sup>①</sup> 见1921年7月27日《新共和》上刊载的利奥·沃尔曼博士卓越地讨论了幼稚地运用这种数字和“假原则”而写的关于“生活费用和工资削减”的文章。这种告诫很重要，因为它来自经济学家和统计员，他们尽了那么大的努力来改进解决工业争端的技巧。

术语——“舆论”才能够存在。

专家进行调解的价值不在于他提出意见去威胁持有偏见的人，而在于瓦解了那些持有偏见的人们。贾奇·加里和福斯特先生可能始终不大服气，然而可能不得不用一种不同的口吻说话。但是，几乎所有其他没有个人利益纠缠在内的人，都会使自己免遭纠缠。因为那些本来十分易于引起他的反应的纠缠不清的固定成见和口号，却由于专家的这种论证而得到清理。

#### 四

在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上，以及不同的人不同程度地对待较多的个人问题上，记忆的线索和感情的线索是纠缠在一起的。同样的词会包含一些不同的思想，感情随着形象转移，这些感情都有一些名称，这些名称又与这些形象的名称相类似。在没有经过检验的那部分心理中，有大量的联系是仅仅通过声响、接触和连续性得来的。有一些是零碎的感情的附属物，也有一些词曾经是事物的名称，现在则是空名。在许多梦、幻想和惊慌中，我们揭示出头脑中的某些混乱，足以看到朴素的心理是怎么构成的，在没有受到警觉的力量和外界压力的惩戒时，它又是怎么表现的。再没有比我们看到的一间布满灰尘的旧阁楼里的情况更缺乏正常的条理的了。事实、思想和感情之间常常存在着不相称，就象可能发生在剧场的事一样，如果所有的戏装堆积如山，所有的配乐都混乱了，使得蝴蝶夫人穿着瓦尔基的服装，感情奔放地等待着浮士德的归来。一篇社论说：“在圣诞节的高潮时，旧时的记忆使心变软。随着对童年的回忆，重新想起了神圣的教导。当你透过朦胧的半喜半悲的现已死去的亲爱的人的往事来看时，这个世界并不是那么不幸。没有一颗心不曾受到过神秘的影响的触

---

① 正象洛厄尔先生在他的《舆论和民选政府》中运用的。

动……红色的宣传已充斥这个国家——但还是有丰富的绳索、肌肉和灯柱……当这个世界前进时，自由的精神将在人的胸中燃烧。”

头脑里遇见这些词的人需要帮助，他需要一个会区别这些词的苏格拉底，反复讯问他直到他对这些词作了明确的解说为止，使一些词都具有观念上的名称，使它们都具有特定的含义而别无其它含义。因为这些绷紧的音节通过原有的联系已在他的头脑里连结起来，又被他对圣诞节的记忆、他作为一名保守主义者的愤慨以及作为革命传统的继承者的激动都捆在一起了。有时候，这种纠结太大和太古老而难于很快得到澄清。有时候，象现代心理疗法中的作法那样，有一层又一层的记忆回溯到幼年时期，这些都需要区分开来确定其名称。

确定名称的效果，犹如说没得到足够工资的是C组和M组的劳工，而不是X组，但不说劳工受到了剥削，这样说的效果是透彻的。许多概念都重新获得鉴定，而感情则是由具体的原因引起来的，因为它再也不受圣诞节以至莫斯科的每一件巨大的和偶然的事情联系而加强。澄清了的概念有它自己的名称，曾经受到过仔细检查的感情则很容易为这问题的新材料所纠正。它已经埋置在整个个性之中，与整个自我稍微有关；一种挑战会震动整个灵魂。经过彻底的评论以后，这种观念就不再是“我”而是“那个”了。它是客观化了的，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它的命运与我的命运没有密切的关联，而是与我正在行事的客观世界的命运密切相联的。

## 五

这种再教育将有助于使我们的舆论紧扣外界环境。这是使庞大的审查机构、产生成见和弄虚作假的机构都得以取消的办法。什么地方不难了解相应的环境是什么样的，什么地方的批评家、

教师、医生就能够澄清人们的思想。但是，如果什么地方环境对分析家来说就象对他的学生一样是朦胧不清的话，那么就没有足够的办法进行分析。这就需要情报工作。在政治问题和工业问题上，批评家本身是能够有所作为的，但是，除非他能够指望从熟练的记者那里了解到关于环境的确凿情况，否则，单凭他的雄辩术是不能成功的。

所以，就象大部分其它问题一样，尽管“教育”在这里是最重要的解决办法，然而这种教育的价值仍依赖知识的发展。我们所具有的关于人类组织机构和制度的知识仍然是非常贫乏和印象主义的。总的看来，社会知识的收集工作还是杂乱无章的，不是象它应成为正常的行动伴随物那样。然而，人们可以肯定，消息的搜集将不是为了它的最终使用。搜集它是因为现代决策的需要。但是，当它已经搜集起来以后，就会积累成一堆材料，政治科学能够根据它进行概括，还可以为学校创立一种概念化的世界形象。当那种形象建立以后，公民教育就能够有一种准备去对付看不见的世界。

由于教师可以利用一种可行的社会制度模式了，他就能利用它来促使学生正确地意识到如何使他的思想适应这些不熟悉的事实。教师在懂得这种模式以前，他是不能够期望人们对他们将发现的世界有充分的准备的。他能够作到的只是使他们作好准备去应付那个比他们自己头脑所想的更为复杂得多的世界。他能够运用例证法教给学生养成检验他的消息来源的习惯。例如，他能够教他阅读报纸，了解电讯是在什么地方发出的，记者的名字叫什么，通讯社是什么名称，给予报道什么权限，在什么情况下获得这项报道的。他能教学生问问自己，这位记者是不是看到了他所描写的事情，教学生回忆那位记者在过去是怎样描写其它事件的。他能教给他关于审查制度的性质，保密的观念，并向他们提供过去的宣传知识。通过正确地运用历史，使他能意识到固定成见的存在，并且能够培养一种对于由印刷文字引起的意象进行内

省的习惯。通过比较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课程，使他能够得出一种毕生的认识，懂得礼教习俗是怎么把一种特殊的型式强加给想象的。他能够教育人们学会自己进行比喻，使一些关系戏剧化，并且使抽象的观念人格化。他能够告诉学生当他持某种意见的时候，他怎么把自己放到比喻中去，他怎么变得感兴趣的，以及他怎么选择态度，是采取英雄的姿态、浪漫蒂克的态度，还是采取实用的态度。

研究谬误，不仅为了有效的预防，而且能成为引导我们去研究真理的一种激励。由于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脑子里所存在的主观主义，我们才对客观的方法产生了一种不能不有的热情。我们清晰地看到在正常情况下看不到由于我们偏见产生的极大危害和一时的残酷事实。消灭偏见在开始时是费力的，因为偏见与我们的自尊是相连的。但是，在胜利地消除了偏见的时候，就会给你一种巨大的宽慰和美好的自豪。注意力的范围就会有根本的扩展。由于流行的一些观念范畴瓦解了，对于世界的一种坚固的和简单的看法也就打破了。情景变得清晰和充实。随后就激发起对于科学方法的热情赏识，不然的话，这种感情是不容易产生和不可能维持的。偏见是那么容易产生和更能引起兴趣。因为如果你讲授科学的原则，仿佛他们总已接受了，作为一种训练，它们的主要优点是客观，然而会使他们感到乏味。但是，首先教他们克服心理上的迷信，那种追求和征服的振奋精神会使学生产生一种坚实的转变，即从他自我束缚的经验转变成这样的状态——他的好奇心已经成熟，他的理智也已征服了感情。



## 第二十八章 诉诸理智

### 一

我曾经几次写成了这本书的结尾，然后又把它们扔到一边了。所有这些结尾稿中都系着最后几章的命运，看来每一种思想都已在最后的几章中占有了篇幅，所有难以理解的问题，凡属作者没有忘记的，也都已得到了阐明。在政治生活中，英雄并不是在以后一直生活得快乐的，或者完美地结束他的生命的。并没有结尾的那一章，因为在政治生活中，英雄面前的未来，比他身后记载的历史要丰富得多。在作者的想象中，到了最后的一章，有礼貌的读者也已厌倦得开始悄悄地在看他的表了。

### 二

当柏拉图临到他认为该总结的地方时，他的自信变成了怯弱，由于他想到如果说要让他回答政治生活中理智在什么地方，听起来会是多么荒谬。《理想国》第五卷中的那些句子甚至很难让柏拉图来表达，它们是那么透彻和那么严格，使人们既不能忘记它们，也不能依靠它们。所以，他让苏格拉底向格劳孔说，由于他说了“什么是使一个国家能够进入一种更确实的形式的最低限度的变革，”<sup>①</sup>他将在笑声中遭破坏和被溺死，因为“如果看上去不是太放肆的话。”他会欣然说出那种想法的，那就是“直到哲学家们当上皇帝，或者这个世界的皇帝和王子们都具有哲学的精神和力量，而且政治的大人物与智慧结合成一体以前……城市将永远不会结束邪恶，——不，人类也永远不会结束邪恶。……”

---

① 《理想国》，第5卷，第473页，乔伊特译本。

简直想象不到他说过这些可怕的话，当他认识到这些话是一种实现不了的理想时，他就对他的无可匹敌的崇高理想感到困窘。所以，他赶紧补充说，当然，“真正的舵手”将被称为“一个空谈者，一个空想家，一个无用的人。”<sup>①</sup>虽然，它保护他不受希腊人的指责，说他缺乏幽默感，但是，这种富于机智的承认错误给一种庄重的思想提供了一层补白花絮。他开始挑战并警告阿德门德斯说，他必须“把哲学家们的无用归咎于那些不用他们的人，而不是归咎于哲学家们自身。舵手不应恭顺地乞求水手们接受他的指挥——那不是自然的规律。”他以这种傲慢的姿态，匆忙地拾起理智的工具，消失在学园中，把世界丢给了马基雅维里。

因而，在理智和政治之间首次大的遭遇战中，理智的战略是气冲冲地退却。但是，正象柏拉图告诉我们的，当时这艘船是在海上。自从柏拉图写书以后，曾有许多船在海上，而今天，无论我们的信仰是聪明还是愚蠢，我们不再能称一个人是一名真正的舵手，只不过因为他懂得怎么去“注意年度和季节，天空、星星和风向，以及属于他的技艺的其它一切。”<sup>②</sup>凡属使那艘船能顺利地航行所必须考虑的事，他都可以什么也不考虑。因为海外有一些反叛者，他不能说：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都更加糟糕……要我驾驭一次叛变是不符合自然的规律的……要我考虑反叛也不符合哲学的规律……我懂得怎么航行……我并不知道怎么去驾驭满船的水手……如果他们并不认为我是驾驶的人，我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大家将跑到礁石上去，他们就该受到他们罪恶的惩罚；我仍自信我懂得较多……。

### 三

每当我们在政治活动中诉诸理智的时候，又出现了这种比喻

---

① 《理想国》第6卷，第488—489页。

② 《理想国》第6卷，第488—489页。

的困难。因为用理智的方法去对付一个无理性的世界是有一种内在的困难的。即使你同意柏拉图说的真正的舵手对于船舰是最了解的，你也必须回想他并不是那么容易认识到的，这种有疑问的事使得大部分水手感到不信服。根据解说，水手并不懂得他所知道的事情，舵手则全神贯注于星星和风向，并不知道怎么去使水手了解他所知道的事情的重要性。当海上发生反叛时，每个水手没有时间作出象专家们那样熟练的判断。舵手没有时间去和他的水手们商议并且查明他是不是真正象他自己把自己想的那样聪明。因为教育是需要许多年的事情，而紧急的事件则是几个小时的事情，这完全属于专科院校的事情，例如，告诉一个舵手真正的解决办法是通过一种教育赋予水手们较好的证据观念。你只能在陆地上向海员讲述。在危急关头，唯一的建议是用枪，或者发表一篇演说，或者提出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或者提议妥协，采取合适的手段去平息这次反叛，证据观念是什么就是什么。人们只是在岸上计划许多他们能进行的航程，并且必定是为了他们的生路而去研究那些长期才能变更的航道。他们将会用几年或者几个世代的时间来进行研究，不只是在紧急的时刻。没有什么比需要区别假的危急还是真的危急更伤脑筋的了。因为当流传惊慌的事时，一个危机接踵另一个，实际的威胁与想象的恐惧混合在一起，根本不可能建设性地运用理智。看来宁可要任何一种秩序而不要任何的混乱状态。

只有在一个前提下，即经过长时间可靠的稳定，才能够希望人们接受理智的方法。这并不因为人类是愚蠢的，也并不因为向理智呼吁是出于空想，而是因为在政治问题上，理智的进展还只是刚刚开始。在政治中，我们的理性观念仍然是宽广而缺乏概括性的，对实际的指导还太抽象和太粗糙，除非总体大得使个别的特性都相互抵消而呈现出很大的一致性。政治中的理智在论断人们的个别行为时特别不成熟，因为在人类的行为中，刚刚出现的最小变化常常导致最复杂的差异。或许那就是为什么在对付突

然发生的情况时，我们企图坚持完全向理智呼吁的话，我们就要失败和受到嘲笑。

## 四

当我们掌握理智时，理智本身进展的速度比必须采取的行动的速度慢一些。所以，在政治学的现状中，对于一种情况转变到另一种情况有一种趋向，即还没有清楚地了解第一种情况以前，在事后就作出很多政治的批评，别无其它。不论是在发现不知道的事，或者在宣传已经证实的事情中，都有一个时差，这个问题应该比过去更大程度地吸引政治哲学家的注意。主要是在格雷厄姆·华莱士的授意下，我们已开始检验一种看不到的环境对于我们意见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单凭经验知道很少一点儿以外，我们并不了解政治学中时间的因素，尽管它直接关系到任何建设性计划的可行性。<sup>①</sup>例如，我们能看到，由于某种原因，任何计划恰当与否，要视实施所需要的时间长度而定。因为时间的长度还将依赖于这计划所提供的假设的材料是不是与其真实的材料一样。<sup>②</sup>这里就有一个确实受到现实主义的和经验丰富的人们重视的因素，它有助于以某种方式同机会主义者、庸人和空谈家划分开来。<sup>③</sup>但是，时间的计算是怎么引进政治学的，现在我们还不能用任何系统的方法来进行了解。

直到我们更清楚地知道这些问题为止，我们至少能够记忆起有一个理论上最困难而实践上却很重要的问题。它将有助于我们珍爱柏拉图的理想，而不同意由于那些不听从理智的人的邪恶

---

① 参看H·G·韦尔斯：《人类在形成中》一书开始的章节。

② 任何机构的情报工作对当前的事情分析得越好，人们当然就可能越少地按照过去的事实来研究未来的问题。

③ 我认为在反动分子、保守分子、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之间有一些区别，并非全部，是由于社会问题的变化速度的直觉估计不同而产生的。

所仓促作出的结论。在政治中，很难服从理智，因为你是试图使两个到目前为止有不同步法和不同步速的进程合在一起，在理智还处于难以捉摸的和独特的状况以前，政治上的直接斗争将会继续需要一些天生的才智、势力和无限的忠诚，这是理智既不能提供，也不能控制的，因为对于生活方面的事实的理解力是很一致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在许多重要的决定和大部分临时决定中几乎都是不完善的，到目前为止，没有选择，只有采取直觉的行动，用命运进行赌注。

但是，我们能够从那些直觉中产生一种理智的信仰。我们能够运用我们的机智和我们的力量去为理智提供一些立足点。透过我们对世界的想象，我们能够对一些事件看到较长远的前景，只要可能，就可以避开现在，让这种较长远的前景来支配我们的许多决定。然而，即使有这样的意愿去考虑未来，我们一再地发现，我们也并不确实知道怎么样按照理智的支配来行动的。人类的问题中，可以由理智来支配的数量是很少的。

## 五

可是，在那种得自自知之明的宽厚精神中，有一种高尚的虚假观念以及一种不可论证的信念，认为我们群居的人类没有不渴望一个更加友好的世界的。那么多愁眉苦脸的人彼此搅得心绪不宁，而这些苦恼并不全都是重要的。在有許多不确知的事，以及许多行动必须依靠猜测的情况下，对于保留纯粹的体面的要求是强烈的，人们认为必须生活得犹如良好的意愿都会实现一般。我们不能够证实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会如愿，也不能够证实为什么憎恨、偏狭、猜疑、固执、保密、恐惧和说谎是不利于舆论的七种极大的罪恶。我们只能够坚持这样的意见，那就是在诉诸理智时它们没有存在的余地，从较长远来看，它们是有害的；对于超出我们自己的范畴和生命的这个世界，采取我们所坚持的一种观

点，我们才能够珍爱一种强烈的偏见来反对这些罪恶。

如果我们不让恐惧和狂热那么深刻地影响我们，使我们束手无策并由于对人类的前途失去信心而失去对长远事务的兴趣，那么我们是能够作得更好的。这种绝望是没有根据的，正象詹姆斯说的，因为所有把握我们命运的设想，从来都是孕育着成果的。对我们目睹过的野蛮行为，我们已有了解，因为它是怪诞的，所以不是决定性的。说得文雅一点，这种野蛮只发生在1914年至1919年的柏林、莫斯科和凡尔赛，而不是阿美其顿。人们越是在实际上固执野蛮和歇斯底里的行为，他们就越有权力，由于发生了另一次大战，因而情报、勇气和努力都再也不能为所有的人设计出一种美好的生活，人们这么想并不愚蠢。

恐怖曾是那样巨大，但也不是遍及全球的。有腐化，但也有廉洁。曾经有混乱，也曾经有奇迹。曾有大量的谎言，也曾有人决心去揭露它。当人们否认，有一些人已具有的，更多的人以至很多人也可能具有时，这并不是一种判断，而是一种情绪。你可以由于一无所成而感到绝望。也可以对曾有过三个头脑而感到绝望，尽管肖先生即使对这样的事也不绝望。但是，你不能对这种可能性——由于人所展示的任何人类素质的美德而存在的可能性——感到绝望。如果在这十年所出现的邪恶中，你还不曾见到过你所希望增多的男男女女，不曾知道你所希望增多的重大事件，那么上帝对你也无能为力。